中国军事通史 第五卷

西汉军事史

目　录

第五卷　西汉军事史

绪　论

《西汉军事史》包括西汉王朝（前206年～8年）和新莽时期（9～23年），共228年。全书分为11章，共42万余字，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广阔背景，勾画出西汉战争、军制、国防、军事技术与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探讨这个时期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明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总结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经验与教训，以为今日之借鉴。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盛的封建朝代。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存在联系与交往。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有力地促进我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与周边蛮夷戎狄诸族的往来与融合，产生了“定于一”的大一统观念。而以农业中铁农具的广泛运用与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更强烈要求国家的统一。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①，创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然而，秦的统一，仅止于实现中原旱地农业区与南方水田农业区的统一，还不是中国全部领土的统一，而且国家的政治统一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发挥便二世而亡。代秦而立的西汉王朝，不仅重建专制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并以其宏伟的气魄和非凡的胆略，相继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和开

---

①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拓边疆的斗争，巩固、发展、扩大了秦始皇开创的统一事业，除实现大漠以南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统一，还将西域、河西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和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封建的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之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推动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中原华夏族加快了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成分的步伐，更加发展壮大，其族名也因汉朝的影响而改称为汉。周边的一些民族，由于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开始走上封建化的道路，扩大了中国社会封建化的范围。此外，随着张骞的"凿空"与西域纳入中国的版图，中西交通从此开辟新纪元，外来文明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也远距离地向外传播。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汉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体现到军事领域，便在战争、军制、国防、军事学术等方面形成许多新的特点，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风貌。

西汉的战争较秦代有着很大的发展，不仅种类和性质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而且其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也与前代有所不同。下面，让我们按照西汉军事发展的历程，先作个简要的回顾。

（一）前期（汉高祖元年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 206～前 141 年），主要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这个时期的战争是从楚汉战争拉开帷幕的。楚汉战争是继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但它与秦的统一战争具有不同的特点。秦代的统一战争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兼并战争发展而来的，是经过长达 100 多年的长期准备而发动的，秦国一开始就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据巨大的优势，秦强而六国弱，所以当秦始皇依靠强大的武力，从中央突破，由远及近，各个击破时便势如破竹，屡战屡胜。楚汉战争与此完全不同。这场战争是由秦末农民战争转化而来的。由于秦朝在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未及彻底清除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便二世而亡，六国旧贵族乘农民大起义之机，纷纷组织武装，

加入反秦行列，妄图借以复辟秦以前的分封割据局面。秦朝的统治被推翻后，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的项羽，为满足自己割地自立、称霸天下的野心，公然凭借手中的强大武力，分封许多诸侯王而自称西楚霸王，使割据的局面重新出现。这样，楚汉战争就不仅是一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统一全国的战争了。但在这场战争开始之时，被项羽封到巴蜀、汉中的汉王刘邦，面对的却是实力强大的项羽，自己处于劣势的地位，汉弱而楚强，屡战而屡败。在这种形势下，他只能斗智而不能斗力。因此，他采取以智取胜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按照张良的献策，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外交、人才诸方面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为自己营造全局上的优势，并运用自己的智谋，首创了在统一的战略指导下，由多个战区互相配合的战争指导艺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历尽艰难曲折，他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由弱变强，最后击败项羽，夺得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农民战争结束了秦朝的暴政，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统治者又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努力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得到缓解。但是，西汉王朝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由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了争取同盟军，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曾对一些拥有实力的异姓将领实行分封，随着刘邦的胜利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建，这些异姓诸侯王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矛盾便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在秦亡之后，中央政府无暇南顾，又中断了对“西南夷”的统治，南越也乘机割据自立，摆脱中原王朝的管辖。更严重的是，北方的匈奴奴隶制国家在秦汉之际日趋强大，不断向四周扩大势力，趁中原多事之秋重新夺占河南地，并与西汉的异姓诸侯王互相勾结，威胁到西汉政权的安全。起初，刘邦试图借助战胜项羽的余威，首先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但当他率兵北上迎击匈奴时，却在平城陷入重围。他因此意识到，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西汉王朝，民贫国穷，尚

不具备战胜匈奴的实力，而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却是朝廷的肘腋之患。于是他改取先内后外的方针，对匈奴暂时忍辱退让，以“和亲”与开放关市来换取边境的安宁，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内部的统一，使用武力和欺诈手段，逐一铲除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同姓诸侯王，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刘邦之后，其后继者仍然坚持先内后外的方针，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间，虽曾发生一场吕氏专权与铲除诸吕的斗争，不过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影响西汉奉行的政策。可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姓诸侯王的实力也在急剧增长，从而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生冲突，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汉景帝利用人民厌恶内战，七国勾结匈奴失去民心的有利条件，调动汉军，集中主力，控制要点，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平息了这场叛乱。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后一次大斗争，至此宣告结束。接着，西汉朝廷收夺封国的军政大权，从根本上消除地方的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随着国力的逐步增长，西汉王朝采取措施积极加强北方的边防。汉文帝不仅接受贾谊积极防御匈奴的主张，还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筑城屯田，并大力发展养马事业，扩充骑兵队伍。在加强边防力量的基础上，他对匈奴的入侵，就地组织了几次反击。这不仅对防御匈奴的更大规模入侵起到一定作用，而且为日后汉武帝大举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二）中期（汉武帝建元元年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年），主要致力于改制与开边，实现国家的空前大统一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府库充溢，国力强盛，拥有强大的骑兵集团和比较完备的步、骑、弩、车、水相结合的军事力量体系。年轻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甘于墨守“无为而治”之政。他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制，在政治上扩大皇帝控驭朝廷和地方的权力，严厉打击豪强地主，抑制诸侯王势力，在军事上强化皇帝对军权的控管，抓紧中央常备军的建设，在经济上加

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以非凡的气魄，积极致力于开拓边疆的斗争。这是继秦始皇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边疆的战争，它同秦始皇的开边也有不同的显著特点。秦始皇的开边，是在刚刚灭掉六国、创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久进行的，限于国力，只能采取南攻北守之策。汉武帝的开边，则是在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充分准备、拥有比秦代更加强盛的国力基础上进行的，采取的是全面出击的策略。在北方，他改变前期守边、堵击一类拒敌于外的防御战法，起用年青的将军卫青、霍去病，率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远途奔袭，迂回包抄，追歼匈奴主力，连续取得河南、漠南、河西、漠北诸战的胜利，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①。为断匈奴右臂，又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令赵破奴攻破楼兰、车师，李广利出击大宛，军事与外交互相配合，使西域诸国脱离匈奴而归汉，并令李息、徐自为统率大军平定西羌的叛乱，设护羌校尉加以监护。在南方，命唐蒙出使夜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并命杨仆、韩说、路博德诸将率领水陆大军统一东瓯、南越和闽越，置郡县加以治理。此外，在东北还出兵讨伐起兵叛汉的卫氏朝鲜。这一系列开边兴利、继往开来的举措，以其辉煌的战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②

然而汉武帝的军事活动是以人民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加上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导致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汉武帝晚年乃“悔远征伐”，下诏“罪己”，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后继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史记、汉书·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

的昭、宣二帝“因循守职，无所改作”①，再度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策，使社会生产又获得一定的发展，西汉王朝因此得以继续维持几十年的兴盛局面。在此基础上，汉宣帝命赵充国平定西羌叛乱，命郑吉袭破车师，发五将军联合乌孙共击匈奴。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设金城属国安置降羌，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诸国。匈奴在遭到汉军的连续打击之后陷于分裂，郅支单于远走西域，呼韩邪单于率部归汉，大漠以南地区从此与中原实现统一。《汉书》因此称颂汉宣帝曰：“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②。

（三）后期（汉元帝初元元年至新朝地皇四年，前48～公元23年），军事随着政治的腐败逐步走向衰落

汉元帝之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最高统治权力落到了宦官与外戚手中，政治愈来愈加黑暗与腐朽，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此时，西汉统治者既无暇也无力继续致力于边疆的开发和统一事业。只有在汉元帝时，使西域都护骑校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借助武、昭、宣时代反击匈奴、远征西域之余威，矫诏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屯田吏士4万人，冒着冬日的严寒，漫天的飞雪，分兵沿西域南北两道远征康居，击灭西迁的匈奴郅支单于，使匈奴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这可以说是西汉中期反击匈奴战争的余绪，也是西汉后期对开拓边疆事业唯一的一个贡献。

在西汉王朝危机四伏之际，外戚王莽代汉而立，建立“新”朝。他为缓解危机施行的“改制”，反而加深了各阶层的灾难，使“众庶各不安生”③。他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狂妄和愚蠢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对他们实行歧视和侮辱的政策，又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使早已安定下来的边境重新燃起战火。王莽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又急忙调动大军，四出征讨。但他所进行

---

①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② 《汉书》卷八《宣帝纪》赞。

③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的战争同此前汉王朝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统一边疆的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属于推行民族压迫的不义之战，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危机，激化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各地分散的农民反抗斗争由小到大，终于汇合成声势浩大的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它不仅比秦末农民战争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无论在组织、斗争目标、策略和战略战术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当农民军经过 6 年的分散战斗之后，逐渐意识到王莽政权的黑暗统治不仅造成广大农民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损害到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因而毅然与反莽的豪强地主武装实现联合。一批文化水平、政治识见和军事才能较高的豪强地主和刘氏宗室成员加入到农民军的战斗行列，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社会号召力，并明确提出推翻王莽统治的政治目标，建立自己的政权，将反莽斗争迅速地推向高潮。这个时期的农民战争较之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在军事上也表现出自己明显的特色。在军事路线上，避免了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是先依据一定的根据地而后再求发展；在作战形式上，初具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初始形态。他们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姿态，通过棘阳、淯阳、宛城等一系列攻坚战予莽军以沉重打击，再经昆阳决战歼灭敌军主力，很快便攻入长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军仅仅战斗了六个月便被秦军挫败，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及时地争取江淮下游的各路起义军，与之结成可靠的同盟，而在秦军反攻时陷于孤军作战的被动地位。新末农民军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争取同盟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进而夺取推翻王莽统治的胜利，为后世的农民战争留下了宝贵经验。王莽统治的结束，为东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前进扫除障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综观西汉军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代

的前进，西汉的战争较之先秦已有很大的发展。除了秦代已有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三种基本类型外，还有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之类的战争，如西汉功臣集团、刘氏宗室对诸吕集团的战争。而民族战争当中，除秦代已有的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统一边疆性质的战争，还出现了边疆民族反抗王莽民族压迫的正义之战和王莽压迫边疆民族的不义之战，这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战争现象。在西汉这些种类繁多、性质复杂的战争中，统一是主旋律。正是在这个主旋律的支配之下，统一战争以及带有统一战争性质的开拓边疆的战争成为西汉战争的主流，起着规范、制约西汉战争发展基本方向的作用。

“汉承秦制”。西汉的军制是秦代的继续，仍然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但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开展和加强国家的政治统一，西汉军事上的集权也在不断地强化，从而显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西汉强化军事集权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西汉前期与秦代一样，全国的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之手，而以太尉为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不过其时太尉的官属很少，且常罢省不设，以其职掌归属丞相。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罢除太尉，设大司马以代替之。但此时的大司马仅是一种荣誉性虚衔，并无多大的军政实权，且又时设时省，实际执掌权柄的则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各色名号的将军。而这些将军，多为皇帝的亲信，他们战时带兵出征，平时则多居朝中，直接受皇帝的控制。这样，既削弱丞相权力，又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

二是武装力量体制的调整。为强化中央集权，西汉进一步贯彻“居重驭轻”的原则，大力加强中央军的建设，使之足以控制地方的军队，保卫京师的安全。为确保对中央军的控制，汉初不仅使宫廷禁军、南军和北军自成体系，既互不统辖又相互牵制，而且有时特设卫将军统领南、北军，并设监军以监视之。汉武帝更对南、北两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增强南军中郎卫的实

力，将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在其属下增设期门、羽林二军，由中央直接控制；同时进一步扩充北军，增设中垒等八校尉的精锐部队，也由皇帝直接控制，并增置京辅、左辅、右辅三都尉和城门校尉，以分割北军军事长官中尉（后改为执金吾）的权力，使军事实权进一步集中于皇帝之手。对地方的王国兵，则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①，将王国的官吏包括军事长官中尉的任命权全部收归朝廷。后来还规定王国不得修武备，不得练兵，从而使王国兵纳入郡县兵的体系之中，统一归属朝廷控制。

三是兵种构成及编制的健全。西汉前期与秦代一样，就兵种的构成而言，步、骑、车、舟几大兵种齐全，其中以步兵数量最多，遍置于全国的各个郡县。而骑兵尚处于发展初期，主要是配合车、步兵作战。至汉文帝，骑兵已有一定规模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马政建设的发展，汉武帝为适应大举反击匈奴的需要，又大力扩充骑兵队伍，组织大规模的骑兵集团。此后，骑兵逐渐成为封建国家军队的重要兵种，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被骑兵所取代。同时，由于造船业的发达，汉武帝为拓展边疆，还大力加强舟师即水军的建设，建成比较完整的水军体系。就军队的编制而言，西汉仍以秦代的部曲制为主要形式，但又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领军将军之下的部—曲—屯—队—什—伍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同时还根据边境诸郡特别是北部边郡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军事需要，分别建立包括候望系统、屯兵系统、屯田系统、军需系统、交通系统在内的边郡屯戍兵的组织，使军队的编制更加健全，并把它牢牢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

武装力量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西汉王朝通过以上途径和措施，建立起一支由皇帝控制的强大统一的军队，这是它顺利开展一系列统一战争和开拓边疆战争、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维持长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期安定和繁荣局面的重要条件。刘邦之所以能战胜异姓诸侯王，就是靠手里掌握的一支经过楚汉战争考验的强大军队。刘氏宗室与功臣集团之所以能诛灭诸吕集团，就是由于周勃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控制了南北军的指挥大权。汉武帝之所以能四面出击，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并在晚年"海内虚耗"的状况下，还能比较稳固地维持统治，就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南北军特别是八校尉统率的精锐之师。而王莽之所以灭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的42万精锐部队在昆阳城下遭到农民军的打击而陷于瓦解。西汉的历史证明，没有一支强大统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统一和兴盛。

西汉的国防，也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由于国力强盛，措施得力，西汉的国防设施比前代更加强大统一而坚固。其最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成庞大而完备的国防工程体系。西汉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秦长城加以修缮、改造与扩展。除修缮北方的秦长城，还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将其向西延伸到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并在北方某些地段增修复线。汉长城的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以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长城。与此同时，西汉还在长城沿线新建一批边城、亭障、烽火台与军用道路，使之成为一项集国防、交通、通讯三位一体的完备的边防设施。在中国的历史上，长城的兴建，一般都是为了防御强敌的进攻。但西汉长城的修建，则是在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过程中进行的，往往是在打完一个大的战役之后就修一段长城，然后再以这段新修的长城作为前进基地发动另一个大的战役。所以，西汉长城的修建，具有其他朝代修建长城所不具备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它对反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等族的袭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建设强大的边防部队。随着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战争的不断胜利，西汉的疆域日益扩大，边防线逐步延长，边防任务也更加繁重。为此，西汉大力加强边防军的建设，除令边郡最高

行政长官郡守兼掌军事之职，统率一支多达百人的骑兵部队、负责本郡的防务之外，还通过各种途径组建一支强大的边防部队，部署在绵延数千里的边防线上，而以北方和西北地区为多。这支边防部队有着明确的分工，或守备作战，或屯田耕作，或候望报警，或从事军需供应，各有专责，对保障西汉王朝的安全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拓展军事交通网络。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进一步统一边疆，西汉王朝在秦代开辟的军事交通干线基础上，继续大力加以拓展。在西北，除张骞通西域后开辟的“丝绸之路”，还修筑回中道，将秦代陇西大道延伸到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在西南，除重修秦代的陈仓道、斜褒道与五尺道，还修筑了从甘肃两当到陕西略阳、阳平而南与秦代所修南栈相接的故道，从杜陵（今陕西西安南）到今汉中南的子午道；在东北，修筑了从今河南通往辽东的道路；在北方，则重修了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塞北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与从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渡黄河，经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通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河东道；在南方和东南方，则继续维修南连吴楚的驰道与攀越五岭的新道。此外，西汉政府还在秦代开辟的内河航道基础上，大力发展水上交通，特别是命水工徐伯开凿关中漕渠，使溯河而上的漕粮可从关东直运京师长安，再转运北方或西北前线。这样，便形成一个以京师所在的关中为核心的呈辐射状的交通网络，将京师和内地与边疆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加强国防力量，促进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积极开发和建设边疆。西汉在修筑长城和派兵戍边的同时，还采取徙民实边的重大措施，将大批内地居民徙置会稽、辽东、北方和西北边陲，而以徙往西北地区新置的边郡为主，利用他们垦荒拓疆，并随时防御周边民族的进袭。大批内地移民在边疆安家落户，与屯田士兵一起，为巩固边防，开发和建设边疆，促进汉族与边疆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汉的军事思想，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据《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统计，西汉时期的兵书总数仅有20种左右。但是作为对军事活动进行理性总结和抽象提炼的军事思想，毕竟是来源于战争实践的。西汉战争活动的频繁开展，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总之战争的丰富实践，为军事家实现军事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西汉高祖和汉成帝时期两次组织人力，大规模整理兵书，“删取要用”①，“撮其指要”②，又为西汉军事家继承、借鉴先秦时代优秀的兵学遗产提供了方便。因此，西汉的军事思想，包括战争观、治军原则和作战指导，都比前代有所发展与突破。同时，也正由于上述的缘由，西汉的军事家在他们的军事活动中创造发明颇多，而对其内涵进行理性总结和抽象提炼较少，所以西汉的军事思想也就呈现实践性较强而理论性较弱的特点。

第一，战争观的进步。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既充分肯定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又主张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认为“兵，凶器；战，危事也”③，“兵势，国之大事”，“不可不慎”④。他们一方面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⑤。而是否符合于“天道”则视战争的性质而定，正义的战争“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是“得道”之战；非正义的战争“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是“失道”之战⑥。因此，他们主张用正义的战争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以义诛不义”⑦，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⑧，坚信正义的战争必将战胜不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③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④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⑤⑦ 《三略·下略》。

⑥⑧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义的战争。

西汉的军事家还深入地考察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经济、军事、自然诸条件的关系，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①，因为为政之得失关系到民心之向背，“以弱胜强者，民也”②，“制胜破敌者，众也”③，所以“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政法，塞邪隧”乃是“用兵之上也”④。同时，又强调经济、军事、自然诸条件对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⑤，并指出“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为“临战合刃之急者”⑥。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西汉时期的富国强兵思想蓬勃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对于西汉王朝夺取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治军理论的发展。前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主张以“礼”、“法”两种手段治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这两种手段之外，又提出了“禄”的手段，既强调要以法治军，否则“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又主张“礼、禄”并施，认为“治军之要，在崇礼而重禄”，如能将“礼”与“禄”即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手段结合起来，“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将士“下力并而敌国削”⑦。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疆域的拓展，西汉军事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将帅临阵指挥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因此，西汉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认为，“统军持势者，将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⑧，“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⑨，对将帅的选择与任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标准，要求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坚强的意志、广博的知识、优秀的指挥才能，并对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作了阐述，强调国君与将帅要互相信任，要

---

①④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②③⑦⑧ 《三略·上略》。

⑤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⑥⑨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威信的树立，国君对将帅要施行“权变”之术，要根据将帅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使用与控驭，求贤去邪，“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①。这些主张含有不少真知灼见，为当时和后世的治军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作为军事思想的主体构成部分，西汉的战略战术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就主要范畴还是具体原则而言都有不少的创新之处，从而推动了军事斗争实践的发展。这种创新，在西汉兵书中的突出表现，是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的发展。如《淮南子·兵略训》根据孙子的全胜战略，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思想，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为了实现这种战略目标，作者主张用兵者应先牢牢抓住“必胜”之本，“修政庙堂之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强大的地位，这样虽有军队但不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俯首称臣。同时，在用兵之前应先谋划于堂庙之上即先行“庙战”，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粮储、士卒、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对双方的力量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确信自己确有战胜敌人的条件再行作战，做到“胜定而后战，钤县(悬)而后动”②。赵充国则根据全胜的战略思想，提出了“贵谋”的主张，说“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认为“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善用兵者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是从这样的战略思想和观点出发，他在平定羌乱之后主张“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并上《屯田制羌疏》，指出军队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③，首次对屯田的军事意义作出理论上的论证。他的留兵屯田之举，后来常为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用作守边之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西汉时期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更多的是产生于战争的实践

---

① 《三略·下略》。

②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③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活动之中。西汉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锻炼培育了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将领。项羽、韩信、彭越、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人都是显赫一时的名将，刘邦和汉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和张良等谋士更是智慧超群的军事谋略家，冒顿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不仅以卓绝的战功彪炳史册，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的战略战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军事思想的宝库。例如，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除根据张良的献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还首次创造性地运用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正面战场以防御为主，北方战场以进攻为主，南方战场以牵制为主，敌后战场以干扰为主，另有间谍谋略战场以瓦解敌军领导集团为主。这种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既是我国军事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见的创举。彭越在敌后战场承担牵制楚军的任务，“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①，调动楚军往来追逐，疲于奔命，这种避实击虚，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也是我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井陉之战，韩信深入险地，设背水阵，大破赵军，这又是对“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古兵法的一大突破。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不仅针对匈奴流动性大、机动性强的特点，首次统率独立的骑兵集团深入大漠，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奔袭，并采取正面冲击、侧翼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了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略战术。杨仆、韩说、路博德等大规模进军岭南，则进一步发展了步兵、舟师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互相配合、水陆或海陆协同作战的战略战术。在新末农民战争中，绿林、赤眉和河北一带农民军，继承秦末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传统，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疲惫、消耗、削弱敌人，使强大集中的敌军顾此失彼，常常陷于被动而遭受失败，从而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流动作战的经验。而到后期，绿林军更从流动战、游击战转向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集中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兵力，以强大的攻势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夺取推翻王莽政权的胜利。这种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尽管还只具初始的形态，但却是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军作战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将我国的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西汉军事史在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正面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历史教训。西汉的军事史再次证明，军事活动与国防建设不应超越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西汉以前，秦始皇曾以其大规模统一战争和国防建设的辉煌业绩，缔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但其军事活动却大大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把全国人民推向极其苦难的深渊，结果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秦朝的灭亡。西汉初期的几代统治者，注意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轻刑慎罚，同时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忍辱退让的“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于铲除内部割据势力的斗争，尽可能把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又推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促成“文景之治”，为国家的昌盛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中期，经济繁荣，府库充溢，汉武帝调整政策，大举开展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的战争，同时大力加强国防的建设，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繁荣昌盛的国家闻名于世界。对他的这个卓越的历史功绩，我们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当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仍然用兵不止。这样，几十年的连续战争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再加上他穷奢极欲，广事兴作，又几乎耗尽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阶级矛盾，终于引起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出现了“盗贼并起”的局面。事实确如司马光所评述的那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① 但汉武帝毕竟与秦始皇不同，他面对人民的不断反抗，能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

逐步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危害，曾对大将军卫青表示："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① 后来他终于在征和四年（前 89 年）下诏"罪己"，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息民重农。后继的昭、宣二帝，又能遵守他的遗愿，与民休息，西汉因此又继续了几十年的兴盛局面，而未"袭亡秦之迹"。这段历史再次昭示人们，在任何时候，军事活动与国防建设，都是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的，因此必须控制在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而让人民作出无法忍受的牺牲，必将产生不堪设想的负面效应。这是西汉军事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西汉 200 多年的军事史，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惟愿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更多的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研究，进而涌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

①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第一章　楚汉战争和西汉王朝的建立

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七月爆发农民大起义，历经 3 年急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立即由纷乱走向统一。在灭秦斗争中，逐渐形成项羽和刘邦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和其他许多独立割据的势力。为了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刘邦与项羽及其他割据势力又经过 4 年多的割据混战和楚汉战争，才使历史重新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

第一节　秦朝灭亡后项羽和刘邦之间矛盾的发展

一、鸿门宴

项羽出身于原楚国旧贵族的家庭，自幼流亡，乘秦末农民战争之际，与其叔父项梁起兵于江东。陈胜、吴广牺牲后，项梁、项羽率 8000 子弟兵渡江北上，力挽狂澜，屡挫秦军，并拥立楚怀王孙心。后项梁兵败身亡，项羽在著名的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继而迫降秦军统帅章邯，取得了灭秦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项羽虽为灭秦立下赫赫战功，但胜利的果实却被刘邦抢先摘去。

刘邦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做过秦朝的泗上亭长，借秦末农民战争之机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后联合项梁，共同反秦。巨鹿之战前夕，楚怀王命项羽等率主力北上救赵，命刘邦率兵一部在黄河以南机动作战，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 由

---

[1]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于项羽在河北鏖战，歼灭秦军主力，因而使刘邦在河南的作战颇为顺利，发展较快，并给刘邦乘虚入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汉高祖元年（前 206 年）十月①，正当项羽扫荡黄河以南的秦王朝残余势力时，刘邦率兵 10 万经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进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迫降秦王子婴，灭亡秦朝。接着，刘邦为了称王关中、进而争夺天下，先后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封存府库，还军霸上。刘邦迫降子婴后即进军咸阳，见秦廷宫室豪华，妇女、财宝众多，便想留居宫中，享受起来。军队也失去约束，“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②。这时，将军樊哙向刘邦提出：“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军霸上，无留宫中！”③ 谋士张良也极力劝谏：“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④刘邦采纳他们的建议，离开秦宫，整饬部队，封存府库，撤出咸阳，还军霸上；并由丞相萧何收藏秦朝丞相府的图书档案，掌握了“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⑤等各种资料和情况。

第二，约法三章，除秦苛政。刘邦还军霸上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召集关中诸县父老、豪杰，宣布其基本政策：“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⑥ 同时

---

① 十月：汉初至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仍沿用秦代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因此，汉高祖元年约相当于前 206 年，而“十月”则约相当于前 207 年 11 月。

②⑤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③④ 《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

⑥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派人同秦吏一起巡行各地，向民众告谕约法三章的政策。这一政策受到民众的欢迎，民众纷纷向刘邦的军队奉献酒食，而刘邦又谦让不肯接受，说“仓粟多，不欲费民”①。人民更加高兴，都“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②。

第三，遣兵守关，拒纳诸侯。刘邦刚刚在关中稳定了形势，有人向他建议：“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③ 刘邦按照这一建议，立即派兵加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的防御，准备以武力阻止项羽等各路起义军入关，企图拥兵自立，称王关中。

刘邦所采取的上述三条措施，前两条无疑是正确的，既防止起义军进城后的腐败，又争得关中地区的民心，从而对后来的楚汉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但第三条措施是不合时宜的。当时项羽的实力远远超过刘邦，阻止项羽西入关中，势必过早地激化刘、项之间的矛盾；而战争一旦爆发，刘邦将遭受无法挽回的失败。

汉高祖元年十一月，项羽麾军 40 万来到函谷关前。他见关门紧闭，异常生气，立即派其得力战将英布攻破关门，长驱西进。十二月，项羽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军所驻霸上相距 40 里。这时，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告密：“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④ 项羽闻言大怒，立即下令军中：“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⑤项羽的谋士范增也建议：“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⑥从而更加坚定了项羽消灭刘邦的决心。

但是，项羽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既容易下决心，也容易改

---

①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④⑤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变决心。他进攻刘邦的决心刚刚定下，军事机密就被其叔父项伯泄露出去。项伯过去与张良很要好，恐项羽进攻时张良遇难，就连夜私自去找张良，叫他赶紧逃离刘邦军中。张良不仅没有逃走，反而立即报告刘邦，协助刘邦拉拢项伯。刘邦当即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求他向项羽转达自己并无背叛之心："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① 项伯允诺了刘邦的请求，并要求刘邦第二天一定要亲到鸿门去面谢项羽。

项伯连夜回到楚军，传达刘邦的求和愿望，项羽果然动摇了决心。第二天，刘邦带张良等人来向项羽谢罪求和，一再表白自己的战功和对项羽的忠诚，不断软化项羽的意志，以致项羽把曹无伤告密的事也告诉了刘邦。在宴席之上，范增三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肯动手。范增又找来项羽的从弟项庄，让他入席祝寿，以舞剑助兴为由，相机刺杀刘邦。不料项伯也拔剑而起，与项庄对舞，保护着刘邦。后张良找来刘邦的随从樊哙，樊哙持剑拥盾闯入宴席，准备与项羽拼命，当场把项羽挖苦一番，项羽竟毫无反应，从而解除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危机。接着，刘邦退席逃归军中，并立即杀死曹无伤；而项羽不仅没有追究刘邦的不辞而别，还接受了张良代表刘邦所奉献的礼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当时双方已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要消灭刘邦易如反掌。但是，由于刘邦、张良巧施计谋，卑辞求和，项羽虚荣骄傲，项伯通敌，故使矛盾暂时缓和下来。

二、项羽分封诸侯

早在巨鹿之战时，项羽因其特殊的战功取得了对各路救赵义军的指挥权，经过"鸿门宴"后又取得对刘邦军队的支配权，因

---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而更加骄狂，不可一世。他怀着强烈的复仇怒火进兵咸阳，首先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继而掠取秦宫的大量财宝、妇女，最后又放火烧阿房宫和秦始皇陵园。这场大火烧了三个月不止，给关中地区造成一场严重的浩劫。加之他在入关前夕就曾坑杀秦军降卒 20 余万，因而引起关中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刘邦入关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形成鲜明对比。

这时，一位颇有见识的读书人韩生，向项羽献计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① 这个建议对于项羽夺取和巩固灭秦后胜利果实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项羽却不以为然，他见秦的宫室已被自己焚烧残破，又一心想着东归故里显示自己的荣耀，遂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②，便轻率地否定这一建议。韩生深为可惜，私下叹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③项羽听说后，居然把韩生烹杀。

于是，项羽在西屠咸阳之后回军戏下（今陕西临潼东北戏下村），开始处理灭秦后的政治事宜。他首先派人去请示楚怀王，想通过怀王肯定自己的特殊功绩，否定原来"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不料怀王既未肯定项羽的特殊功绩，又强调坚持"如约"，项羽大失所望，由此产生废黜怀王的念头，对各路义军将领说："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④ 诸将既慑于项羽的威势，又贪得自己的封赏，无不赞成由项羽来主宰对灭秦后胜利果实的瓜分。项羽遂于汉高祖元年正月，佯尊怀王为义帝，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⑤为借口，强迫其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徙都于郴（今湖南郴州），虽名为天下共主，实则废置于江南。接着，于同年二月发号施令，在全国范围内分封 18 个诸侯王。

分封中着重处理的是刘邦和关中问题。项羽和范增怀疑刘邦

---

①②③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④⑤ 《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

有争夺天下的图谋，但业已和解，又不愿被人说“负约”（负“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之约），经过一番策划，认为“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①，正好可以用来困锁刘邦，便硬说“巴、蜀亦关中地也”②，将巴、蜀二郡分封给刘邦。又经项伯、张良一再求情，连同汉中郡也封给刘邦，遂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为了限制刘邦北上和东下的发展，又将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分有咸阳以西之地，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司马欣为塞王，分有咸阳以东之地，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董翳为翟王，分有关中东北部的上郡之地，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北）。此三人都同项羽关系密切。章邯投降时“见项羽而流涕”③，深得项羽信任，当即被项羽立为雍王，置于军中。司马欣“尝有德于项梁”④，投降后被项羽任命为上将军。董翳最先劝章邯投降，也是一心投靠项羽的。因此，项羽把关中这一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交给他们三人，用以牵制刘邦的势力。但这三个人在关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他们投降后都保住了自己的显赫地位，而20余万士兵（绝大部分是关中子弟）却被项羽全部坑杀。所以，项羽把关中分封给章邯等三人，显然是一种失策。

处理完刘邦和关中问题，其次便是对各路将领和诸侯的分封，主要是根据他们在反秦战争中的贡献大小以及对项羽的态度和关系如何而进行分封的。魏王豹占有原魏国东部的梁地，称东魏王，因项羽“欲自取梁地”⑤，遂将其徙往河东，封为西魏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张耳的嬖臣申阳，曾首先攻下河南郡，项羽救赵时曾迎接楚军于河上，故被封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是项梁所立，仍封为韩王，占有今河南南部地区，都阳翟（今河南禹州）。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⑥，被封为殷王，分有河内郡之地，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赵王歇没有什么战功，被徙封为代王，分有代郡，都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赵相张耳，在巨鹿

①②③④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⑤《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

之战中颇有贡献，又随项羽入关，被封为常山王，分有原赵国的大部地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楚将英布，作战勇敢，常为冠军，又是项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被封为九江王，分有九江郡之地，都六（今安徽六安东北）。番君吴芮，曾“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①，被封为衡山王，分有今湖南及湖北东部之地，都邾（今湖北黄冈北）。楚怀王的柱国共敖，曾率兵击南郡，“功多”，被封为临江王，分有今湖北大部地区，都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燕王韩广，既未亲自率兵救赵，亦未跟随项羽入关，被徙封为辽东王，仅予辽东郡之地，都无终（今天津蓟县）。燕将臧荼，既曾率兵救赵，又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分有今河北中北部地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齐王田市，乃田荣所立，受田荣的控制，始终不肯与诸侯联合抗秦，被徙封为胶东王，仅予胶东地，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齐将田都，不顾田荣的反对，曾率兵救赵，随项羽入关，被封为齐王，分有齐中地，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原齐王建之孙田安，当项羽渡河救赵时起兵攻下济北数城，并引兵投降项羽，被封为济北王，分有今山东北部地区，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

除上述18个诸侯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在分封中也做了处置。一是齐相田荣，因其“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②，因而没有得到王位的封号。二是长期活动在巨野泽一带的彭越，没有参与救赵和入关，也未得到王位的封号。三是赵将陈余，其功不下于张耳，因在巨鹿之战中与张耳发生矛盾，辞去将印，闲居南皮（今河北南皮北），故未得到王位的封号，经诸将求情，仅受封南皮及周围三县。还有吴芮的将领梅鋗，因战功较多，被封为十万户侯。

至于项羽本人，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分有梁、楚之地九郡，都彭城。他不仅国土封域远远大于其他诸侯，而且地位、名分也不同，其他诸侯称“王”，项羽称“霸王”，也就是诸侯之长，在18

---

①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个诸侯王之上。企图以霸王的地位和名分号令诸侯，主宰天下，实行分封，这就是项羽在灭秦之后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和决策。

综观项羽的大肆分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行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历经数百年的斗争而逐步走向全国统一，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反秦斗争中虽然形成楚、齐、燕、赵、魏、韩六国，但始终以楚军的战斗为主，其余五国皆基础薄弱，势力不大。特别是巨鹿之战以后，项羽的声望甚高，实力很强，并直接指挥着各诸侯国、各起义军参加救赵的部队，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心都已在斗争中形成，灭秦后如果措置得当，较快地重新统一国家是颇有希望的。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项羽却倒行逆施，破土分封。不仅保留了业已存在的齐、赵、燕、魏、韩五国，还新封了13个王国，再加上义帝和他自己的西楚，共达20个割据实体。这一大分裂的局面，比战国末期七雄并立的形势还倒退了很大一步，从而造成无数矛盾和隐患；例如，项羽逼迁义帝、自封霸王、占有中原大片富庶地区，这就必然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离心离德；刘邦丢了关中被困锁到巴蜀、汉中，关中被不得民心的章邯等人拿去，这就必然留下了刘邦争夺关中的隐患；魏豹、赵歇、韩广、田市等人都遭到贬斥徙封，大片土地被项羽、张耳、臧荼、田都、田安等人拿去，这就必然会引起新旧诸侯之间的剧烈冲突和纷争；田荣、陈余、彭越等人没有得到封王，他们决不甘心，这就必然会引起使用武力改变政治地位的行动。同时，项羽自己的实力在分封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分封前他直接指挥着各路将领和军队，分封后诸将各自独立，项羽名为霸王，实际上失去了对各路将领和军队的指挥权。特别是英布、章邯、司马欣、董翳、田安等，分封后都各自为王，使项羽失去了众多的助手和亲信，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正由于项羽实行分封后使自己的力量遭到削弱，造成无数新的矛盾和隐患，从而给天下进一步大乱播下了祸种，使刘、项之间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这一主要矛盾得以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给了刘邦很多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条件。

在大分封之后，各路诸侯于汉高祖元年四月罢兵戏下，各就

其国。当时刘邦对于未能获得关中地区十分不满，甚至想不计后果地同项羽一战。他的部属周勃、灌婴、樊哙等都力加劝阻。萧何分析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① 刘邦最后采纳了萧何的建议，离开关中。途中，他又采纳张良的建议，烧绝所过栈道②，一方面防止诸侯兵的袭击，同时又是向项羽佯示自己没有北上争夺关中和东进谋取天下的意图，从而在战略上麻痹项羽，促使之早日撤离关中。

项羽见诸侯各就其国，刘邦也前往汉中，并烧绝栈道，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便放心而高兴地引兵东归，到彭城去做他的西楚霸王。

第二节　楚汉战争的爆发

一、田荣起兵反楚

自汉高祖元年四月诸侯兵罢戏下后，不到一个月天下便动乱起来。因此，楚汉战争的初始阶段，并不是楚汉双方的直接交锋，而是在诸侯割据混战、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

田荣既不满项羽没有封其为王，又不满项羽封田都为齐王、徙田市为胶东王。当田都率兵往临淄就封齐王时，田荣立即起兵相拒，于汉高祖元年五月打败田都，田都逃亡至楚。田荣胁迫田市，不准其徙往胶东，但田市惧怕项羽，背着田荣偷偷徙都于即墨。田荣一气之下，于同年六月追杀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接着他又与彭越联合，授彭越以将军印，令其进攻济北。七月，彭越击

---

①《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

② 栈道，为古代在山崖险处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又名阁道。古代关中通往汉中的道路极为艰险，故刘邦烧绝栈道可起麻痹项羽的作用。

杀济北王田安，田荣遂全部兼并三齐之地。彭越又继而南下，反楚于梁地，大败楚将萧公角。

与此同时，北方的燕、赵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韩广不肯徙往辽东，并发兵拒绝臧荼就任燕王，双方经过几个月战争，臧荼击败韩广，于同年八月杀韩广于无终，全部兼并了韩广的辽东地区。陈余不满于自己被封为南皮三县之侯，更不满于赵歇被徙往代、张耳做常山王，派夏说等人与田荣联系，在田荣发兵支持之下，陈余向张耳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双方战至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十二月，张耳失败，逃亡至汉，投降了刘邦；陈余接回赵歇，立赵歇仍为赵王；赵歇则封陈余为代王，但陈余仍留在赵歇身边任赵相，命夏说以相国的官职守护代国。

这些战乱和变化，一是在全局上削弱了项羽的霸主地位和威信，使各诸侯很难再听命于项羽，进一步离心和瓦解；二是在北方逐渐形成齐、赵、燕三大割据势力，特别是田荣、陈余、彭越都直接把矛头对准项羽，使项羽的北部安全受到相当的威胁；三是为刘邦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北上还定三秦，进而东下争夺天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项羽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总之，项羽分封诸侯之后，天下一日也未得安宁，形势急转直下，完全是项羽咎由自取的结果。

二、刘邦还定三秦

正当田荣、陈余、彭越等人大肆反楚的时候，刘邦集团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做出了北上还定三秦和进而东下争夺天下的战略决策。

刘邦一到汉中，就按照萧何的建议，收取巴、蜀租税，拜韩信为大将，积极加强战争准备，时刻伺机北上、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的反楚战争一爆发，韩信就给刘邦全面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强弱形势。他指出："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

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① 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遂下定"决策东向，争权天下"的决心。

汉高祖元年八月②，正当田荣兼并三齐，彭越反楚于梁地，以及韩广与臧荼、张耳与陈余相互混战之时，刘邦开始还定三秦。其主要部署是：萧何留守南郑，收取巴、蜀租税，负责军食供应；曹参、樊哙为前锋，刘邦、韩信率大军继后；绕开原来已烧绝的栈道，西出故道③，奇袭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然后由西而东，由南而北，逐一平定关中。

由于刘邦就封汉中时采纳张良的建议烧绝了栈道，不论章邯、司马欣、董翳或项羽，都没有料到刘邦会迅速地还袭关中，因而皆无准备。汉军乘其不备，潜出故道，很快即攻占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故道（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关东南）二县，击破西

---

①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② 《汉书·高帝纪》作"五月"，兹从《史记·高祖本纪》。

③ 故道，又名陈仓道。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南行，出散关，沿故道水谷至今凤县，折东南入褒谷出抵汉中。

县（今甘肃天水西南）雍军于白水（今白江）之北，从而顺利越过秦岭，渡过渭水，突然推进到陈仓。这时，雍王章邯在不完全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仓促率部分兵力至陈仓迎战。章邯以轻车骑布阵，被汉军前锋樊哙部一举突破。章邯见汉军来势凶猛，一面引军东撤，一面请求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派兵增援。章邯退至废丘，其弟章平率兵退至好畤（今陕西乾县东）。汉前锋军跟踪追击，在好畤再次击败章平军，随即围困之；刘邦、韩信大军则沿渭水河谷东进，直逼废丘。章邯回到废丘后重新调整了部署，扩充兵力，并得到塞军与翟军的增援，遂把三秦军联合起来，西出至壤乡（今陕西武功东南）之东和高栎（今陕西武功东南）一带，迎击刘邦、韩信大军。韩信一面率兵实施正面攻击，同时调前锋军曹参、樊哙自好畤南下，前后夹击，结果大破三秦军，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章邯再次退守废丘，章平由好畤弃城逃走，汉军迅速攻占好畤和咸阳。刘邦、韩信到达咸阳后，除以一部兵力围攻废丘外，又立即派遣诸将分攻关中各地。这时章平在北地郡兵和翟军的支持下，曾两次向汉军反击，均告失败。在汉军的凌厉攻势下，汉高祖元年八月，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先后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唯章邯尚死守废丘，陇西、北地有部分残余雍军。在关中基本平定的同时，刘邦于同年九月派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收编了占据南阳一带的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王陵的部队，准备策应汉军主力自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方向的大举东进。翌年十一月、正月，汉军在大举东进的前夕，攻拔了陇西、北地二郡，俘虏雍将章平；六月，正当汉军在东方与楚军鏖战之时，关中汉军引水灌废丘城，雍王章邯自杀，关中地区全部平定。这就是楚汉战争的序幕和初战，刘邦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中地区的辉煌胜利，为尔后东进争夺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邦还定三秦，其主要战事不满一月，进展之神速、成果之巨大为战争史上所少见。汉军所以能取得这一胜利，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士气高昂。善于掌握和利用士气，是韩信用兵的一大

特点。出兵前韩信就对刘邦说过："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① 刘邦、韩信正是利用了"士卒皆歌思东归"②的心理，造成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之势。三秦军则相反，由于章邯等人政治上不得民心，军队士气低落，故往往一触即溃。

第二，突然袭击。这是韩信用兵的又一鲜明特点。汉军潜出故道，越秦岭而涉渭水，三秦军无所察觉，达成了战略奇袭的高度突然性，打得三秦军措手不及。首战告捷后，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不为章邯固守废丘所牵制，大胆地分兵略地，连续突击，迅速扩大战果，因而在很短时间内就基本平定了关中地区。三秦军在战前松懈麻痹，没有明确的战守方略；遭受汉军突然打击后晕头转向，仓促应战，盲目行动，毫无成算，因而连战皆败，终归于灭亡。

第三，假象惑敌。这一点张良起了重要作用。开始时他劝刘邦烧绝栈道，麻痹了项羽和章邯等人。汉军一入关中，他又即时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③。同时还把田荣等人的"反书"寄给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④，"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⑤。这样，便给刘邦提供了一个放手夺取关中的大好良机，以致章邯在废丘白白死守十个月，项羽竟未发一兵一卒去援救章邯。

三、项羽北击田荣

自汉高祖元年四月诸侯罢兵戏下，至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春正月，天下政治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对项羽越来越不利，而项羽本人对这些却几乎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应变措施。田荣、陈余、彭越大肆反楚，他没有及时采取任何干预行

---

①②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汉纪一，高帝元年。

⑤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动，直到汉高祖元年七月彭越率兵攻楚，项羽才派了个不知名的将军萧公角去同彭越作战，被彭越打得大败之后，项羽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刘邦还定三秦，占领整个关中，章邯死守废丘十个月之久，项羽又置若罔闻。直到汉军已出武关、入南阳与王陵的部队联合起来东进，项羽才"发兵距之阳夏(今河南太康)"①，做出一点微小的反应。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项羽主要办了两件事。一是杀了韩王成，立了韩王郑昌。韩王成虽然是项梁所立，但他没有战功，而韩相张良又与刘邦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项羽甚为不满。戏下一罢兵，项羽就没有允许韩王成就国，而是把他带到彭城，接着在汉高祖元年七月杀掉韩王成，八月立故吴县(今江苏苏州)令郑昌为韩王；张良则乘机逃到刘邦那里，从此彻底归属了刘邦。二是杀害了义帝。义帝虽已废置于江南，但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地位在项羽之上，和项羽也算是君臣的关系。项羽对此颇不甘心，他不急于处理田荣、陈余、刘邦等问题，却急于去处理义帝的问题。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汉高祖二年十月，项羽命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发兵进攻义帝，击杀义帝于江中。

项羽处理完义帝问题之后，开始考虑如何处理田荣、刘邦等人的问题。依当时形势而言，田荣、陈余、彭越虽与楚相邻，近在咫尺，但他们的目标都在于割地称雄，并无与项羽争夺天下的雄心；而刘邦则不同，不仅长期以来所谋划的都是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大计，而且业已占有巴、蜀、汉中、关陇和关东部分地区，其势力已远远超出田荣、陈余、彭越之上，足以同项羽相抗衡。因此，项羽的主要敌人是刘邦而不是田荣等人。但项羽考虑到田荣等人最先起兵反楚，且彭越反于梁地颇有掣肘之虞，加之张良的战略欺骗，说刘邦没有越关东下的企图，于是项羽决定把战略打击的方向首先指向田荣。他不仅征发了自己直接统率的部队，还派人向九江王英布征兵。英布假称有病未跟随项羽同行，仅遣将率数千人去支援项羽。项羽遂发动了对田荣的大举进攻。

---

①《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汉高祖二年正月，项羽率大军北上，彭越接连北撤，项羽进军至城阳（今山东鄄城东南）。这时田荣已协助陈余赶走张耳，平定赵地，遂亲率大军与项羽会战于城阳。结果项羽大获全胜，大破齐军。彭越率残兵逃往巨野泽和济水之间；田荣在楚军紧紧追逼之下，不敢向东北逃往临淄，一直向北撤逃，部队全部溃散。田荣逃至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被平原人民群起而杀之，项羽重新册立了原来的齐王田假为齐王。这时，项羽本来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剩下的问题由田假去进行政治安抚就行了，平原人民杀死田荣已充分表明对项羽的拥护态度。但是，嗜杀成性的项羽，至此仍不肯罢手，他还要继续在齐地进行战争，屠杀人民，以满足他对田荣的报复心理。田荣死后，项羽又进军北海（今山东北部），沿途大肆“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①，所过“多所残灭”②，因而激起齐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于是齐地人民相聚而叛，田荣之弟田横收集田荣的散兵数万人，起兵于城阳，击败田假。田假再次逃亡至楚，项羽一怒之下杀了田假。于是田横在汉高祖二年四月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继续同项羽作战。项羽连战不能取胜，遂在齐地陷入同田横的长期战争之中。这样，便给了刘邦以还定三秦之后，再继续出关东进的大好战机。

楚汉战争之所以能迅速爆发，关键在于项羽手握重兵而没有及时解决和处理田荣、陈余、彭越等人的割据叛楚行动，遂使刘邦敢于大胆地进军关中。刘邦所以能占领和巩固关中地区，又在于项羽不肯给章邯等人以丝毫援助，没有采取与刘邦争夺关中地区的任何措施与行动，可以说是拱手把关中让给了刘邦。刘邦之所以占领关中后又敢于出关东下，是因为项羽不肯及时正确地结束对齐作战，甘心情愿地陷入齐地而不自拔。项羽在战争初期所犯的这一系列战略指导错误，使自己大大丧失了控制全局的主动权，使刘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发展成与项羽相匹敌的强大势力，成为项

①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羽再也无法制服的敌人，从而严重影响着尔后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第三节　汉军的战略进攻和楚军的反击

一、汉军夺占彭城

正当项羽北上攻齐、陷于长期作战不能自拔之时，刘邦完成了大规模东进的一系列准备。

首先是巩固关中地区，把它作为对楚作战的可靠根据地。一是继续肃清章邯的残余势力，命诸将攻拔陇西、北地二郡，号召"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①，同时加紧围攻章邯于废丘；并遣兵防守和缮治秦时蒙恬所筑河上塞，以御匈奴的进袭，保证关中的安全。二是施惠于民，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开放了秦代的"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②，下令"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③。三是自南郑迁都栎阳，以充分发挥关中地区在楚汉战争中的根据地作用。

其次是进军河南与河东，扫除战略进攻的障碍。当时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西魏王魏豹都各守自己的封地，至少在形式上都是项羽的与国，起着在西部屏蔽项羽的作用；不首先降服这些诸侯国，汉军就无法向项羽发起大规模的直接进攻。汉高祖二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入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镇抚关外父老"④，用政治利诱和军事威胁并行的手段，降服河南王申阳，将其地改为河南郡。同时派战国时韩襄王之孙韩信为将，率兵进攻韩王郑昌。韩信"略定韩十余城"⑤，又急击韩王郑昌于阳城（今河南

---

①②③④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⑤ 《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

登封东南)，遂迫降了韩王郑昌。于是刘邦顺利地占有河南地区，改封韩信为韩王(即韩王信，与大将韩信为另一人)，然后把锋芒指向河东和河内。同年三月，刘邦率兵自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过黄河，运用上述同样手段，迫降西魏王魏豹。同时向殷王司马卬发起进攻，攻克河内(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俘虏司马卬，司马卬被俘后投降，其地被改置为河内郡。这样，河南、河东、河内全部为汉军所占领，便构成对项羽的直接而巨大的威胁。

再次是大造舆论，联合诸侯，孤立项羽。汉高祖二年三月，刘邦率兵渡平阴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到达洛阳，准备对项羽发动进攻。这时洛阳新城的三老董公向刘邦建议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① 刘邦采纳这一建议，立即对项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他亲自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②。同时派遣使者遍告各国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内)士，南俘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③这一政治和外交攻势收到明显的效果。首先响应的是陈余。陈余提出要刘邦先杀张耳，然后出兵助汉。刘邦杀了一个与张耳面貌相似的人，把人头送给陈余，陈余信以为真，遂派出一部分兵力与汉军联合攻楚。其余各诸侯王虽然没有直接发兵助汉，但也对项羽进一步离心离德，采取中立和袖手旁观的态度。特别是项羽最亲近的得力助手九江王英布，从此以后竟没有给项羽丝毫帮助。这样，刘邦便完全达到了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项羽的目的。

完成上述准备后，刘邦于同年四月对项羽发起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萧何、韩信留守关中，继续围攻章邯于废丘。刘邦亲率汉军主力及已经降汉的魏王豹、韩王信、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

①②③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常山王张耳等五诸侯联军共56万人东征。具体部署为兵分三路：曹参、樊哙、灌婴、郦商及陈余所派赵军为北路，由围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河南下，攻取梁、鲁地区，然后与中路会攻彭城；刘邦率张良、陈平、周勃、夏侯婴、卢绾、靳歙、司马欣、董翳及五诸侯军为中路，由洛阳东下，直取彭城；将军薛欧、王吸及王陵的部队为南路，出南阳，攻阳夏，然后东下与中路会攻彭城。这一部署的核心思想是夺取楚都彭城，而不是与齐军配合，聚歼项羽主力于城阳一带。正是这一指导方针的作用，给彭城会战和楚汉战争的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项羽正在城阳一带同田横作战。他听说汉军大举东下的消息后，仍不放在心上，感到“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①，于是确定了先齐后汉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项羽继续亲率主力同田横作战，同时对汉军的进攻作了一般性的防御部署：在西南的阳夏和西部的曲遇（今河南中牟东）派有部分兵力，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由其大将龙且和项它守备，以此分别对抗三路汉军的进攻；首都彭城的兵力不多，似部署在萧（今安徽萧县西北）、砀（今河南永城北）一带。项羽的这一方针和部署，给刘邦夺取彭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而决定彭城会战初期的战局。

在双方上述的部署下，汉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同年四月，北路方面樊哙攻克煮枣（今山东东明南），又击破楚将王武、程处于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尔后转向东北，连克邹（今山东邹县东南）、鲁（今山东曲阜）、瑕丘（今山东兖州北）、薛（今山东滕县南）。曹参、灌婴击败了楚将龙且和项它，攻占重镇定陶，又追击龙且、项它于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由郦商攻克之，遂南下与中路会师。同月，南路方面击破阳夏楚军，尔后东下萧、砀与中路会师。同月，中路方面周勃攻破曲遇楚军的防御，刘邦进抵外黄，这时彭越率兵3万来会，汉军声势进一步壮大。接着向萧、砀推进，会合南北二路，一举攻占彭城。

---

①《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不到一个月时间，汉军完全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夺取了楚都彭城，取得一次重大胜利。进入彭城后，刘邦以为大功即成，令吕后之兄周吕侯驻军于下邑（今安徽砀山），令樊哙继续在鲁地作战，封彭越为魏相国，令其率兵略定梁地，其余大军都驻在彭城、萧县一带，没有作出进一步对项羽作战的部署。刘邦本人则贪于项羽的“美人货赂，置酒高会”①，得意忘形。但是，刘邦的胜利是表面的，项羽所率楚军主力并未受到损失，而且近在城阳。加之刘邦进入彭城后的忘乎所以，这就必然要引起战局的急转直下。

二、楚军回师反击

项羽虽然确定先齐后汉的方针，并继续恋战于齐地，但听说彭城被刘邦占领后，怒不可遏。他立即改变了原来的方针，令诸将率兵攻齐，自己亲率3万精锐骑兵，南下击汉。项羽一向以骁勇善战闻名，楚军在巨鹿大战中无不以一当十，加之彭城失守，全军上下同仇敌忾，人人欲一决死战，彭城一带又地形平旷，利于骑兵突击，因此，项羽南下回击，造成一所向披靡、不可阻挡之势。汉高祖二年四月，项羽以闪电般的行动，从鲁经胡陵至萧，在鲁地作战的汉军樊哙部丝毫未能迟滞楚军的行动，一触而溃。项羽于拂晓前抵萧，立即向汉军发起攻击。汉军向东退至彭城，楚军跟踪追击，遂同汉军主力大战于彭城之下，由晨至午，仅半天即大破汉军，将汉军压迫于谷水、泗水（在彭城东郊，二水相合处）之滨，汉军被歼及落水而死者十余万人。汉军东退无路，争往彭城西南的山区溃逃。楚军紧追不舍，将汉军压迫于灵壁（今安徽濉溪西）以东睢水之边。楚军再次猛烈攻击，汉军又被歼十余万人，其中被逼入睢水而溺死者不计其数，“睢水为之不流”②。

---

①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这时，刘邦被楚军包围，非常危急，几乎被俘。后因突然刮起西北大风，飞沙扬石，天昏地暗，楚军队形混乱，刘邦乘机率数十骑突围而逃，才得免遭于难。刘邦逃至下邑，得到周吕侯部队的保护，利用周吕侯部队对楚军的迟滞，刘邦才得以逃回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在逃跑中，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楚军俘获。其一子一女在途中与刘邦相遇，刘邦为了轻装逃命，多次将其子女推弃车下，幸被夏侯婴保护下来，可见刘邦败逃狼狈之至。

刘邦在彭城惨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损失数十万军队，由进攻转为防御，而且已经投降和响应他的诸侯王也纷纷叛汉。殷王司马卬战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重新投降项羽；陈余发现张耳未死，自己受了刘邦的骗，遂与楚约和背汉；魏王豹则借故归国，绝河反汉，与楚和好；田横也放弃了反楚态度，在项羽杀了田假不久，与楚停战结盟；彭越也放弃了所攻下的梁地十余城，率兵北撤，驻军河上（今河南滑县北）。刘邦完全由主动和优势变成了被动和劣势。项羽则相反，一战而扭转了被动局面，收复了全部失地，声威大震。

项羽所以能取得这次反击会战的胜利，主要在于他握有一支强大而精勇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给汉军以突然猛烈的打击。善于作破釜沉舟的拼死决斗和对敌实施突然猛烈的奇袭，这是项羽战术指挥的两大特色，不论巨鹿决战和彭城会战，都是这样。这次回袭彭城，项羽不是由南而北实施正面攻击，也不是由东而西将汉军击溃，而是由城阳东北经鲁、胡陵至萧，走了一个反“S”形绕至汉军的侧后，然后由西而东猛攻，企图全歼汉军于彭城、谷水、泗水、睢水之间，并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项羽仅以3万骑兵的绝对劣势，居然对数十万汉军实施迂回歼灭作战，这一决心、勇气和战术，都是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正因为项羽高度发挥了骑兵快速突击的优势、部队破釜沉舟的勇敢精神和奇袭战术的特殊效果，所以才取得了彭城反击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给了汉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弥补了楚汉战争开始以来项羽的许多失误。

刘邦在这次会战中的失败，主要教训有三：一是对战争的本

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主要方面即消灭敌军的实力认识不足，把全部着眼点放在攻城夺地上，未能给楚军主力以削弱和打击，这是作战指导方针的错误；二是进占彭城后松懈麻痹，没有针对项羽的反击作出必要的军事部署，没有作战方案和计划，使几十万大军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三是缺少强大的骑兵，也没有强大的车兵，因而在楚军骑兵的猛烈冲击下迅速崩溃。

三、汉军退守荥阳，楚军追击受阻

彭城会战，给了刘邦以巨大的打击。项羽也从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刘邦是自己的主要敌人，遂同田横约和之后，便把主要攻击矛头指向了刘邦，乘胜向汉军发起追击，企图彻底解决刘邦的问题。但是，项羽的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为时已经过晚。刘邦虽然惨败于彭城，但仍有关中地区为其巩固的根据地，并占有关东部分地区，特别是占有荥阳一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足以同项羽相周旋。因此，刘邦仍然是项羽难以制服的敌人。

汉高祖二年五月，刘邦经下邑、虞县（今河南虞城北）沿路收集败散残兵，退至荥阳。刘邦一到荥阳，萧何立即“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①；韩信也从关中驰赴荥阳，协助刘邦谋划军机。这时，楚军已追击到荥阳之东，不断向汉军进攻。韩信把汉军重新组织起来，击破楚军于“京（今河南荥阳南）、索（今河南荥阳）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②，从而稳定了战局，使楚汉双方陷于僵持局面。这是韩信自袭取三秦以来，第二次对刘邦的巨大贡献。袭取三秦，给刘邦奠立了进行战争的巩固基础；破楚军于京、索之间，使刘邦在败逃之中得到立足之地和喘息之机，为尔后重整旗鼓赢得了必要的条件。

---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接着，刘邦、韩信派曹参、灌婴、靳歙等将领率兵去平定梁地一些叛汉降楚的将领，平定了雍丘（今河南杞县）、外黄、燕县（今河南长垣西北）、衍氏（今河南郑州市北）、武强（今河南郑州市东北）、菑南（今河南民权东）、昆阳（今河南叶县）、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等地王武、程处、柱天候、邢说等人的叛变。这样，汉军的战线进一步稳定，以荥阳为中心，北起大河南至南阳一带以及荥阳以东部分地区，与楚军形成对峙。楚军自彭城乘胜东下，收复大片失地，但在京、索一带受挫后，进攻的锋芒锐减，转而调整内部，巩固后方，筹集兵力，准备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

彭城之战虽然楚胜汉败，但综观楚汉战争开始以来双方的得失，刘邦之得大于失，而项羽之失大于得。刘邦虽然在彭城惨败，损失严重，功败垂成，但他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人力、物力和领土都成倍地扩张，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完全摆脱了在鸿门宴前后有可能随时被项羽消灭的危险境地。项羽虽然取得彭城会战的巨大胜利，但他的所得仅仅是收复了自己失去的西楚领土，失去的则是关中和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与国；北方出现齐、赵等独立的割据势力；其最重要的盟友九江王英布已离心离德，居然在刘邦进占彭城时未能助项羽一臂之力；加上长期以来项羽缺少对汉作战的思想准备，兵力明显不足，彭城大捷后无力发展成全局性的胜利，不能越荥阳而西，更不能把战争引向关中和巴蜀。因此，项羽的战略优势，已较战争开始前大大减弱。

第四节　成皋相持和楚汉力量对比的转化

（参见附图 1）

一、成皋相持之初刘邦的决策

彭城会战给予刘邦以巨大的打击，但刘邦是个意志极为坚强

的人，决不因彭城之败而服输。在撤退和逃命的途中，他即开始运筹下一步对战争全局的指导。刘邦自彭城逃至下邑时，突然在途中下马踞鞍而问张良："吾欲捐关已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① 这说明刘邦已从失败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项羽的；像从前那样只联合某些一般的诸侯王，是"无足与计天下事"②，也是不能战胜项羽的；而必须不惜割弃关东的大片土地，用高功厚赏扶植、拉拢几个具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共同联合，才能击败项羽。张良是个杰出的战略谋划者，在失败的逃跑途中他也在不断思考下一步的问题，并已腹案在胸。因此，当刘邦提出问题后，张良立即答道："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③自秦末以来，群雄纷起，豪杰并立，拥兵割地者不计其数，但张良独具慧眼，认为只有韩信、英布、彭越是最具实力的人物，欲破项羽，非此三人不可。当时英布称王于九江，彭越游居于河上，韩信尚在关中，张良建议的实质，就是要策反九江王英布，以便割断项羽的左臂；支持、发展、扩大彭越的队伍，以便破坏项羽的后方；把韩信重用起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令其独当一面，以便在某一个侧翼给项羽痛击。这一建议当即被刘邦欣然采纳，并成为尔后整个楚汉战争的指导思想。

汉高祖二年五月，刘邦退守至荥阳。他根据张良提出的上述指导思想，先后采取以下一系列措施：

第一，策反九江王英布。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后，由下邑撤退到虞县时，即派出策士随何去劝说英布举兵反楚。当时项羽正在乘胜东下追击刘邦，刘邦对随何说："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④ 随何应命而往，

①③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② 《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二年。

④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不久即策反了九江王英布。

第二，鼓动彭越，大肆骚扰项羽的后方。在派随何前去策反英布的同时，刘邦又派人去同彭越联系，以梁地为诱饵，鼓动彭越袭击项羽的后方。彭越曾多次配合刘邦作战，又一贯站在反对项羽的立场上，在刘邦鼓动之下，欣然受命，不断地以“游兵击楚”①，活动于项羽的后方。

第三，组建骑兵部队，加强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的正面防御。刘邦鉴于彭城惨败的教训，一退到荥阳就立即开始组建骑兵，拜灌婴为中大夫，统率骑兵；择选秦时的骑士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协助灌婴训练骑兵。骑兵组建后立即投入战斗，曾于荥阳东大破楚骑；接着深入荥阳东楚军之后，“绝其馕道，起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至襄邑（今河南睢县）”②，以及黄河南岸其他一些地方，不断给楚军以打击。同时，修筑甬道以连接敖仓（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荥阳与黄河，取敖仓之粟以给军食，并屯重兵于成皋、巩县（今河南巩县西南）、洛阳一带，形成多层次的坚固防御，以迎击楚军的正面攻击。

第四，加强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在组建骑兵和部署荥阳、成皋防线之后，刘邦于同年六月返回关中，册立了吕后所生之子刘盈为太子，由萧何辅佐，镇守关中。萧何在关中制定法令，修复宫室，组织县邑，计户口，征粮饷，转漕调兵，将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对项羽的战争。另外，刘邦还亲自率兵围攻章邯，以水灌城，迫降废丘，章邯自杀，尽平雍地80余县，一一设置郡县以加强统治。并部署关中部队，分守四境边塞，确保关中根据地的安全，以有效地支援荥阳前线。

第五，派韩信率兵东进，开辟北方战场。刘邦于同年八月从关中返回荥阳，首先派人与魏王豹联系，劝他归汉叛楚。魏王豹不肯听从，刘邦遂于同月拜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等一道

---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② 《汉书》卷四十一《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率兵北上，开始逐一地进击魏、赵、代、燕、齐各国。

第六，采纳陈平的建议，离间、瓦解项羽的领导集团。刘邦为进一步孤立项羽，曾采纳策士郦食其的建议，“立六国后以树党”①，张良极力反对，连发“八难”②，指出如复立六国之后，则刘邦统一天下的大业必然“去矣”。刘邦否定了郦食其的建议，转而谋于陈平。陈平认为：“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即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③ 刘邦采纳了这一意见，给陈平黄金4万斤，对项羽领导集团实施大规模的离间、瓦解。

刘邦在彭城败后短短几个月内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整和部署，逐步形成一个依托关中，正面相持，南翼牵制，北翼进攻，敌后扰乱，与间谍攻心相结合的对楚作战的全面方针。从而在西起荥阳东至彭城，南起九江北至燕、代的空前广大的空间里，展开我国战争史上空前壮观的战争。它充分体现了刘邦领导集团指导战争全局的高度艺术。

在刘邦做上述调整与决策期间，项羽也制订了自己的方针与决策。他的基本作战方针是：以亲率主力、集中兵力对荥阳、成皋实施正面突破为主；在北翼，依托魏、赵、燕、齐等国为屏蔽，牵制汉军；在南翼，极力逼迫九江王英布参战，以其下南阳、出武关，配合楚军主力的西进。项羽的这一方针，虽然看起来也颇有道理，但多系主观愿望，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北翼诸国虽曾一度背汉归楚，但项羽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的支持和援助，不久在韩信的攻击下一一瓦解。南翼的英布，在项羽强行胁迫之下不仅没有出兵助战，最后反而被刘邦所策反，化友为敌。正面攻击在失

---

①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② 八难，详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和《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③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去两翼配合的情况下自然受到削弱，加之后方不稳及领导集团内部渐次被离间等因素，这就必然难以达成战略突破的企图。因此，项羽的作战方针是简单而疏漏的，缺乏深谋远虑和具体、周密、有效的措施作保证。这种建立在一厢情愿基础上的作战方针，在战争实践中必然要落空。

楚汉战争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双方即各自按照上述方针展开行动，在长达2年又6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全面、激烈、尖锐、复杂、曲折的斗争。

二、项羽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和刘邦的防守

楚军自京、索受挫之后，项羽即开始重新准备大规模地进攻。他一方面整顿内部，筹集兵力，另一方面实现与田横的和解，并联合魏、赵等国从北翼牵制汉军，同时敦促英布从南翼发动进攻。但是，这期间项羽的进攻准备工作受到两个很大的打击：一是在汉高祖二年八月至三年（前204年）十月，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魏、赵、代、燕4国接连被韩信攻克和降服，使项羽的北翼基本崩溃；二是九江王英布已叛楚降汉，发起了对楚军南翼的进攻，项羽不得不派重兵去同英布作战，直到汉高祖三年十二月才把英布击败。因此，项羽的正面攻击一拖再拖，到汉高祖三年春，项羽在失去南北两翼配合的条件下，才对荥阳汉军发起强大猛烈的正面攻击。项羽首先夺回了荥阳以东的各地，将荥阳以东汉军的各个据点逐一击破。然后派兵袭击荥阳至敖仓间的甬道，多次侵夺甬道，切断荥阳与敖仓之间的联系，使荥阳汉军处于乏食的困境。最后，项羽于同年四月，亲率大军包围荥阳，企图一举全歼刘邦领导集团于荥阳城中。这时，楚军在正面战场占有巨大优势，完全有可能歼灭汉军主力及刘邦领导集团主要成员于荥阳，进而赢得战争全局的胜利。

但是，刘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接连采取四项策略，终于解除了正面战场的危机。

第一，计除范增。汉高祖三年四月荥阳被围后，汉军乏食，刘邦首先提出请和，愿“割荥阳以西者为汉”①，双方罢兵休战。刘邦的意图显然是想保住荥阳，以稳定其正面防御。项羽不知是计，竟“欲听之”②。但范增识破刘邦的企图，极力反对议和，对项羽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③项羽对范增十分尊重而信任，称之为“亚父”，遂按照范增的意见，拒绝了刘邦请和，进一步发起猛烈攻击。刘邦知项羽不肯上当，乃是范增的主谋，便令陈平加紧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陈平早已买通项羽周围的人，经常散布范增、钟离昧等人的坏话，“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④。项羽对流言渐生怀疑，便派使者到汉军中去寻风摸底。刘邦亲自招待楚使，按陈平的设计，首先端来好饭好菜，让侍从一见楚使的面就故意惊讶地说：“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⑤遂把好饭好菜收回，换成很差的饭菜招待楚使。楚使回来后对项羽报告了这一情况，项羽便更加怀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⑥。范增本想“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⑦，又遭到项羽的怀疑，十分生气。他愤怒地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请赐骸骨归卒伍。”⑧就这样，项羽唯一的谋士范增，在“天下事大定”的关键时刻离开楚军，欲回彭城，结果在途中生气发病而死。陈平的离间计获得一次重大的成功，虽然没有直接解除荥阳的危机，但对尔后的战争进程却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第二，诈降脱险。陈平的离间计虽然使项羽赶走了范增，但楚军对荥阳的包围仍在继续，刘邦仍处于危机之中。刘邦领导集团认识到，最高统帅刘邦被困于荥阳，不仅对指导战争全局不利，

---

①《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②③⑥⑧《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④⑤⑦《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而且时刻有生命危险，一旦荥阳失守，刘邦被俘，将直接关系全局的成败，因此必须在坚守荥阳的前提下，设法帮助刘邦逃走，以便调集兵力，机动作战。于是，在陈平、纪信等人谋划下，于同年五月制定出一个诈降脱险的方案。该方案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由纪信伪装成刘邦，开荥阳东门向项羽诈降；二是刘邦乘机率少数人从荥阳西门逃走；三是由御史大夫周苛以及魏豹（此时魏豹已被韩信部队俘虏，再次投降刘邦）、枞公等率兵继续坚守荥阳。由于范增已离开楚军，刘邦的诈降十分顺利。纪信假扮成汉王，“乘王车，黄屋左纛”①，声称“食尽，汉王降楚”②，于夜间开城东门出降，同时由陈平派出2000妇女，随纪信一起出城。这时项羽信以为真，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迎接刘邦的投降上，楚军“皆呼万岁”③，停止攻城，纷纷跑到城东来观看刘邦的投降和出城的妇女。刘邦及其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乘机率数十骑从荥阳西门脱身而走。项羽发现受骗后怒不可遏，当即放火烧死纪信。这时，荥阳城早已四门紧闭，防守如故。周苛恐魏豹再次发生反复，刘邦一走他就杀了魏豹，与枞公协力守城，防御仍很坚固，项羽未能攻克。接着，项羽分兵一部围攻荥阳，一部西下，攻拔了重镇成皋。但因有荥阳汉军的牵制，楚军的西进受到了影响。这一情况表明，刘邦诈降脱险并非撤军逃跑，而是留下了重兵防守荥阳，不肯轻易放弃荥阳。他这一招实在高明，否则，项羽连续实现正面突破，就会给汉军造成极为不利的形势。

第三，南下机动作战。刘邦自荥阳脱险后，很快经成皋入关，迅速调集关中的后备力量。他原想立即率兵出关，夺回成皋。谋士辕生献计说：“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④刘邦采纳辕生的意见，于同年五月率兵出武关，与九江王英布一起，进军宛、叶间，并开

---

①②③④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展了一定的攻势，以期调动和疲惫楚军。项羽正在猛攻荥阳，忽闻刘邦出军于南阳，便忽视了自己正面突破的巨大战略利益，而把消灭刘邦本人看成是最高目的，遂不辞辛苦，亲率楚军主力驰赴南阳一带去寻求同刘邦决战，仅留部分兵力于荥阳前线。项羽一到南阳，刘邦立即收兵固守，坚壁不战，使项羽欲战不得，欲去不能，陷于僵持局面。汉军的正面战场却因此减轻了压力，得以进行休整，巩固防御，从而防止楚军的连续突破。

第四，深入袭击敌后。刘邦在南阳一带，一面与项羽相持，一面则派人指使彭越大举攻击项羽的后方，以便更大规模地调动和疲惫楚军。彭越于同年五月大举出击，渡过睢水，绕至彭城侧背，破杀楚将薛公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彭越这一大胆深入敌后、威胁彭城的行动，迫使项羽不能置之不顾。他很快就离开南阳战场，命楚将终公率兵一部防守已经攻克的成皋，自己则亲率楚军主力，千里回师，还击彭越。刘邦见项羽主力东下，立即麾军北上，击破终公，夺回成皋，解了荥阳之围。

以上就是项羽在正面战场对汉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楚军实力雄厚，几乎围歼汉军主力于荥阳，实现正面连续突破。但因项羽忽视歼灭汉军主力和连续实现正面突破的战略利益，一再上当受骗，往返奔驰于成皋、南阳、下邳之间，在正面战场一无所得，因而导致失败。刘邦则相反，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之下，巧施各种计谋，特别是南下机动作战和指使彭越深入敌后，从而调动和疲惫楚军，因而得以转危为安，恢复和巩固正面战场的防御，取得了正面防御的第一次胜利。

项羽的第一次进攻虽然失败，但他的实力损失不大。汉高祖三年六月，他率兵击败彭越，迫使彭越率兵北遁。但他还未及彻底解决彭越的问题，听说成皋被汉军夺回，立即对汉军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比上次更为猛烈，项羽于同年六月集中兵力一举攻克荥阳，俘虏汉将周苛、枞公、韩王信。周苛不肯投降，与枞公同时被杀；韩王信以假投降骗过项羽，不久逃回汉军。接着，项羽又集中兵力猛攻成皋，很快即再克成皋，歼灭汉军一部，汉军退守于

巩县。项羽连克荥阳、成皋重镇，歼灭汉军主力一部，又取得敖仓之粟，声威大震，重新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汉军的正面防御纵深较大，多层次设防，又占巩县一带有利的地形，项羽未能越巩县而西，连续突破。此后，刘邦便开始组织反击。

刘邦本在成皋指挥作战，成皋被围后又陷于危机之中。在成皋城破的前夕，刘邦仅得与夏侯婴共车从成皋玉门（北门）逃出，身边没有部队。刘邦这次逃出成皋后没有再回关中，因为关中的兵员刚刚被他调来成皋、荥阳，并损失了一部。他只好北渡黄河去寻求韩信、张耳的部队来支援正面战场。当时韩信早已攻取魏、赵、代、燕等国，但因楚军"数使奇兵渡河击赵，张耳、韩信往来救赵"①，赵地未得全部平定，故驻军于修武（今河南获嘉），以利同楚军奇兵作战和随时应援正面战场。刘邦自成皋逃跑而来，恐韩信等人有变，遂伪装成汉使，于黎明韩信、张耳尚未起床之际，驰入韩信帐中，收夺韩信的兵权，把部队置于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然后，他命张耳去巡行各地，负责赵地的守备；拜韩信为相国，令韩信征发赵地尚未入伍的兵员，组成一支部队，去进攻齐国，以便进一步从侧翼打击楚军。刘邦自己则统帅韩信、张耳的大军，驻扎在修武，一面抽调部分兵力去增强巩县的防御，制止项羽西下，一面准备南下渡河，从侧后打击楚军，夺取成皋和荥阳。这时郎中郑忠向刘邦建议，在楚军锋芒正盛之时不宜进战，应据险固守，派奇兵一部协助彭越袭击楚军后方，再疲项羽于奔命。刘邦采纳这一建议，于同年八月派将军卢绾、刘贾率步兵2万、灌婴率骑兵数百，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河，与彭越相配合，大肆破坏楚军的后方。卢绾、刘贾、灌婴等采取游击战术，到处"烧楚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而已"②，楚兵来击时"辄坚壁不肯与战"③，与彭越呼应相保。彭越则大举进攻梁地，接连攻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等17城，给楚军后方造成严重的威胁。

---

① 《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高帝三年十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高帝三年八月。

同年九月，项羽深感后方的威胁与破坏严重，被迫第二次回师东下。他命令大司马曹咎守御成皋，对曹咎说："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① 这说明项羽接受了上次的某些教训，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成皋，他自己也以最快的速度，预定15天即重返成皋。于是，项羽亲率主力，急如星火地回师梁地，去同彭越等人作战。这就给刘邦的反击再次提供了战机。但此时刘邦却准备放弃成皋以东地区，集中兵力加强巩、洛的防御，以防项羽再次突破。郦食其建议说："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红女（女工）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指位于今河南沁阳北太行山险隘之道），距飞狐之口（在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②这一建议的实质，主要是劝刘邦进兵夺回荥阳、成皋、敖仓，据敖仓之粟以加强正面防御，同时要全面控制大河南北的要害之处，以使天下诸侯认清汉必胜、楚必败的形势。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引兵渡河，向成皋守军发起攻击。曹咎起初依照项羽的命令，坚守不出，但经不起汉军数次挑战和百般辱骂的刺激，一怒之下率部出击。汉军自成皋城下向东佯败，渡过汜水；楚军渡汜水而追击。当楚军半渡汜水时，汉军乘机突然发起反击，大破楚军，大司马曹咎和塞王司马欣自杀于汜水之上。汉军乘胜收复成皋，进军广武（在敖仓西北黄河岸边），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之东。这就是项羽发动第二次正面进攻的结果。楚军虽然在初期取

---

① 《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高帝三年八月。

② 《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得一些胜利，但因不懂得据守敖仓的战略意义，加之被汉军深入敌后的行动所迷惑与调动，最后以惨败而告终。汉军则相反，在正面战场上实施了多层次、大纵深的坚固防御，从而阻止了楚军的连续突破和深入；加之以深入敌后的机动作战和正面战场的及时反击，取得了打退楚军第二次正面进攻的巨大胜利。

项羽按预定计划，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击败了彭越，收复梁地十余城。当他进兵到睢阳时，听到成皋失守、曹咎兵败自杀的消息。与此同时，韩信的部队顺利攻克齐国，造成对楚军后方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战略形势下，项羽没有改变正面进攻的方针，而且错误地采取两面作战的方针。他命大将龙且率领楚军 20 万到齐国去同韩信作战，他自己则率领楚军主力重返荥阳，于汉高祖四年十月，对汉军发起了第三次正面进攻。

这次进攻远非前两次可比，不仅两翼和后方更无保障，加之一年多来的消耗和两线作战、兵力分散，楚军在正面战场上已无优势可言，实力大为削弱。由于项羽所率楚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甚强，这次进攻一开始，汉军就纷纷退守险阻，不同楚军正面交锋，使项羽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当时刘邦驻军于广武，就敖仓之食以拒楚军，项羽也进军至广武，与汉军相持。项羽求战心切，把刘邦的父亲太公拉到战场，置于高俎之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① 刘邦不为之所动，幽默地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②气得项羽当即欲杀太公，但又被项伯巧言保护下来。项羽又激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③刘邦给以讽刺的回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④项羽大怒，令伏弩暗射刘邦，欲杀死刘邦而乘势攻击。刘邦被射中胸部，伤势很重，但他机智地俯摸其脚说："虏中吾指！"⑤ 以防部队惊慌。受伤后刘邦本不能行动，而

---

①②③④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⑤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张良“强请汉王起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①，然后才把他送入成皋养伤。项羽无隙可乘，继续同汉军相持。但是，相持的战况对楚军越来越不利。同年十一月，龙且的20万大军全部被韩信歼灭，韩信部队逐步南下，不断向楚都彭城附近推进。这时刘邦的伤势已好，回到关中，仅留四日，增调一批部队，重返广武，以更加强大的兵力与项羽相持。彭越又在梁地大肆活动起来，“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②。同年七月，英布在南方战场也活跃起来，被刘邦立为淮南王。项羽在四面受敌、兵疲粮尽的恶劣环境下一筹莫展，与汉军相持到同年八月，被迫与刘邦议和，双方划鸿沟③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妻子送归刘邦，然后于同年九月引兵东归。这就是项羽的第三次正面进攻，前后历时十个多月，一无所获。

综观项羽的三次正面进攻，都是在没有两翼配合与后方可靠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不得不转战于南北，疲困于东西，虽打了无数胜仗，最后却一无所得，终以失败告终。汉军则相反，既有可靠的后方，又有正面战场、北方战场、南方战场、敌后战场以及间谍谋略战的配合，加之善于机动作战，调动、疲惫敌人，因而赢得正面防御战的全面胜利。

三、韩信在北方战场的大举出击

在整个楚汉战争中，给项羽以最大打击的，莫过于韩信所指挥的北方战场。韩信在北方战场的大举出击，共有三次。

第一次，破魏之战。汉高祖二年（前205年）五月，刘邦刚刚从彭城败退至荥阳，正面防御尚未稳定下来，魏王豹即叛汉投楚。这时项羽正和齐、赵谋和，稳定其北翼，以尽快发起正面进

①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③ 鸿沟，古运河名。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经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

攻。魏王豹的叛汉，使刘邦侧背受到威胁。魏据河东，西进可以威胁关中，南下可以截断关中与荥阳的联络，并可与楚军造成夹击荥阳之势。为了解除北顾之忧，刘邦先派郦食其去劝说魏豹归汉，遭到拒绝。随后，于汉高祖二年八月，派韩信、曹参、灌婴等率兵一部，由关中进击河东。进兵前，刘邦问郦食其："魏大将谁也?"郦答："柏直。"刘说："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郦答："冯敬。"刘说："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郦答："项它。"刘说："是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① 战争的发展，完全如刘邦所料。

为了防御汉军的进攻，魏豹于同年八月集重兵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断绝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通往蒲坂的交通，阻止汉军自蒲坂渡河。除蒲坂之外，沿黄河北上的其他渡口如夏阳（今陕西韩城东南）一带等，则兵力寡弱，疏于戒备。韩信探明魏军的部署之后，遂采取佯攻蒲坂、暗渡夏阳的声南击北、避实就虚的战术。他在蒲坂对岸大事集中船只，佯作欲大规模渡河攻击之状，以迷惑魏军。然后与曹参率汉军主力偷偷开赴夏阳，不用船只，而用木罂（口小腹大的木桶）渡过黄河。魏军毫无觉察。曹参渡河后，按韩信预先确定的目标，迅速向魏军的后方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插去。在东张（约在今山西永济东北）大破魏将孙遬，进而攻克安邑，俘虏魏将王襄。汉军的奇袭行动，使魏豹惊慌失措，遂迅即自蒲坂回师，去迎击韩信、曹参。这时，灌婴等乘机从蒲坂渡河，向魏军发起追击。汉军前后夹击，大破魏军。魏豹退至曲阳（约在今山西夏县与垣曲之间），曹参再破之。魏豹逃至东垣（约在今山西垣曲西），曹参跟踪追击，全歼魏军，俘虏魏王豹。同年九月，汉军攻占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尽定魏地，共得 52 县，设置河东、上党、太原三郡。

韩信在北方战场上旗开得胜，一举灭魏，既屏障关中根据地的安全，稳定汉军正面战场的北翼，并以破魏所得精兵支援到荥

---

①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阳前线，增强刘邦的防御能力，同时又为进一步北上、东下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破代、灭赵、降燕之战。破魏之后，韩信立即派人向刘邦提出一个宏伟的战略计划："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① 这一计划的实质，就是让刘邦在正面战场与项羽周旋，韩信在北方大举出击，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进而夺取其全部领地，最后围歼项羽于荥阳。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给韩信增兵3万（连同原来所率部队，共约五六万人），并派张耳做他的助手。于是，韩信在破魏之后，紧接着就发动破代、灭赵之战。

身为代王兼赵相的陈余，当韩信破魏之时，即已预感到对汉作战迫在眉睫。他一面和赵王歇一起筹集赵国的兵力，准备抵抗汉军的进攻；一面命代相夏说率兵南下，驻守于邬（今山西介休东北）东，并命代将戚公屯守于邬县城中，以阻止汉军的北上和东下。韩信于汉高祖二年后九月（即闰月）发起进攻，自平阳沿汾水河谷北上，至邬县东同代军遭遇。曹参迅速击败夏说，夏说大败东走。汉军发起猛烈追击，至阏与（今山西和顺）追及代军。曹参擒斩夏说，全歼代军主力夏说部。接着，韩信、张耳率兵东进击赵，命曹参回军围攻邬县。代将戚公弃城而逃，被曹参追斩。至此，代军基本被歼灭，曹参（似乎还有灌婴）率所俘代国精兵，回到荥阳前线，暂时撤出了北方战场，以加强正面战场的防御能力。

歼灭代军夏说部之后，韩信、张耳率数万汉军乘胜东下，于汉高祖三年十月发起攻赵之战。这时，赵军已作好迎战的准备。赵王歇和陈余集中号称20万大军于太行山八陉口之一的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企图待汉军越过井陉口后，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将其围歼。其谋士李左车向陈余献策说："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麾）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① 陈余是个儒者出身，"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②，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得知上述情报后，十分高兴，遂率军进至井陉口以西 30 里处。半夜，派出 2000 轻骑，令每人持汉军的赤旗一面，从偏僻小路前进，隐伏于赵军大营附近的山中，待赵军全部出营去同韩信作战，"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③。韩信随即传令军中："今日破赵会食！"④命先以万人为前锋，出井陉口，在绵蔓水东岸背水列阵。他认为，"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⑤，故万人先行，不会遭到赵军的袭击。赵军见汉军前锋背水列阵，都大笑不止，以为韩信不会用兵。拂晓，韩信建起大将旗鼓，与张耳率领汉军主力，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井陉口。赵军见汉军主力已越井陉口，以为时机到来，立即出兵迎战。双方大战良久，韩信、张耳佯败而走，进入背水阵中。赵军误认汉军已被击败，遂倾巢出动，空营发起追击。汉军因背水列阵，无处逃走，士兵都人人拼命作战，赵军无法取胜。埋伏在赵军大营附近的汉军 2000 轻骑，乘虚攻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在营垒上全部插起汉军的红旗。进攻汉军背水阵的赵军，正欲退兵，忽见自己的营垒被汉军攻占，以为统帅被俘，顿时大乱。韩信乘势发起攻击，与进入赵营的汉军轻骑兵前后夹击，大破赵军。赵王歇、陈余率溃军逃跑，汉军发起猛烈追击，再败赵军于鄗县（今河北高邑东），斩陈余于泜水之上，杀赵王歇于襄国，全部平定了赵、代各地。

战斗结束之后，诸将皆问韩信："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

---

①②③④⑤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何术也?”[1] 韩信说:“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2]善于出奇制胜,善于掌握和利用士气,这就是韩信灭赵的秘诀。韩信此战,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在破赵过程中,韩信曾下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李左车),有能生得者购千金”[3]。李左车被俘获后,韩信去其缚而“师事之”[4],虚心向李左车请教北攻燕、东伐齐的策略。李左车认为,汉军经过数战已“众劳卒罢”[5],强攻燕国的坚城,必然旷日持久,同时又使齐国获得加强军备的时间,不如“案甲休兵”[6],乘破赵的声威劝降燕国,燕国降服后,“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7]。韩信采纳这一建议,很快即劝降了燕国。

这样,韩信自关中出兵,仅3个多月时间,接连破魏、下代、灭赵、降燕,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在北方战场打开一个大好局面。每次胜利后,“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8],从而给了正面战场以巨大的支援。

第三次,是灭齐之战。韩信破赵、降燕之后不久,项羽接连对荥阳、成皋发动两次大规模进攻,汉军的正面战场一再处于危机之中,刘邦不断告急,加之楚军不断派奇兵渡河进攻赵地,牵制韩信、张耳的部队,使韩信对齐作战推迟了很长时间。汉高祖三年六月,刘邦自成皋逃至修武,夺了韩信、张耳的部队,用以反击项羽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为了在楚军后方给项羽以致命的打击,刘邦命张耳守备赵地(不久于次年十一月立张耳为赵王),命韩信征集赵地尚未入伍的兵员,攻取齐国。韩信经过两个多月的征兵、训练、组建部队时间,刘邦又将曹参、灌婴再次调归韩信指挥,遂于同年九月开始向齐国进军。在韩信出兵的前夕,刘邦采纳郦食其的建议,派郦食其到齐国去劝说齐王田广、齐相田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横背楚投汉，从而采取一个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的方针。

齐国的主要决策人物是田横，其基本国策是割地自保。他虽早已同项羽和解，但从来没有给过项羽丝毫帮助；同彭越仍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彭越大肆骚扰楚军后方，他一向坐视不理；对刘邦也从来没有抱过敌意。当得知韩信准备进攻齐国的消息后，田横等人开始紧张起来，遂集中全齐的兵力20万人，由将军华无伤、田解率领，屯于历下（今山东济南西），准备坚决抵抗。就在这时，郦食其来到了齐国，对齐王田广说："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陈余）；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飞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① 田广、田横等信以为真，遂答应降汉，并撤去历下的守备，日夜同郦食其一起纵酒作乐，毫无戒备韩信之心。

韩信进军至平原西准备渡河时，听说郦食其已劝降齐国，即欲回军停止进攻。谋士蒯彻（《史记》、《汉书》因避武帝讳而作"通"）说："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以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② 韩信听蒯彻之言，于汉高祖四年十月，乘齐军撤兵无备之机，在平原津渡过黄河，突然向历下发起攻击。历下齐军因齐汉议和，毫无戒备，在韩信突然袭击之下即时崩溃。汉军轻易攻占历下，并乘胜疾速向齐都临淄进军。田广、田横等闻讯惊慌失措，以为被郦食其所出卖（其实郦食其和刘邦皆非有意欺骗齐国），当即将郦食其烹杀。由于齐军主力在历下崩溃，无力防守都城临淄，齐国领导集团仓皇出逃。齐王田广逃往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相国田横逃往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守相田光逃往

---

① 《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② 《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高帝三年。

城阳，将军田既退据胶东，将军出吸退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齐国完全陷入崩溃与混乱之中。汉军占领临淄后，又立即分兵发起追击。灌婴追田横至博阳，大败田横所率的骑兵，又追至嬴县（今山东莱芜西北），再次击败田横，继而北上，击斩田吸于千乘。曹参进军济北，连克济北各城。韩信率军东下，沿路攻克齐城，直逼高密。田广在溃败之余，不得不求救于项羽。

项羽正在梁地同彭越作战，忽闻齐国被韩信攻占，深恐其南下威胁彭城，遂答应田广的请求，派大将龙且、亚将周兰率军20万救齐。龙且所率为楚军主力之一部，多系骑兵，约于睢阳、彭城两地出发，经今山东莒县、诸城一线，很快与齐王田广会师于高密。这时，韩信也集中了曹参、灌婴的部队，准备对付齐楚联军。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同龙且夹潍水而阵。当时齐楚联军约20余万，汉军不过数万，龙且占有很大优势。有人向龙且献计说："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①龙且却认为："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②遂决心与韩信正面交锋，一决胜负。韩信先令人做1万多个沙袋，于半夜秘密派人携至上游投入潍水，堵住水流；天明后韩信率兵越潍水至东岸向龙且挑战。龙且率军出击，韩信佯败而走，退到潍水西岸。龙且不知有计，渡水追击，正在渡河时，上游的汉军突然掘开沙袋，潍水暴涨，楚军被冲成两段，隔在东西两岸。韩信乘机发起猛烈进攻，全歼西岸楚军，曹参斩杀龙且，灌婴擒俘周兰，并乘胜渡河，大破东岸齐楚联军，取得潍水之战的全面胜利。接着，汉军四处追歼残敌，俘斩田广于城阳国（治今山东莒县），并俘田光、许章等人，破杀田既于胶东，唯田横逃跑到彭越的军中。汉军全部平定了三齐之地，共得70余城。

---

①②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至此，韩信在北方战场东进2000余里，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下一步围歼项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刘邦在正面战场、南方战场、敌后战场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唯韩信所指挥的北方战场给了项羽以致命的打击。韩信在北方战场的胜利，并不是依靠特殊有利的政治条件、外交条件或强大的军事实力。除了萧何从关中根据地为之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之外，他主要是紧紧依靠自己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灭魏时，陈船蒲坂，暗渡夏阳；灭赵时，背水布阵，偷袭敌营；灭齐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潍水之战时，沉沙断流，半渡而击。所有这些，都是因时、因地、因敌而异，对古兵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确实做到了“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① 相比之下，北方各割据势力的失败，主要并不是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外交条件或军事实力不足所致，而是指挥上的无能。魏豹本拥有优势兵力，却毫无积极主动的精神，只知道消极防守蒲坂，不知道给集结中的汉军以有效的打击；陈余本有决胜的把握，但不肯用“诈谋奇计”，甘愿守株待兔，坐视韩信出奇施巧；齐国本已严密设防，继而迷信和谈，自撤藩篱；龙且实力强大，本可广泛机动作战，使汉军在齐地无法立足，但他偏偏要与韩信夹水对阵，结果一战被歼。韩信在北方战场的胜利，从反面充分证明了：在项羽营垒中几乎没有一个堪称将帅之才的人物被委以指挥重任，这是项羽在相持阶段中转优为劣、转胜为败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四、汉军开辟南方战场

在楚汉战争中，南方战场的开辟，经历了一个策反、进攻、失

---

① 《孙子·虚实篇》。

败、发展、扩大的曲折过程，对整个战争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当刘邦大败于彭城、项羽乘胜而下的时候，九江王英布的态度对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楚汉双方都在积极争取英布。项羽争取英布的方法十分简单，即"数使使者诮让召布"①，责备他楚军击齐时不应称病不往，汉军进占彭城时不应袖手旁观。这种争取方法使英布越来越恐惧，不敢亲自去见项羽的面。而项羽的真实思想是："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②项羽同英布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和项羽的拙劣作法，恰恰被刘邦所利用。刘邦自彭城败退的途中即派出随何率 20 人去策反英布。开始时英布不肯接见，随何通过太宰转告英布说："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即英布的都城六），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③英布于是接见随何，随何便从三个方面对他讲明利害关系：一是直指英布"提空名以向楚"④的事实，即项羽亲自率兵伐齐，而英布仅派兵 4000 相助，刘邦袭占彭城，而英布"垂拱而观其孰胜"⑤，这样对待项羽必然自取祸患；二是指出了楚汉双方的强弱形势，汉军"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坚守而不动"，有"万全"之势⑥，楚军"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有"危亡"之形⑦；三是诱之以重利，言明英布只要发兵背楚，使项羽留兵"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⑧，刘邦则裂地而封英布为王，并许以整个淮南之地。英布终于被随何说服，但慑于项羽的威势，"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⑨。

不久，项羽派遣使者来到英布的都城，一面责备英布没有履行诺言，一面催促英布尽快发兵，配合项羽进攻汉军。英布虽已"阴许畔楚"，但仍在犹豫，未下最后的决心。随何恐英布有反复，便大胆闯入楚使的住处，坐在楚使的上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说："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英布的秘密被公开，大惊失色。楚使怒而欲走，随何劝英布乘机杀掉楚使、归汉。英布遂杀楚使，"起兵而攻楚"①，被逼踏上了背楚投汉的道路。

当时，项羽正在追击汉军，在下邑同周吕侯的部队作战。他一方面联络魏、赵、齐、燕等国屏蔽其北翼，一方面催促英布发兵，组织南翼的进攻，自己则直趋荥阳，准备尽快发起正面攻势。由于英布起兵击楚，不但项羽的南翼进攻计划落空，正面进攻也被大大推迟。项羽不得不派出重兵同英布作战。这样，刘邦的南方战场便很快开辟起来。英布首先发起攻击，给楚军左后方造成很大威胁。项羽命项声、龙且率兵进击英布，双方战斗达"数月"之久。后来英布被龙且击败，率领数千人投降了刘邦。南方战场的初期战况，虽以英布的失败而告终，但对战争全局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它既破坏了项羽的左翼进攻部署，又把项羽的正面进攻推迟"数月"之久，从而给刘邦精心组织成皋、荥阳防御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楚军自彭城乘胜西下受挫于京、索，也是和英布对楚军的牵制分不开的。

英布在南方战场失败后，接着随同刘邦转战于成皋和南阳，对刘邦打退项羽第一次大规模正面进攻也起了相当作用。当刘邦南下宛、叶间机动作战时，英布"行收兵"②，与刘邦相配合，使南方战场又渐趋活跃，很快将项羽由荥阳前线调动到南阳一带，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由于项羽起兵于江东，曾长期转战于江淮一带，政治影响较深，且楚大司马周殷在这一带守备，兵力比较雄厚，加之相邻的临江王和衡山王都没有背叛项羽，因此，英布在南方战场的作战，长期处于艰苦的环境之中。到汉高祖四年春、夏，南方战场日益活跃，英布攻取了九江郡的数县，发展成为一支较强的力量。同年七月，英布被刘邦立为淮南王。这期间，英布通过长期斗争，牵

---

①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制了项羽左后方，特别是楚大司马周殷的兵力，从而给了刘邦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以一定的支援。此后，战局急转直下，项羽自荥阳前线败退。刘邦发起战略追击，汉将刘贾率兵围攻寿春（即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楚大司马周殷叛楚。英布乘机在南方战场大肆活动，迅速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配合刘邦、韩信、彭越，对最后围歼项羽起了重要作用。

五、彭越对楚军后方的袭扰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策动彭越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我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早在反秦战争时期，彭越就曾长期在巨野泽一带从事游击战的活动，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万人之众的队伍。田荣反楚时，他积极响应，其主要目标在于攻取梁地，以求割地称王。刘邦进袭彭城时，他的队伍已发展到 3 万人，率部归降刘邦，被封为魏相国，遂攻取梁地全部地区。刘邦在彭城败退后，他北居河上，成为汉军敌后战场的游击统帅，“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①。在楚汉战争相持阶段，彭越对正面战场的支援极为重大。项羽发动第一次攻势时实力非常强大，包围了荥阳，攻克成皋，刘邦几乎被俘。刘邦连施各种计谋，均未能打退项羽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刻，彭越开始在敌后发挥了关键作用。

汉高祖三年五月，彭越大举南下，不惜千里跋涉，越过睢水，居然绕到彭城东南的下邳，击败楚将项声，杀死楚将薛公，造成威逼楚都彭城之势。项羽被迫千里回师，刘邦乘机解了荥阳之围，夺回重镇成皋。倘无彭越这一千里奔袭下邳的行动，刘邦是难以打退项羽第一次进攻的。当项羽回师攻击彭越时，彭越则根本不同他硬拼，而是在达到了调动项羽回师的战略目的之后，即引兵北上，逃之夭夭。彭越这种避实击虚、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给

---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项羽造成了无法根除的心腹之患。

项羽发动的第二次正面攻势十分猛烈，连克荥阳、成皋重镇，歼灭汉军一部。刘邦虽然夺得了韩信、张耳的部队驻守于修武，但他仍然处于劣势，难以摆脱正面战场的危机。这时，又是彭越的游击战发挥重要作用。汉将刘贾、卢绾、灌婴主要活动在楚军运输线上，而彭越则重点进攻梁地，连克睢阳、外黄等 17 城，使荥阳前线楚军的直接后方梁地全部陷于瘫痪。当时，楚军占据着敖仓，军食问题尚不严重，正是由于梁地的全面瘫痪，才逼迫项羽不得不第二次回师，用 15 天时间去进攻彭越，收复梁地。时间就是胜利。这 15 天的时间，为刘邦提供歼灭曹咎部队、夺回成皋、进军广武、占领敖仓的条件，他才得以粉碎项羽的第二次正面攻势，并极大地改变了汉军在正面战场长期处于劣势的状态。项羽本想用 15 天时间解决彭越的问题，消除这一无穷之患，但他的打算又落空了。彭越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梁地稍事抵抗、把项羽拖了十几天后，即率兵长驱北上，转移到齐地的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项羽往返徒劳，无可奈何地再回荥阳。

项羽的第三次正面进攻长达 10 个月之久，战局越来越对楚军不利。这期间彭越又大举南下，先后采取两大行动。一是攻克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周围 20 余城，得粟 10 余万斛，全部送给了正面战场的汉军。二是再次略定梁地，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配合刘邦的正面战场，切断了项羽由荥阳直接东归彭城之路。正是由于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加之项羽处于刘邦、彭越的前后夹击之中，项羽才被迫与刘邦议和。和议达成之后，因彭越占据梁地，项羽难以直接东撤，而是绕道阳夏，曲线东归。因此，在刘邦粉碎项羽的第三次攻势中，彭越又做出重要的贡献，并牢牢地控制了梁地，成为汉军下一步合围歼灭项羽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第五节 刘邦的战略进攻和项羽的最后失败

一、垓下决战前的形势

就项羽方面而言，自汉高祖四年冬十月曹咎部被歼于成皋，十一月龙且部被歼于潍水，楚军即已陷入被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其后方更加不稳，军食更加困难，兵员日益枯竭，士气日益衰落，军心日益瓦解，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之中。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无疑。但是，项羽之所以能够继续同刘邦在成皋相持10个月之久，关键在于刘邦集团内部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重大而深刻的矛盾，不能迅速地集中全力一举而歼灭项羽。

如前所述，刘邦自彭城败后，即确定了借用韩信、彭越、英布的力量同项羽作战的方针，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韩信，因而赢得了相持阶段的胜利。但就在项羽被消灭的前夕，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同刘邦逐步发生了利益冲突，其中，以韩信同刘邦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起着支配其他矛盾的作用。韩信在取得灭齐之战和潍水之战的胜利后，便开始有意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上书给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① 想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当时项羽正在荥阳发动第三次正面攻势，刘邦见书后愤怒地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②张良、陈平急忙劝解刘邦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③于是，刘邦不得已册封韩信为齐王，从而较大地缓和了双方的矛盾。韩信封王之后，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遂成为在刘、项之间起支配作用的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久，项羽派使者武涉去游说韩信，指出刘邦贪得无厌、欲尽吞天

---

①②③《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下的意图，韩信之所以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项羽的存在，项羽一旦灭亡，刘邦必然要消灭韩信，如今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①，劝他“反汉与楚连和，叁分天下王之”②。韩信因已得刘邦封王，拒绝了武涉的劝说。接着，韩信的谋士蒯彻又两次劝告韩信，说刘邦和项羽都已经精疲力竭，“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③，且韩信自灭魏、破赵、降燕、伐齐、败楚以来，“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④，最好的上策是将楚、汉双方“两利而俱存之，叁分天下，鼎足而居”⑤。武涉和蒯彻的言论，都击中了刘、韩之间矛盾的要害，韩信曾一度犹豫不定，但因留恋刘邦对自己的深情厚义，又自恃功高，认为刘邦不会加害自己，不肯背叛刘邦，没有采纳蒯彻等人的上述建议。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韩信一方面保留在刘邦阵营之内，另一方面又不肯积极地南下对楚作战，企图进一步向刘邦索取更大的封赏。除韩信之外，彭越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利用刘、项在荥阳对峙之机，夺得梁地的大部分地区之后，便开始着手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实力，以便向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的封号。英布虽然已被刘邦封为淮南王，但领地基本在楚军控制之下，所以他最关心的是在南方战场发展自己的势力，夺取更多的土地。这就是楚汉战争决战前夕，刘邦集团内部的基本状况。

上述情况，使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拖延了一个时期。但由于刘邦集团内部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团结统一的局面，最后终于促成了决战时刻的到来。

二、垓下决战

（参见附图2）

汉高祖四年八月，项羽因“兵少食尽”，主动与刘邦议和，划鸿

①②③④⑤《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沟为界，“中分天下”。次月，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引兵东归。直到这时，刘邦尚未看清战争全局的形势，项羽东归之后，他也打算引兵西归。但熟谙兵机战略的张良、陈平建议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刘邦遂下定决心，利用项羽东撤之机发起战略追击。其主要部署是：刘邦亲率大军由西而东追击；约会韩信率兵由东而西；约会彭越率兵由北而南；派将军刘贾率兵一部入楚，配合英布，由南而北，准备会歼项羽于东撤的途中。

由于梁地大部分地区为彭越占领，项羽难以由荥阳直接东撤，而是向东南绕道阳夏、固陵（今河南淮阳北）一带，然后再东赴彭城。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冬十月，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这时，因韩信、彭越按兵未动，没有如期会师，英布、刘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没有取得进展，未能北上会师，遂造成刘邦孤军同项羽对战的局面。项羽东撤至固陵时发现刘邦背约来追，即停止了撤退，向汉军发起猛烈反击。结果刘邦被打得大败，再一次被迫坚壁自守，等待各路援军的会师。刘邦问计于张良，怎样才能使韩信、彭越出兵？张良说：“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今河南淮阳）以东傅海与韩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②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以上述条件派人同韩信、彭越联系，韩信、彭越立即答应出兵；一面继续同项羽对峙，将楚军紧紧拖住，以待各路会师，围歼项羽。于是，战局迅速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首先是齐王韩信的军队进展很快。韩信命曹参留守齐地，亲

---

① 《资治通鉴》卷十汉纪二，高帝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五年。“韩王信”，一本作“齐王信”，以后者为是。

率大军南下，以灌婴的骑兵部队为前锋，直取彭城。项羽的后方空虚，不堪韩信一击。韩信、灌婴连克薛、沛、留（今江苏沛县东南）等县，俘虏楚柱国项佗，攻占彭城。接着转锋西下，克萧、相（今安徽濉溪西北）、酂（今河南永城西）、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鹿邑）等县，与刘邦会师于颐乡（今河南鹿邑东）。其次是英布、刘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刘贾于同年十一月渡过淮水，围攻寿春，遣人诱降了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叛楚后，以九江兵投降英布和刘贾，自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北上克六，与英布、刘贾军会合后，又北上攻克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继而西下与刘邦、韩信军会师。与此同时，彭越也率军南下，与刘邦会师。于是，刘邦的各路大军皆已会齐，遂同项羽展开空前规模的决战。

在汉军四面云集的形势之下，项羽于汉高祖五年十二月由固陵向东退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一说今河南鹿邑东），汉军跟踪追至。这时，楚军的后方已几乎全部被汉军占领，项羽已无处可退，遂下定决心在垓下同刘邦一决胜负。汉军总兵力约五六十万人，其中仅韩信所部即 30 万人。项羽的军队约 10 万人。韩信一向以出奇制胜闻名，但在垓下之战因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项羽善于正面突破的特点，遂部署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五军阵，即："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①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纵深大，正面兵力密集，两翼灵活策应，以利有效地阻止项羽的正面突破。决战开始后，韩信首先发起攻击，项羽挥军反击。因楚军战斗力强而攻击猛烈，韩信失利后撤。项羽挥军追击，孔将军、费将军从两翼向楚军发起攻击，韩信又率兵回击，遂将项羽击败。楚军损失大部，项羽率残部退守垓下营中。汉军乘胜将楚军重重围困，以求全歼。夜间，项羽闻汉军"四面皆楚歌"②，以为汉军已全部占领楚地，感到大势已去，无力再战，遂丢下楚军残部，仅率 800 骑

①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兵，连夜突围而逃。天明以后，汉军发现项羽已突围逃走，刘邦派灌婴率5000骑兵追击项羽，其余汉军围歼楚军残部。项羽自垓下突围后一直向东南逃跑，经过突围作战和途中溃散，渡过淮水来到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时，他手下的骑兵仅剩百余人。在阴陵因迷失方向，被一农夫欺骗，向西走陷入大泽之中，结果被汉兵追及。又经过一番突围战斗，项羽向东逃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手下只剩28骑。汉兵数千人追来，将项羽紧紧包围。项羽对其部下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① 他将28骑分为4队，从4个方向向汉兵突击，然后聚为3处，经反复如此3次战斗，杀死汉兵甚多，自己仅亡2骑。最后，项羽率26骑突围南走，来到长江的渡口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乌江亭长以船迎接项羽，劝其去江东重整旗鼓。项羽感到当初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②遂谢绝了乌江亭长，与其26骑下马步行，持短兵与汉军搏斗。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项羽精疲力尽，身负重伤，自杀而亡。至此，历时3年零5个月的楚汉战争，以项羽的失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刘邦在垓下之战后立即收回了韩信的兵权，平定了楚国各地；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初三即帝位于汜水之阳（曹州洛阳县内，今山东定陶官固堆），初都洛阳，同年五月迁都长安，从而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三、楚败汉胜的主客观条件和原因

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它与秦始

①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皇的统一战争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前者是在一百多年的长期准备、艰苦奋斗、奠定了坚实基础上进行的，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以强灭弱，水到渠成；后者则完全不同，项羽占有极大的优势，刘邦的势力非常弱小，战争全过程基本上都是以弱胜强，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屡战屡败而最后取得胜利。优势的项羽所以失败，劣势的刘邦所以胜利，归根到底是双方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认识不同，对战争全局的指导艺术不同，进而导致优劣易势，成败异变。主要表现有以下七点：

第一，项羽忽视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在灭秦之后大封诸侯，倒行逆施，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破坏了业已形成的统一局面，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加之他在战争中不讲政策，任意地坑降卒，虏妇女，烧城郭，大失人心，激起了人民的反对，逐渐使自己陷于政治上空前孤立的局面。刘邦则完全相反。他处处注意争取人心，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除秦苛法”，“所过秋毫无犯”，大赦“罪人”等等，并顺适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坚持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度，除因策略需要不得已分封某些诸侯外，在战争进程中不断消灭项羽所分封的割据势力，逐步发展扩大自己的统一势力，从而为完成统一事业、夺取战争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

第二，项羽忽视军事地理对战争的影响和作用。拒绝韩生的建议，不都关中，而都于四战之地的彭城，使自己陷于四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之中。这是非常失策的。倘项羽采纳韩生的建议，都关中而霸天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临巴蜀，刘邦欲争夺天下，几乎是无计可施的。刘邦则与项羽相反，他把军事地理看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大因素，早在灭秦入关之时，就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欲据关中而争夺天下。夺得关中后，又进而夺取河东、河南、河内，天下形胜尽入其掌握之中。他利用这一有利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军事战略上的重大优势，进可攻，退可守，使自己立于不败

---

① 贾谊：《过秦论》上。

之地，终于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第三，项羽忽视战争初期的作战对战争全过程的作用和影响。不在刘邦进军关中时予以反击，也不在刘邦进军河东、河南、河内时予以反击，直到刘邦率56万大军攻占了彭城，项羽才把对汉作战提上了日程。这是个极大的失误。他明明知道刘邦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却眼看刘邦坐大不予理睬，而自己却去同非主要敌人的田荣作战，解决田荣问题后又继续同田横恋战，一再失去在战争初期战胜刘邦的时机和条件。当他意识到需要用全力同刘邦作战时，刘邦的势力已发展到他无法制服的程度。与项羽相反，刘邦则把战争初期的作战视为极端重要的问题。他开战前进行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用各种战略欺骗手段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齐地的田荣。然后抓住战机，一举夺得关中；关中尚未完全平定，又立即夺取河东、河南和河内，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而后虽遭受彭城惨败，但因战争初期获得巨大胜利，为坚持持久作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项羽要在战争初期打败刘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刘邦如没有战争初期的胜利，就不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项羽忽视外交对战争的作用和影响。战争初期他坐视刘邦消灭关中、河东、河南、河内各盟国而不救，战争中期又眼见韩信消灭北方各盟国而不救，对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英布不采取积极的团结措施，对有争取可能的重要势力彭越没有做任何争取工作，自始至终处于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的地位。刘邦则相反。他把争取盟友看作是制服项羽的一个根本条件，开始时普遍争取天下诸侯，彭城败后重点争取英布和彭越，战争后期不惜巨大代价争取韩信和彭越，终于以强大的联合力量共同消灭了项羽。可以说，没有外交上的密切配合，刘邦就不能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反之，天下诸侯本为项羽所封，项羽稍能重视联合对敌，刘邦就无隙可乘。

第五，项羽忽视后方建设对战争的作用和影响。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不能给前方以充足、及时的人力和物

力补充，并时有后顾之忧，这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刘邦从战争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强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因此，每当形势不利或遭受严重挫折时，他都能得到来自关中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极大地增强了战争能力，屡战屡败而能迅速得到恢复，终于用持久战打败了项羽。

第六，项羽忽视侧面战场同正面战场的配合。在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客观上存在着正面、两翼、敌后等各个战场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既往的战争经验，把全部力量投入正面战场，不认真组织和指挥其他战场的配合，虽然在正面战场打了许多胜仗，最后两翼和后方全部丢失，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刘邦则相反。他在楚汉战争中首次创立了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艺术。他知道敌强己弱，单纯地正面相撞只能失败，要打败项羽必须有各种力量、各种手段和各个战场的配合，正面战场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南方战场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北方战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敌后战场的主要任务是干扰，还有一个由陈平指导的间谍谋略战场，其主要任务是瓦解楚军的领导集团。正是通过这多种战场、多种手段、多种力量的配合，才取得了战争全局上的优势和胜利。这一战争指导艺术，实为我国战争史上的空前创举，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创举。

第七，项羽忽视人才对战争的作用和影响，而刘邦则极为重视人才。就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刘邦都远远不如项羽。但项羽的最大缺点是轻视人才，任人唯亲，独断专行，刚愎自用。韩信是当时第一流军事家，陈平是不可多得的智谋之士，都曾在项羽的手下效力，又都因言不听、计不用而弃楚归汉，并成为项羽的掘墓人。项羽唯一亲信的范增，虽远不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之辈，但也不失为一个智谋奇士，结果还是被项羽赶走而气死。项羽所重用的武将，也没有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物，强大的楚军只有在项羽的亲自率领下才能屡战屡胜，一旦离开项羽的指挥，就会遭到像成皋汜水之战和潍水之战那样的惨败。项羽手下也并非无可任用的将才，如“有名

于楚”、“数窘汉王”① 的季布，就是一个很好的将才，但也始终未得到项羽的重用。项羽轻视人才，实行孤家寡人的政策，这是他失败的最重要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刘邦则不同。他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招纳或笼络到自己的手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以，选贤任能，纳谏如流，是刘邦的最大优点，这一优点弥补了他个人的无数缺点和不足。因此，打败项羽后刘邦总结经验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② 刘邦的这一认识是很深刻的，是实事求是的。楚汉战争的全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才流动和转移的过程，充分反映了人心向背和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的道理。

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智力等各个方面实力的全面竞赛，每一个方面都会在不同情况下给战争的胜负带来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优势一方总是有较多的胜利希望，而劣势一方总是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就上述七个问题而言，项羽能避免其中任何一个错误，都不会导致全局的失败；相反，刘邦如有一个问题处理不当，都无法取得全局的胜利。可见项羽的失败，教训实为深刻；刘邦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综观战争全过程，项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力取胜，即司马迁所说：“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③ 这就是项羽的根本错误，即单纯迷信武力，认为只要在战场上打胜仗就会取

---

①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②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③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得战争的胜利，不懂得正确指导战争全局的艺术。他确实英勇善战，所向无敌，有一套独特的战术，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但他的胜利是局部的，虽然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不少，但在全局上的失败却越多，最后终因全局的失败而失败。刘邦则相反，他坚持以智取胜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决定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不放过一个有利条件，千方百计争取全局上的优势，不怕局部战场的屡战屡败，最后终以全局的优势而夺得战争的胜利。

第二章　西汉初期富国强兵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二月,刘邦在氾水之阳即位称帝,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西汉王朝。此时,西汉统治者面临的是相当严峻的局面。首先,是秦末以来的长期战乱,使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缺衣少食,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其次,是楚汉战争中分封的众诸侯王,还控制着大片的土地和人口,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形成尖锐的矛盾,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再次,是在中原战乱之时,为秦王朝所统一的南方各族,有的又乘机割地自立,而北方的匈奴更是不时南下骚扰,威胁到西汉王朝的安全。面对这种状况,西汉统治者尊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对匈奴采取忍辱退让的和亲之策,而集中力量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改革军事制度,完善国防设施,力求富国强兵,为西汉政权的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汉初的形势

一、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西汉王朝建立后,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但是,由于项羽在秦朝灭亡之后恢复了分封制度,先后在各地分封 18 个诸侯王,使诸侯割据的局势死灰复燃。实力远比项羽弱小的汉王刘邦为了争取同盟军,笼络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在楚汉战争中跟着分封几个诸侯王。刘邦称帝后,正式定封

爵，序分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其中，除封授143个功臣为侯①，食邑而不治民，还有8个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耳、韩王信、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

汉高祖分封诸侯王，是楚汉战争为争取盟友所采取的一种笼络手段，即《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所说的"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可谓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些诸侯王拥有大片封土，手握重兵，不仅同人民渴望统一的历史潮流相违背，而且对刚刚建立的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就在汉高祖登基的当年，燕王臧荼首先举兵谋反，其余诸王也多有反状。后经高祖亲率大军镇压，反叛朝廷的异姓诸侯王被逐一削平。但是，汉高祖却又错误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由于未封同姓诸侯王而使皇室陷于孤立的缘故，因而在诛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氏的宗室子弟为诸侯王，企图借以屏藩皇室。到他去世时，先后共分封了9个刘氏诸侯王。他们是：楚王刘交、吴王刘濞、齐王刘肥、荆王刘贾、淮南王刘长、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

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的结果，并未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史载，经过这次分封，"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②。9个诸侯王国竟占有当时全国大约54个郡③中的39个郡的土地。虽然汉高祖规定所封的诸侯王国，由天子为置

---

① 《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

③ 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汉高祖时全国划为52郡。此据王国维《汉郡考》所考数字，见《观堂集林》。

傅、相，企图借此限制诸王之权力，防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他同时又允许诸侯王可以自行任命除相国外的一切官吏，并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征收赋役。后来，这些同姓诸侯王便利用这个条件，大力恢复和发展封国内的经济，蓄积起巨大的财富，壮大其实力，进而“自为法令，拟于天子”①，与朝廷分庭抗礼，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影响到国家的统一。

二、社会经济的凋敝

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及其对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血腥镇压，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接踵而来的楚汉战争，又使“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②，“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③。为了支持对楚战争，汉高祖虽令萧何镇抚蜀、汉、关中，招抚流亡，并令中原饥民“得卖子，就食蜀汉”④。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只有少量的中原饥民能够跋涉千里，攀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前往蜀地就食。绝大多数饥民还是流离失所，转死沟壑。这场楚汉战争长达四五年之久，“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⑤，更使社会经济陷入彻底崩溃的境地。

西汉建国初年，全国到处呈现一片满目疮痍、荒凉残破的景象。“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⑥。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⑦，其余十分之七八，或死于战火，或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②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③④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⑤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⑥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⑦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游离于西汉政府的控制之外。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高祖路过曲逆县（今河北完县），登上县城，望见其屋室高大，赞叹说："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他回头询问随行的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回答是："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① 被称为"壮哉县"的曲逆，在籍户口竟不及秦时的1/6，其他地方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与人口的大量减少相联系的，必然是土地的大量荒芜。土地的荒芜，造成粮食和物资的奇缺。再加上一些"不轨逐利之徒"乘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有些地区"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②。结果，不仅"齐民无臧盖"，生活困苦不堪，动荡不安的社会无法稳定下来，就是汉朝政府，也因赋役来源陷于枯竭而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以致于"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③。"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④，缺少这个经济基础，西汉王朝的统治便无法得到巩固。

三、匈奴等族对边疆的扰掠

楚汉交战之际，周边各族频繁入犯边疆，边防几乎失控。尤其是北方强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不断驱使骑兵袭扰北方边郡，时刻威胁着西汉北部边疆的安全。

匈奴族是"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民族，兴起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时期的史籍《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等，夏代曾称荤粥，周代称猃狁，战国时始称匈奴。战国后期，匈奴的势力已逼近秦、赵、燕3国，并占有今内蒙古中部以北广大地区。秦统一后，曾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匈奴虽失河南之地，

---

①《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②③《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页。

但仍雄据北方,使秦朝不得不“因河为塞”①,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大修长城,加强防御。秦、汉之际,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领强悍的骑兵,“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②,建立起东接朝鲜,西接月氏、氐羌,控弦30万众的强大国家。西汉建国时,匈奴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③,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南方的西汉边疆,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除了北方的匈奴外,东北还有乌桓等族,西北尚有氐羌,南方又有诸蛮、百越诸族。其中,南方各族原已为秦始皇所统一。但在秦亡之后,中原王朝无暇南顾,已中断了对“西南夷”的统治,南越更乘中原战乱之机割地自立。周边这些民族,他们虽不像匈奴那样直接构成对西汉国防的威胁,但如果中原政局不稳,国力不支,也会发展成为西汉政权的敌对势力。

第二节　与民休息的方针和重农抑商的国策

一、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西汉建立之初,内忧外患互相交织,使西汉统治者感到无比忧虑。汉高祖曾忧心忡忡地对丞相萧何指出:“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④。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呢?汉高祖向儒生陆贾问计,陆贾专门为他写了一部《新语》,为他献上一套治国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陆贾首先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

---

①③《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②《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①，“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②。有鉴于此，他主张实行黄老之学③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轻徭薄赋缓刑，与民休息，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④，“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⑤。所谓“无为而治”，就是在社会经济残破的形势下，把刑罚与赋役征敛控制在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之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陆贾的这个主张，为汉高祖君臣所接受。汉高祖在西汉初期因忙于封王、废王与东征西讨，很少顾及政务，但丞相萧何在具体处理全国的政务时则积极加以贯彻施行。他遵照“无为而治”的原则，“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⑥。萧何深知，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要求安定，不希望无休无止地变动，因此他和汉高祖所定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及其下属的官僚系统，皆因循秦代旧制，只在个别地方根据现实的需要而“颇有所改”⑦，所制定的律令，也是“攈摭秦法，取

---

① 陆贾：《新语·辅政》。

②④ 《新语·无为》。

③ 黄老之学系指老、庄思想与黄帝之学。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在战国时代，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思想。老、庄学派在先秦思想史上被列为“道家”。到战国后期，思想界又出现了伪托“黄帝之学”的另一个道家学派。这个黄帝学派将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化为政治统治策略，主张“先德后刑”，形成一套“德”、“刑”并用的统治术。后来，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逐渐合流，形成为黄老之学。

⑤ 《新语·至德》。

⑥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⑦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其宜于时者"①，做到"约法省禁"②。同时，针对"民无盖臧"的情况，又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萧何之后，丞相曹参笃信胶西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之言，对萧何辅佐高祖的成规"尊而勿失"，后世称之为"萧作参随"，百姓也歌之曰："萧何为法，覯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③ 此后，吕后临朝，仍然是"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宴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④。汉文帝时长期任丞相的陈平也好黄老之术，参与文景两朝朝政的窦太后更好黄老之言，强令其子景帝及窦氏子弟习黄老之书。因此，在汉初几十年间，西汉王朝一直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为其基本国策的指导原则，坚持与民休息，"刑罚用稀"，"禁网疏阔"，"填（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⑤，"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⑥。

二、维护中央集权，确保安定统一

根据黄老之学"因者，居之纲也"⑦ 的理论，汉初对秦代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皆"因循而不革"，只在个别地方"颇有所改"⑧，以确保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汉高祖即位后，即明文规定唯有皇帝才拥有"铜虎符发兵"⑨

---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②⑥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③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④ 《汉书》卷三《高后纪》。

⑤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⑦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引《鬼谷子》之言。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及《索引》。

⑧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⑨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索隐》引《汉旧仪》。

之权，全国的军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符节方可调动。此外，皇帝还是全国行政和司法的最高主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①，皇帝的诏令就是法律，君主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

汉高祖仿照秦朝制度，建立了超越秦朝的庞大的中央统治机构。皇帝之下，地位最尊者为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协助皇帝总理政务；太尉掌管全国军政；御史大夫专司全国官吏的监察。三公之中，丞相最高，“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②。太尉位比丞相，但并非直接掌握军队，尤其是没有发兵之权，其职在于备皇帝军事顾问，掌握全国军政，同时参与朝政。御史大夫负责“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③。三公之间，互相牵制，各司其职。

三公之下设九卿：奉常掌宗庙祭祀；郎中令掌宫殿掖门；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皇帝舆服车马；廷尉掌司法；典客掌外交；宗正掌皇族事务；治粟内史掌农业、财政；少府掌皇家私产。

九卿之下又有列卿，位次九卿，官额不定。掌京师戍卫者有中尉；掌建筑工程者有将作少府；掌皇家园囿者有水衡都尉；掌少数族事务者有典属国等。列卿之外有宫官，服务于宫廷。

军官系统以太尉为最高，以下称将军。其中，又以大将军为冠。将军之下，有校尉及郡都尉、千人司马等军职。各级军官以次相属，皆隶属中央。

西汉王朝如此完整的中央统治机构，充实和壮大上层统治力量，安置诸多功臣良将，使他们得以安心职位，尽职尽责，有力地维护中央集权，收到了保障安定统一局面的良好效果。

在地方上，尽管汉初中央直辖区仅有 15 个郡，许多国土处在诸侯王控制之下，但汉王朝仍然全力推行郡县制度，并力图加强

---

① 《汉书》卷六十《杜周传》。

② 《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③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

对诸侯王的控制，逐渐削弱其势力，扩大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

汉初仿秦制，每郡设一郡守，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由中央直接任免，并明确规定其职责："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①。春天巡行所属县，秋冬遣吏按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②，管理一郡之内所有行政事务。郡守之下置郡丞或长史以为佐理，内地之郡，每郡设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③，以加强边郡统治力量和巩固边防。

在诸侯王的封国之内，也同样设置郡县，不同的是王侯封国之地的郡守以内史为之，"郡为诸侯王国者，置内史，以掌太守之任"④。

郡下设县，置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之县曰令，万户以下之县曰长。又设县尉与县丞，县尉主缉捕盗匪，县丞主刑狱囚徒。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汉乡、亭及官，皆依秦制也。县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⑤。亭设亭长，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官吏。这样，就可以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而严密的官僚机构体系，将中央的统治贯彻到庶民百姓中间，用以维护国家的安定，确保中央集权的巩固。

由于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众多的诸侯王，形成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

在诸侯王国内，由诸侯王"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⑥。太傅由天子代置，职责是在道德、学问等方面教导诸王，地位虽崇，但不参与政务。王国的政务由丞相、内史、中尉及群卿大夫分工负责，丞相为最重要的行政长官。汉初"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⑦试图通过朝廷任命王国丞相来驾驭王国。

---

①②④《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郡太守条。

③⑥《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⑤《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乡官条。

⑦《续汉书·百官制》。

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于中元五年（前145年）下诏，规定诸侯国的官吏统由皇帝任免，诸侯王不得过问封国的政务，并省易封国的官名，从制度上降低诸侯王的地位。这些措施的实行，进一步加强了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有利于维护全国的统一和安定。

三、轻徭薄赋，重农抑商

西汉初年，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①，汉高祖及其后继者顺民之情与民休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首先，招抚流亡，奖励农耕。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五月，高祖即位不久，即颁发了一个旨在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重要诏令——“复故爵田宅”令。诏令规定，凡军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即五等爵，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公乘以上者晋爵一级，分给食邑。这样，就使一批有军功的军吏卒获得土地而成为军功地主，扩大了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鉴于土地大片荒芜而缺乏劳动力耕垦的状况，诏令还宣布“兵皆罢归家”②，规定按军功爵的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愿留关中者，免除12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6年。对于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诏“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③。此外，诏令还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④。这个诏令不仅保护了地主的财产和政治特权，同时，也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奴婢的社会地位，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诏令颁布后，不仅大批军卒回到故乡，从事耕垦，还有不少流民也还归故里，安家落户，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

汉高祖以后的几代统治者，皆继承高祖之遗志，致力于奖励农

---

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③④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耕。汉惠帝即位后，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①，凡尽力耕垦、产量过人者，可免除其身的徭役。汉文帝时，更强调农业是“天下之大本也”，他亲自执耜，耕作“藉田”，“以给宗庙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昭示天下致力耕织。后元六年（前158年），文帝正式下令“弛山泽”之禁，鼓励农民垦田取利。前元十二年（前168年），还为“力田”与孝悌者劳赐帛绢，“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后元四年（前160年）又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②。汉景帝时，下令“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③ 允许农民离开土地瘠薄或较少的狭乡，迁往地多土沃的宽乡去耕垦畜牧。他还明令禁止官吏抽调民夫从事矿冶，以保证农民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轻徭薄赋，减少征敛。西汉建立后，改变秦代竭泽而渔的作法，“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④，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时，规定田租“什五而税一”，当时全国征收的租税，“转漕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⑤。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十二年（前168年）还两次减免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前167年）又下诏：“除其田之租税”⑥，直至景帝元年（前156年），才恢复征收田税，“令田半租”⑦，定税率为三十税一，以后遂成定制。田租之外，西汉政府对以人口为对象征收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也常实行减免。如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开始征收算赋时规定“人百二十（钱）为一算”⑧，汉文帝时则减为40钱⑨。

徭役的征发也比秦代大为减轻，丁男一年服役一个月，而且尽可能安排在农闲季节征调，以免耽误农时。汉惠帝从元年（前

---

① 《汉书》卷二《惠帝纪》。

②⑥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③⑦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④⑤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⑧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注引《汉仪注》。

⑨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194 年）起，修建长安城，征调民夫皆在农闲时节，其中“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①，由于征调的民夫服役时间较短，所以工程拖了很长时间，历时 6 年始完成。后来，汉文帝还将徭役改为“丁男三年而一事”②，进一步减轻了人民的徭役负担。

此外，遇到灾荒年月，西汉政府除减免租税，还常下令恤贫救灾，赈济饥民，帮助农民度过灾荒，恢复生产。

第三，倡导节俭，抑制奢欲。西汉初年，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皆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收入为“私奉养”③，不再增加人民的负担。汉高祖本人注意节俭，尽量抑制奢侈之风。汉高祖七年（前 200 年），他见丞相萧何将未央宫修得非常壮丽，就责备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解释这是因为“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④，他才转怒为喜。汉高祖以后的几代皇帝及皇室，大都注意节俭。汉文帝在位 23 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打算筑一露台，工匠计算费用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身穿皂色的厚缯，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生前为自己修造霸陵，令“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⑤，力求简单朴素。

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还极力抑制商业。汉初一些商人乘经济凋敝、物资奇缺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兼并农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

---

① 《汉书》卷二《惠帝纪》。

②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③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④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①。许多农民在他们的兼并之下陷于破产，流亡他乡，没有破产的也常弃农经商，“背本趋末，游食者众”②，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王朝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③，于是大力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高祖即位后，便极力限制和打击商人的活动。他不仅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为官，规定“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④，并且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惠帝、吕后时，“复弛商贾之律”，取消了商人衣丝乘车的限制，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⑤。汉文帝虽“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⑥，并实行“入粟拜爵”之令，但商人进入仕途仍然无望。

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长足的进步。到汉文帝之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⑦。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⑧。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具备了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物质条件。

---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②⑥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⑤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⑦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

⑧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第三节　汉初的军制

一、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及其区分和构成

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及其文臣武将，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建国后，又着手建官立制、整编军伍，重修军规，完善制度，包括军队的领导机构、中央和地方军队的编制、军事法规、兵役制度及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系统等在内的军事制度。这套制度，既是中央集权制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内容。

西汉的军事制度基本是承袭秦制，但其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又比秦代更加丰富和完备。汉初统治者根据军队的不同系统，设立了经常性的中央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两大系统。中央禁卫武装力量独立成军，有着完整的领导体制，地方上的边郡又不同于一般郡县，设有独特的军事官员。遇到战事，汉初还要组建战时指挥系统。这些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军事行政系统，构成了汉初武装力量领导体制的全部内容，统御着全国上下的各种军队。

（一）中央军事统御机构

在马背上得天下的汉高祖，深知军队在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建国伊始，便将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明确规定，只有皇帝才有征兵发兵之权，只有皇帝才可以大规模调动军队，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皇帝之下的丞相，“助理万机”，是最高军事统帅——皇帝的第一助手。除了皇帝和丞相之外，中央所设专门的军事统领是太尉。

太尉之职，秦已有之①。汉初将其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太尉是朝廷中最高的军事长官，其职责是专“掌武事”，“太尉主五兵”②。具体职权有三：一是备军事咨询，故常随皇帝左右。二是遇有重大战争，经皇帝授命，可亲自统兵征战。如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周勃以太尉率兵征讨陈豨；吴楚七国之乱时，“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③。三是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包括军功爵赏、兵役征发、军队管理等。因此，太尉府是汉初中央重要的军事行政机构。

由于太尉地位的重要，其待遇与丞相“等尊”，“金印紫绶”，“秩万石”，在汉初多由开国功臣担任。又由于太尉的特殊地位，皇帝对其既尊重，又戒备，一般不轻易委任。为了维护“君权至上”，太尉的权力受到各种限制，如没有独立的发兵权、领兵权和军吏任免权，属官很少等等。虽然如此，太尉作为全国最高的专职军事行政首长，却肩负着“保国家、安刘氏”④ 的重大责任。

为加强中央军权的集中和统一，汉初确立了以中央军为主体的、保证中央“居重驭轻”、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与此相适应，中央的军事领导机构，还包括中央直辖军队的统帅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设有郎中令、卫尉和中尉，负责宫廷和京师的戍卫。

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⑤，也是皇帝的顾问参谋和宿卫侍从。属官有大夫、郎、谒者⑥，其中的郎官具体“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⑦。《初学记》云：“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主执戟卫宫陛。”郎官的人选，多来自郡国的“孝廉”和“贤良方正”，“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分左右

---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云：“太尉，秦官。”

② 《通典》卷十九《职官》一。

③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④ 《初学记》职官条。

⑤⑥⑦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署”①。一般郎官都应是50岁以下的“孝廉”或“敦朴有道”者，以保证“执戟宿卫”和“出充车骑”的军事需要。由于郎官是皇帝的亲近侍从，又是重要的仕途，因此，汉人多求为郎，以为入仕阶梯。

卫尉也是仿秦而置的中央军事官员，“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前143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②。

卫尉统辖卫士，保卫宫门，和郎中令有明确的分工，“殿外门署属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即郎中令）”③。二者分工合作，互为表里。卫尉的职权是“掌宫门卫屯兵”④，“《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⑤。可见，卫尉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宫门内，主禁军之南军。由于卫尉是宫城禁卫军的头目，于宫中安危关系重大，汉初多由重臣担任。

中尉“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等属官⑥。所谓徼循，即禁备盗贼。因此，中尉的任务主要是警卫京师。汉初，中尉统领着中央禁军之北军⑦，不仅负责“徼循京师”，也负责“按考疑事”⑧，承担治狱、治安等任务。

“将军”之称，始自秦晋。战国时，将军之号遂多。汉初，将军已定为官号，种类也空前增多。在名目繁多的将军之中，“大将军”最为荣宠，楚汉战争中的大将军韩信、汉景帝时的大将军灌婴，皆是“金印紫绶”，位比三公。随着战争的发展，至西汉中期

---

①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注引《汉官仪》。

②④⑥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旧仪》卷上。

⑤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

⑦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14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 《文献通考·职官考》。

将军称号逐渐增多。他们遇战事而出征，冠以将军之号，战事毕则罢归。出时统兵，入则另作他职。

将军之职为领兵主征伐，其统兵作战之权皆受之于皇帝。但将军在外执行征战任务时，有权根据战机便宜从事，调整部署，制定战术，也有权依法对属下进行奖惩。

将军之下有"校尉"和"都尉"等中级武官，"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①，"有卒徒武事故曰尉"②。至于都尉，自汉初始便名目繁多，诸如"骁骑都尉"、"车骑都尉"、"军门都尉"、"强弩都尉"等。校尉和都尉，平时按各自不同分工率兵任职，战时则随将军带兵作战。

汉代的将军，平时开府治事，出征时则置"幕府"，以为参谋之部。此制先秦时已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将军征行无常处，所在为治，故言'莫府'。"《索隐》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帟为府署，故曰'莫府'。则'莫'当作'幕'字之讹耳。"汉代将军定为官名之后，幕府即指将军府。

将军府中有各种僚属，大将军府最多。其名号有长史、校尉、军司马、军司空、从事中郎、军正、军监、军史、军武库令等。③骠骑将军府及车骑将军府、卫将军府也各置属僚，其名有校尉、司马、鹰击司马、军史、长史、从事中郎、军市令、千人、掾、舍人等。这些僚属，名目虽多，但不出两类，一类是参谋人员，如长史、从事中郎、诸曹掾史等，他们负责幕府庶务、文书、参赞军务；另一类是军事管理人员，包括校尉、司马、军正、军监、千人、武库令、军市令、军司空等，他们负责统辖将军卫队、协调军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应劭语。

②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张晏语。

③ 分别见《汉书》之《丙吉传》、《霍光传》、《杜延年传》、《杨敞传》、《陈汤传》、《匈奴传》、《律历志》、《杜钦传》等。

务、传达军令、执行军法及后勤供应等。

幕府必须随时与中央保持文书往来，传达皇帝诏令，汇报府下军情，申请报功行赏。将军出征后，幕府也负责军内粮饷、武器的支配。西汉时期，幕府在参议军务方面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军队出征作战的能力，有利于国内的安定和边防的巩固。

（二）地方军队的统领机构

汉初，地方上郡县制与封国并行，其地方军的领导体制也与秦代有所不同。在中央直辖的郡县之内，每郡设一郡守，郡守下为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①。郡尉（都尉）的职权除“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外，还“典兵禁，备盗贼”②，即负责协助太守分管一郡军事，包括协助太守主持“都试”、征兵、调运军饷、制造、保管武器装备，维护郡内治安等。但郡尉的军事行政权，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的节制。

在与郡同级的王国之内，其行政长官为相，军事长官为“中尉”。中尉“掌武职”③，负责王国治安，也主军吏督察。随着汉代王国势力的消长，中尉的设置及其职权也发生了变化。汉初，王国的中尉一般由王国自置，汉景帝以后则由中央任免，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军权控制的强化。

在县级行政机构中，县令（长）之下设县尉。大县两尉，小县一尉，负责一县的军事行政，职掌与郡尉略同，职权范围仅限一县而已。

由于汉初边防建设的需要，在边疆诸郡另设有边郡长史，以加强边郡的武装力量，巩固边防。史载，“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④，边郡“置长史一人，掌兵马”⑤。边郡长史因秦制而设，“长史，秦置郡丞，其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掌兵马，汉

①③④《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②《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⑤《汉旧仪》卷下。

因而不改，其后长史遂为军府官”①。汉初的边郡长史一律由中央任命，其职责主要是带兵作战、戍边。

从汉初中央及地方的军事统御机构设置不难看出，汉初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充分体现了军事集权的重要特征。这主要体现在皇帝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由于皇权至上，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军队，皆由皇帝控制。就连主管全国军政的太尉，也无调兵之权。凡军队的征集、调动、指挥都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及羽檄和玺书，故有“材官、骑士散于郡国，虎符、羽檄召而后来”②之说。一些重大战役，皇帝亲自部署和指挥，更是军权高度集中的体现。这种军事集权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军队的统一行动，便于军队的集中使用，在汉初巩固统一的新政权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汉初的军事领导机构及其职官分作几个系统设置，互不统属，互相钳制，是汉初军事集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西汉统一后，虽然幅员辽阔，军事职能部门随之增多，但汉初设置的负责中央最高军事行政的太尉、属于禁卫军系统的郎中令、卫尉、中尉和战时指挥系统的将军幕府及地方上的郡尉、县尉系统，始终各自独立，互相之间并无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听从皇帝的统一指挥。而各系统的军事首长及其僚属，职守分明，各负其责。他们的地位及权限不一，但都须依军法行事，忠于职守。这种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御军方式，可使“将无专兵，兵无常将”，对于皇帝独揽军权、稳定政局、巩固统一十分有利。

汉初军权集中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皇帝身边拥有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卫军，并有着严格的监军制度。汉初统治者为了控制全局，在京师建立了由郎中令统领的“郎卫”和由卫尉、中尉统领的“南、北军”，形成了京师的三层保卫力量。三支卫军组织机构庞大，僚属众多，互为表里，分工合作。他们武器精锐，装备优良，士兵素质高，是全国军队的主力。此外，皇帝为了进一步

① 《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

② 《玉海·兵制》。

控制军权，设立了“护军都尉”、“护军中尉”、“护军”、“监军御史”、“监军史者”等职，不仅在出征军队中设有监军，在中央军及地方军中也设有监军。监军往往由宠臣、御史充任，权力较大，举劾案章，督察不法，维护军令的贯彻执行，监督将帅的违法行为。当将帅缺员时，监军还可以代之统兵，直接执行皇帝意志。这一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军权的集中，以防止军权的旁落，保证政局的稳定。

汉初高度集权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是整个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既是战国以来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发展的结果，也是汉初对诸侯王势力和匈奴势力斗争需要的产物。

二、军队的体制、编制和训练

与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西汉军队的体制、编制和训练，也在秦朝军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据估计，汉初的全国兵额大体上维持在60～80万①。这支庞大的军队，就其体制而言，则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

中央军即中央直辖的军队，它是汉初武装力量的主体。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汉代遵循“居重驭轻”的原则，将中央军的组建摆在全国武装建设的首位，使中央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足以控制和驾御地方军队，以确保京师的安全。

---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载：“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载：“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载贾谊谏书曰：“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三段材料皆言汉卒有“百万之众”，但这仅是一个约数。如以吴楚七国之乱时全国的兵员（包括吴国在内）统计，约在60～80万之数。

西汉的中央军包括以郎卫为主体的宫廷禁军及南军和北军。史载，“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在京师有南北军之屯”①。汉初，郎卫的实力较弱，皇宫和京师的保卫主要靠南军和北军，中央王朝对各级地方的控制也离不开南、北军。但是，如果中央军过于强大，南、北军难于控制，也会对皇室和中央王朝形成威胁。因此，如何掌握南、北军的控制权，是汉初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初统治者对此采取的办法是：使郎卫、卫尉、中尉三大系统的中央军互不统属，相互钳制，在非常时期则特设卫将军统领南、北军。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又设监军于其中，加强对南、北军的控制。汉初的护北军使者及监御史，即是北军之监军。

汉初中央军中以郎卫为主的宫廷禁军是皇帝的贴身禁卫。郎卫平时执戟宿卫殿门、殿廊，遇有大朝会便立于殿阶两侧，以为警卫。皇帝出行，则充当车骑扈从。“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②。郎中令统领诸郎，是宫廷禁军的长官，郎中令通过“五官署、左、右署”（其长官分别为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下属机构统领诸郎。三署之下设车、户、骑三将，分工负责宫廷的保卫和皇帝出行的安全，如同皇帝的亲兵和家将。

中央军之南军，指卫尉所辖的卫士，是汉初的宫廷禁军。“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③ 因汉初未央宫在京城南面，故称为南军。南军卫士是离皇帝稍远的外层卫兵，卫士一般不上前线作战，主要负责宫城的安全保卫。在汉初，南军的地位尤为重要。南军卫士宿于“周庐”，分为八屯，“警夜巡昼”④。他们除保卫宫城外，还担负朝会等活动的保卫。

---

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兵考》二。

④ 《汉旧仪》及班固《西京赋》。

中央军之北军，是京师的卫戍部队及畿辅屯兵。因其屯兵之地位于未央宫城之北，与南军相对而得名。汉初，北军的统领者为中尉。“汉宫城内为南军，宫卫屯兵属焉，卫尉主之；京城门外为北军，京辅兵属焉，中尉主之。”[①]“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内之兵”。[②] 北军的任务在汉初主要是“徼循京师”、“禁备盗贼”[③]，负责京师治安。一般情况下，中尉参与治狱，但不统兵出战。非常时期，也由太尉或将军临时统领出征。

中央军各部在组织上各有分工，职责明确，互不隶属，互相制约，各自对皇帝负责，共同保卫京师和宫廷。

西汉的中央军官兵素质较高，郎卫及南、北军长官一般都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直接担任。卫士通常选自关东和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两河等六郡及三辅地区的良家子，他们多是经受过良好训练的轻车、材官、骑士，熟于战事。加上中央军的政治、经济待遇优厚，武器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明显强于地方军，拥有较强的战斗力。它在汉初巩固统一、稳定政局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地方军是汉初武装力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指地方上的郡、国之兵。汉初郡县与封国并行，除中央直辖 15 个郡外，余皆为封国，诸侯王势力很大。中央在郡县内建有军队，诸侯王也有“郡国兵”。“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④] 由此可见，地方军的组建原则是因地制宜，视各郡国的条件而置兵种。“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⑤]。“平地用车骑，山阻用

① 《玉海·兵制》。

② 《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兵考》二。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④ 《汉官仪》卷上。

⑤ 钱文子：《补汉兵志》。

材官，水泉用楼船”①，三者之兵种，各随其地势所宜。

地方军中的郡县兵同中央军一样，同属于正规军队，中央对它有统一调动之权。兵虽在地方，但“材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②，郡县兵有一定的数量和完备的编制。“自有员数”，大抵大郡兵员至万，小郡数千③。郡守、郡尉（都尉）及下级机构县令（长）、县尉为地方军的统领。

郡县兵的任务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平时在本地服役，接受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按期番上到京师或边防“屯戍”。战时则听候中央统一调发，奉命出征。此外，郡县兵也被用于从事各种各样的杂役，如救决河、帝王葬事等。

地方上的王国兵，在汉初数量相当大，如吴王刘濞自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④。与郡县兵不同的是，王国兵的组织建置与中央军近似，设有军事长官中尉，也有宫廷禁卫长官郎中令和掌卫宫城的卫尉等职。王国兵的责任在于警卫王室，维护社会治安。汉初，王国兵有相对的独立性，王国往往可以招募流民，赦囚为兵。如吴王刘濞“背德反义，诱天下亡命罪人”⑤。王国兵逐渐成为与中央王朝相对抗的武装力量，“谋作乱逆”。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取消了王国对军事长官的任命权，王国不得修武备和擅自练兵，王国兵的性质和作用为之一变，成了与郡县兵相同的地方武装。

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兵由中央直接调动，遇有战事，中央则可以凭虎符、羽檄召而用之，事罢归家。地方兵调发的原则是“近地调发”，使之“无远征之劳”。地方军是中央不可缺少的强大而雄厚的战略后备力量，汉初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征用地方兵而完成的。有时地方兵也可奉命独立作战。

---

① 《汉官仪》卷上。

② 钱文子：《补汉兵志》。

③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158页。

④⑤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西汉建国之后，面对“胡虏数入边地……攻城屠邑，驱略畜产”① 的形势，为了加强边疆的防御力量，陆续建立了一些边塞、关卡和烽燧，并配置了相应的边防军，负责边疆的守御。在西汉前期，边防军主要由戍卒及边郡正卒组成，并按照不同的分工，组编成以屯田耕种为主的屯田兵，以守备作战为主的将屯兵，以侦察报警为主的候望兵，以物资供应为主的军需兵等。有关边防军的情况，下面有关章节将作详细介绍，这里从略。

就西汉从中央到边郡庞大的军队种类而言，可分为步兵、车兵、骑兵和楼船士。前三者为陆军，后者为水军。汉代步兵被称为“材官”或“材士”，遍置全国各地，它是汉军中数量最多的兵种。从武器装备上区分，步兵又有甲士、蹶张士②、射士、迹射士、轻兵之别。骑兵多称“骑士”，是西汉军队中作战能力较强的兵种。西汉建国后，十分重视加强骑兵的建设，一面广建牧苑养马，一面招徕胡、夷等少数民族骑兵。汉文帝时，骑兵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 166 年）对匈奴防御作战，一次已能发车千乘、骑十万③。汉初的骑兵，已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轻骑兵不着铠甲，手持弓弩，背负箙囊，乘骑矮小，奔跑迅速，灵活机动，能且驰且射，主要用于长途奔袭。重骑兵部分带甲，手持长矛之类武器，乘骑高大，冲击力强，主要用于冲锋陷阵，承担“溃围、斩将、刈旗”的任务。车兵又称“车士”或“轻车士”，是凭借战车作战的兵种。汉文帝对匈奴作战时“发车千乘”，是汉军车兵兴盛的具体表现。水军称作“楼船士”，有时也称为“舟师”。主要是利用舟船作战。汉初已有用水军作战的记载，但大规模运用水军是在汉武帝时期。

汉军兵种的配置是，“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集解》引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

③ 钱文子：《补汉兵志》。

多材官"①，"以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颍川诸处，只有材官。上郡、北地、陇西诸处只有车骑，而庐江、浔阳、会稽诸处只有楼船"②，"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③。车兵曾在汉初对匈奴作战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发挥过作用，水军则主要建置于南方及沿海诸郡。

汉军各兵种虽然都是独立之师，但在战争中往往配合使用，各兵种混合参战。遇有大战，常常数十万步、骑、车兵齐发，规模巨大。

大兵团、多兵种联合作战，不仅要有统一的指挥，而且必须有合理的编制。

汉初军队的战时编制是以部曲为主要组织形式，战时的军事统帅为将军，"将军，不常置。……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④。考之汉简，可知汉军的编制屯下有队，队下为什伍，每队设队率、队史、什长及伍长⑤。

汉军最大的作战单位是军，其首领为大将军，或将军及长史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述军一级的首领时说："前后左右将军，……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⑥。军下辖若干部，部设校尉、军司马、假司马。一个校尉有一个军营，所领兵员多则六七千，少则一二千，人数随时而易。每部校辖

---

①③ 钱文子：《补汉兵志》。

② 《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兵考》二。

④ 《续汉书・百官志》，汉初军队编制大抵如此。《居延汉简》可以证之。

⑤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⑥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若干曲，曲设军候一人，或称曲候。曲候外设千人，被称为“曲千人”。曲下辖屯若干，屯长领各屯兵，屯亦称“官”，屯长或称“长官”。屯下设队帅（率）、队史领一队之兵，队下辖若干什、伍。什、伍是西汉最基层的军事单位。《汉书·晁错传》云：“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师古注曰：“五人为伍，二伍为什”①。由于什、伍兵额固定，但什、伍上级单位所辖什、伍数量不一，故队、屯、曲、部、军的兵额并非同级等额。

以上是汉初军队编制的一般情况，西汉中期以后边郡屯戍兵组织的编制则另有不同。由于边郡地理条件和特殊的军事需要，边郡太守之下，往往设有两个或多个都尉。边郡太守也常被称为“郡将”，以比将军，常统兵作战。边郡郡尉的军事权限一般也大于内地郡国，他们不仅开府治事，属官、吏员也多得可比内地太守府②。就边郡军事组织而言，都尉之下，又有候望系统、将屯系统、屯田系统、军需系统和邮驿系统之分。

汉军的编制成龙配套，而且各军皆有旗帜、徽章和冠饰。《尉缭子·兵教篇》说：“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③ 汉军对此又有新的发展，军中严格规定：不同的军事单位，必须“异其章旗，勿使冒乱”④。汉军中不仅旗帜、徽章位置有别，而且以色区分：左青、右白、前赤，以此标明部伍，辨别行列，便于指挥。

此外，汉军官兵的武冠也在秦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定制。不仅保留了秦兵之“长冠”、“鹖冠”、“武帻”、“武弁”，还出现了“却敌冠”和“非却敌冠”等冠饰。汉军冠形固定，尺寸划一，既反映着军中的等级、地位，也有利于军士执行特殊任务的需要。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汉简缀述》第 38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③ 《尉缭子·兵教上》。

④ 《说苑·指武》。

汉初在结束大规模战争之后，为了使庞大而有系统编制的军队维持较强的战斗力，平时十分重视军事训练，汉初统治者始终将军训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晁错曾对皇帝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齐)，……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①。汉初规定，"非教士不得从征"，"士不素习，不得应召"②。

汉军训练的科目与内容十分丰富，不同的军、兵种，有不同的训练内容。大体上包括如下几项：第一，学习兵法，演习战阵。"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③。孙子、吴起兵法是汉军学习与训练的内容之一。演练阵法包括军伍的序列、队形操练等。其训练方法大概如《吴子》所言："圆而方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④。这是军队基本素质的训练。第二，训练骑术、驾车和"弓射"、"五兵"等武器的运用，这是对于军事技巧的训练。"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⑤。"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⑥。可见，汉军训练中，十分强调"习射"，对于其他武器的使用，也要通过训练，达到"便器械，积机关"，以使其得心应手。第三，训练不同兵种的协同作战。步、骑、车兵混合编队，演练战阵攻防。第四，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这是对少数军士的训练，如边塞燧卒，要习候望，识别信号，掌握"烽火品约"；宫廷卫士要"习鸡鸣歌"等。此外，西汉军队还要训练体能，具体科目有"蹴鞠"、"角抵、投石、超距"等。"蹴鞠"即踢球，"今军无事，得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⑦。《汉书·艺文志》中将《蹴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及注引张晏语。

③ 《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

④ 《吴子》卷上《治兵篇》。

⑤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⑥ 《汉旧仪》卷下。

⑦ 刘向：《别录》。

鞠二十五篇》列为“兵技巧十三家”之内，说明这是一项军事体育训练项目。“角抵”，近似于后世的摔跤或相扑，“角者，角技也，抵者，抵触也”，“名此乐为角抵者，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①。“投石”即投掷训练。“超距”，“犹跳跃也”。军队的这些体能训练科目，不仅有助于提高军士体质和技巧，也常作为比赛项目在军中开展，用以活跃军营，增强斗志。

为了保证军事训练水平的提高，汉军也常常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军队进行校阅、考核。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大体上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被称为“秋射”、“校阅”或“都试”。中央设有都试郎，总阅试习武备。地方上，“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②，其场面十分壮观。郡国兵之“都试”也是军中大典，仪式颇为隆重，参加演习的军士身着绛色制式军衣，设斧钺，建旗鼓。试军士驾车、御马、射矢等训练水平及其材力。都试有一定的标准，优者奖赏，或擢拔升官，不合格者受罚。

由于西汉重视军事训练与校阅，并使之成为常制，因此使汉初的军队具备“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发、矢道同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等五大长技③，逐渐形成对匈奴作战的优势。

三、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制度

武器装备是战争的工具，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汉代的武器种类在先秦弓矢、殳、矛、戈、戟“五兵”基础上，有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应劭、文颖语。

② 《汉旧仪》卷下。

③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了新的发展，军士使用的武器已是多种多样。长兵器有殳、戈、矛、戟；短兵器有刀、剑；远射兵器有弩、弓；防护兵器有铠甲、盾牌；攻守的兵器有钩镶。此外还有锤、棁、杖、钺、斧等劈砍、锤砸兵器。在各种兵器之中，铁兵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汉初晁错所列的弓弩、短兵、长戟、剑楯、矛铤等多是质量精良的铁制兵器。近年来考古发掘的长安武器库所出兵器，除少量仍为青铜制造外，绝大多数均为铁兵器，刀、剑、戟、矛、斧、镞、铠甲一应俱全，仅铁镞就达 1000 余件①。

汉代军中的武器不仅品种多，而且质量高，远远优于匈奴的兵器。正如晁错所言，汉军的精兵良器用于战斗，"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此中国之长技也"②。

汉军的精良武器是由多系统、多部门制造的。考工令是西汉中央兵器制造的主要部门之一。"考工，少府之属官也，主作器械"③。"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④。

考工之外，西汉的尚方令也制造兵器，史载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⑤。《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仿)效尚方事"。另，《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绛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索隐》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属尚方，故云工官尚方。"⑥

汉代地方上制造兵器的部门是工官。"《地理志》：河南、南阳、济南、太山、颍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徐天

① 考古报告见《考古》1978 年第 9 期。

②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③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颜师古注。

④⑤ 《续汉书·百官志》。

⑥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索引》注。

麟按：工官虽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也。”①《汉唐事笺》卷六亦载：“汉自郡国至京师，皆有武备，在郡皆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产铁之郡。”可见，汉代产铁之郡皆设制造兵器的机构。

西汉的武库不仅负责兵器的贮藏，也具有武器生产的功能。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②。这里的主兵器，也应包括武器的制造③。

虽然西汉武器的制造机构有的在京师，有的在地方，但所造兵器皆藏之武库。从这一点看，西汉的武器生产权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对于武器生产的规格、质量、数量都应有统一的计划④。

武库是西汉武器装备的主要贮藏部门，为了使武器装备能够及时地配给军士使用，西汉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多层次的武库网络。中央级的武库有京师长安的武库，地方郡级武库见于记载者有洛阳、河南、上郡、颍川、广汉、山阳、北海、玄菟武库⑤，张掖、酒泉、渔阳、上党等地也建有武库⑥。县级武库见于记载者有阳陵、居延、商县和武牢等武库⑦。汉武帝以后全国武库大增，边防军及大将军幕府多设有武库。

汉代武库规模巨大，位于长安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长安武库，四周有高大的围墙，考古证实东西长 710 米，南北宽 332 米，墙厚 1.5 米，总占地 23 万平方米⑧。武库内共发现七处库房遗址，

---

① 《西汉会要》京师兵器条。

② 《续汉书·百官志》。

③④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 266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

⑤ 分见《汉书》之《刘濞传》、《周亚夫传》、《成帝纪》、《王莽传》。

⑥ 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4.1，19.8A，102.6，303.12B，505.3。

⑦ 《封泥汇编》64，《汉金文录》卷 6，第 12 页。

⑧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95～396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各库所存放的武器种类不一，有的存放铠甲，有的专贮弓箭、镞矢。该武库自汉初兴建，终西汉一代始终沿用①。地方上的武库也有相当的规模。遇有战事，这些武库网络便可以及时地为数以万计甚至十几、几十万的军队提供装备。

西汉王朝十分重视对武器装备的管理。武库令（长）和武库丞、啬夫等经营武库之官吏，一般由皇帝亲信为之。武库有严格的籍簿登记制度。从居延汉简可以看出，当时库藏武器装备的品种、数量及出入情况都有详尽的登记，其登记簿册名为“器物簿”。为了保证武库的安全，武库有“库卒”昼夜巡逻值班，名为“直符”②。西汉中期燕剌王刘旦曾对群臣诡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藩，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③汉武帝戾太子为江充陷害被迫起兵时，曾“挢（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④，皆说明动用武库兵器必须有皇帝制诏才可行，武库兵器的发放十分严格。武库控制在皇帝手中，既反映西汉对武器装备的严格管理和使用，也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西汉军队的武器装备中，车船和战马是大型的战斗工具和军事装备，具有特殊的性能和作用，其配备、管理和使用也与一般武器装备有所不同。

先秦时，经常以车列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秦汉时期，战车作战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各类军用车辆仍然大量使用，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往往动用数以千计的车辆。除用于战争的转输车辆外，也有直接装备军队的车辆，如轻车、武刚车、戎车和云车

---

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395～396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170.2 及陈梦家《汉简缀述》第 102～103 页。

③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

④ 《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等。"轻车"即古之战车,"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辟辄弩服,藏在武库"①,"置弩于轼上,驾两马也"②。"武刚车"为主力战车,"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③"戎车"其上"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辟胄甲弩之服"④。"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犹《墨子》云'公输般为云梯之械'"⑤。云车即春秋之际的云梯,上有梯,下有轮,战争中用以攻城。除此之外,见于史籍的战车还有"驰车"、"革车"、"棚车"、"撞车"等。

"南车"和"辎车"也是汉代用于战争的车辆,"南车"上具"司南",有辨别方向、指挥作战之功能,战争中不可缺少。"辎车"为载重之车。汉初张良曾对高帝说:"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颜师古注曰:"辎车,衣车也。"⑥可见,辎车即用于运输衣粮物资之车。

汉代的军车制造以官营为主,中央及地方的工官担负着造车的任务。对于车辆的使用和保管,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秦简中有军车使用、维修、保管内容的律文,规定损伤车辆不及时维修者,用车人及吏长皆有罪⑦。汉承秦制,军车管理也应十分严格。

战船是西汉水军的主要装备。随着西汉造船业的发达,战船及水军的数量逐渐增加。战船的种类有楼船、戈船、下濑等多种。楼船在汉代大量生产,其船规模宏伟,结构一般为三层,大者达十余层,高十余丈。船上有楼数重,又有女墙、战格、弩窗矛穴,上树幡帜,置抛车垒石铁斗,壮如城垒。楼船由汉代水军"楼船士"驾驶,在"楼船将军"指挥下作战,可攻可退,每只船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

---

①② 《续汉书·舆服志》及徐广注。

③④ 《续汉书·舆服志》。

⑤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注。

⑥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及注。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90 页、第 137 页等简文。

戈船也是主要战船之一，“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烛涯涘”①。汉代专设“戈船将军”指挥戈船作战。

下濑也是一种战船，较为轻便，可在水流湍急与有碛石的河流航行。汉代也专设有“下濑将军”，以指挥作战。

此外，汉代水军装备中，还有用于突袭敌船用的“冒突”、“先登”、“艨冲”和“赤马舟”等，其特点是船小，行进速度快，如快马驰于陆地。或以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孔穴，由弩窗外射敌，易守能攻。另有一种专用于侦察敌情之船，名曰“斥候”，也装备于西汉水军。

西汉造船的专门机构，在京兆尹有“船司空”②，水衡都尉之下设船官“辑濯令丞”③；南方庐江郡有“楼船官”④，负责军民船只的制造。船上的构造有帆、舵、橹等，操纵灵活，其水平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尤其东南吴地造出的大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⑤。西汉高超的造船技术，为水军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军事装备，提高了水军的作战能力。

战船仅限于水军使用。相比之下，在广大的汉军中，大型的军事装备——战马，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用战马武装起来的西汉骑兵，不仅广布于汉军之中，而且也是最强的战斗力量。骑兵离不开战马，战车兵也须借战马之威。因此，西汉军制中十分重视对马匹的收养、征集和使用、管理。

西汉之初，社会经济残破，马匹奇缺，匹至百金，难以组编强大的骑兵。从汉文帝时起，开始大力鼓励养马，完善马政，加强管理，充实骑兵队伍。西汉的军马管理十分严格，所有军马都必须一一登记造册，马身烙印标记，盗马者要被处死刑。军马的饲料配给，皆有一定的标准。军马伤亡，须及时上报。

---

① 《三辅黄图·池沼》引《三辅旧事》。

②④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⑤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由于西汉初年建立了一整套军队武器装备的管理制度，不仅对一般士兵的武器装备有明文规定，对特殊的军事装备又有特殊的管理办法，甚至对于军中的传令征鼓、烽燧的积薪都配备得当，用之有则，因此使汉军的素质逐步提高，总体战斗力日益加强。

与军队建设相适应，西汉还建立了一套后勤保障体系。包括军费的筹集、使用，士兵衣食和军用粮草、物资的供给、转输等。

汉初，一度令“兵罢归家”，减少了兵员，降低了军费的开支。但政府仍必须每年支付日常养兵、武装设备、边防工程和战时费用及军功赏赐、安葬抚恤等费用。

汉初军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征收的丁口赋税。汉初规定：“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①。算赋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记载，地方上征收的算赋，主要用于“转费”和“缮兵”②，与《汉书·食货志》所载用途一致。此外，7 至 14 岁未成年人要交纳口钱，每人每年 20 钱。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纳“戍边三日”的代役钱，名之为“更赋”，每人每年 300 钱，这部分财政收入也常被用于军事费用。

有了足够的军费，才可能维持汉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保证其平时与战时的后勤供应。从汉初军队的后勤供应来看，士兵衣食主要由国家供给，自家可以补给“私衣”，弥补不足。不仅正常服役的士兵衣食“仰给县官”，戍边的“刑徒兵”衣食也由国家供应③。士兵的衣服有袍、禅衣、袭、绔等。袍为夹服。禅衣为单衣。袭也称褶，是一种短袍，便于骑射。绔即后来之裤子。

士兵衣服的供给办法是分夏、冬两季发给。夏衣在四至六月发放，冬衣在九至十一月禀受。发授的数量因军士身份不同而有多少之别。一般士兵只有一套，戍卒及田卒各只有一袭一绔一袜

---

① 《汉旧仪》、《汉仪注》。

② 考古报告见《文物》1974 年第 7 期。

③ 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498.14A，B；509.26。

而已。

汉初士兵的口粮大体上以黍、粟、麦、菽、稻为主，月口粮大约为二石① 左右。士兵领受口粮的标准因地区或时间不同而不一致，因军士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口粮数量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田卒剧作”，口粮较高，平时训练或一般士卒，则按正常标准。士兵口粮一月一给，上月领下月粮，发放办法是由士兵自取或发到戍所，统一食用。粮食之外，通常每个士兵每月发给食盐三升②，又有肉、菜等副食品配给。

军士需要衣食，军马需要粮草，汉代军马之需同样由国家禀支。汉初征收的藁税，主要是用于军马及牛的饲料。具体支出由大司农负责，按月支付。

军队的后勤供应，平时较易保障，战时则难于转输。楚汉战争时，“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③，及时供应前线粮草，为汉军取胜提供了条件。西汉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了后勤供应体制，由大司农负责军需物资储备、调运的协调指挥。一般军队都设有大型辎重部队，以备战时急需之用。各郡也都设置仓库，储备粮食和武器，以供就近调用。大规模战争发生前夕，大司农便预调物资，储存在大军集结地的附近，以备动用。大军出征后，沿途郡县如无力供应充足的粮饷物资，则由大司农调拨物资，组织人力，陆续运至前沿。边郡部队所需的粮饷物资，也由大司农主管，从内地调拨供应。但内地郡国的部队，其军需补给则由该郡国的长官自行解决。

远距离的军饷物资调拨，需要动用大量的运输力量。为此，西

---

① 汉代有大、小石之分，此处指大石，汉简中所载汉卒口粮为月三石以上者，均为小石。

② 《居延汉简甲乙编》266.12、254.24、203.14 简载：“鄣卒□□，盐三升，十一月庚申自取”。“鄣卒张竟，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鄣卒李就，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③ 《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

汉政府经常大规模征调“更卒”输运军资。汉制规定，成年人每年须于所在郡县从事一个月的徭役，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漕运委输。除了组织服役者供应军队军资之外，西汉也组织士兵或雇佣民力进行水陆运输，以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被雇佣的民力被称为“僦”，由国家支付其“僦钱”①，标准大体是“车载二十五斛，与僦钱一里一钱”②。

为了保证军需供应，西汉逐步在全国设立了配套的仓储系统，从京师到边疆，建立了众多大大小小的粮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汉初统治者深知军队后勤供应的重要，始终不忘发展生产，积谷供军，这是汉军由弱变强的物质基础。

四、军事法规

汉初的军法由皇帝制定，汉高祖曾明令“韩信申军法”。“军法在《九章律》之外，韩信所定者，《汉书》注多引，《军法》乃其书也。”③西汉《军法》已佚，现从史籍中仍可窥见其信赏厉罚的内容。在有关奖赏方面的军事法规中，汉初承袭秦制，刘邦打败项羽后，按军功赐爵，便是明显的例证。“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④这是对全体有功官兵大规模的奖赏，其中的大夫、七大夫就是因军功而定的。西汉建国之初，战争减少，军功奖赏赐爵不太突出，主要实行赐民爵的制度。在西汉，凡战功显著，获高爵者，皆得封侯，赐给食邑。不少功臣因此而获封赏，食邑多者至万余户。从西汉中期的史料看，因战功封侯的条件是领兵将领不能损失十分

---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索隐》引服虔曰：“雇载云僦”。

② 《九章算术·均输》。

③ 沈家本：《汉律摭遗》。

④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之三以上的兵力，否则，杀敌再多，也不得封赏。

对军功除赐爵封侯食邑之外，西汉军法还规定对立功者赏赐金钱和实物。立大功者可受赏黄金千斤，少者也达百斤。

西汉军法的另一类主要内容，是对违犯军令者的惩处。汉初规定，当皇帝下令兴兵征伐时，"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①。汉简中也有对军人违抗命令、不该行而行的将领处斩的记录②。西汉军法还规定，军队不得"干行"，"干行"则斩。所谓"干行"，即破坏了编队的严整。此外，行军逗留、逃亡畏懦都将处以死刑。"《军法》，行逗留，畏懦者，腰斩"③。可见西汉军法之严。

西汉的军法还规定，军人失期、不至期即不按时到达目的地者，也一律杀之。此外，军人逃亡、奔北、沮败及领兵而失兵过多及谎报军情者，军法的处罚也极严厉，一般都要处以死刑。此外，军法还规定，军人出征，不得迷失道路，否则也将处斩刑。军人擅离职守、擅自退却，以及后行者皆将被杀。在作战中，即使失利，也不得擅自退却；更不可擅自停止战斗，否则均将依法严惩。

除这些与作战直接相关的军事法规之外，西汉还有关于对违反兵役制度、擅自发兵，虚报军功、军人争功、损害后勤保障设施、违犯军营制度等行为的惩罚规定。西汉依法征兵，到了服役年龄，即可征为军士，"孤、独、盲、侏儒，不属律人，吏毋得擅征召"④，如违制，则将受军法惩罚。西汉军队调发，须持皇帝虎符，"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⑤，要依法治罪。虚报军功以邀赏及军人争功者，罪皆弃市。偷盗武库兵器者，弃市。武器装备保管不善有损害者，根据损坏程度的轻重分别处以一算或三算的处罚。

---

①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②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037、098、123，《文物》1981 年第 2 期。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如淳曰。

④ 《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转引自《汉简研究文集》第 53 页。

⑤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

盗用军粮及军资，以违犯军人职责论罪，依法处治。

西汉军法对行军、宿营，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①，“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②，“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③，“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④ 等等，对违者均有相应的刑罚惩治，轻者斥免，重者斩杀。

西汉军法还规定，边境举烽火违制，要送县狱治罪。军营之中，不得驰驱。军士宿营，他人不得擅入。即使是天子劳军，也需在营中按辔徐行。军中不得喧哗，军士不得取民家之物，违者一律治罪。

西汉军法的执法者是军中的军正⑤。西汉中央南北军和将军幕府中皆设军正。军正以熟悉军法的军官为之，具有司法审议之权，权力极大。军正身在幕府，却不属将军所辖，将军违犯军法，军正亦可上报皇帝裁决，二千石以下官吏违犯军法，军正可直接处罪罚刑。军正的设置，保证军法的执行，维护了军队的法律秩序，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五、兵役制度

西汉初年，主要的兵役制度是征兵，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兵源，均靠征集来补充。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曾“征九江兵”⑥。西汉建国后，“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征兵梁”⑦，汉高祖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⑧。

---

①③ 《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④ 《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引军法。

⑤ 《补汉兵志》：“军正，正、丞，掌军法。”

⑥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⑦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⑧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汉初的征兵制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制，其原则是凡国家的编户齐民，在适龄期内，都必须承担一定期限的军事任务。征兵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①。这里的民，是指所有到了始傅年龄、且不在免役之内的人民。

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户籍、什伍制度，是征兵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汉初征兵的起征年龄为15岁，即“始傅”的年龄。在战争状态下，也有时征发未傅者。如楚汉战争期间，“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②。西汉建国后，征兵年龄正式从15岁开始。到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朝廷对“始傅”年龄做了调整，“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③。西汉中期以后，征兵年龄再次调整，昭帝时改为23岁始傅④。

汉初征兵制的止役年龄一仍秦朝旧制，有爵位者56岁免老，无爵位者60岁免老，后来一律改为56岁止役。征兵的条件除年龄外，还有相应的身体标准，汉律规定：“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⑤。“孤、独、盲、侏儒，不属律人，吏不得擅征召，狱讼毋得毄，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⑥这是对征召一般士兵的要求，对于骑士、材官等兵种，又必须选择“年四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以上”、“材力武猛者”充任。⑦

汉代规定征兵的种类和服役期限为：正卒，在地方上服役一年。《汉书·食货志》载：“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

---

① 陈傅良：《历代兵制》。

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③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④ 《盐铁论·未通》。

⑤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注引如淳曰。

⑥ 《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第35页。

⑦ 参见《六韬》卷六《犬韬·武骑士》及《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仪》。

改”。这里的“为正”即正卒。《汉旧仪》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材官、骑士皆为正卒，服役期为一年。

戍卒和卫士指屯戍的兵役，在边防者称戍卒，在京师者称卫士。戍卒和卫士通常是从内地已经当过一年正卒或复员者中征调，兵役期均为一年。在内郡，二役不可并输，屯卫京师者不再戍边，戍边者不再屯卫京师，故曰：“屯戍一岁”，或“为卫士一岁”。边郡则往往正卒、戍卒合一，兵役主要分“骑士”和“戍卒”两种，因战争需要，边民多在边地服役，与内郡略有不同。

西汉建国之初，承秦之弊，还未对戍卒的戍守期限作出具体规定。到高后五年（前 183 年）才明诏“令戍卒岁更”①，使戍卒一岁而更成为定制。

汉初具体的征兵办法，是由中央下达各郡应征兵员的名额。原则是大郡名额多于小郡，边郡多于内地。征调的兵种因地制宜，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征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征材官；江淮以南多征楼船士②。征兵时，“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③。此外，通常以身体、财力和丁口优者先征。

征兵的主管部门是都尉、县尉及乡里基层组织。为了完成征兵任务，保证兵源，西汉从中央到地方始终注重整理户籍，加强对户籍的控制和管理，每年仲秋之月都要定期实行“算民”和“案比”，登记户口，以为征兵的依据。

汉初还制定了一系列免征兵役的规定，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以“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复者，除其赋役也”④，其中也包括免除兵役。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诏：“诸侯

---

①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② 钱文子：《补汉兵志》。

③ 《补汉兵志》序。

④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及注。

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十二年（前195年）又诏：“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①。汉文帝时下令：“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②。汉惠帝曾规定：“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③。这些官吏的家属除纳军赋外，一切免除，不在服兵役之限。

其次，享有一定爵位者，可免除兵役。汉承秦制设20等爵，“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④ 七大夫以上特别是五大夫以上者，可免“戍卒”之役。

再有“三老”、博士弟子及能通一经者，民有车骑马及入奴婢、入粟者，皆可免除兵役。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又令民生子者免二岁，以鼓励人口增殖。此外，汉高祖家乡人民亦可免征兵役。

汉初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免征兵役的措施，皆由于汉初战争减少，统治者致力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所致。

除了征兵制之外，由于局部战争的需要，汉初也偶有募兵之举，并曾联络和使用少数民族士兵。但这种情况在兵役制度中并不常见，未有定制。

第四节　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国防措施

一、徙民实边

汉初，北部边疆不断受到匈奴的威胁，尽管统治者忍辱“和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②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③ 《汉书》卷二《惠帝纪》。

④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

亲”，但并未彻底获得边境的安宁，匈奴势力南下侵掠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汉王朝不得不在努力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实施一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国防措施。

如前所述，新生的西汉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将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用于京师的保卫。就全国人口的分布而言，也是内地多于边郡，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多于内地一般郡县。这样的人口布局和兵力配备，使匈奴侵边大有可乘之机。因此，从汉高祖起到文帝时，汉与匈奴的形势一直是“天下之势方倒县（悬）”，“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悬）如此，莫之能解”①。西汉边郡之民不得休息，守边将吏更难安枕。

为了改变边防空虚的状况，汉初统治者重视边防军的建设，边郡兵士远远多于内地郡县。但由于边郡人口稀少，难于及时补充戍卒兵员，内地前往戍守的边兵，又需年年更换，每年要花去大量的转输之费。又由于边郡人口少，边地粮草也需内地供应，更使汉初贫弱的财力不堪重负。另外，内地更卒戍边，一岁而更，既不熟悉边地情况，又不知对匈奴之战法，加上常念家乡，不能有效地捍卫边疆。在这种情况下，素有“智囊”之称的太子家令晁错建议募民外移，充实边疆人口。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晁错上书说：“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

①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①，布渠答②，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③，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④。

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下诏募民徙于塞下。从晁错的建议来看，当时选募实边的人有罪犯、奴婢及自愿前往边塞者。对于所徙之民，一般是举家迁徙，享受优遇：有罪者免罪，无罪者拜爵，并免除全家人的赋役。国家先为徙边者于边塞造屋室，备农具，配发衣食。

移民实边实施后，晁错继续上言文帝说："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⑤晁错又建议进一步安置移民，建立城邑、分田耕作，筑室屋，配器具，置医巫，救治疾病，再令男女成婚，邻里相恤，使移民有安居长久之心。他主张移民中也要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使五家为伍，伍有

---

①②③《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注引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疾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袤十二尺。'"注引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也。"

④⑤《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做到“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①，以利有效地抗御匈奴的入犯。

晁错的移民实边建议，不仅会加强边疆的防御力量，减少转输之费，也将大大缓和内地人口相对集中、无田可垦的压力，取得安置社会贫民、安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正因为如此，汉文帝时创立的移民实边制度，至景帝时仍在继续推行。这项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举措，为巩固国防，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移民边疆屯田、戍守、反击匈奴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积粟实边

徙民实边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加强屯戍护边，二是减少转输之费，在边疆积屯粮草。基于这个指导思想，晁错还向汉文帝直接建议，积粟蓄粮，充实国防。

在晁错提出移民实边的第二年(前168年)，晁错又上书文帝，提出“贵粟”、“务农”主张。晁错根据历代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历史经验，面对西汉“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及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的状况，建议：“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①。

汉文帝十分明晓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的道理，得晁错之言后，马上下诏：“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②

晁错的建议被文帝采纳实施，他感到十分欣慰，奏言道：“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愈）勤农。时有军役，若遇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于是汉文帝又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③。

通过务农积谷、“入粟拜爵”的手段，达到积粟实边、巩固边防的目的，这是汉文帝时创设的又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宏伟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巩固了边防，加强了边郡防御的经济力量，免除了边防军缺乏粮草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加快了农产品的流通，从而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起到了重农抑商的作用。边郡积粟足支五年后，再积谷于郡县，预防灾年，增强了人民安居乐业的信心，保证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可谓一举数得。

三、建立马政，为大规模建设骑兵做准备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

---

①②③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以济远近之难"①。马是汉代军队作战的重要工具和军事装备，在诸多的兵种之中，骑兵是最具战斗力的兵种之一。但是，西汉初年，皇室仅有"厩马百余匹"②。由于缺乏马匹，难以编置一支强有力的骑兵，无法抵挡匈奴骑兵的入侵。为此，西汉王朝从一开始，便致力于马政建设，大力发展养马事业。

汉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便着手建立一整套马匹牧养和管理的严格制度。汉高祖时，丞相萧何作汉律九章，创加厩律③，制订了有关养马的法律。吕后时，又明令禁止母马外流，以防止军资遗敌。汉文帝即位后，曾因养马费粮，一度限制马匹的发展，晁错发现后，马上建议"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鼓励民间养马。汉文帝接受他的建议，下令用免役的办法促使民间养马，史称"马复令"④，民间养马之风再兴。汉景帝时，卫绾建议，"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⑤，史称"马弩关"。汉景帝又在秦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⑥，扩大边境游牧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国家的军马养殖因此有了长足的进步。

汉初的马政，基本上包括官马管理制度和民间养马政策两大内容。就官营养马而言，汉初已建立完整的养马机构，形成分布较广的养马管理体系。中央的太仆是国家掌管车马的最高机关。太仆位列九卿，其助手除太仆丞外，还有下属养马厩的令、丞或长、丞。汉景帝时，西北边郡养马范围扩大，又在边郡地区增设了六牧师苑令，每令之下，设三丞为辅助。此外，中央的一些部门如廷尉，也辖有一定数量的牧场。在郡县也设有主持马政的官吏，称马丞，诸侯国则设"仆"官，下领"厩长"及"厩丞"，负责马政。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列传》。

②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③ 参见《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益事律兴、厩、户三篇"。

④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⑤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⑥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中央到地方主持马政的机构和官吏，平时与传驿系统相结合，战时则向军队提供战马。官马场的分布一在京师及近郊，一在边郡地区，尤以后者规模最大。京师的天子六厩，专供皇室使用；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 36 所牧场，集中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军马之用。

汉初的马政制度虽然还不甚完备，但它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养马事业的发展，从而为西汉王朝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反击匈奴的进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章　西汉初期巩固统一的战争

汉高祖建国前后，面对天下汹汹的形势，为了彻底打败项羽，建立和维护西汉政权，一方面努力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统治秩序，一方面又不得不将楚汉战争中的功臣名将封为诸侯王。受封的诸侯王，尤其是 7 个异姓王各有大片封土，手握重兵，并拥有封国内的行政与经济大权，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对实行集权统治的中央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就在汉高祖即位的当年，燕王臧荼首先谋反，其余诸王也多有反状。汉高祖不得不亲率大军，进行了长达 7 年的削平异姓王的战争。但在消灭诸侯王的同时，他又不断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分封制与郡县制是完全势不两立的政治体制，分封的结果必然要引发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皇权之间的冲突。汉高祖死后，吕后擅权，以诸吕取代刘姓王侯，刘氏诸王与朝臣起兵诛灭诸吕。待诸吕灭亡，同姓诸王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景帝时，他们公然举兵叛乱，阴谋夺取帝位。于是西汉王朝又与同姓王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给分裂势力以致命打击。此后，西汉王朝将封国的军政大权收归中央，统一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第一节　削平异姓王的战争

一、灭燕王臧荼之战

高祖登极不久，臧荼首先起兵发动叛乱。臧荼本为燕将，灭秦战争中从项羽征战入关，被项羽封为燕王。后来，韩信破赵，兵临燕境，在汉军的威慑之下，臧荼归汉。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正月，仍以臧荼为燕王，治蓟。

臧荼受封后，于同年秋七月公开举兵反叛朝廷，攻取代郡之地，扩大自己的割据领地。汉高祖闻讯，立即调集大军，亲自挂帅征讨。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周勃、郦商为将军，灌婴、樊哙为车骑将军，率各路兵马，北上伐燕，又令代相张苍率领代郡之兵，与中央军队配合作战，共剿臧荼。汉军从河南向河北进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驰道为之阻塞。臧荼以栾布为大将，据地自守。周勃、郦商、卢绾所率前锋军先至河北，与臧荼战于龙脱①。郦商军冲锋陷阵，勇不可挡，大败藏荼。燕军主力被迫退居易下（今河北雄县），负隅顽抗。汉中央军及张苍所率代郡地方军合力围攻，大破燕军，生擒臧荼及栾布，臧荼之子臧衍逃至匈奴。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臧荼的叛乱即被迅速平定了，这说明搞分裂、叛乱，妨碍国家的统一、安定，是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的。

汉高祖以坚决而果断的行动平息了臧荼的叛乱，但并没有因此消灭燕国。因为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与汉王朝的中央政权是不能同时并立的，而想乘机封立他的同乡好友卢绾为王。卢绾与汉高祖同为丰人，两人都是同日所生，自幼一起长大，关系极为亲密。汉高祖起兵反秦之前，曾遭到官府的追捕，东躲西藏，卢绾经常左右相随。汉高祖起兵后，卢绾“以客从”，后被授为将军、太尉、长安侯，“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绾者”②。汉高祖即位后，原想封卢绾为王，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战功，恐群臣不服，不敢加封。臧荼反叛被诛，汉高祖便想立他为燕王，便“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大臣明白汉高祖的心思，皆曰：“太尉、长安侯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③当年九月，卢绾便被立为燕王。灭掉臧荼，而代之以卢绾，燕国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① 龙脱在河北境内，今雄县以南，具体今址待考。

②③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二、灭韩王信之战

韩王信是故韩襄王的庶孙，名信。项羽分封诸王时，曾立故韩国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后因韩王成未曾亲自率兵随项羽入关灭秦，项羽遂“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后又杀之”①。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十月，韩襄王庶孙信随汉王还定三秦，次年，汉高祖以信为韩太尉，将兵略取韩地。阳城之战，他击败并迫降项羽杀韩王成之后所立的韩王郑昌，汉高祖遂立信为韩王。后来，韩王信与周苛等驻守荥阳，被楚军击败，他投降项羽，不久，复归于汉。汉高祖五年再被立为韩王，都颍川。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正月，高祖以韩王信“壮武”，手握重兵，反复无常，所王之地“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②，恐其作乱，改变韩王信的封地，以太原郡直至北方边界的31县为韩国，徙韩王信于此，令其北御匈奴，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韩王信到达新的封地后，认为都城晋阳距离边塞太远，不便于抵御匈奴的南犯，上书要求迁往靠近边塞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得到汉高祖的同意。因此，他便迁都驻守马邑。

当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南下包围韩都马邑。韩王信急忙上书朝廷请求增援，并数次派使者向匈奴求和。汉高祖闻讯，派汉军往救，但怀疑韩王信与匈奴暗中勾结，赐书谴责他贪生怕死，不能坚守边塞。韩王信遂献出马邑投降了匈奴。冒顿单于立即引兵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北）南下。韩王信也亲统韩军南下，与匈奴一起进攻太原郡，企图以此为根据地再向河东地区推进。

汉高祖得知韩王信叛投匈奴的消息，于翌年（前200年）十月统兵32万北上，在上党之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击败韩王信，斩杀其将王喜。韩王信逃入匈奴军中。其部将曼丘臣、王黄收集

---

①② 《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韩王信旧部，并立六国时赵国贵族后裔赵利为王，“与匈奴共距汉”①。冒顿单于命左、右贤王领精骑万余，联合王黄之兵，抢占广武以南至晋阳间的有利地势，企图阻止汉军北进。汉军气势正盛，在晋阳再破匈奴及韩王信之兵，杀到离石（今属山西）城下。匈、韩联军退据楼烦（今山西宁武），汉军穷追不舍，一鼓作气，夺取了楼烦。

汉军连战连捷，使韩王信军受到致命打击。但匈奴军队仍未受到重大损失。冒顿为引诱汉军北进，待机反扑，佯败北退，撤到东北方的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只留老弱残兵与汉军周旋。汉高祖以为可以趁机一举灭敌，不听刘敬劝阻，不顾“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坠指者十二三”②的恶劣气候，命 20 万大军翻越句注山北上，自己则率先头骑兵进至平城，结果在平城东南的白登山遭到冒顿 30 万骑兵的包围，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突围而出，退回广武。

汉高祖八年（前 199 年）、九年，汉军两次反击韩、匈联军，均未获胜。十一年（前 196 年）春，韩、匈联军南攻参合（今山西阳高南），前往迎击的汉将军柴武致书韩王信，劝其归汉：“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复书，说自己在荥阳降项羽，在马邑投降匈奴，现又带兵与汉军作战，有三大罪，无法再度归汉，惟有“旦暮乞貣蛮夷”③。柴将军遂发起进攻，破城而入，斩杀了韩王信。韩王信的割据势力至此被彻底铲除。

三、灭代相陈豨之战

陈豨原先颇得汉高祖的宠信，被授官郎中，担任巨鹿太守。高祖征讨韩王信回到长安后，又封陈豨为阳夏侯。汉高祖九年（前

---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③ 《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198年），赵相国贯高企图谋杀高祖，事泄后赵王张敖被废为侯，贯高被杀，高祖遂徙代王如意为赵王，兼领赵、代之地，同时封陈豨为代相，辅佐如意，镇守代地，兼监赵、代边兵。

陈豨在离开京城赴任之前，曾与楚王韩信密谋：他在边地起兵反汉，韩信在京城响应配合。至代地后，他又仿效先秦时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养士的办法，广招宾客，结成党羽，准备反叛。他告假时路过赵地，随身宾客常过千乘，随行队伍浩浩荡荡，邯郸官舍尽为所占。赵相周昌见陈豨宾客众多，向汉高祖密报，说："（陈）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①。高祖派人前去查核，发现代地陈豨宾客的不法行为，大多同陈豨有牵连。此时，异姓王中燕王臧荼已被消灭，韩王信投降匈奴，赵王张敖、楚王韩信均已被贬为侯，陈豨恐慌异常，加快了反叛的步伐。他暗中派人与韩王信之将王黄、曼丘臣联络，准备举兵反叛。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高祖之父病死，召陈豨入朝吊孝。陈豨心中有鬼，称病不往。九月，陈豨遂与王黄等共同举兵反叛，自称代王，劫略赵、代。他们还商定，计划兵分两路，一路以陈豨为统帅，程纵为副统帅，侯敞、宋最、陈武为将军，率领10万左右的军队，自东垣（今河北正定南）南下；一路由韩王信之将曼丘臣等统率，攻取马邑，再南下与陈豨军会合，迎击汉军。

汉高祖得知陈豨反汉的消息，决定出动30万左右的汉军，兵发两路，讨伐叛军。主力一路由汉高祖亲领樊哙、灌婴、夏侯婴、郦商、靳歙等统帅出征，进驻邯郸，再从邯郸北上进击东垣。另一路由周勃率领，先进至晋阳，再由晋阳北上迎击马邑之敌，并令张良带病亲随周勃北征。同时，发羽檄征调天下兵马，共讨叛军。此时，楚王韩信已被降为淮阴侯，高祖也令其随大军一同前往平叛，但韩信称病不从，准备待高祖离开都城长安，即按原计划起兵响应陈豨。高祖又令梁王彭越出兵助战，彭越也以病为由，拒绝参战，只派部下代己出征。

---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冬，高祖率轻骑驰入邯郸，见陈豨叛军未派兵占据邯郸这个河北的战略要地，十分高兴，对部下说："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为矣。"① 此时，常山郡25城已有20城为陈豨所占，赵相周昌认为常山郡守、郡尉应对此负责，建议将其斩首。汉高祖问："守、尉反乎？"周昌答说："不。"高祖认为，常山郡守、郡尉既然没有谋反行为，丢失城池是因为兵力不足的问题，没有什么罪责，不当斩杀。汉高祖还让周昌推举赵国可统兵为将的人才。周昌推举四个人来见他，汉高祖故意当面责骂他们说："竖子能为将乎？"这四个人慌忙伏地，表示惭愧。他见他们既忠心耿耿又谦虚谨慎，遂封他们为千户侯，出任将军。周围的将臣见了，劝谏高祖说："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他回答说："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②接着，汉高祖又进行细致的调查，得知陈豨手下将领都是商人出身、贪财爱物，便以千金收买了他们，然后再部署对叛军的进攻。由于他注意调查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并严格区分敌我，善于团结并调动忠于朝廷一方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阵垒，这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就在汉高祖率军至邯郸时，从东垣南下的叛军由先锋军将领侯敞率领，正以1万多兵士进攻襄国，与北上迎敌的汉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樊哙、灌婴等指挥汉军大破侯敞军，侯敞及其部将五人为灌婴的部将斩杀。灌婴又挥师越过东垣，直取王黄拥兵拒守的曲逆。王黄的部将多已被汉军用重金收买，并不出力拒战，叛军很快就被打败。与此同时，陈豨派往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攻城略地的张春部，也被汉将郭蒙军击退。

叛军各部相继被打败之后，叛将赵利，仍然死守东垣。汉高祖亲自指挥汉军主力猛攻一个多月，一直未能攻下东垣。叛军守卒在东垣城上高声辱骂汉军，汉高祖愤怒异常，命令全军拼死急攻，终

①②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于破城而入，守军败降，辱骂汉军的叛卒全部被杀。汉高祖改东垣为真定，并下令："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赋三岁"①，以奖励并进一步发动河北诸地的军民与叛军展开斗争。然后挥师北上，扫平卢奴（今河北定州）、上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安国（今属河北）、安平（今属河北）等地，一举收复了常山、清河两郡的全部失地。

周勃、张良所率的西路汉军，进入晋阳后，北攻代地，包围了韩王信的老巢马邑。但马邑叛军固守拒战，汉军久攻不克。周勃乃用张良所出奇计引诱韩王信军出战。韩王信军据城而守，尚能支持，出城之后即被汉军打得大败，屠杀了城中的大部分军民，韩王信率残部仓皇北遁，半途与陈豨的败卒相遇，一起逃往楼烦。汉军追杀不止，陈豨等又北走参合。

汉军东、西两路步骑得胜后，会师北上，追击叛敌。陈豨与韩王信刚刚逃至参合，立足未稳，即被追上，被迫应战。经过一番激战，汉将柴武军斩杀了韩王信，又俘虏了王黄等叛将。周勃擒获了陈豨之将宋最。陈豨向雁门（今山西右玉南）逃窜。汉军又与雁门太守所率地方军汇合，攻取雁门、云中各邑。陈豨又南逃灵丘（今属山西），被紧追不放的汉军斩于战场，陈豨所立的伪代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等也皆被杀。陈豨的反叛势力至此被彻底消灭，汉军光复了代郡、雁门、云中及河北诸郡的全部领土。

汉高祖在平定代地之后，为了避免同已建立"和亲"关系的匈奴直接发生冲突，主动放弃了恒山以北的原代郡之地，将代国移至山南，立皇子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

四、灭淮南王英布之战

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的英布，在汉高祖称帝前，被封为淮南王，都六县，统辖九江（治今安徽寿春）、庐江（治今属

---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安徽）、衡山（秦郡名，汉称江夏郡，治今湖北黄冈）、豫章（治今江西南昌）诸郡大片土地①。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吕后诛杀了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并将彭越尸体做成肉酱遍赐诸侯，以此威慑异姓诸侯王，迫使他们效忠朝廷。英布收到这一血腥的“赏赐”，十分惊恐，便暗中部署军事力量，以防不测事变的发生。

英布有一爱姬，因身体有病，常找医生治疗。这个医生的家与中大夫贲赫正好对门，贲赫常借机向这个爱姬馈赠厚礼，同她在医生家里饮酒。爱姬常在英布面前夸奖贲赫，英布因此怀疑她与贲赫有染，准备捕捉贲赫。贲赫闻讯，惊恐万状，乘驿传直奔京师长安，向汉高祖状告英布“谋反有端”②，建议朝廷抢在他谋反之前诛杀之。高祖将贲赫的话转告丞相萧何，萧何认为英布不会谋反，怀疑是诬告，建议先将贲赫囚禁起来，再派人前往淮南调查英布的行动。但英布见贲赫匆忙驰往京师，怀疑是去向皇帝告自己的黑状，现在又看到朝廷来人进行调查，更是惊恐不安，便下令诛杀贲赫的家人，于汉高祖十一年秋七月举兵反叛朝廷。

英布举兵反叛的消息传来，汉高祖便释放贲赫，任为将军，并向群臣征询对付的计策。群臣都主张发兵讨伐，坚决消灭之。汝阳侯夏侯婴问宾客薛公，英布为何会谋反，曾为楚国令尹的薛公认为，汉高祖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彭、韩与英布“三人皆同功一体之人”，英布因而“自疑祸及身，故反耳”③。夏侯婴将他的看法转告汉高祖，汉高祖认为此人颇有见解，又召见他询问平叛的计谋。薛公认为，英布有上、中、下三计，上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④。薛公还指出，英布从一个骊山刑徒变为万乘之主已很满足，他胸无大志，不会再有更高的企图，此次举兵必出下计。汉高祖觉

①②③④《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得薛公的分析很有道理，封给他千户，同时宣布以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取代英布，并调发大军征讨淮南。

英布举兵后，原以为汉高祖年老患病，不会亲自挂帅出征，而汉军诸将只有韩信、彭越可与自己匹敌，但这两员战将已死，其他将领均不足畏。因此，他有恃无恐，与淮南大司马、上柱国及别将肥铢等率兵10万，东取荆地，逐杀荆王刘贾，兼并全部荆兵，然后渡淮攻楚。英布的军事行动果如薛公所料，弃攻取齐、鲁、燕、赵、韩北方诸地的上计，而行下计，一意向西扩展势力。

汉高祖起初因年老多病，曾打算让太子挂帅南征。太子宾客东园公、绮里季、夏董公、角里先生等四贤士认为“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矣”。他们游说建成侯吕释之请吕后劝说高祖：“黥布（英布），天下猛将，善于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① 吕释之连夜将四贤士之意说与吕后，吕后哭泣着请高祖亲征。高祖于是决定亲征。他命皇太子为将军，以张良辅之，监关中之兵，并征调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3万人为皇太子侍卫，驻守霸上，拱卫京师。同时下令“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②，并征发诸侯兵，直趋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讨伐英布。部署停当后，他率左丞相郦商、太仆夏侯婴及将军贲赫等，统步骑兵南下，令齐王刘肥、齐相曹参率齐地12万车骑直下蕲西之地。两股大军齐下，形成夹攻之势，准备将英布消灭在蕲县西部地区。

英布东取荆王刘贾获胜后，占领荆都临淮（今安徽泗洪南），指挥大军北渡淮河攻楚。原楚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皇子刘交代为楚王。面对英布的进攻，刘交率楚军在徐、僮之间（今安徽泗县、宿县北部一带）进行抵抗。他将部队一分为三，各守一地，

---

① 《资治通鉴》卷十二汉纪四高帝十一年。

②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欲以相救为奇"，犯了兵家之大忌。谋士指出："（英）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分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① 刘交不听，结果被英布以其优势兵力击溃一军迅速突破防线，其余两军闻讯散逃，楚军大败。

英布战胜刘交后，挥师向西，正好与汉高祖所率汉军主力相遇于蕲县之西。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冬十月，两军会战于蕲县西南约 30 里的甀乡。英布之军兵精马壮，列阵严整，位于甀乡之南。高祖大军远道而至，不便立即交战，便在甀乡北邻庸城坚壁待机。高祖在庸城阵前见英布的布阵同过去项羽的布阵一样，十分反感，对着英布高喊："何苦而反？"英布既已谋反，就干脆回答说："欲为帝耳！"②高祖怒极，遂挥师出战。混战之中，高祖身中流矢，病体受伤。齐王刘肥与曹参见状，即令 12 万车骑出击。高祖带伤令车骑将军灌婴击英布别将于蕲县西北的相县，斩杀了英布三员大将，随后又与曹参合军击败英布军之东北翼，大败英布上柱国和大司马之军。接着，再破英布别将肥铢，俘获左司马一人，斩其 10 名将校。在英布侧翼诸军皆败的同时，正面与郦商所率汉军交战的楚军，也遭失败。英布率残兵南撤淮水岸边，诸路汉军紧追不舍，英布渡过淮水，继续奔逃。汉军渡淮追击，英布且战且走，最后只率百余人逃至江南。其狼狈之状，不亚于昔日垓下败逃的项羽。

早在英布起兵反秦时，番君吴芮曾将女儿嫁与英布为妻。此时，吴芮之子长沙成王吴臣见英布谋反失败，诈称愿与其一起逃亡南越（今广东、广西地区）。英布遂随之奔往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结果被番阳人杀于兹乡。

淮南王英布的叛乱被彻底平息，异姓王中最难对付的一股割据势力终于也被铲除了。

在这场叛乱中，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叛乱平息后，汉高祖因刘贾无后，乃更荆国为吴国，以皇侄刘濞为吴王，统治淮南三郡 53 城之地。

---

①②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五、灭燕王卢绾之战

卢绾原本深受汉高祖的信任，被封为燕王后对汉室也是忠心耿耿的。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秋，代相陈豨发动叛乱，卢绾曾发燕兵进击陈豨的东北翼，有力地配合了汉军的平叛斗争。陈豨见四面楚歌，形势危急，即派遣王黄向匈奴求援。卢绾闻讯，也派张胜前往匈奴，劝说匈奴不要出兵助陈。张胜抵达匈奴时，正好遇到叛逃匈奴的原燕王臧荼子臧衍，臧衍对他挑拨说："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豨，而与胡连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①。张胜竟为其所惑，违背使命，暗请匈奴出兵反击燕军。卢绾见匈奴出兵来攻，怀疑张胜与匈奴暗中勾结，马上向汉高祖上书，请求诛杀张胜家人。张胜自匈奴返回燕国后，向卢绾陈述其所以勾结匈奴击燕的缘由。卢绾也为其所惑，再次上书朝廷，谎称谋反者非张胜而是别的人，以掩盖张胜的罪行，并暗中派使者范齐与陈豨联络，鼓动他与汉军作持久之战。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汉军征讨陈豨大获全胜，陈豨一裨将降汉，揭发了卢绾派范齐与陈豨密谋抗汉之事。高祖派人召卢绾入朝，卢绾见诏恐惧，称病不往。高祖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赴燕召卢，并向卢绾的左右调查卢绾的情况。卢绾益恐，匿居不出，暗中对幸臣说："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汉族淮阴（指韩信），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②。他仍以生病为由，拒不入朝，手下左右大臣也纷纷亡匿。审食其探知卢绾与幸臣的密语，回京师长安报告汉高祖。高祖又从匈奴降者口

①②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中得知卢绾使臣张胜果然就在匈奴，断定“绾果反矣”①。于是，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4年）春二月，令樊哙率兵征讨卢绾，同时册立皇子刘建为燕王。正当樊哙准备以相国兼将军的身份挂帅征燕之时，却被告发他与吕后结党，准备在高祖病逝后尽诛其宠姬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高祖于是免去樊哙之职，改命周勃为统帅，并下诏宣布：“燕吏民非有罪者，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②

周勃代樊哙为相后，于汉高祖十二年二月率10万大军伐燕。周勃采取军事进攻与招降并举的策略，根据汉高祖的诏令，对燕国六百石以上官吏未随卢绾反叛者，均加爵一级；曾随卢绾反叛后又弃卢绾归汉者，一律赦罪免予追究，并加爵一级。这一措施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卢绾手下将吏纷纷脱离卢绾，率部归附朝廷，积极投入平叛斗争。汉军得到广泛支持，很快攻下了燕都蓟城，俘获燕国的大将抵、丞相偃、太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等。卢绾率家属及宫人逃离蓟城北遁。周勃指挥汉军乘胜追击，攻破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卢绾再向北逃窜，周勃挥师追至长城脚下，平定了上谷郡12县、右北平郡16县及辽西辽东29县、渔阳22县。

卢绾一败涂地后，在长城脚下东躲西藏，准备待机入朝向高祖谢罪。不料，当年四月高祖驾崩。卢绾闻讯，遂北出长城，逃往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一年多后病死于匈奴帐中。

至此，通过5次大规模的战争，西汉王朝建国前后所封的异姓诸侯王已有5个被彻底铲除了。

六、诛灭韩信和彭越

西汉初年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斗争中，势力强劲的楚王韩信和

---

① 《汉书》卷二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②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梁王彭越是未经战争而被削王除国的。

韩信与张良、萧何并称汉初三杰，在楚汉战争中任大将军，屡建奇功。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二月，韩信被封为齐王，但在次年又被夺去军权，从齐地徙往淮北，改封为楚王，建都下邳。韩信来到淮北后，原项羽的旧将钟离昧正逃亡在楚国封地内。汉高祖十分痛恨钟离昧，多次下诏令韩信将其捕杀。但韩信素与钟离昧友善，不忍杀之，由此又招致汉高祖的猜忌，时刻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十月，有人以韩信在封国内巡行时列兵相随为由，上书诬告韩信企图谋反。汉高祖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左右诸将争相请求统兵征讨，但陈平认为朝廷的精兵良将皆不如韩信，“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①，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建议：“古者天子巡守，会诸侯。南方有云梦（今属湖北），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陈、楚之西界，（韩）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禽（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②意思是让汉高祖伪装巡游云梦，乘韩信出郊迎谒之机擒之。他即加以采纳，下诏遍告诸侯，宣称自己“将游云梦”，会诸侯于陈地。

韩信深知汉高祖怀疑自己，听说汉高祖将游云梦，更是惶恐不安。谋士向他建议：“斩（钟离）昧以谒上，上必喜，无患。”③韩信又与钟离昧商量对策，钟离昧说：“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汉，吾今死，公随手亡矣。”随后大骂韩信，自杀身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至陈地拜谒高祖。高祖仍决心除掉韩信，令武士将他捆绑起来，载之后车。韩信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烹）！”④高祖回答说：“人告公反。”随即将韩信押送洛阳。但因韩信确无反状，汉高祖只得赦其罪，将他由楚王贬为淮阴侯。

---

①②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③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④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同年，封皇弟刘交为楚王，以王楚地。

韩信一再被削地夺爵，知道汉高祖畏惧自己将兵征战的才能，对高祖更加不满，常称病不朝，羞与周勃、灌婴为伍。在汉高祖面前，他甚至公开声言“陛下不过能将（兵）十万”，而自己将兵则“多多益办耳”①。后来，韩信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就发展为谋反行动。当阳夏侯陈豨被汉高祖派往赵、代监军为相国，向韩信辞行时，他竟策动陈豨谋叛：“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②双方商定：陈豨在边地举兵反叛，他在京师响应配合。汉高祖十年（前197年）末，陈豨果反，汉高祖亲自统兵出征，命韩信随行。他仍以生病为由拒不出京，一面派人与陈豨联络，一面与家臣密谋，准备在夜间“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③。这时，韩信身边的舍人谢公（一云乐说）因事得罪韩信，韩信将其囚禁起来，准备把他杀掉。谢公之弟遂向吕后上书告发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之事，吕后本打算召韩信入朝加以逮捕，又怕其不从，乃与丞相萧何合谋，决定“诈令人从帝所来，称豨已死”④，令群臣入宫相贺。萧何还对韩信说，你虽有病，也应强支病体入朝庆贺。韩信不明真假，一入朝，就被吕后埋伏的武士捕获，斩杀于长安长乐宫之钟室。被杀之前，韩信仰天长叹：“吾悔不用蒯通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⑤吕后随即下令，尽斩韩信三族。不久，汉高祖平息陈豨叛乱回到长安，听说韩信已经被杀，且喜且哀，喜的是彻底消除了又一心腹之患，哀的是汉军永远失去了一员功臣良将。

比韩信下场更惨的是梁王彭越。

彭越早年起兵反秦，因未得项羽封王而叛楚。汉高祖二年（前205年）被拜为魏相，将兵略定梁地。楚汉战争中，彭越游击楚兵，断楚粮道，对汉楚两军的盛衰起着重大的作用。汉高祖五

---

①②③《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④⑤《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年（前 202 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曾与诸侯合击项羽于垓下，为高祖登极建国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后，异姓诸侯王一个个被翦除，梁王彭越日感恐惧不安。为了消除汉高祖对自己的猜疑，他不断入朝拜谒皇帝，以求安其王位。汉高祖十年（前 197 年），高祖亲率大军征讨赵相陈豨，过邯郸时，征兵于梁地，令彭越率兵随征。彭越因病未能亲自将兵，另派别将率领梁兵赶到邯郸，高祖怒不可遏，派人谴责彭越。彭越恐慌不安，准备亲去邯郸谢罪，手下的大将扈辄劝阻说："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擒，不如遂发兵反。"① 彭越不听。这时，梁国太仆有罪怕遭彭越处罚被杀，逃至邯郸，向汉高祖状告梁王与扈辄密谋反叛朝廷。汉高祖立即派人捕捉了彭越，把他押送洛阳，投入狱中。经廷尉调查，扈辄确曾劝告彭越反汉，彭越虽未即谋叛，但亦未杀扈辄，算是"反形已具"，"请论如法"②。汉高祖念他昔日助汉之功，赦其死罪，削国夺爵，贬为庶人，流放蜀地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北）。

彭越从洛阳被押往蜀地，西过郑县（今陕西华县）时，恰遇从长安东往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表白自己无罪，请求让他还归故里昌邑。吕后当场表示答应，并将彭越带回。但到达洛阳后，她却对汉高祖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③得到高祖的准许，遂令彭越舍人状告彭越再次谋反，再令廷尉奏请高祖批准，于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三月将他的宗族全部诛杀，并将彭越头颅悬挂于洛阳城门示众，将彭越尸体制成肉酱，遍赐诸侯，以示警戒。

彭越被杀后，汉高祖以皇子刘恢为梁王，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从原梁国封地中划出东郡、颍川为刘友封国。这样，刘恢、刘友分治彭越原先的封地。

从汉高祖称帝开始，至高祖十二年燕王卢绾被消灭为止，汉初进行了长达 7 年的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斗争。7 年之中，先后经历

---

①②③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5 场大规模的战争，除北征卢绾一役之外，其余 4 场战争，汉高祖都是亲自出马，动用大军，挂帅亲讨，表现了他对异姓诸侯王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的决心。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未经战争而被除，则是经过吕后的精心谋划而用计诛杀的，这样，建国前所封的 7 个异姓诸侯王，唯有势力最为弱小、僻处南疆的长沙王封国犹存。异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已经彻底根除了。

汉高祖削平异姓诸侯王的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这无疑是符合历史潮流、切合民心的举动。汉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异姓诸侯王在反叛的名声中一一灭亡，说明分裂割据是不得人心，受到人民的唾弃的。

第二节　铲除诸吕的斗争

一、吕后专权与诸吕控制军权

西汉王朝削平异姓诸侯王，中央可以不必担心握有重兵、控制大量人口和土地的开国功臣会祸起肘腋，危及中央政权的安全。但西汉王朝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丧失了众多的功臣、良将，连汉高祖本人也在亲征淮南王的战斗中中箭负伤而久治不愈，于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四月崩逝于长安长乐宫中。

汉高祖去世时，太子刘盈年仅 16 岁，为人仁弱，他的生母吕后深恐他即位后，那些能征善战的朝中重臣不服，天下难安。她决定先秘不发丧，杀尽朝中老臣，然后再为之发丧下葬，扶太子登极。她对谋臣审食其透露其计划说："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审食其同意了她的安排。但 4 天之后，皇帝驾崩的消息还是泄漏出来，有人将此事告诉曲阳侯郦商将军，郦商立即去找审食其，对他指出："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

将皆诛，必连兵还乡（向），以攻关中。大臣内畔，诸侯外反，亡可跻足待也。”① 审食其听后，入宫向吕后讲述了秘不发丧、大诛功臣之危害，吕后这才将高祖已崩之事露布天下，大赦罪人。五月，为高祖举行葬礼，葬之于长陵。太子刘盈寻即皇帝位，是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

汉惠帝登极后，朝政大权实际上控制在“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② 的吕太后手中。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独揽朝政，她立即着手清除有可能对她构成威胁的隐患。高祖在临终前数月，曾因太子刘盈不像自己那样刚毅，打算将其废黜，另立宠妃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后经大臣张良、叔孙通等人的谏阻而作罢。吕后本来就十分妒忌戚夫人，经过这次废立太子之事，对戚氏及赵王如意更是恨之入骨。惠帝即位后，吕太后便将戚夫人囚禁起来，召赵王如意入宫，准备将其母子一并杀害。赵相周昌以赵王有病为由，未让其入宫。吕太后大怒，先令周昌入朝，再令赵王进京。赵王不得已来到长安，仁慈的汉惠帝知太后怒怨赵王，亲自迎赵王于霸上，陪他一起入宫，又一起同食共寝，吕太后一时无法下手杀害赵王。汉惠帝元年（前 194 年）十二月的一天，惠帝约赵王明晨一同出猎。不料，翌晨，惠帝已出，赵王年少贪睡，没有如约早起，吕太后乘机派人将其鸩杀于床榻之上，下令徙淮阳王刘友为赵王。接着，吕太后遂砍断戚夫人手脚，戳瞎眼睛，弄聋耳朵，并逼饮瘖药，弄哑她的嗓子，使居厕中，称为“人彘”，叫汉惠帝前去观看。惠帝看后吓出一场大病，一年多卧床不起，派人对太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③从此，他每日饮酒纵欲，不再临朝听政。汉惠帝二年（前 193 年）十月，汉高祖长子齐王刘肥进京朝觐，惠帝在吕太后前宴请齐王，按家礼请齐王入上座。吕太后大怒，令人进毒酒企图毒害齐王。齐王发现情况异常，佯醉而出。齐国内史士向他献计：“太后独有孝惠

---

①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

②③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① 齐王依计让出齐地城阳一郡给鲁元公主，并尊公主为鲁王太后，这才幸免于难。

汉惠帝七年（前 188 年）秋八月，24 岁的惠帝在当了 7 年空头皇帝之后郁郁而亡。吕后虽然失去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但在惠帝发丧时，她竟哭而无泪。群臣大惑不解，张良之子、入侍天子的侍中张辟疆对丞相陈平说：“（惠）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②。陈丞相这才明白吕后的心思，立即按辟疆之计行事，奏请拜吕后之内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将军，入宫执掌南军与北军的大权。吕后大悦，这才放声哀哭。汉惠帝死后，张皇后本无子，但她在此前已奉吕后之命取宫女吕氏所生子为己子，而杀其母，以为太子。吕后便以诸吕控制军权作靠山，擅立这个年幼的太子为皇帝，自己临朝称制，“号令一出太后”③。

吕后称制后，为了巩固吕氏的家天下，以抗衡刘姓诸侯王及高祖朝的旧臣，决意大封吕姓子弟为王。汉高后元年（前 187 年）冬，她在朝堂上先问右丞相王陵对此有何看法，王陵表示反对，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④太后听后十分不满，又问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有何意见，周勃等人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喜而罢朝，分封诸吕的决心遂定。

为减少分封诸吕的阻力，吕后首先撤换了一批重要的大臣。她将反对分封诸吕的王陵罢去相位，迫使他以病还乡，并将陈平由左丞相提升为右丞相，同时，任命其宠臣审食其为左丞相，令其监政宫中，如履郎中令之责，而不治府中之事，常侍左右，决断天下大事。后又将亲近自己的上党太守任敖调入朝中，任为御史大夫。

---

①②③④《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接着，吕后便追尊已死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长兄周吕侯吕泽为悼武王，以试探朝臣对自己分封吕氏家族的态度。同时，封鲁元公主之子张偃为鲁王，封惠帝宫女所生子（实为吕氏诸子）刘山为襄成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刘疆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朝中老臣看出吕后追尊其故去的父兄为王，并分封惠帝后宫诸子为王、侯，目的在于分封诸吕，不得不迎合其意，奏请立悼武王之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国之济南郡以为吕国。吕后许之。不久，其次兄建成康侯吕释之死，立其子吕禄为胡陵侯。为掩人耳目，吕后在封立诸吕王侯时，又封立楚王刘交之子刘郢客为上邳侯，封齐王刘肥子刘章为朱虚侯，并将刘章调入宫中宿卫，以吕禄之女与之为妻，加以控制。后来，吕台死，又立其子吕嘉为王，并立吕后之妹吕须为临光侯。

吕后所立的儿皇帝懂事后，得知自己非惠帝皇后所生，且知自己的生母已被杀害，声言长大后要为母报仇。吕后闻知此事，一手遮天，于汉高后四年（前 184 年）夏私自将小皇帝废掉，杀死，另立汉惠帝后宫所生子常山王刘义为帝，史称少帝，更名刘弘，另以轵侯刘朝代为常山王。

此后，吕后更加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地迫害、废立刘姓王侯，随心所欲地分封诸吕。汉高后六年（前 182 年）冬十月，因吕台子吕嘉在封地内“骄恣”，将其废黜，另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汉高后七年正月，高祖子、赵幽王刘友① 因不爱吕后强加给他的吕氏王后，被吕女诬告。太后大怒，召刘友进京，幽之密室，不予进食，使他活活饿死。二月，吕后又徙梁王刘恢为赵王，封吕产为梁王。吕产既是梁王，又是少帝太傅，长期不赴封国，常留宫中，吕后还割齐国之琅邪郡，封吕须女之夫刘泽为琅邪王。梁王刘恢徙赵后，郁郁不乐，吕后又使人毒杀了刘恢宠姬，以吕产之女妻之，以为赵王后。赵王后的从官皆为吕氏，在赵国擅权跋扈，

---

① 刘友原被汉高祖封为淮阳王，汉惠帝元年（前 194 年）被吕后徙封为赵幽王。

时刻窥探赵王动向。六月，赵王心灰意冷，在封国内自杀身亡。遂立吕禄为赵王。九月，燕王刘建死后，吕后使人杀其后嗣，罢除燕国，旋以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吕通弟吕庄为东平侯。

汉高后八年（前 180 年）七月，吕后身患重病。她唯恐自己死后吕氏的王侯之位被夺，便下诏以吕禄为上将军，直领北军，以吕产为相国，直领南军，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并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① 吕产、吕禄牢记吕后之言，死死抓住中央军权不放，企图使诸吕永掌朝政。

二、铲除诸吕势力的斗争

汉高后八年（前 180 年）七月三十日，吕后病逝于长安未央宫中。她临朝八载，政治上继续施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使社会基本维持稳定，"天下晏然"②。病逝前，立下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赐财物有差，大赦天下以求安定。但她为独揽朝权而分封诸吕，排斥打击刘氏诸王与朝中老臣，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情的发展也就未能如她所愿。

吕后在世专权时，高祖旧臣周勃、陈平慑于她的威势，为求免祸，对吕氏的分封表面上采取附和的态度，实际上对诸吕的秉政却深恶痛绝。后来，陈平常静居独虑对付的方策 。汉高祖的文臣陆贾看出了这一点，汉高后七年，他向陈平进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周勃），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③

①②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 《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陈平于是联络太尉周勃，并送给贾陆奴婢100人、车马50乘、钱500万，让他暗中联络朝廷公卿，准备待时机成熟时共同行动，诛除诸吕。

吕禄、吕产一为上将军，一为相国，专兵秉政，大权在握。他们自知违背汉高祖之约，恐怕有朝一日会为高祖旧臣及刘氏王侯所诛。吕后一死，他们就想抢先下手，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尽杀高祖旧臣及刘姓王侯。但又顾忌内有太尉周勃和朱虚侯刘章，外有齐王、代王、吴王等刘姓诸侯之兵，一直犹豫不决。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吕禄的女婿、住在宫中的朱虚侯刘章察觉。刘章见形势危急，立即派人告知其兄、齐哀王刘襄，嘱其发兵西讨，答应事成之后立他为帝。自己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在京城里应外合，一举尽诛诸吕。

齐哀王刘襄接到刘章使者的密报，与其舅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清除了反对出兵的齐相召平，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悉发齐国之兵，讨伐诸吕。祝午被任为内史，向东到琅邪用计调发琅邪王刘泽之兵，与齐兵汇合。齐王率兵向西，进攻吕国之济南郡（治今山东章丘西），并致书诸王，说明他举兵讨伐诸吕的缘由：“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挢制以令天下，宗庙以危。寡人帅兵入诛不当为王者。”①

相国吕产等在京师得知齐王起兵的消息，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迎击。灌婴到达荥阳，与部将商议，认为“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②，于是派人联络齐王及刘氏各诸侯王，待吕氏兴乱，即共同联兵进京，诛灭诸

---

①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②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吕。齐王刘襄接受这个建议，引兵东还，屯驻齐国西界以待机。

齐王起兵之后，周勃、陈平、刘章等人即在京师准备策应。但周勃虽为太尉，却不得主兵，他与陈平商议，命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去说服吕禄交出兵权。郦寄对吕禄说："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① 吕禄素与郦寄友善，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当即表示同意，并叫人转告吕产及诸吕，但诸吕中有人表示反对，因而"未有所决"②。

九月初十日清晨③，故丞相曹参之子、平阳侯曹窋行御史大夫事，正与相国吕产商议国事时，吕产派往齐国打探消息的郎中令贾寿归来，向吕产报告灌婴已与齐、楚联合，准备连兵诛灭诸吕，要他从速入宫采取对策。曹窋急忙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马上赶去北军驻地准备调兵，但为吕禄的亲信所阻。遂由掌管天子符节的襄平侯纪通诈称天子有命，宣布北军交由太尉周勃亲统。周勃又令郦寄、典客刘揭去见吕禄说："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④吕禄遂交出北军大印。周勃立即驰入北军，对将士下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⑤ 军中将士心向刘氏汉室，听令后皆袒露左肩，表示服从周勃指挥调动。周勃旋即驰赴南军驻地，准备夺取吕产的军权。此时，陈平召来协助周勃的朱虚侯刘章正好赶到，周勃令其把住军门，又令曹窋告诉卫尉，不得放吕产进入殿门。吕产不知北军之动向，拟入未央宫调兵作乱，走到殿门为卫尉所挡，旋被带兵入宫的刘章

---

①②④ 《汉书》卷三《高后纪》。

③ 《资治通鉴》卷十三作"九月庚申日"。《汉书·高后纪》、《史记·吕太后本纪》均作"八月庚申"，误。

⑤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所杀。刘章随后与谒者一同持节进入长乐宫，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次日，周勃下令斩杀吕禄，笞死吕须，并分遣军士将诸吕男女全部捕获，不分少长，一律斩杀。燕王吕通也被周勃所派将士杀死，诸吕被彻底铲除，吕后以来权归吕氏的局面顷刻瓦解。

诸吕被除后，周勃、陈平等大臣认为："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用强吕氏。今已灭诸吕，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①。有人认为齐王为高帝长孙，主张拥立齐王为帝。但多数大臣认为，齐王之舅驷钧也如吕氏一样专横，如果立他为帝，将来恐重蹈诸吕擅政覆辙。经过一番讨论，大臣们一致认为代王刘恒是最合适的人选："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②。于是，群臣共召代王入朝，于闰九月即位，是为孝文帝。

第三节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

（参见附图 3）

一、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

吕后专权时，极力排挤和迫害刘氏宗室，赵王刘友和梁王刘恢被害而亡，燕王刘建死后也被杀尽后嗣而罢废。刘氏宗室与朝中老臣合谋诛除诸吕后，共扶汉文帝继位。至此，汉高祖所封的9个同姓诸侯王，就只剩下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襄、淮南厉王刘长，还有一个异姓长沙王吴芮。汉文帝原本是个代王，他之所以能继承帝位，得力于宗室大臣的拥戴，为了酬谢并笼络刘氏宗室以巩固帝位，便又继续分封同姓诸侯王。即位不久，他即

---

①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②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 179 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刘友之子遂为赵王，徙吕后时封的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将“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①。汉文帝前元二年三月，立赵王刘遂之弟辟疆为河间王，悼惠王之子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三年四月死），刘兴居为济北王（三年八月因兴居犯罪自杀，国除），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史称梁孝王），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四年徙封代王，复并得太原），立皇子刘揖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 164 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又立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同年，又封十年前因谋反败亡的淮南王刘长之子三人为王。这样，汉文帝先后共封了 17 个同姓诸侯王，几乎是高祖所封之同姓诸侯王的一倍。

同姓诸侯王在汉高祖初封时，大多数年纪尚幼，羽毛也未丰满，高祖死后又遭吕后的排挤迫害，自顾不暇，所以尚未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但是，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的繁衍增殖，诸侯王的势力也在不断膨胀。许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②，争相招徕流民，容纳亡命，甚至藏匿罪犯，与中央争夺人口和劳动力。他们还自征租赋，自铸货币，扩张自己的实力。由于汉初规定商人子弟不得入仕为官，商贾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纷纷投入诸侯王门下，以其钱财交结王侯，更增加了诸侯王的经济实力。随着经济势力的不断发展，这些诸侯王觉得羽毛已丰，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渐露不臣之心，公然“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③，甚至自置丞相，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④，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然而，汉文帝以诸侯王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自觉威信未立，羽翼不丰，对诸侯王的骄纵不法，多采取宽容态度。一些诸侯王因而认为他软弱可欺，公

---

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③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④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开发动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同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迅速地激化起来了。

最早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的序幕的，是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故齐悼王刘肥之子。在诸吕势力被清除后，他曾以东牟侯的身份，同诸大臣共立文帝于代邸，并亲自率兵将少帝逐出未央宫，迎文帝入宫就位。商议封王时，许多大臣以诛诸吕时朱虚侯刘章功劳最大，“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①。但汉文帝听说刘兴居与刘章当初曾打算立齐王为帝，所以只割齐地两郡封授刘章与刘兴居，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刘兴居与刘章对此极为不满，“意自以失职夺功”②。过了一年多，刘章病死，但刘兴居仍耿耿于怀，渐起叛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前 177 年）五月，匈奴侵入北地、河南，文帝下令调集大军，命丞相灌婴统率出征，自己亲自到太原督战。刘兴居遂乘机起兵反叛，准备进袭荥阳。汉文帝闻讯，下诏罢丞相兵，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 10 万军队回师镇压，并令祁侯缯贺为将军，戍守荥阳。七月，汉文帝回到长安，下诏宣布：“济北吏兵，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③ 叛军迅速瓦解。八月，刘兴居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的叛乱刚刚平息 3 年，淮南王刘长又再次起兵反叛朝廷。刘长是汉高祖最小的儿子，于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即已受封。汉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汉文帝宽赦之，他更是骄横不法，随文帝入御苑狩猎，竟“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公然锥杀辟阳侯审食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都怕他三分，他因此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并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傅、相等二千石官，自置丞相及二千石官，自行封爵关内侯以下 94 人。他还“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

---

①②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宅"①。汉文帝未加惩处，只令其舅父、将军薄昭致信劝戒。刘长更加"不说（悦）"，遂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令大夫旦、士伍开章等70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秘密策划，准备以辇车40乘反于谷口（今陕西西安北），并派人出使闽越、匈奴，求其发兵援助。但未及行动，即被朝廷觉察。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丞相张苍、典客冯敬奏请依法处以"弃市"之刑，汉文帝说他"不忍置法于王"，让与列侯、吏二千石官再议，列侯、吏二千石官灌婴等43人也主张依法处置。最后，汉文帝下令尽诛所与谋者，但赦刘长不罪，只废除王爵，流放蜀郡。刘长行至雍地，绝食而死。

济北王与淮南王的反叛说明，日益膨胀的同姓诸侯王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地威胁皇权的安全，破坏国家的统一。朝野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纷纷思考如何削弱诸王势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汉文帝前元六年，就在淮南王的叛乱平息不久，年青的梁王太傅贾谊向文帝呈递了一篇后来被称为《治安策》的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上书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大势，驳斥某些进言者所说的"天下已安已治"的错误看法，认为当时的西汉是危机四伏，是"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因此他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一个王国分为几个，让诸侯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从而使每个王国由大变小，"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无力再与中央政府对抗，而接受朝廷的统辖，这样，"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②，天

---

①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②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下就可安定。

贾谊《治安策》对形势的分析十分精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切实可行。但因此前曾有朝中元老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①，汉文帝怕得罪这些开国元勋，故未即采纳。汉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年）夏，封已死的淮南王刘长四个儿子为列侯，贾谊看出文帝终将封立他们为王，又上疏谏阻：“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英）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②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刘揖坠马死，无子，贾谊又上书建议文帝将皇子刘武由淮阳王改封为梁王，“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如不行，则将皇子、代王刘参迁都于睢阳。因为“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③这次，汉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徙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④。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徙城阳王刘喜王淮南故地。十五年（前165年）齐文王死，无子。翌年，汉文帝又依照贾谊的建议，把齐地分为六，立齐悼惠王六个儿子为王：刘将闾为齐王，都临淄；刘志为济北王，都博阳；刘

---

①②③《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④《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梁王刘揖死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淮阳王刘武徙封为梁王于十二年；而《汉书·诸侯王表》均记两事为十年。《汉书·文帝纪》及《资治通鉴》均记两事为十一年，今从之。

贤为菑川王，都剧（今山东寿光南）；刘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刘印为胶西王，都高苑（今山东邹平东北）；刘辟光为济南王，都东平（今山东东平东）。同年，又将刘喜从淮南迁回城阳故地，将淮南一分为三，此时刘长一子已死，另立其余三子为王：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二、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及其战略部署

汉文帝限制诸侯王的措施显得过于软弱，未能抑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病死，由“材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① 的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对诸王专横不法早就十分痛恨。他年轻气盛，继位不久就与御史大夫晁错商议进一步削弱、打击诸侯王的对策。汉景帝继位前，晁错曾对汉文帝“言宜削诸侯事”，但文帝“不尽听”②；他还几次针对吴王刘濞的不法行为，“言吴过可削”，但“文帝宽，不忍罚”③。汉景帝继位后，迁其为御史大夫，他又“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④。并继续建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⑤汉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楚王刘戊因上年为薄太后守丧期间在服舍私奸，被削去东海、薛郡；赵王因二年前有罪也被削去六县。汉景帝还经廷臣商议，下诏削夺吴王的会稽、豫章二郡。

汉景帝的削藩，激起了众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慌，吴王刘濞终于忍耐不住，纠合各诸侯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刘濞是汉高祖兄刘仲之子，在汉高祖平定英布后被封为吴王。吴王拥有50余城，仅次于拥有72城的齐王，是同姓诸侯王中的

---

①②④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③⑤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第二大国。在汉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刘濞利用吴国境内豫章郡的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他利用雄厚的财力，大肆收买民心，不向百姓收赋，“如此者三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到文帝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刘濞也日益骄横，日渐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有一次，吴太子入朝侍皇太子博饮，因不恭敬被皇太子击杀，他由是“怨望”，称病不朝，开始露出反意。汉文帝对他采取宽容态度，赐其几杖，免其入朝觐见。但他不图改过自新，“乃益骄恣”，“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道”①。

廷臣商议削夺吴地的消息传至吴国都城广陵，吴王刘濞“恐削地无已”，决定起兵叛乱，夺取帝位。他听说胶西王刘印勇而好兵，又刚被削夺六县的封地，心中愤愤不平，就派中大夫应高劝说刘印一起反叛。刘印起初犹豫未决，应高许以事成之后，“两主分割”②、平分天下，他才答应参加。刘濞怕他不坚决，又亲至胶西当面约定。胶西群臣得知他们密谋叛汉，劝阻刘印说：“诸侯地不能为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③但刘印不听，又暗中派人游说齐、淄川、胶东、济南诸王，煽动他们参加叛乱。楚王刘戊因被朝廷削夺东海郡，主动与刘濞勾结，也加入了这个叛汉联盟。汉景帝三年正月，削夺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送到广陵，刘濞认为反叛的时机已经成熟，诛杀了朝廷派到吴国的二千石以下官吏，并下达征兵令：“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④同时，派人约请南方的闽越、东越（瓯）等共出兵相助。在短时间内，他从封地内临时拼凑起 20 多万兵马，加上闽越、东越（瓯）派来的援兵，共约 30 多万人，即公开举起叛旗，从广陵出发，渡过淮河，向西汉统治的中心区域进攻。加入反汉联盟的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等国纷纷出兵响应。济北王因为城墙倾圮，其郎中令

---

①②③④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挟持济北王督工修筑，因而没有发兵。齐王悔约，也未出兵参与叛乱。楚国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反对叛乱，楚王刘戊叛心已定，杀掉张尚、赵夷吾，举兵响应吴王。赵相建德、内史王悍也谏阻赵王刘遂，赵王杀掉建德、王悍，发兵至赵国西界，等候吴、楚叛军到来，一起西进关中，并遣使约请匈奴出兵攻汉。胶西王、胶东王则与淄川王、济南王一起发兵围攻齐都临淄，想迫使齐王参与叛乱。吴楚七国之乱的战火在中原大地迅速蔓延开来。

吴王刘濞在起兵之前，曾向胶西王透露他谋划的第一个行动计划：由他亲率吴楚之兵略函谷关，夺荥阳敖仓之粟而守之，距汉军，以会诸侯，再合兵攻取关中。起兵反叛后，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吴臣田禄伯认为他的这个计划只有一路大军径直向西，没有另外方向的策应，难以取胜，向吴王提出："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但吴王的太子表示反对，说："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①刘濞遂拒绝他分兵迂回入关的奇正并用的计策。年青将领桓将军也向刘濞指出："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建议他挥师西进时，沿途不攻城夺地，而以最快的速度抢占洛阳的武库和敖仓的粮仓，据洛、荥一带的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否则，如"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②。刘濞向吴国的老将征询意见，老将认为桓将军是年轻人，只配冲锋陷阵，根本不懂用兵的谋略。刘濞便拒绝了这个避短用长、速占关东战略要地的建议。

起兵之后，吴王刘濞按照自己确定的计划，率领 30 多万吴兵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准备进攻梁地，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并派出一批间谍潜往殽黾（指今陕西潼关以东至今河南渑池之西的山区）一带，以候探关中军情。在楚地，刘濞派人致书遍告诸侯王，打出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说："以汉有贼

①②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臣（晁）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仕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① 企图借此煽动更多的诸侯王参加反叛。刘濞在书中，还自称握有精兵50万，又可得南越之兵30万，并拥有经营吴国30余年所积蓄的大量钱财，可供“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足以“匡正天下”，“以安刘氏”②，力图借此为参加叛乱的众诸侯王壮胆打气。刘濞在书中还以金钱爵邑为诱饵，诱骗诸侯国的官吏百姓参与叛乱，宣布：“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率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③刘濞的致诸侯书，还公开宣布他的作战部署：南越兵直取长沙以北，然后西趋巴、蜀、汉中；楚、越及淮南、衡山、济北三王会同吴军西取荥阳；齐、淄川、济南、胶东、胶西诸王定河间、河内，然后或入临晋关，或与吴军会师于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云中，联合匈奴兵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然后各路会师，西攻长安。刘濞的这个作战计划虽然是南、东、北三个方向合击关中，但作为整个作战计划的关键之着仍然坚持原先的部署不变，即由他自己率领吴、楚主力攻占荥阳，然后与南、北两路诸侯军会师洛阳，西取长安。后来由于其他诸侯王没有按计划行动，南北两路进军纯属虚构，结果还是由他自己率领的吴、楚联军一路孤军奋战，所谓三路出兵、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就变成一路孤军西进了。

接着，刘濞率吴、楚联军进攻梁国，攻破棘壁（今河南睢县东南），杀数万人，继续西进。梁王刘武命将率兵反击，又被打败。梁王被迫退守梁都睢阳，拼死顽抗。吴、楚叛军从此陷于梁地无法脱身。战局的发展，果如桓将军事前所预料的那样：“大王徐行，

---

①②③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刘濞的战略决策与作战指导屡屡失误，这就铸定了他必然败亡的结局。

三、周亚夫率军反击及其战略决策

吴王刘濞发动七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汉景帝召坚决主张削藩的御史大夫晁错商议对策，晁错建议皇帝御驾亲征，由他留驻长安居守。晁错还拟审讯原吴国丞相爰盎，了解吴王谋划叛乱的详细内幕，以便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对策。爰盎过去曾接受过刘濞的财物贿赂，在汉景帝面前力保吴王不反，为此受到过晁错的治罪，被汉景帝诏赦为庶人。不料，爰盎得到消息，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通过丞相、窦太后之侄窦婴的关系，入见汉景帝，说吴、楚等国反叛，皆由晁错鼓吹削夺诸侯封地所致，“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而俱罢”①。汉景帝竟为他的花言巧语所说动，下令将竭诚“安刘氏宗庙”的晁错腰斩于市，而命爰盎为太常、吴王之侄德通侯刘通为宗正，持诏前往吴国赦免七王之罪，令其罢兵。这时，吴王刘濞已率兵进攻梁地，爰盎、刘通到达梁地，刘濞却拒不受诏，说：“我已为东帝，尚谁拜！”② 并要求爰盎参与叛乱。爰盎未允，刘濞拟囚杀之，他只得连夜逃回长安。

汉景帝斩杀晁错后，焦急地等待吴、楚罢兵的消息。过几天，谒者仆射邓公从前线归来，他即询问：“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说：“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③汉景帝这才恍然大悟，悔恨错杀了晁错，决定改变姑息政策，发兵讨伐叛军。他想起汉文帝临终前戒谕他的一句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④，拜周勃之子、中尉、条侯周亚夫为太

①③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④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尉，率36将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使屯荥阳，以监视齐、楚之兵。周亚夫一路为汉军主力，着重打击叛军的主力吴、楚叛军，郦寄与栾布则分兵钳制齐、赵叛军，另以窦婴进驻关东的战略要地荥阳，控制南北要道，东阻吴、楚，北拒齐、赵，西屏关中，并保障周亚夫侧背的安全。

周亚夫是个熟知韬略的将军，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受命担任平叛的主将后，根据吴、楚叛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个暂时放弃部分梁国土地，诱使吴楚叛军深入，乘机断其粮道，待其军疲粮尽，再大举出击的作战方案，奏报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① 获得景帝同意后，遂即乘六乘传离开长安，准备前往荥阳与诸将会师。行至霸上，赵涉拦道向周亚夫建议："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陀狭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②周亚夫立即采纳，改变行军路线，不从正面东出函谷关，而是绕过殽、黾，从东南取道蓝田（即峣关，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出武关，经南阳直趋雒阳，并派兵搜捕殽山、黾池之间的吴、楚间谍，抢占荥阳要地，控制雒阳武库和荥阳的敖仓。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周亚夫对平叛战争充满信心，他高兴地说："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③

周亚夫至荥阳与诸将会师后，将荥阳交给大将军窦婴镇守，以防齐、赵之兵西进，自己亲率汉军主力东进，准备迎击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周亚夫率车骑兵进抵淮阳，见到其父周勃的老部下邓都尉。邓都尉提出一个同他制订的作战方案完全相符的建议："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

---

①②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③ 《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景帝前三年。

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① 周亚夫依计而行，没有引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遭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折向东北，驻军昌邑，以控制吴、楚西进的侧背。他自己屯兵昌邑，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另派弓高侯韩颓当率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泗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迂回至吴、楚联军的背后，切断叛军的粮道，从而为最后击败吴、楚联军奠定了基础。

四、七国之乱的平定

吴王刘濞率吴、楚联军攻入楚地后，起初进展颇为顺利，显得锐不可当，但很快就在睢阳受到梁王的顽强抵抗而受挫。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原封淮阳王，汉文帝前元十年原梁王刘揖死后无子，因贾谊的建议将刘武改封为梁王，并扩大其封地，以防范其他诸侯王的反叛。贾谊与汉文帝布置的这步妙棋，现在果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梁王"念（窦）太后、（汉景）帝在（关）中"②，对吴、楚联军坚决进行抵抗。在叛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刘武被迫退守睢阳，多次派人至昌邑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意识到，如果此时他入援梁国，数十万汉军与吴、楚叛军胶着于梁地，不仅会过早遭到削弱，而且仅靠敖仓之粟也无法长期解决军粮的接济问题，万一胶西等四王击破齐军，南下梁地，自己势必腹背受敌，处境更是十分危险。相反，如暂不赴援梁王，让梁王独立坚守一段时间，吸引和消耗吴、楚联军，使之由盛转衰，遭到削弱，再出动汉军主力进击，即可稳操胜算。因此，他坚持"以梁委吴"、以疲叛军的计策，没有赴援。吴军攻城益急，刘武又派人至长安求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依据军法的"将住兵

---

①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②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在外，便宜有守”的规定，仍坚壁不出。刘武于是亲自率兵坚守睢阳，而命中大夫韩安国及已故楚相张尚之弟张羽为将军，“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①，接连击败叛军。吴、楚联军因此无法西进。周亚夫命弓高侯切断吴楚联军的粮道后，见叛军攻梁力量已受到很大消耗，又出兵南下屯驻下邑，进一步威胁叛军的侧背。刘濞见吴、楚联军难以攻克睢阳，遂引兵转攻下邑，想找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仍然坚壁不出。吴、楚联军粮绝卒饥，急于求战，遂派部分兵力对汉军壁垒的东南角发动佯攻，企图吸引汉军的注意力，然后再以主力奔袭西北角。周亚夫识破叛军计谋，下令加强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叛军的攻势。吴、楚联军饥饿不堪，纷纷叛逃，刘濞不得不引兵退走。

二月，周亚夫见叛军不胜而退，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亲率精兵追击。吴、楚联军只顾后退，背对汉军，被杀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刘濞见联军大败，丢下大部人马，只率数千人乘夜南窜。吴、楚士卒或降于周亚夫，或降于梁王，顷刻瓦解。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吴王刘濞溃败南逃的捷报传至京师，汉景帝发布诏书，号召汉军将士乘胜追击。诏书宣布:“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所有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②

刘濞正月间在广陵引兵北渡淮河前，曾派遣下邳人周丘夜袭

---

①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② 《汉书》卷三十五《荆楚吴传》。

下邳，向北攻打阳城，队伍扩展到10余万人。后闻知吴王已弃军而逃，自度反汉难以成功，于是引兵返归下邳，行至途中背疽突发而亡，其军全部逃散。

刘濞狼狈向东南败逃，渡淮越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收集散亡士卒约万余人，企图依附东越（在今浙江境内）以自保。周亚夫率领汉军乘胜追击，遂尽虏之，降其县，并悬赏“购吴王千金”①。月余，东越（瓯）王以慰劳吴国军将之名，将刘濞骗出军营杀死，割下他的头颅送交汉廷。吴王太子刘驹亡走闽越（在今福建境内）。吴楚起兵叛乱，历时3个月，至此被彻底平定。

在吴王唆使下起兵反叛于齐地的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诸王和赵王，也与汉军展开了交战。齐地诸王起兵后，见齐王刘将闾背约而不出兵反汉，胶西王刘卬即率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叛军围攻齐都临淄，企图先灭齐国，再与汉军决战。齐王忙派路中大夫至京师报告汉景帝，景帝令其还报齐王，说汉军正在反击吴、楚之军，让他坚守待援。路中大夫回到齐国后，临淄已被胶西等国叛军重重包围，他不仅未能入城，反被叛军俘虏。叛军令其向齐王喊话：“汉已破矣。”但他却向齐王高喊：“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②喊完即被叛军杀死。在路中大夫离开齐都后，因叛军攻城甚急，齐王一度发生动摇，曾暗中与叛军联系投降。听到路中大夫的喊话，齐臣共劝齐王坚守城池，不要投降叛军。这时，汉将栾布与平阳侯曹襄统领的汉军已赶到齐国，围攻临淄的叛军兵疲意沮，被一举击败，纷纷逃回各自的封国。临淄之围遂解。不久，栾布听说齐王刘将闾曾拟投降叛军，准备移兵讨伐之，刘将闾畏罪服毒自杀。胶西王刘卬返回胶西封地后，准备向汉军投降，汉将韩颓当向他宣读汉景帝的诏书，说：“王其自图！”刘卬自叹：“如卬等死有余罪！”③遂

---

①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②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③ 《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景帝前三年。

自杀，王太子、王太后亦皆自杀身亡。胶东、淄川、济南诸王返回封国后，皆在汉军的追击下兵败被杀。齐地叛乱历时3月余，亦被平定。

汉军另一路大军由郦寄率领，北上征讨赵王叛军。赵王刘遂起兵之后，因吴楚联军的进展受阻，一直持观望态度，迟迟未按计划南下攻夺河内、河南诸地，不久见燕不出兵，自己势孤力薄，难与齐地叛乱诸王和吴、楚合为一体，汉廷又调发大兵来讨，便退守都城邯郸。郦寄大军久攻不下，历时7个月。曾与赵王有联系的匈奴单于听说吴楚联军已败，也未肯入边救援赵王。出征齐地的栾布在消灭胶西王后，回师邯郸，与郦寄将军合力进击，以水灌城。邯郸城破，刘遂自杀。

西汉军队经过7个月的战斗，"斩首十余万级"①，彻底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前元三年六月，景帝下诏："乃者吴王濞等为逆，起兵相胁，诖误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②接着，继续实行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陆续封立13个皇子为诸侯王。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③，规定王国官吏悉由皇帝任免，诸侯王不能干预自己封国内的政务，使之丧失专断擅权的条件。后来，汉廷还规定，王国不得修武备和擅自练兵④，诸侯国人不得到京师宿卫补吏⑤，诸侯王的势力更趋衰弱，几同于"衣食租税"的一般大地主，已难于再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了。

---

①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④⑤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卷六十三《武五子传》；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五、汉军取胜七国战败的主客观条件和原因

吴王刘濞以其 30 余年经营积蓄起来的雄厚实力发动七国之乱，仅只 3 个月的时间，他所统率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即被汉军消灭，前后不过 7 个月，整个叛乱便被西汉中央政权所平息。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战胜这股地方割据势力，并不是偶然的。

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先决条件。西汉初期，值长期的战乱之后，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此时的西汉王朝，顺应民心，不仅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而且采纳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晁错的削藩之策，削弱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以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当吴、楚等诸侯王公然发动叛乱，西汉中央政府经过短暂的犹豫与斩杀晁错的失误之后，毅然决定采用武力加以镇压，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这一切无疑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汉军的行动，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吴楚七国的叛乱，起初虽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但他们“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为时不久，叛乱的主谋刘濞就公然自称“东帝”，要“两主分割”天下，彻底暴露出其大搞分裂割据的野心，从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有甚者，他们为一己的私利，暗中勾结北方的匈奴，以求一逞，更是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再加上叛军驱民为兵，烧杀掳掠，“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这更引起对兵燹之祸记忆犹新的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失去民心的支持。不仅广大人民对它持反对态度，就连众多的同姓诸侯王，也持观望和反对的立场。当时全国的 22 个诸侯王，参加叛乱者只有 7 个诸侯王，不足总数的 1/3。而且在叛军内部，也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信心不

足，屡屡发生动摇和分化事件，如齐地与吴王有约的诸侯王中，齐王就违约未动，济北王也未出兵，吴王致诸侯书中提到的燕王、衡山王、淮南王以及南越王也均不出兵。失道寡助，这就决定了七国之乱必然失败的命运。

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取得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七国之乱的初期，叛军首先发动进攻，处于主动地位，汉军则是被动应战，处于可能遭受两面夹击的不利地位。但汉景帝能对战争的全局作出正确的判断，认准吴王刘濞是叛乱战争的主谋与策划人物，由他统率的吴、楚联军是叛乱战争的主力，选择吴、楚联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任命“真可任将兵”的条侯周亚夫作为太尉，统率主力大军东攻吴、楚，而以郦寄、栾布分兵钳制赵、齐叛军，同时命大将军窦婴进驻荥阳的战略要地，以确保关中和京师的安全。这个符合客观形势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为汉军夺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吴王刘濞既不懂军事而又刚愎自用。起兵之初，他所制定的兵分三路、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纯粹是出于一厢情愿的主观设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由于失道寡助，再加上诸侯王内部的种种矛盾，吴王起兵之后，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现象，燕不出兵，赵存观望，南越也未按计划进至长沙以北。虚构中的南、北、东三路，就只剩下东路。而东路之中，齐王背约，将胶西四王的叛军吸引到临淄一地而未能西进，这路叛军便又剩下吴、楚联军孤军奋战。所谓分进合击攻取关中的战略意图自然也就化为泡影了。

具体的作战指导是实现战略决策的根本保证。作为这场平叛战争的主要统帅，周亚夫具有优异的军事指挥才能，又善于虚心听取周围将士的正确建议。受命赴任之后，他针对吴、楚联军的特点，制定“以梁委之（吴）”、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土地以牵制和消耗吴楚兵力，待敌疲惫而后击之的作战方针，并征得景帝的赞同。尔后，他采纳赵涉的建议，出敌意外地由蓝田出武关，迅速占据战略要地荥、雒，控制雒阳的武库与荥阳的敖仓，在战略

上先站稳脚根。接着，又依邓都尉之计，进据昌邑，守而不战，使吴、楚联军陷于梁地而无法脱身，然后再派兵出淮泗口，截断吴军粮道，使吴、楚联军陷于粮尽兵疲的困境。这一系列的行动，可谓是步步胜着，虽是后发制人，却取得了以逸待劳、变被动为主动的良好效果，从而为最后消灭吴、楚的疲惫之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王刘濞目光短浅而又独断专行，在具体指挥作战上，屡屡出现失误。他先是拒绝田禄伯的分道出击、会师关中的正确建议，又不采纳桓将军急速推进、速战速决的主张，而以主力强攻梁地，不仅予汉军以从容部署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的部伍遭到极大的消耗，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再加上他忽视粮运要道淮泗口的设防，导致军粮的断绝，最后陷入粮尽兵疲的困境，等待着他的就只有败亡的厄运了。

此外，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经济已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加上经过汉初削除异姓诸侯王、铲除诸吕势力的斗争，西汉中央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一切，无疑也是汉军迅速平定七国之乱的重要条件。

第四章　西汉初期对匈奴的防御作战

正当西汉王朝削平异姓诸侯王和铲除诸吕、平定七国叛乱的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来自北方的匈奴势力却不断南下，进入西汉边地进行掠夺。由于汉初国力较弱，西汉政府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并每年奉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以求缓解匈奴的袭扰。但匈奴的袭扰并未因此而完全停止。汉文帝时，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西汉政府开始对匈奴展开一些防御性作战，以阻止匈奴铁骑的进一步深入，减轻边地人民遭受的灾难。

第一节　匈奴统一北方及其对西汉的威胁

一、匈奴统一北方及西灭月氏、征服西域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据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时，匈奴已在北方建立了氏族和部落联盟。战国晚期，匈奴通过战争，财富不断增加，不断渗入大量的外族人口，其势力已逼近秦、赵、燕三国。在秦灭六国之时，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头曼称单于，创建了奴隶制的国家，并乘中原战事方酣、诸侯国无暇外顾之机，占据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秦始皇统一诸夏后，曾“使蒙恬将十万（一云三十万）之众北击胡（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①。匈奴虽弃河南之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而北徙，但在其首领头曼单于的率领下，仍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雄踞北方，秦朝不得不大修“万里长城”以拒之。

西汉初年，匈奴占据着广阔的领土，但人口却“不能当汉之一郡”①，有人认为“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②。据《史记》载，汉初的匈奴“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③。如从这一记载及其寓兵于牧的状况来分析，估计汉初匈奴的总人口当在150万至200万之数④。

当时的匈奴人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美草甘水则止，水尽草竭则移”，即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为辅。他们过着不定居的生活，“毋城郭”，“毋坛宇之居”，“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⑤。匈奴的主要生产资料是牧畜，实行个体私有制。社会成员分为奴隶主、平民和奴隶，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且占有大量的牲畜。他们使用奴隶和依附牧民经营畜牧业。奴隶的来源一是“坐盗者，没入其家”为奴，二是通过攻战“得人以为奴婢”，而以后者为主。

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匈奴国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政治制度。最高的统治者为“单于”，全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之貌，有如汉族皇帝的天子之称。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掌万骑，小者数千骑，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左、右骨都侯为辅政之官。诸王将多为单于子弟担任，且为世袭之官。其他官吏概由贵族任之，匈奴尚左，左贤王高于右贤王，往往是单于的继承人。诸二十四长，各

---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②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③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④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第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参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及《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盐铁论·备胡》等。

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①。

单于和诸王将各有分地，诸左王将居东方，直汉上谷郡以北，东接秽貉、朝鲜；诸右王将居西方，直汉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单于居中，直汉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以北。

在诸王将之外，匈奴还设有“瓯脱王”，即戍边守界的首领，该王常因人因事而设。

匈奴的诸官职，既代表匈奴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代表军事组织，诸王既是各级行政长官，也是各级军事将领。他们平时负责治理部众，征收赋税，战时率领部众作战。无论平时、战时，他们都不离开自己的部众。

匈奴社会的基层单位为“帐”，亦称“落”。“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②。一帐包括夫妻子女若干人。

匈奴贵族中以挛鞮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最为著称，诸单于皆出自挛鞮氏。单于既掌分封，统辖王将，又控制军政大权。这种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具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残余。在这种制度下，奴隶制经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男子既是生产者，也是战士。男孩从小学习骑射，成年后编入军队，平时从事生产，战时“贯弓上马”③ 作战。

军事服从于政治，又对政治起反作用。在“以马上战斗为国”的匈奴社会中，这种反作用尤其显著。担任各级军事、行政长官是匈奴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在任命时必须更多地着眼于军功和作战指挥能力。因此，有些王、将之职不一定全是父子相承或兄终弟及，如出身低微的匈奴人赵信因有谋略也被封为王④，甚至投降的汉将也可被封为王。这种任官制度，保证了匈奴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军事领导集团。

公元前 3 世纪末匈奴建国以前，蒙古草原被许多大小的氏族

---

①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③ 《盐铁论·论功》。

部落和部落联盟所割据，各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①。当时匈奴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地区，其力量在诸部落联盟中并非绝对强大。在它的东南沙拉木伦河流域和老哈河流域，分布着东胡部落联盟，在它的西北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的色楞格河流域，分布着丁零部落。匈奴西南的弱水流域及以西地区，尚有月氏和乌孙部落。此外，在匈奴的周围，还分散着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落。在更远的西域（今天山南北地区），又有几十个部族、部落或小国。在匈奴之南，则是华夏的强大帝国——秦朝。在各个部落联盟或政权中，匈奴东南的东胡、西南的月氏和南方的秦朝是匈奴的劲敌。

头曼单于时，匈奴将王廷设在头曼城（今阴山北麓）。随着部落联盟力量的壮大，匈奴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向南发展，占领了黄河河套以南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将蒙恬一度收复“河南”之地，匈奴不得不向北退缩700余里。

由于匈奴东、西尚有强敌东胡和月氏，头曼单于不得不将太子冒顿送往月氏作为人质。头曼单于宠爱阏氏及其所生少子，产生了废太子冒顿、另立少子的意念。于是，头曼单于公然与月氏交恶，大举进攻月氏，冒顿险些被月氏所杀。在处境危险的情况下，冒顿盗取月氏善马奔回了匈奴。回到匈奴的冒顿先作鸣镝之箭，再凭健壮之躯，率匈奴万骑，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父亲头曼单于而自立，成为匈奴的领袖。

冒顿单于为了对付周围的强敌，整治匈奴制度，巩固内部统一，终日厉兵秣马，加强军事建设，训练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骑兵。东胡王凭借自己强大的势力，派使者到匈奴索取头曼单于生前乘骑的千里宝马。冒顿单于不顾群臣反对，将宝马送与东胡。东胡王认为匈奴畏惧东胡，又向冒顿索取头曼单于的宫女。匈奴王将认为东胡欺人太甚，主张应该发兵出击东胡，冒顿却慨然将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单于的美女送与东胡王。但当东胡王向匈奴索取边界之地时，冒顿却怒斩了同意让地给东胡的臣将，认为“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①！接着发兵东击东胡。

东胡王一贯以为匈奴软弱，不堪一击，对冒顿的进攻未作充分准备。不料，冒顿突发奇兵，神速而至，使东胡王措手不及，东胡兵被一举击破，东胡王及其民众、畜产被匈奴劫获而去。

东胡是个畜牧兼农业的部落联盟，破灭之后，它的民众成了匈奴奴役的劳动人手，它的财产充实了匈奴奴隶制国家，使匈奴进一步强大起来。灭亡了东胡，匈奴解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冒顿开始西击月氏。

月氏是居于河西的一支强大民族。战国末年至秦初，月氏与河西的乌孙发生冲突，乌孙战败，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所杀，乌孙部落被赶出河西。刚出生的难兜靡之子昆莫被其傅父布就翎侯携带投归匈奴，匈奴人收留了昆莫及其被月氏打散的乌孙余部。冒顿击破东胡后，乘胜西击月氏。月氏抵挡不住匈奴与乌孙余部的联合进攻，不得不放弃河西故地，沿天山北麓进入伊犁河下游的广大地区。月氏西迁的时间正值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

匈奴东灭东胡，西败月氏，占据了地理环境更加优越的东胡、月氏故地，一方面积聚起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征服异族的作战经验。作为北方势力最大的匈奴族，在此基础上马不停蹄地以悍骑南并楼烦、白羊（居河套内）二王，占领秦将蒙恬夺取的匈奴故地。又北上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部落。接着，冒顿挥师向西域进发，准备征服天山南北诸国。

西汉初年，西域除乌孙、月氏、塞种之外，尚有 30 多个部族或政权，史称西域 36 国。36 国居住分散，互不统属。在阿尔金山以北至罗布泊洼地，有鄯善国；阿尔金山与昆仑山之间为婼羌；昆仑山及喀喇昆仑山北麓分布着且末（今属新疆）、精绝（今新疆民丰北）、扜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岸）、于阗（今新疆和田）、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皮山（今属新疆）等国；帕米尔及以东地区分布着西夜和子合（位于今新疆叶城、皮山南）、蒲犁和依耐（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及叶城南部）、无雷（今帕米尔）、莎车（今属新疆）、疏勒（今新疆喀什）、休循（今帕米尔北部）诸国；在天山南麓又有温宿（今新疆乌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龟兹（今新疆库车）、轮台和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车师（今吐鲁番、鄯善和昌吉等地）诸国；天山北麓主要为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等国。这些西域民族及国家，多以农业为主，也有的农牧结合，小部分专营牧业，如婼羌、西夜、子合、蒲犁、休循、温宿等。

西域诸国与匈奴相比，有着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已经能够种植粮食、菜、果和棉花，并且能够制造铁器。酿酒、棉纺织、毛纺织和玉器制造等手工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绿洲之间相距较远，交通不便，各国缺乏紧密的联系，民族成份又十分复杂，在政治上形成几十个地区狭小、人口不多的集团，难以抵御外来强大势力的侵入。

匈奴正是在消灭了东胡、月氏等部落联盟后，在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进入西域的。西域诸国中，人多兵盛的国家首推乌孙，据《汉书》载，乌孙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①。这个人口数字实际上是公元1世纪以后乌孙统治下的乌孙、塞种和月氏族的总人口和兵力，秦汉之际，乌孙的力量远不及此。并且，乌孙被月氏击溃后，乌孙王子昆莫完全依靠匈奴的保护才得以生存，因此，乌孙与匈奴有着十分特殊的密切关系。乌孙复国之初，实际上是匈奴的属国。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初年，匈奴乘势扩张到了西域。“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② 西域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

匈奴征服西域大部地区后，立即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设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①，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至此，匈奴不仅统制了蒙古高原，也控制了河西和西域，并“臣服诸羌”②，占据了青海羌族所居之地。匈奴对被征服的各族进行狂暴的掠夺和盘剥，随意征调各属国的兵力，镇压各民族的反抗，凭借广大地区的财物和雄厚的人力，与西汉王朝相抗衡。

二、匈奴的武装力量

匈奴之所以能够灭东胡，征西域，侵河西，除了其奴隶制游牧政权富于掠夺性，外部诸国力量分散、不能联合抗御匈奴的进攻等因素之外，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则是其内因之一。

冒顿时期，匈奴奴隶制国家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政权。在冒顿单于主持下建立的政权系统，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单于既是国家的首脑，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长，虽然各有领地，名称不一，但都领有相应的骑兵，“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③。各级单位直至基层的“帐”都是军政性质的组织。每帐内必有一名以上的骑兵。因此，匈奴的兵制是寓兵于牧，所有成年男子都被编入“甲骑”。匈奴的什长领 10 帐（即汉之 10 户）之兵，是最小的作战单位，合 10 个什长置百长，领兵约百人，百长以上的千长统兵千人。千长以上的诸王将各有兵数千或万余骑不等，他们也称之为“万骑长”。万骑长不仅可以自置千长、百长、什长，也可任命裨小王、相邦、都尉、当户、且渠等中下级军官。

从军事组织和兵制来看，匈奴虽然没有一支脱离生产的常备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军，也没有一支专事征战的雇佣兵，但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军营。男子既是生产者，更是战士。征服东胡、月氏和西域诸国后，属国之民也常常被匈奴征来充军。匈奴的女子一般不参加战斗，但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匈奴妇女也能走马射箭，她们常在军中负责后勤和生产。当匈奴大军远征时，妇女们常驱赶牛马随行，“因水草为仓禀”①，源源不断地供给军食。这样，便避免了作战中运粮转输之劳，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此外，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②的习俗，丁壮战死后，其孤儿寡母不会流离失所，免去了骑兵征战的后顾之忧，战斗力很强。又由于匈奴的行政组织军政合一，单于及以下各级官吏平时既负责一切行政事务，又组织军队的训练，因此，官兵关系密切，无将不知兵，无兵不知将，在战斗中尽可发挥最大的战斗能力。

匈奴的军队以骑兵为主，主要的进攻武器为弓箭。“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③。又有剑、匕首、长矛和套索。防御器械有头盔、铠甲和盾牌。战马既是匈奴骑兵的坐骑，也普遍用于运输，故其行军作战速度快，善远征，又机动灵活。匈奴骑兵的弓箭手在五六十米之内能准确地射中目标，有效射程可达一百五六十米。冒顿使用“鸣镝”箭，发射时带有声响，既可直接杀伤敌人，又可用于作战指挥。“鸣镝”所射之处，即是部众攻击的目标。除了弓箭之外，远距离进攻时，匈奴骑兵也常投掷矛。在短兵相接时，匈奴骑兵则多用鋋、刀、剑、匕首和套索。鋋是铁柄短兵器，形似短矛。套索是用牛皮制成的绳索，常在拼杀中冷不防抛出，套上对方的肢体，是杀敌的重要兵器之一。匈奴的防身装备是铠甲，亦称“革笥”，多用皮革制作，轻便而灵活，也有少部分铁质的鱼鳞甲。匈奴的头盔也常用皮革制作，形如圆锥。匈奴的盾牌又称“木荐”，多为柳条编制而成，外覆牛皮。马背上的骑兵往往有小型盾牌。

战马是匈奴军队必不可少的作战工具。匈奴人人善骑，且有饲

---

① 《盐铁论·论功》。

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养、挑选战骑的丰富经验。强兵配好马，冲锋陷阵，锐不可当。匈奴骑兵出征时，多带空马，一人多骑，既可轮流乘坐，减少马匹疲劳，又可在军食不供时，杀马充饥，渡过难关，打了胜仗，空马还可以驮着战利品满载而归。匈奴骑兵的运输工具，除马之外，也有车辆，称为"辒辌"。"辒辌"不仅用于军事运输，也用于筑构营垒。

匈奴极其重视骑兵队伍的训练。匈奴人自幼就开始训练骑射技术。"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弯)弓，尽为甲骑。"① 匈奴的成年男子"人不弛弓，马不解勒"②，直至年老不能出征为止。匈奴的骑兵编成队伍后，还要接受正规的训练。每年正月、三月、九月定期举行部落大会，称为"三龙祠"，一面祭祀祖先、天地、鬼神，一面讨论国事，校阅人畜，进行"走马斗橐驰"等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活动。此外，在集体狩猎过程中，更常常"习勒其骑射"③，统一号令，进退有序，如同军事演习一般。

冒顿对骑兵的训练抓得很严。即位之前，他率部众出猎，下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④，在他发射鸣镝后，一些部众未随其发箭射击目标，即被斩首。训练中，冒顿还利用优厚的赏赐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规定"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⑤。由于经过严格的训练，再加上蒙古草原严酷自然环境的锻炼，匈奴的骑兵逐渐变成一支坚韧不拔、英勇善战的劲旅。

匈奴骑兵是奴隶制军事国家的有力工具，他们作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物质财富和奴隶。他们的作战方法是"因时而动，乘可而发"⑥，进行突然袭击。当强敌来攻时，他们凭借行军之速度，"善为诱兵以包敌"⑦。其作战原则是"利则进，不利则退"⑧，十分机动灵活。与汉军相比，匈奴骑兵的优势有三：一是匈奴之马便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优于汉马；二是匈奴之兵遇到"风

---

①④⑤⑧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② 《淮南子》卷一《原道训》。

③⑦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⑥ 《盐铁论·世务》。

雨罢劳，饥渴不困”，胜于汉卒；三是匈奴骑兵可在“险道倾仄”处“且驰且射”，技艺高于汉骑。劣于汉军之处在于：汉军有“轻车突骑”，利于平原作战，此为匈奴所不及；汉军有“劲弩长戟”、“坚甲利刃”，匈奴武器相对较差；匈奴行军作战均依赖战马，不善步战，一旦“下马地斗”，则劣于汉军①。此外，由于匈奴不大重视武器装备，缺乏攻城器械，又不善于筑城，因而也不擅长攻城、守城的战斗。

第二节　平城之战

一、匈奴的南下与汉高祖的反击

匈奴的冒顿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后，“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②，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接着，便乘楚汉之争的机会，南并楼烦、白羊王，夺回秦将蒙恬攻取的河南地。旋复南下，西扰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带，东掠燕、代地区，而与刚刚建国的西汉接邻。为防备匈奴的进一步南下，汉高祖在即位的第二年（前201年），下令将韩王信由“天下劲兵处”的颍川徙往晋阳，将太原郡直至北方边界的31个县划给他做封地。韩王信上书高祖，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③得到高祖的批准后，即迁都进驻马邑，以护汉边。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秋，兵强马壮的匈奴进犯韩国，将韩王信包围在马邑城中。韩王信一面上书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一面暗中遣使向匈奴求和。汉高祖发兵救之，又疑心韩王信与匈奴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③ 《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遣使往来是怀有贰心，赐敕书谴责他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① 韩王信害怕自己被杀，遂"与匈奴约共攻汉"，在九月献出马邑投降了匈奴。冒顿随即引兵越过句注山南下，韩王信也率数万韩兵，以王喜、曼丘臣、王黄为将，进攻太原。

汉高祖得知韩王信背叛汉廷投降匈奴，大为震怒。在韩王信投敌的第二个月，即高祖七年（前 200 年）十月，决心亲率 32 万大军进行反击。当时，他尚不知冒顿已引兵越过句注山南下，拟抢在匈奴南下与韩王信合兵之前，先集中兵力消灭韩王信，然后再北上与匈奴决战。而对韩王信，又决定采用迂回包抄的办法，兵分两路，一路绕至太原郡之北，断韩王后路，隔绝韩王与匈奴的联系，然后向南压缩，一路由南而北，向晋阳正面推进，南北夹击，将韩王围歼于太原一带。按照这个战略决策，汉高祖亲率大军由洛阳北上，同时命樊哙、夏侯婴、灌婴、靳歙、周勃诸将率一支步、骑兵，快速绕至敌后，从代郡向西北扫荡，肃清沿边一带的敌兵。樊哙、夏侯婴、灌婴、靳歙、周勃等驰至代郡，向西先攻占霍人（今山西繁峙），进至马邑，收降楼烦以北 6 县，又进至武泉（今内蒙古武川）之北，击败一部匈奴骑兵，再向北攻占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扫荡了沿边一带，尔后回师南下，准备会合北上汉军围歼韩王信。汉高祖统领大军自洛阳一路北上，直趋晋阳。从马邑南下的韩王信已抢先一步攻占晋阳，正在进攻上党之铜鞮。南北两路汉军在此与之遭遇，大败韩军，斩杀韩将王喜。韩王信慌忙率部北撤，"亡走匈奴"②。其将曼丘臣、王黄立六国时赵国贵族后裔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溃兵，与韩王信及冒顿共谋攻汉。冒顿命左右贤王将兵万余骑，与王黄等驻屯广武以南，抢占广武至晋阳一带的有利地势，企图阻止汉军的北进。汉军乘胜追击，收降太原等 6 城，进至晋阳城下，大破韩王信及匈奴联军，斩杀匈奴将领胡白题，一举攻占晋阳。汉高祖进驻晋阳，

①② 《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灌婴与周勃继续追击逃敌，至硰石（今址未详。一云离石，即今山西离石，似亦不确）击败匈奴骑兵，追北 80 余里，攻占楼烦三城邑。冒顿率匈奴兵且战且退，最后退至代谷驻屯。

二、白登之围

冒顿率领的匈奴骑兵以往在漠北地区的草原地带作战，一直是所向披靡。但是他们毕竟缺乏在中原地区平原地带作战的经验，既不善于步战，也不擅长攻城、守城的战斗。因此，在晋阳一仗失败后，他决定改取示弱于敌、诱其深入，再以优势兵力加以围困、聚而歼之的计策来对付汉军。根据这个战略决策，自晋阳北撤后，他即不与汉军正面接触，一遇汉军追击，他便“阳败走”，并“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以“诱汉兵”①。

汉高祖此前采取兵分两路、南北夹击的作战方针，基本上是获得成功的，尽管匈奴兵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越过句注山南下，与韩王信合兵，使汉军未能达到消灭韩王信的目的，但汉军还是收复了晋阳及太原郡的大片土地。但汉高祖却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未能识破冒顿诱其深入的计策。当他在晋阳听说冒顿屯驻代谷的消息，即决定亲自领兵北上追击。他先后派出使者 10 人赴匈奴侦察敌情，“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他们回来“皆言匈奴可击”②。他不放心，又派随行的奉春君娄敬出使匈奴打探军情。但未等娄敬回还，他即命令 32 万汉军出发北上。不久，娄敬还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此时，30 余万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北进③，汉高祖担心娄敬之言会使军心动摇，破口大骂娄敬“妄言沮吾军”④，命人将娄敬绑缚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七年。

③④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及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起来，械送广武，自己亲率少量骑兵飞速突进。

这时，正值寒冬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堕指者十之二三”①，行动迟缓。汉高祖所率少数骑兵率先到达平城，驻扎在平城东南30里的白登山。冒顿得知汉军到达平城的只是少量的骑兵，20万汉军步卒尚在楼烦、马邑一带，于是纵精兵30余万骑②由东向西杀来，紧紧包围了汉军扎营的白登山，然后派人约请韩王信部将王黄及赵利等前来会师，共同围歼汉军。汉高祖登台远望。只见台西是清一色的白马骑士，台东是青駹骑士，台北是乌骊骑士，南面是赤黄色的骍马骑士，四面战马颜色各异，匈奴骑兵布阵整齐。汉军内外的联系已被彻底切断，无法互相救援，高祖后悔不及。

三、汉军突围与汉匈和亲

汉军在白登被围7天7夜，粮尽援绝，情况万分危急。汉高祖问计于随行的谋士陈平。陈平建议派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夫人），让她劝说冒顿解围，汉军再乘机突围而出。他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汉高祖采用此计，派使臣用重金贿赂求见阏氏，并送上一幅美女图，“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③阏氏见图，担心单于得此美女，夺走冒顿对自己的宠爱，便劝冒顿解围撤兵，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④冒顿听后决心动摇，加上王黄、赵利等迟迟未按约定时间前来会师，疑心他们暗中与汉军另有图谋，又担心汉军后续部队赶到，里外夹击，遂将包围圈放开一角。这时正值大雾，护军中尉陈平建议汉高祖：“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

①④《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此据《汉书·匈奴传》。《史记·匈奴列传》及《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七年作40万骑。

③《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注引应劭语。

（向），徐行出围。”① 高祖采纳他的建议，命夏侯婴殿后保护，令士卒各持附加两矢的强弩，乘隙突围而出，直奔平城。至平城，汉军步兵主力正好赶到。冒顿只得撤兵北返。汉高祖不敢恋战，令樊哙收复代地，自己也率兵退回广武。

汉高祖回到广武后，释放了押在狱中的娄敬，并对他赔礼道歉："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②。并下令封娄敬为关内侯，号建信侯，赐邑二千户；封陈平为曲逆侯。

平城解围之后，汉高祖亲眼看到匈奴雄厚的军事实力，意识到刚刚建国的汉朝暂时还无力与之争锋。当年十二月，匈奴再次攻代，代王喜弃国逃回，他仅贬其为郃阳侯，并未加以深究。第二年（前199年），匈奴又几次袭扰汉朝边境，掳掠人口、财物。汉高祖乃向娄敬问计，娄敬提出和亲之策。他首先分析天下大势与冒顿的性格，对汉高祖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接着，他献出和亲之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③汉高祖觉得在汉王朝急需安定而又无力抵御匈奴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便采纳这个建议，准备将自己的亲生女长公主嫁与匈奴冒顿单于。但吕后得知后日夜哭泣，不愿将唯一的女儿远嫁匈奴，汉高祖只好选一庶人之女④ 冒充公主嫁给冒顿，并派娄敬为使臣，于高祖九年（前

---

① 《汉书》卷三十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②③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④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认为汉高帝所遣为宗室之女，孰是待考。

198年）冬送她前往匈奴与冒顿成亲。通过和亲，汉匈双方“约为兄弟”，暂时缓和了矛盾。

娄敬出使匈奴，了解了匈奴的情况，回到京师长安后，向汉高祖建议说：“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① 高祖赞同此议，将关东的齐国大姓田氏、楚国的屈、昭、景氏及燕、赵、韩、魏之豪族大姓与平民10多万人移居关中，增强关中实力，从而对巩固政权、抵御匈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西汉王朝长期坚持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并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缯肉食物等，以换取边境的安宁。

第三节　汉文帝、景帝时期的防御作战

一、汉文帝三年的防御作战

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初期的20多年间，西汉王朝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限制，对匈奴基本采取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的办法，以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政策，虽然为西汉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促进了汉匈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毕竟无法遏制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夺野心。汉高祖之时，“冒顿乃少止”，但仍“时时小入盗边”②，匈奴的小股骑兵不时入犯燕、赵、代的边境城邑，掳掠人口，抢劫财物，给边地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惠帝、吕后之时，“冒顿寖骄”，竟

①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派人送来羞辱吕后的国书，嘲弄、侮辱西汉王朝。西汉大臣对此均感到极大的愤慨，主张“发兵而击之”①，但因受国力的限制，最终还是卑辞求和，以和亲手段来维持暂时的和平。直到汉文帝即位之后，由于长期的休养生息，经济与军事实力均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西汉王朝才开始对匈奴的侵扰实行有限的防御作战。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五月，冒顿背弃“和亲”之约，派右贤王率军南下，侵袭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掠夺财物，杀戮人民。汉文帝闻讯，决心调发边军进行防御性的还击，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今陕西延安北），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②灌婴按照汉文帝诏书指令，率8.5万车、骑兵至上郡高奴，迎击匈奴右贤王。与此同时，汉文帝又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驻扎在长安周围，护卫京师。

匈奴右贤王见汉军有备而来，担心自己孤军深入汉地，易被切断后路，便在劫掠之后向北退却，凭借其快马飞骑，迅速撤到塞外。汉文帝闻知匈奴已经退兵，亲自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宫来到高奴，慰劳军士，顺便巡幸太原，视察边境。他一路上召集故旧功臣，论功行赏，布置边防，使边军大受鼓舞。此时恰遇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汉，汉文帝遂返回京师，命灌婴罢兵休战，首次抵御匈奴的战役宣告结束。接着，遣使携带国书致冒顿单于，谴责匈奴的背约行为。

汉文帝三年的防御作战，虽然阻止了匈奴向内地的深入，但并没有予匈奴以有力的打击。第二年，冒顿单于遣使致书汉廷③，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 《资治通鉴》卷十四汉纪六载此书于“汉文帝六年”，误。汉文帝前元六年冒顿单于在此书基础上又作一书致汉朝。见《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一面表示歉意，一面又借西灭月氏的余威进行威胁。书中说："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系虖浅奉书请，献橐佗一，骑马二，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① 汉文帝见书，召集群臣共议对策。公卿们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②。鉴于国内的经济正处于恢复和发展之中，国力有限，汉文帝只能采纳这个意见，继续与匈奴实行屈辱性的和亲，以换取边境的安宁。他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为使臣，给冒顿送去"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并带去一封国书，指出"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要求单于"明告诸吏，使无负约"③。

二、汉文帝十四年的防御作战

汉文帝前元六年（前 174 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继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继续以宗室之女为单于阏氏，并派宦官燕人中行说护送她到匈奴和亲。中行说本不愿出使匈奴，朝廷强迫他出使，他说："必我也，为汉患者。"一到匈奴，即向老上单于投降，并进行挑拨离间，破坏汉匈关系。他对老上单于说："匈奴人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①。于是“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②，教会老上单于掌握计算和登记的办法，对牧民按人口和牧畜数量征收课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他还让老上单于将致西汉的国书增幅至“尺二寸”，以超过西汉致匈奴国书的“以尺一牍”，“印封皆令广大”，并倨骜其辞曰：“无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以盖过西汉国书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之辞③。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在中行说的挑唆下，老上单于亲率匈奴14万骑南渡黄河，突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斩杀都尉孙卬，大肆掳掠人口和牲畜。然后乘胜东进，攻取彭阳（今甘肃镇原东），使骑兵入烧回中宫（今陕西陇县西北）。其候骑一度深入到汉朝皇帝避暑的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使长安受到威胁。

面对匈奴的大举进犯，汉文帝决定进行反击。由于这次匈奴的兵锋直逼京师，而京师的安危不仅关系到最高统治阶层的人身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全国政局的安定问题，因此汉文帝首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各率郡兵万人，分别驻守在长安北面、西北面和西面的上郡、北地和陇西三郡，构成护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又任命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率车千乘、骑卒10万，驻守在渭北，构成护卫京师的第二道防线。接着，汉文帝亲自慰劳军士，申明军令，准备御驾亲征。群臣觉得凭西汉的国力，此时尚无战胜匈奴的把握，皇帝御驾亲征过于冒险，因此纷纷表示反对。但汉文帝坚执己意，不听谏阻。后来，皇太后薄氏又出面力劝，他才放弃亲征的打算，改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一为赫）为前将军，内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史栾布为将军，统率上述10余万大军出击匈奴。

匈奴这次进犯，目的仍是掠夺人口和财物。得知汉兵分几路出击，“单于留塞内月余”便下令撤退。由于受到实力的限制，汉军未敢大举追击，“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①。汉文帝的第二次防御作战宣告结束。

匈奴骑兵这次进犯劫掠了大批人口和财物，却未受任何损伤，老上单于因而更加骄横。他几乎每年都要派兵南下袭扰西汉的边郡，“杀略人民甚众”②。云中、辽东、代郡等地受害最甚，每年都有万余人遭受掳掠或杀害。汉文帝又苦于无力还击，只得与匈奴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的安宁。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他特遣使致书匈奴老上单于，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③老上单于致书报谢，同意与汉朝和亲，并希望得到金帛之物。汉文帝马上下诏：“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④此后，汉朝边境赢得了数年的安定。

三、汉文帝后元六年的防御作战

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

①②③④《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即位。军臣单于在即位后仅一年多，便在中行说的挑动下，拒绝与汉和亲，并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出动6万铁骑，兵分两路，大举进攻汉之上郡和云中郡，“所杀略甚众”①。匈奴骑兵的前锋，逼近代郡句注山的边缘。报警的烽火从边地一直传递到甘泉、长安，不断向朝廷告急。

警报传到长安后，汉文帝立即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戍守飞狐，原楚相苏意为将军戍守句注，张武将军戍守北地，以迎击来犯之敌。同时，任命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屯长安西面的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屯长安东面的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守长安北面的棘门，负责保卫京师。部署就绪后，汉文帝又亲自出宫至霸上、棘门与细柳军营视察并慰问将士。当他视察完霸上及棘门后，来到细柳军营，只见军门紧闭，守卫的军士披甲执锐，满持弓弩，拒不打开军门放他进去，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汉文帝派人持节通知周亚夫，说他要亲自入营劳军，周亚夫才命令军士打开军门迎他进去。营门的守卫军士，又嘱咐皇帝的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汉文帝按军营的规定，按辔徐行，来到中营。周亚夫全身披挂甲胄，揖而不拜，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汉文帝感慨万分，赞叹说：“此真将军矣”②。

令免、苏意、张武受命之后，各自统率一支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分别抵达飞狐、句注和北地前线。匈奴军见汉兵有备而来，迅即北撤，离开边塞远遁。汉军亦即罢兵，汉文帝第三次防御匈奴的作战宣告结束。

汉文帝在位期间，面对匈奴的骚扰和进犯，根据有限的财力和兵力，前后组织了三次抗御作战。这三次作战虽然都未与敌军正面交锋，但却起到威慑作用，从而迫使匈奴迅速离塞北走，保卫了内地的大片国土免遭敌骑的蹂躏。这三次防御作战，与“和亲”政策交互运用，使西汉的边境保持相对的安宁，继续争取到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并为后来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积累了不少经验。

四、汉景帝时期匈奴的袭扰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赵王刘遂在起兵反叛之前，曾秘密派人到匈奴，与军臣单于商定，待吴、楚七国起兵之时，同匈奴联合出兵进攻汉朝。但是吴楚起兵后便胶着于梁地而未能挺进关中，匈奴也就犹豫观望，没敢轻易出兵。3个月后，叛军主力吴、楚联军被汉军消灭，7个月后，赵王在邯郸兵败自杀，七国之乱被彻底平定，匈奴也就放弃了乘机入侵的企图。

匈奴虽未乘七国之乱南下，但对西汉的威胁仍然存在。汉景帝不得不继续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他在即位的当年（前157年）和次年，曾连续遣使奉汉女与匈奴和亲。前元五年（前152年）夏，又再遣公主嫁与军臣单于①，开创了汉帝以亲生女嫁给匈奴单于的先例。与此同时，汉景帝还继续与匈奴“通关市”②，允许匈奴以畜产品换取汉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由于和亲、通关政策的施行，汉景帝在位的16年间，匈奴未再大规模地袭掠西汉边地，但小规模的袭扰仍未停止。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春二月，匈奴兵曾入掠燕地，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小股骑兵又突袭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至云中武泉，入上郡，抢走汉朝马苑所蓄养的良马，汉军吏卒仓促应战，战死者多达2000余人。上郡太守李广率百骑出击，遇到数千匈奴骑兵，用巧计射杀匈奴白马将。匈奴骑兵以为汉军设有埋伏，乃乘夜逃遁。后元二年（前142年）春，匈奴再次突入雁

---

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门。雁门太守冯敬率兵御敌，战死于匈奴铁蹄之下。汉景帝急忙调发车骑兵及材官屯驻雁门，防其再度入犯。

事实充分说明,西汉王朝采取屈辱性的和亲与通关市的政策,虽能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但并没能遏制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夺野心。而汉匈的和亲和通关市，又是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汉朝囿于实力而处于屈辱的地位。这是汉王朝的统治者和广大汉族人民所无法容忍的。因此，随着汉朝国力的逐步发展，西汉政府必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用战争手段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自己摆脱屈辱的地位，保障边境的安宁。

第五章　西汉中期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军事改革

西汉王朝经过高祖、文、景几代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发展起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

第一节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70年间，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社会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为西汉统治者进一步解决各种内忧外患问题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即位之后，西汉地主阶级要求以更积极有为的姿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排除内忧外患，加强和巩固西汉王朝的

---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统治。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此时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汉武帝于是采取措施，积极提倡儒家思想，以之取代黄老之学作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虽从小生长在盛行黄老之学的宫廷之中，但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卫绾却是一位儒生，他就从卫绾那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位之后，汉武帝觉得主张“主唱臣和”、“主先臣随”、倡导“大一统”、“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更适合自己的性格，更有利于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大臣们荐举了一批贤良之士。已出任丞相的卫绾奏报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① 奏书所说的申即申不害，“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②，他建议罢黜的“乱国政”之言就包括了黄老之学在内。汉武帝当即表示赞同，“奏可”③。笃信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这时正以太皇太后身份干政，她规定凡是呈送皇帝的奏章必须同时向她禀奏，卫绾这道奏章送到她的手里不仅未能得到批准，而且卫绾本人不久也被扣上“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④的罪名被免职。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上任后，又推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第二年，赵绾又“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并免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官职，“婴、蚡以侯家居”⑤。但是，汉武帝仍不气馁。建元五年（前136年）春，又公开下令在京师设太学，“置五经博士”⑥，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经典列为官学的必读之书。

---

①③⑥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④ 《汉书》卷四十六《万石卫直周张传》。

⑤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第二年，窦太后死去，黄老学派失去了最后一个靠山，汉武帝即重新任命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使“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从而初步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接着，在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又诏策贤良。今文经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从天人感应学说中引申出君权神授的理论，将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说成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皇帝既是“天”的代表，代“天”治民，同时又受着“天”的制约，不能滥施权威，否则就要受到“天”的惩罚。根据这一理论，他认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最后，董仲舒强调以儒家思想统一全国思想的必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②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这些思想主张，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了儒、法、道、阴阳五行等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他在《春秋繁露》的著作中，还对这种学说进一步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汉武帝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鼓吹儒学，并把全国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汉武帝还大力兴办儒学教育。除在建元五年兴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诏策贤良之后，又采纳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人的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免其役。令太常择民年18以上仪状

---

①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②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又令郡守、诸王相及县令举荐郡国县令之好文学者，经二千石官考察认可后，可与计吏俱至京师，“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博士弟子经过一年学习后进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补文学掌故之缺，成绩优异的还可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①。元朔以后，博士弟子员额不断增加，天下郡国皆立学官。学而优则仕，尊孔读经、学习儒学的风气日盛一日，人们的思想逐渐被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

为了提倡儒学，汉武帝还采取了其他许多相应的措施。一是行封禅礼。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认为人间的帝王应该到泰山去祭上帝，以示受命于“天”。在泰山上祭称为“封”，在泰山下祭谓之“禅”，故称为“封禅”。封禅本非儒家学说所专有，秦始皇奉行法家之言，但他就行过封禅。自汉武帝提倡儒学之后，许多儒生就把封禅说编织到儒家学说之内，进一步神化儒学。自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元封之初，已近百年，其间一直没有行过封禅。许多儒生于是不断鼓吹封禅，借以神化皇权。元鼎四年（前 113 年），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方士出土一宝鼎，齐人公孙卿乘机献“札书”，其书云“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公孙卿又假借已死的齐人申公曾言“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②。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便勒兵 10 余万，北巡朔方，耀威匈奴，尔后东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礼，为自己涂上受命于“天”的神圣光圈，同时也给儒学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其更接近于宗教，从而对人民具有更大的欺骗麻醉作用。二是改订礼制、历法。汉代的儒学理论揉合了阴阳五行学说，鼓吹每个朝代帝王的权力授命于不同的“天命”，属于不同的“德”。按照金木水火土五德相始终之说来推断，“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③，必须实行与土德相适应的一套服饰颜色与礼制、历法。汉武帝于是在太初元年（前

---

①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②③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104年）夏五月宣布改订礼制与历法："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①。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逐步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它不仅对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并对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措施

随着西汉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统治阶级指导思想的转变，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首先，削弱相权，宠用近侍，设置十三部刺史，改革用人制度，以加强中央的集权。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中央政权中，除皇帝之外，掌握实权的是丞相。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②，"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③，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在西汉前期，尤其是汉武帝之前，丞相多由功臣列侯选任，地位尊崇。丞相有所请求，皇帝无不允从。皇帝虽说是大政方针的最后决策者，但他提出的主张也只有通过丞相才能贯彻执行。丞相如与皇帝意见不合，不仅可以廷争，而且还可拒绝执行。比如吕后想封吕氏兄弟为王，丞相王陵即当面抵制，争论不已。汉景帝与窦太后欲立后兄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的反对"默然而沮"。汉武帝即位之初，田蚡为相，荐人任官由处士至二千石，汉武帝说："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④ 这样，相权有时不免要和君权发生矛盾。而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不

---

①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②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

④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愿事事都倚仗于丞相，他遇事常喜欢独断专行，亲自进行处理。因此，他便选择一些侍从或心腹之臣，加上侍中、散骑、常侍、将军、给事中等头衔，随侍左右，以备顾问应对，参与谋议。由于当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①，奏章数量急剧增加，汉武帝又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负责保管、传递这些奏章。这些随侍皇帝左右的尚书、侍从之臣与心腹之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共议军国大事，后来便逐渐形成为一个宫内决策集团，称为“中朝”，而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则变成了“外朝”。中外朝的形成，意味着丞相的地位和职权的削弱，使统治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汉武帝还大力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汉武帝之前对地方的监察，只是由丞相不定期地遣使到各郡国进行巡察，并无专任的地方监察官吏。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以确保皇帝的旨意能在地方得到贯彻执行，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前 106 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②，正式建立了刺史制度。此时，全国划分为 13 个州，称 13 部，即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每州为一监察区，各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部内之郡国。刺史在每年秋天八月出巡监察，岁终向皇帝汇报。监察的对象和内容包括：“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③。监察的重点是郡国相和二千石郡守的不法行为及地方豪强胡作非为。刺史虽秩仅六百石，

---

①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②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汉官典职仪》。

但以位卑临尊，却可督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稍后还可督察诸侯王，因此，可以无所顾忌地履行职责，忠于职守，起到充当朝廷耳目的作用。这种对皇帝直接负责的监察制度，大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各地官僚机构的控制。

为了加强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汉武帝又对用人制度作了改革。西汉前期，官吏的选用大体上不出二途：一是来自军功，二是由郎官入仕。军功之吏多不谙政务，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政治的需要。郎官之选，或者是通过纳赀为郎即以财得官，或者以任子为郎即高级官吏保任其子弟为官，又“未必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汉武帝将以前偶尔实行的察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正式制度确定下来，开辟“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等科目，令州郡官保举人才。如元光元年（前 134 年）冬，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不久，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②。此外，汉武帝还经常采用征召的办法，任用有治国之术的人为官。如元光五年（前 130 年）“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③，元狩六年（前 117 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④。所征之人，不拘一格，皇帝亲自召见后，如认为确有专长，即可授予官职。吏民还可上书“自衒鬻”，他们的上书经汉武帝审阅后，认为确实贤能，亦可诏拜为官。通过上述的改革，汉武帝网罗到了大批优秀的地主阶级人才，班固曾列举汉武帝时期的一批杰出人才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

---

①③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① 汉武帝利用这些人才充实西汉的封建官僚机构，从而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第二，颁布"推恩令"，制订"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打击诸侯王的割据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对王国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大大缩小了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但诸侯王仍据有较大的疆土，有的甚至"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②，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年）春，中大夫主父偃建议对诸侯王实行"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③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年正月，梁王、城阳王提出愿以部分封土分给他们的弟弟，武帝即下令"许之"，并下诏曰："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④。具体的推恩办法是：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均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侯国的名号由皇帝制定，其地位与县相当，隶属于郡而不再隶属于原来的诸侯王国。此诏一下，诸侯王纷请分邑子弟，先后共分封侯国达一百七八十个之多。推恩的结果，"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⑤，不仅使王国的辖地变小，同时也扩大了朝廷直接管辖的土地，"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⑥。

汉武帝还"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以抑制诸侯王的势力。汉代尚右，以右为尊，汉武帝将诸侯王之官称为"左官"以示贬

---

①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②③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⑤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

⑥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抑。“左官之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职的官吏即“左官”，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不得进入中央任官。“附益之法”又称“附益阿党之法”，规定凡有朝中大臣交结诸侯王，帮助诸侯王获取法外利益者，或是诸侯王的官吏与诸侯王结为死党，诸侯王有罪而不举报，都将给予严厉的惩处。

此外，遇到诸侯王违法，汉武帝还常乘机削爵、夺地与除国，以消除他们的势力。刘长之子刘安在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被封为淮南王后，即怀有异心，在封国内招纳宾客，图谋反叛。元朔五年(前124年)，他开始治战具，积金钱，暗中进行叛乱的准备。其弟衡山王刘畅听说淮南王准备谋反，“亦心结宾客以应之”①。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就在他们即将举兵反叛之时，为淮南王的宾客伍被所告发，汉武帝下令逮捕淮南王刘安，刘安畏罪自杀，衡山王刘畅闻讯也自杀。汉武帝趁机彻底消灭了淮南、衡山两王的势力。此外，汉武帝还以各种罪名削夺其他一些诸王国的封国。整个汉武帝时期，因罪而国绝、国除者，除淮南、衡山两王之外，尚有济川王刘明、燕王刘定国、济东王刘彭离、常山王刘勃、济北王刘宽等。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诸侯王的封地或被剥夺或被分割，所剩的一些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②，已不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了。

第三，用严刑诛杀与迁徙关中的办法，打击地方的豪强势力。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禁网疏阔。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日益膨胀。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或宗族势力，“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③，有的甚至公然与地方官府分庭对抗。对于这股与中央政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汉武帝除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设13部刺史时，规定其巡视地方的一项内容是督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

---

①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②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

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弱，以众暴寡”① 之事外，还任用一批以廉洁著称而又执法严酷的所谓“酷吏”，以严厉的手段加以惩治。如义纵任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桉太后外孙修成子中，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②。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③。与此同时，汉武帝还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④，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⑤ 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从而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

三、强化中央集权的财政改革

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允许民间私营盐铁酒，允许郡国自由铸钱，特别是汉文帝时更采取放任政策，“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⑥，一些工商业主“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⑦ 而致巨富，有的则“以铸钱财过王者”⑧，他们不仅与国家争利，“不佐国家之急”⑨，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而且还“连车骑，游诸侯”⑩，勾结地方割据势力，破坏国家统一。为了巩固中

---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颜注。

②③ 《汉书》卷九十《酷吏传》。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⑤ 《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⑥ 《盐铁论·错币》。

⑦ 《盐铁论·刺权》。

⑧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⑨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⑩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央集权，汉武帝适时地调整经济政策，进行财政改革，对富商巨贾进行限制和打击。

元狩四年（前119年），“领盐铁事”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孔仅以及侍中桑弘羊，通过大司农颜异向汉武帝建议实行盐铁官营：“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①。汉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派孔仅与东郭咸阳到各盐铁产地，聘请家产富裕又有经营盐铁经验的人担任盐铁官，建立48个盐铁机构②，专门负责盐铁的产销经营。这样，就将盐铁的产销控制在官府手里，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打击了大盐铁商人的嚣张气焰。

天汉三年（前98年），汉武帝又推行酒类的专酿专卖政策，令“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③，予酒商以沉重的打击。

汉武帝在财政改革上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实行币制改革。汉初的货币有铜钱和黄金两种，金币之形承袭秦制，变化不大，而铜钱却屡有改铸。西汉建国后，“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④，小如榆荚，每钱重三铢，文曰：“汉兴”⑤；又有小荚钱，重一铢半，径五分⑥。吕后时改铸八铢钱⑦，但五行钱即榆荚钱仍有流通。文帝时铸四分钱，文曰：“半两”，同时“除盗铸钱令”⑧即“除钱律，民得铸钱”⑨，“令民纵得自铸钱”⑩。此禁一开，私铸伪

---

①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② 马元材：《桑弘羊传》第71～75页，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应劭注。

⑤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索隐》。

⑥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⑦ 《汉书》卷三《高后纪》。

⑧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⑨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⑩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钱日多，“市肆异用，钱文大乱”。私铸钱者偷工减料，铜钱分量不足，造成“钱益轻薄而物贵”①，引起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放铸之后，民间铸钱者蜂拥而起，竟至“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影响了农业生产。而私铸者却大获奸利，成为巨富，有的甚至“富埒天子”②。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汉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 年）下令禁止民间私铸，“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只准郡国铸钱。但民间私铸的钱币仍然继续流通，未加禁止。

汉武帝即位后，在景帝时中央控制铸钱的基础上，先废止四铢钱，改行三铢钱。不久，又废三铢钱，恢复四铢钱④。元狩四年（前 119 年）下诏“造白金（银币）及皮币（以白鹿皮为币）以足用”⑤，同时令更铸三铢钱，并重申“盗铸诸金钱罪皆死”⑥。但这次改币并未能解决伪币问题，反而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于是，汉武帝决定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在元鼎四年（前 113 年）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⑦。根据这一诏令，钱币统由中央主管诸池与上林苑的水衡都尉的属官均输、钟官、辨铜三官铸造，为五铢钱，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所铸钱从此废除不用，一律销毁而输其铜于上林三官。铸币权收归中央后，钱币统一，质量较高，稳定了流通秩序，打击了不法盗铸的商人。

为了进一步从经济上摧抑商人，削弱富商势力，汉武帝还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实行算缗告缗政策。均输、平准之法是根据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于元封元年（前 110 年）开始推行的。所谓“均输”，是将地方上的主要农产品输于官府，政府再将农产品运往他处出卖，获取差价之利，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起到调剂有无的作用。所谓“平准”，即在京师设立平准官，以各地

---

①②⑦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③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④ 李祖德：《论西汉的货币改革》，《历史研究》1965 年第 3 期。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输送的物品及大农工官所产的东西为资本，进行交换和买卖，“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①，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的投机活动。算缗和告缗之法颁布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② 这项法令包括了算缗与告缗两个内容。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征税，规定无市籍商人必须自报财货，每二千钱交税一算，即120钱；手工业生产者，每四千钱交税一算；非吏而可比吏者、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每车交税一算；商贾轺车每车交税二算；船长五丈以上者交纳一算。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要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属不许拥有土地，违令者“没入田货”。所谓“告缗”就是鼓励知情者揭发工商业者隐瞒不报财货或自报不实的行为，规定揭发属实者，将被告财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此令颁布后，元狩六年（前177年）令杨可专掌“告缗”之事。元鼎三年（前114年）十一月，再次重申告缗令，“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③ 于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④。算缗与告缗令的推行，使商人地主受到重大打击，官府获得巨大的财富，国家的财政得到充实，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

①④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没入田货”作“没入田僮”。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第二节 汉武帝的军事改革

一、中央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

西汉前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是政权的实际负责人。但丞相为天子之丞，助理万机，且皆以列侯为之，位尊权大，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丞相缺位时，往往以御史大夫继任，故人称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太尉虽是最高的军事长官，秩万石，与丞相相等，但官属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官属，而且在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以卢绾为太尉后，又常罢省不设，以其职掌归属丞相。因此，武职的权势远远低于文职。后来，在诛除诸吕的过程中，由于太尉周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太尉的权势有所提高。汉武帝即位后，任用近侍与心腹之臣组成“中朝”，削弱丞相与御史大夫的职权。同时，由于大规模开展反击匈奴的战争，需要有大批能干的将才，汉武帝又积极提倡习武，不仅要求武士、军人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武艺，也鼓励文人学士练习骑射和击剑。史载“上（即汉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①。当时岁举之孝廉，往往先拜郎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才任以其他职务。对战功显赫的将领，汉武帝不仅给予优厚的奖赏，而且还常破格提拔重用。武职的地位因而大大提高。到元朔五年（前 124 年），汉武帝任命侍中起家的卫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②，大将军已位居丞相之上。此后，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③。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丞相的作用日益下降，在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

---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

② 《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

③ 《文献通考》卷五十九《职官考》十三。

为相时，原先车水马龙的丞相府已是“客馆丘虚”，到公孙贺、刘屈氂为相时，丞相府竟“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①。

在尊崇武职的同时，汉武帝对军事领导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于元狩四年（前 119 年）将太尉改为大司马。《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 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颜师古注曰：“冠者，加于其上共为一官也。”从这个时候起，大司马取代了太尉，直至西汉末年不复设太尉之职。但是，西汉的大司马亦如太尉一样，时设时罢，并不是一种常设的固定官职，如元狩四年以大将军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元狩六年九月霍去病死，元封五年（前 106 年）卫青亦死，此后很长时间大司马位置空缺，直到后元二年（前 87 年）二月，才又任命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此后，甘露二年至四年（前 52～前 50 年），大司马位也曾空缺过。而且，西汉的大司马，只有在“领尚书事”时，才开府置官属，否则不开府置官属。因此，西汉的大司马一般只是皇帝加封给其宠臣的一种表示尊宠的荣誉性头衔，他们徒有虚名，并无多大的军政实权。其中，只有几位“领尚书事”者，才真正握有军政大权。如汉武帝临终前托孤于奉车都尉霍光，任命他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昭帝即位后，即命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领尚书事”②，“政事壹决于光”③。又如汉成帝后，以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④。不过，霍光、王凤之所以掌执政军大权，主要是由于他们“领尚书事”而成为中朝官，而非由于他们拥有大司马的头衔。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又是由于昭帝年幼、成帝沉湎酒色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并非常例。

---

①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②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③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

④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后，军政大权名义上归大司马掌管，不再由丞相兼掌。不过，大司马既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且又时设时省，实际执掌权柄的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各色名号的将军。这些将军多为皇帝的亲信，他们战时带兵出征，平时则居朝中，直接受皇帝控制。这样，便达到既削弱丞相权力，又进一步加强君主的军事控制权的目的。

二、军事实力的扩充

汉初的南、北军，都是皇帝的禁军，由中央直辖。南军有兵卫、郎卫之分，分别担任殿门外门署的警卫和殿内廊署的保卫，由卫尉和郎中令统御。北军担任京师长安及内史（三辅）地区的警卫，兵员较多，由中尉统领。

汉武帝执政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充实军事力量，以适应连年对外作战的需要，对南、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武帝首先将南军的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借机扩大郎卫人数，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二军。期门与羽林都是从武帝随身扈从发展起来的近卫军。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羽林军"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①。期门有指定卫士在约定时间等候在某门之下扈从之意，初无定员，多时达千人。期门、羽林卫士多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② 中选募壮勇而善骑者充任。其数量颇为可观，武帝时期门郎约1500人，

---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②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如淳注曰："医、商贾、百工不得预也。"颜师古注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羽林郎约近二千人①，羽林孤儿则员额无限。

汉武帝增设的期门、羽林及羽林孤儿，与其他卫士相比，其身份地位较高，其中优秀者可转为他官。羽林孤儿父子相代，长期为兵，有世兵的性质。由于期门军和羽林军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及其与其他卫兵不同的性质，他们名义上归属光禄勋统辖，光禄勋所统郎卫又属于南军的范围。但扩充兵员后的光禄勋与统领南军的卫尉，皆位列九卿，同为二千石官，因此期门、羽林二军实际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隶属于南军，而是一支新增设的独特宫廷武装，是皇帝的贴身禁军。期门、羽林军除充当宫廷的禁卫，也经常同北军一道参加征战。

为了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确立中央军的绝对优势地位，汉武帝又对北军进行了扩展。北军是京师的卫戍部队，汉初，由中尉统辖。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 年)，在内史地区增设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等三都尉，分割了中尉的权力。太初元年(前 104 年)，又分内史地区为三辅，分别设置长史，同时更中尉名为“执金吾”②。征和二年 (前 91 年)，再增设京师城门屯兵，设城门校尉，负责长安 12 城门的警卫。执金吾的军事实权逐渐被各个都尉、校尉所分割，而由皇帝总揽大权。执金吾所领北军的职责仅限于“缴循京师”、“禁备盗贼”，权限已大大缩小。

在对北军的领导体制进行初步改革的同时，汉武帝又在原北军兵额的基础上，大力扩充北军，增设了八校尉：“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③。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④。校尉秩均二千石。屯骑校尉、长水校尉及胡骑校尉统骑兵，射声校尉统弓弩兵，虎贲校尉统车兵，中垒及步兵校尉则统步兵，

---

① 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三章。

②④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③ 西域应为西城。

各种兵种齐全。其中，步兵校尉驻防上林苑门，长水校尉戒备城外宣曲观，胡骑校尉戒备左冯翊的池阳宫，其余校尉驻地不详，亦皆在京师左近。八校尉都是“以兵为职”，属于常备军，它和期门、羽林一样，都是皇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它们和各郡国的正卒即地方军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八校尉的设置进一步分割了中尉的权力，使军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经过汉武帝对南、北军的改革扩建，中央军的武装力量得到空前加强，西汉王朝“居重驭轻”的建军路线得到进一步贯彻。强大的中央军的建立，是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有力保证。

随着汉初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大力加强边防建设。一面修缮和利用秦长城，一面在河西及河套内外广筑亭障、烽燧，设屯戍守。因此，边防军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实力不断得到扩充。

加强马政建设，组织大规模的骑兵集团，是汉武帝军事改革的重点之一。他首先对马政管理机构的职权作了调整，在元鼎二年（前 115 年）设立水衡都尉，除分管部分皇室的财政，还将太仆寺所属的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辂軨、大厩划归其管辖①，而让太仆寺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军马的发展上。因此，官营养马事业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仅太仆寺所辖边郡六牧师苑令的 36 个牧场，所养马匹即从 30 万匹增至 40 余万匹。“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②。

除积极发展官营养马事业，汉武帝还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民间养马事业。他积极鼓励和扶植私人养马。除继续实行汉文帝的“马复令”，还大幅度地提高了马价，“使人竞畜马”③。西汉前期，马价每匹平均为 5000 钱左右④，高者达万钱。汉武帝规定，匹马

---

①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② 《盐铁论·西域》。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注：“贵平牡马价，欲使人竞畜马。”

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20万钱，高于平常马价几十倍。汉武帝又允许用马匹向官府买爵。元朔六年（前123年），“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几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①。这里的“五大夫”为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汉制至五大夫以上，可免役。千夫为武功十一等（一云十七等）爵之第七级，亦可免役。后因“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又“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②，规定千夫、五大夫不欲为吏者，必须向官吏交纳马匹。西汉政府还实行民养官马，元鼎五年（前112年）“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李奇注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③随后又令天下诸亭养母马，元鼎五年（前112年）“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牸）马，岁课息”④。西汉政府还对民间的私马逐一进行登记，于太初二年（前103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⑤，即征调私马补充军马。《汉书·食货志》载：“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可见当时对养马的高度重视。

除了发展官私养马事业，西汉政府还不惜付出重大的代价，用战争手段夺取大宛的良马。如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年），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先后领兵10余万进攻大宛，耗费亿万，“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⑥。

在马政日趋完备的同时，骑兵所需的武器装备也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西汉时期，由于铸铁脱碳钢技术的出现，可使原先不能制作兵器的生铁脱碳成钢，从而适用于制造具备强度和韧性的兵

---

①②③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器。西汉中期以后，由于炒钢技术的发明①，又使钢的产量增加。故从西汉中期开始，不仅铁兵器已占主导地位，而且骑兵所用的盔、甲、弩、矛、剑等兵器已多由钢制造，更加精良而锐利。此外，还出现了一种环柄长铁刀，它刀脊厚实，刃口锋利，刀身较长，便于劈杀又不易折断，重量较轻，便于携带，适用于马上近战使用，因而逐渐成为骑兵的一种常备武器。随着铁器的广泛推行，弩的制造和使用也更加普遍。铁制铠甲等防御装备也得到发展，出现了铁衣、铁甲、铁胄、铁盾，使防卫能力大大提高。

马政建设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为西汉骑兵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汉武帝在原有骑兵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地组建骑兵集团。前面提到的新增设的北军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和胡骑四校尉，都是掌管经过专门训练的精锐骑兵作战兵团。另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弟壮勇而善骑者充任的期门与羽林二军，除负责皇帝的侍卫，也担负起培养骑兵将领的任务，“名将多出焉”②。因此，西汉的骑兵在这个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巡视边陲，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③。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更动用过20余万骑兵。除了中央直辖的骑兵集团，各边郡太守也拥有不少数量的骑兵，据《汉旧仪》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中原王朝的骑兵，就在汉武帝时期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对匈奴作战的主力。在此之前，西汉的骑兵不能独立完成战役任务，主要是配合车兵、步兵作战。但车兵在对匈奴作战中存在笨拙、迟缓、被动的弱点，难敌机警、敏捷而主动的匈奴骑兵。后来，汉武帝从消极防御改取主动进攻

① 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铁矿遗址曾出土过一座西汉后期的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的发明至少不晚于西汉后期。参看《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②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的战略决策，在几次重大战役中开始投入大量的骑兵，以便发挥骑兵集团的机动性和冲击力，达到消灭匈奴主力、解除边患的目的。车兵于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不复发挥重要的作用，多用于后勤运输或作为御敌的障碍物。西汉骑兵的迅速发展与养马制度的建立健全，标志着我国军事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还注意加强对步兵和水军的建设。元狩年间(前 122 至前 117 年)，创设了屯田兵。屯田兵部署在边境一带，仅朔方、河西等地，即“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①。屯田兵多为步兵，平时从事开渠、凿井、种田，也负责边塞防御，参与战斗，从而有效地抵御匈奴的入犯，并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水军主要集中在南方和沿海诸郡，人数达几十万之众，形成比较完整的水军体系，置有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横海将军，下设校尉、司马等官，以统率之。汉武帝多次派遣水军攻打东瓯、东越、南越和朝鲜，出动水军有时达几万至一二十万。如元鼎五年（前 112 年）“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粤”②，元封二年（前 109 年）令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军 5 万浮海攻朝鲜③。

三、兵源的扩大

汉武帝时期军事实力的扩充，是同兵源的扩大分不开的。除了原有征兵制之外，他还通过多种途径来补充兵员。

谪戍即将刑徒强制编入军队，遣戍边地，是汉武帝扩充兵员的常用途径之一。谪戍早在战国后期即已出现，秦律更将“谪罪”与“冗边”并提，凡是被定为谪罪之人一般都要发配戍边。汉高祖以后，未再实行谪戍之制。汉武帝为扩充兵源，重新实行谪戍，不过具体做法与秦代稍有不同。秦代的谪戍对象包括逋亡人、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③ 参见《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犯罪吏、赘婿、商贾及闾左等。汉武帝的谪戍对象有七种，即所谓“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① 未谪闾左。这“七科谪”列出七种谪戍对象，实际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有罪吏。二是亡命，即逃亡无户籍之人。三是赘婿，《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这里所说的赘子，即指赘婿。四是商贾，包括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即现在和过去的商人以及商人的子孙，此为当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措施之一。汉武帝除七科谪外，还谪发恶少年，即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而未科刑之人。后来在汉昭帝以后，还谪发弛刑士，即已被判刑又遇皇帝的“大赦”或“诏令”赦免的罪人。

汉武帝曾多次大规模谪发刑徒为兵。如元狩三年（前 120 年）“发谪吏穿昆明池”，太初元年（前 104 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天汉元年（前 100 年）“发谪戍屯五原”，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征匈奴②。这些刑徒被征入伍后，有的单独编队，有的与一般士兵混合编队，或屯田，或戍边，或修筑长城，或出征打仗，在西汉的边防建设和御敌征战中均曾发挥过作用。

募兵是汉武帝扩大兵源的另一个途径。募兵制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楚汉相争时，汉高祖除实行征兵制，也临时用过募兵。《风俗通》即载：“高祖为汉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晋书·李特载记》云：“及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说明汉高祖确曾采纳范目的建议，招募过賨人为兵。但当时募兵的次数与数量都很有限。汉武帝之时，战争由平息“内忧”为主转变到以

---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张晏注。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

反击“外患”为主，当时的“外患”主要是指匈奴，对匈奴作战，需要大规模运用骑兵。这种骑兵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熟练地掌握骑射技术。但用征兵制招来的丁壮服役期限“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即曾指出，“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①，难与匈奴匹敌。再加上对匈奴的战争长年不断，士卒伤亡极大，又急需大量补充兵员。因此，汉武帝又开始实行募兵。当时的募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的募兵，用以补充作战或执行其他任务时兵员之不足，事罢即行遣散。如天汉初年，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出使匈奴。颜师古注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为斥候者。”② 即属于此类。另一种是长期性的职业兵，用以组成精锐的常备军。如南军的期门、羽林、羽林孤儿与北军的八校尉，就属于此类。募兵必须出于自愿，应募者一般还需具备较强的体魄、体力、技能、才智和勇气。一旦批准入伍，官府必须付给一定的报酬，称为“赏值”、“赐钱”等，如系罪囚，还可减刑。其中充当常备军者，往往父死子代，演变成为世兵。汉武帝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农民大批破产流亡，募兵的数量不断增加，募兵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史载：“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③ 西汉的募兵，出于自愿，有一定的报酬，一般又经过择选，身体比较强壮，且又是职业兵，可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因此在开始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后来，募兵逐渐成为西汉集兵的一种重要方式，形成征、募兼行的局面。这预示着，原先的兵农合一将向兵农分离的方向发展。

汉武帝扩大兵源的另一个途径是使用少数民族士兵。汉高祖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③ 钱文子：《补汉兵志》。

在楚汉战争中，曾使用过北方的“楼烦”兵、“北貉”兵，东南的“百越”兵和西南的“蛮夷”兵。汉文帝时，晁错又提出“以蛮夷攻蛮夷”之策，建议使用归降的“蛮夷”与边民共同防御匈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① 汉武帝开始将晁错的计策付之实施，不仅征集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义渠胡人入伍，而且把大批内附的少数民族军队如匈奴骑兵、南越楼船士和西域诸国军队改编为汉军，参加京畿的拱卫、边地的防守或出征周边各族。如对匈奴，除将乌桓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朝侦伺匈奴的活动外，还起用归附的原匈奴相国赵信、桀龙，原匈奴王赵安稽，原匈奴旧义高不识、仆朋，原匈奴旧义因淳复陆支，原匈奴旧义楼剸王伊即轩，原匈奴介和王成娩，率匈奴降军出征，这些降将后来皆以战功封侯。另外，义渠出身的胡将如公孙贺、公孙敖也曾随卫青出击匈奴，积功为侯。对西域，汉武帝曾于太初元年（前 104 年）命李广利统“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② 击大宛；天汉二年（前 99 年）命成娩（原匈奴介和王，降汉后被封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征和三年（前 90 年）复命其“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③。对南越，汉武帝因南越王吕嘉反，于元鼎五年（前 112 年）命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分兵四路进行讨伐，其中就有不少归降的南越士兵，《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谓：“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即可为征。而戈船将军严、下濑将军甲与另一将领遗还是归降的南越将领。此次战役，除使用归降的南越水军，汉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 《西域》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武帝还命越归义侯遗“发夜郎兵”①，征调了西南夷兵。

汉武帝使用“以夷制夷”之策，大规模使用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归降的少数民族军队，不仅减轻了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国家远地调发的财政开支，而且扩充了西汉王朝的兵源，改善了兵员结构，弥补了内郡汉军原先不擅骑射及水战的缺陷，促进了战略战术的改革，从而为击败匈奴、统一周边诸族提供了保障。

四、武功爵的设置

汉武帝时期，长期对外用兵，战事频繁。为了鼓励将士英勇作战，武帝在汉初奖励军功的基础上，重新设立了武功爵。

军功爵先秦已置，西汉建国之初也曾按军功封赏爵位。但文景时期，由于大规模战争减少，军功爵制的作用逐渐减弱，赐民爵的制度被广泛运用，而且授爵也渐流于轻滥，失去奖励军功的意义。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大规模展开，奖励军功的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元朔六年（前123年）六月，汉武帝下诏令群臣讨论具体的奖励办法，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貤。其议为令。”②有司奏请设置武功爵，以重赏军功。武帝根据这一建议，设置了武功爵十一等（一云十七等，有六等名称未详），即：造士、闲舆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政戾庶长、军卫。将士依其战功的大小被分别赐予相应的爵位，受爵之后，往往要给予厚赏，一般可以免役、减罪、封侯、当官，或者将赐爵转售。

汉武帝时期授武功爵的条件，史无明载。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汉简记载可以看出，它大体上是以斩捕敌人多少为标准。《上孙家寨

①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简》载："……各二级，爵无过左庶长。斩首捕虏，拜爵各一级。车□□□□□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一级；斩捕五级，拜爵各二级；斩捕八级，拜爵各三级；不满数，赐钱级千。斩首捕虏，毋过人三级，拜爵皆毋过五大夫，必颇有主以验不从法状"①。此外，《汉简》中还规定："能斩捕君长有邑人者，及比二千石以上，赐爵各四级，其毋邑人，及吏千石以下至六百石，赐□□。"②说明赐爵的标准又与斩捕敌人的身份有关。对于集体斩捕敌人者，武功爵制规定："虏什二人以上，拜爵各一级。"获武功爵之高爵者，一般都要封侯，并赐给食邑。《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载：

"1、击匈奴降者赏令

2、□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

3、□故君长以为君长，皆令长其众，赐众如隧长，其斩□。

4、□□赋二千石□赐诣□□言及武功者，赐爵共分采邑。

5、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

6、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斤五十斤，食邑。五百卌八卌八。"③

这组汉简说明，对攻击匈奴有军功者，按不同情况授爵并赐金钱和食邑。

由于武功爵制的设置，在汉武帝时期，封侯者几乎都是行伍出身且立有战功者。据统计，这个时期所封侯爵总数为 89 人，其中，将军为侯者 53 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族降汉而被封侯者 29 人，二者共占全部侯爵的 92%；因外戚或承父爵等而非军功为侯者只有 7 人。④这组数字说明，汉武帝时期的武功爵制是得到彻底的贯

---

①②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载《文物》1981 年第 2 期。

③ 《汉简研究文集》第 9～10 页。

④ 据《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

御施行的。

在以爵禄奖赏军功的同时，汉武帝还对立有战功者赏赐大量的金钱。如大将军卫青击匈奴有功，武帝一次就赐给黄金千金。①上引《汉简》中，对武帝大量赏赐军功将士金钱之事，也有许多具体翔实的记录。

金钱、爵禄、食邑，以其极大的诱惑力，激发起广大官兵杀敌立功的积极性，对提高西汉军队的战斗力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汉武帝军事改革的又一成功之处。

五、大兴屯田与加强后勤保障

汉武帝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完善后勤保障制度。前面叙述的加强马政建设，发展武器与舟船等，都是完善后勤保障的重要举措。此外，汉武帝还采取了其他的许多重要措施。

“粮谷，军之要最。”为了保障军粮的供应，汉武帝除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在边疆地区大兴屯田，以便就近筹粮，减省转输之费，并借屯军增强边地的防御力量。西汉边地的屯田始于元狩四年（前119年）。这一年，汉军在漠北战役中，将匈奴的势力从漠南驱赶到漠北，“幕（漠）南无王庭”，西汉政府“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②，正式创立军士屯田制度。后来，西汉又筑令居以西边塞，屯田范围也随之向西发展。“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颜师古注曰：“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却。初置二郡，故塞更广也。以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③太初三年（前102年），又“筑居延泽上”④，在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嘎顺淖尔）筑塞屯田。大约在太初四年，“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

① 参见《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及注。

布泊地区），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①，把屯田进一步推进到西域地区。

屯田卒且农且兵，边耕边守，广泛地开垦了西北的耕地。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完全由政府供给，屯田所收获的谷物、刍藁等每年上报大司农，将农产品转运委输，交纳官仓。这就基本解决了大部分边防军粮，有力地支持了西北前线的作战，起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 的积极作用。

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汉武帝还将国家财政完全纳入战时轨道。在由国家垄断自然资源，实行盐铁专营的同时，西汉政府又实行重赋政策，以便增加赋税的收入。

汉初，“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武帝除继续按照这个规定征收算赋，还对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加征口钱。《汉书·贡禹传》载：“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③ 其实，口钱的征收并不始于汉武帝时期，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写于汉武帝之前的木牍，就有大量的“口钱”记载④。但口钱起征的年龄却有变化。一般认为，汉武帝之前，口钱从 7 岁始征，改为 3 岁起征则在汉武帝之时。直到汉平帝时，贡禹认为赋重民困，才恢复 7 岁起征。

汉武帝时口钱的数量定为每人 23 钱。《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载：人出口钱 23，“二十钱，以食天子”即归皇室收入，“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即作为武器装备费用。据此，一般认为西汉口钱为每人 20 钱，武帝时加征到 23 钱。

此外，汉武帝也常常以訾征赋，按财产多少征收军赋，并实行“告缗”措施，增加政府收入，以支持长期战争。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③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④ 《文物》1974 年第 7 期。

为了保证后勤供应，汉武帝除继续维修、利用秦代所修东通燕齐、南连吴楚的驰道、通往九原的直道与攀越五岭的新道之外，又新修了不少道路，逐步完成以京师所在的关中为核心，呈辐射状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在西北，除楚汉战争中，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重新修复了秦代的陈仓道外，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①，又修建了自汧（今陕西陇县南）、回中（今陇县西北）以通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将秦代通往北地郡鸡头山的陇西大道向西北延伸。张骞通西域后，又沿着陇西大道的方向，开辟了经河西四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西南，汉武帝命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②，重新修复了已经毁坏的古栈道。同时，又命唐蒙、司马相如先后调集数万人，修复、拓宽秦代所修的五尺道，“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③。在东北，修筑了从今河南通往辽东的道路。此外，汉武帝还在秦代开辟的内河航运基础上，大力发展水上交通。当时西汉王朝供应京师及西北前线的物资，很大部分是从关东通过黄河运至潼关附近，经陆路转运入渭水而达长安，再调拨西北前线的阵地的。但此时的渭水因流量变化无常，流浅沙多，河床曲折，不便通漕。元光元年（前134年）按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汉武帝令齐人水工徐伯“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④，开凿了一条300里长的关中漕渠，为漕运提供了方便。汉初从关东漕运至京师的粮谷“岁不过数十万石”⑤，至元光六年（前129年）增至100余万石，元狩四年（前119年）达到400万石，元封元年（前110年）更高达600万石，时人谓：“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⑥。

---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④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⑥ 《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

边军的供给，需要长途运输。远师出征，更需要大量的转输人力。当时负责后勤供应的人力，有时甚至超过了作战的士兵。如太初四年（前 101 年）伐大宛，“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①。转输的人力，除了利用民夫，也利用士兵。元狩四年（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各将 5 万骑兵击匈奴，“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张守节《正义》云：“言转运之士及步兵接后又数十万人。”②

此外，汉军也时常出钱雇佣民力转输军用物资。《居延汉简》载：

“□□月积一月廿七日运茭就直

出钱千三百卌七　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　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

已入八十五石，少二石八斗三升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适就□”③。

简文中的“就”即“僦”之略写。《史记·平准书》之《索隐》曰：“服虔云：雇载云僦”。上述汉简的文字当为汉军雇佣民夫转输军用物资的原始记录。汉武帝时期多渠道的转输，使京师及内地、边郡官仓、武库中的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证了前线将士的物资供应。

汉武帝加强后勤保障的一系列举措，为汉军四处征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

①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③ 《居延汉简甲乙编》350.12，506.27，505.15，505.20。

第六章　西汉中期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空前强盛，异姓与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已相继消灭，中央集权统治十分稳固。随着马政制度的建立健全，一支能与匈奴铁骑相抗衡的强大的骑兵部队也已建立起来。年轻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甘心继续维持对匈奴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而处于屈辱的地位，决心从消极防御转入主动进攻，以求解除长期困扰西汉王朝的边患。从元光二年（前 133 年）起，他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一场绵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终于爆发。就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古代的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而成为战争的主力，标志着我国军事史上骑兵鼎盛时代的到来。西汉王朝以雄厚的国力为后盾，凭借着骑兵集团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解除了匈奴对西汉政府和中原人民的威胁。遭受西汉沉重打击的匈奴逐步走向衰弱，并因内部的矛盾而陷于分裂，已无力与汉朝相抗衡。至汉宣帝甘露三年（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归汉，终于结束了汉匈之间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使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与中原进一步实现了统一。

第一节　汉武帝前期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

一、反击开始的序战

汉武帝即位之初，便“欲事灭胡”①，反击匈奴。但由于当时

①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朝政还受到窦太后的制约，朝廷大臣中安于现状、主张和亲的势力还占居上风，因而他不得不谨慎从事，继续维持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来汉，要求和亲①。汉武帝召集臣下讨论，“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的大行王恢建议拒绝匈奴之请而发兵出击：“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背）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②。但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力表示反对，与会群臣也大多支持韩安国的意见。汉武帝遂从众议，允许匈奴和亲。《史记·匈奴列传》对此记载说：“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不过，这样一片和平景象毕竟是虚假的。实际上，匈奴并未停止对汉地的滋扰，而汉武帝也在悄悄地进行反击的准备。早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就派60岁的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便侦察敌情，掌握匈奴的情况。他还把长期与匈奴作战的名将李广调任为未央宫卫尉，程不识调任长乐宫卫尉，其目的不仅在于加强首都和宫廷的守卫，也是为了直接对这两位抗匈名将进行考察，同时详细了解匈奴的情况。建元二年，又派张骞出使月氏，试图联络月氏合击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就在答应匈奴和亲请求后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又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分别驻守前线的边郡云中与雁门，以便随时准备带兵出击。

元光二年（前133年）春，雁门郡马邑的一位老人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进献伏击匈奴的计策：“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③ 汉武帝召集公卿大臣进行讨论，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

① 参见《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武帝建元六年。

② 《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

③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竟（境）数惊，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御史大夫韩安国仍然表示反对，王恢支持聂壹的建议，并与韩安国展开激烈的辩论，认为：“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① 汉武帝听后称“善”，决定采纳聂壹的建议，让聂壹献马邑诈降匈奴，待其主力前来，以伏兵围歼之。

马邑位于雁门关外不远，是自北方进入雁门关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地处山西高原北缘山地的边沿，属于晋北黄土台状高地的一部分；冲沟、切沟及梁、峁等沟壑地貌不但宜于藏兵，而且也不利于骑兵作战，的确是汉军伏击匈奴的好战场。元光二年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率各部，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分领车骑材官总计 30 余万人马，埋伏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准备在匈奴军队进入包围圈之后，由韩安国、李广和公孙贺率军与之决战，而王恢和李息则领兵出代地，从侧后截击匈奴辎重。部署停当后，聂壹按计逃入匈奴，对军臣单于佯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②军臣单于大喜，立刻与聂壹约定了进兵计划。

聂壹回到马邑，将死囚诈称马邑令丞斩杀，高悬其头于城楼之上，对军臣单于的使者说：“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③接到使者的报告后，军臣单于亲率 10 万骑兵驰入雁门郡武州塞（在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一带）。但行至距离马邑百余里时，单于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牲畜，却不见放牧人的身影，顿起疑心。他下令停止前进，并攻击附近的亭障，抓获一名巡行徼塞的雁门尉史，欲以矛戟刺之。尉史贪生怕死，将汉军设伏于马邑的机密全盘供出。军臣单于大惊，疾速退兵，庆幸没有中计，封尉史为天王。汉军迟

①②③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迟不见匈奴军踪影，后来听说军臣单于已经退兵，急追至武州塞，不及而还。王恢、李息本应该出代地截击匈奴军的辎重，但他们“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①。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最终以徒劳无功而告吹。

马邑之谋失败后，盛怒的汉武帝将首为此议而怯战不前的王恢抓进监狱，迫使他自杀以谢罪天下。军臣单于出于报复之心，遂与汉朝“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②汉与匈奴由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马邑之谋的失败，其直接原因是雁门尉史的叛变泄密，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伏击战计划本身尚欠周详缜密。首先，汉军的作战目的不够明确，既想围歼匈奴主力，又想截取匈奴辎重，因而需要投入数十万的兵力，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就很难保守秘密。其次，计划本身又缺乏对付意外情况的紧急措施，一旦匈奴骑兵未按汉军预先的设想行动，汉军也就无能为力。再次，汉军以无人看管的畜群布野来诱使敌军深入，显然也容易被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识破。凡此种种，无疑都是导致失败的劣招。可以看出，这个马邑之谋并非深思熟虑之作，而是急于求战、急于求胜的焦躁虚妄情绪的产物。它反映出西汉的君臣既普遍缺乏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对匈奴单于及将领强悍骁勇、多谋善断、匈奴骑兵机动灵活的特点也认识无多，在总体上低估了匈奴的实力，因而产生一战而消灭匈奴主力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邑之谋的失败，确实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作为汉朝反击匈奴的第一战，马邑之谋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从反面促使西汉君臣进一步认识到反击匈奴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而切实研究制定对匈奴作战的长期战略。更为重要的是，汉武帝利用马邑之谋，彻底结束朝廷内部对匈奴和、战策略的争论，开始了运用军事手段解除边患的战略转移。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此后几年间，汉匈双方仍然“通关市不绝”①，边界地区的贸易继续进行。不过，匈奴的铁骑仍不时袭扰汉边各郡县。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②，以图阻挡匈奴的攻势。但在第二年春，匈奴攻入上谷郡地区（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委派四员大将各率万骑，四路出击。因战斗多在关市附近进行，故有的史家称此次作战为“关市诱敌奇袭”③。在这次战役中，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一路扑空，无功而返；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被匈奴打败，损兵7000余人；骁骑将军李广兵出雁门，败得更惨，不但所领大军几被全歼，自己也受伤被匈奴俘虏，后来乘隙夺得一匹快马才只身逃回；唯有第一次领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不同凡响，这位年轻的将军率部出上谷追击匈奴，居然攻破了匈奴的龙城（今内蒙正镶白旗附近）④，杀敌700人，得胜而归。

“关市诱敌奇袭战”的总体战果并不理想。汉军投入作战的兵力不多而又分散作战，彼此难以相互支援，胜少败多，势在必然。从作战规模来推测，汉军此战似乎带有试探的性质，目的主要是为了侦察敌情，积累作战经验。其中卫青的小胜，虽然含有侥幸的成份，但意义却非同一般。龙城乃是匈奴单于大会诸国、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之地，汉军将它一举攻破，对匈奴的精神打击远比军事打击要沉重得多，汉军也因此而深受鼓舞，士气大为高涨。还应该看到，“关市诱敌奇袭战”是汉军第一次把战场摆到了匈奴的境内，而卫青率轻骑奔袭成功，则为汉军提供了远途奔袭作战的最初范例。卫青此战的胜利，不仅是他个人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胜利，而且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第一个胜利。战争结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③ 武国卿：《中国战争史》（三），第46页，金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④ 龙城地望颇多歧说，此处从汪维懋《匈奴龙城考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束后，汉武帝为卫青赐爵关内侯，说明了他对这第一个胜利的高度重视。

上述的序战，汉军虽然负多胜少，但通过实战的锻炼，却涌现了一位能够担当大任的抗匈主将，这就是后来被拜为大将军的卫青。同时，通过这一系列实战的检验，西汉王朝开始改变对匈奴的作战方式，将原先消极被动的“守边”、“堵击”改为主动出击，深入到匈奴境内远程奔袭。此后对匈奴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便由于这种作战方式的改变而爆发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也由于这一改变而取得了。

二、河南之战

（参见附图 4）

秦汉时期的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中的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是夹在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断陷冲积平原。黄河贯穿整个平原，不仅有利于航运，而且还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加之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很早就得到开发利用，因而成为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向往的沃土。

作为蒙古高原与陕甘黄土高原的分界区域，河南地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在军事上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和北方的匈奴统治者，在这里曾经展开反复争夺，最终是匈奴人取得胜利，占据了河南地。这里距离西汉的国都长安不足千里，匈奴的骑兵只需急驰一二日便可到达，屏蔽长安的北地、上郡等地不时成为汉匈交战的前线，长安也就一直处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匈奴占据河南地，就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背后，它所构成的威胁，远比匈奴对西汉边境接连不断的袭扰来得严重。因此，汉武帝在反击匈奴之始，首先便想把匈奴势力逐出河南地，以解除心腹之患。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继续袭扰上谷、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汉武帝任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以加强东方的防御。次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又分兵三路，突破长城关塞，大举入犯。左路2万余骑攻至辽西，杀辽西太守，略边民2000余人；中路杀入渔阳，击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寻又败韩安国军千余骑，几乎将其歼灭；右路进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汉武帝急命卫青率3万精骑出雁门，李息率兵一部出代郡，迎击匈奴骑兵。卫青"斩首虏数千"①，这才暂时挫败匈奴的攻势。但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部又大举进犯上谷、渔阳。韩安国率700人出战，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匈奴骑兵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是时虏言当入东方"②，汉武帝命韩安国向东移驻右北平（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以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决定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作战方针，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急速出兵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

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他们先沿黄河北岸（左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迂回包抄，突然掩袭白羊王和楼烦王。白羊、楼烦二王没有料到汉军会突然出现，仓促交战，被一举击溃，即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俘获"伏听者"3017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③。

汉军此役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首先得自汉武帝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当匈奴军逞威于西汉东北边境时，他不为局部的失利

---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张晏释"伏听者"为"伏于隐处，听军虚实"，其中的多数应是牧民。

所牵制，毅然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奇袭防御空虚的河南地，从而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次，此次取胜，还得益于远程奔袭和大迂回战术使用的成功。卫青、李息率领精锐骑兵，敢于孤军深入，大胆地从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与右贤王辖区中间的缝隙中穿过，行军千余里，切断了白羊、楼烦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迂回包抄，直达陇西，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此外，汉军的胜利，还与白羊、楼烦二王所部人马不多、战斗力较弱有关。白羊、楼烦二王本非匈奴亲信，他们所统率的主要不是征战疆场的兵士，而是安居乐业的后方牧民①，加上 80 多年来那里长期处于和平环境，防务相对薄弱。所以，当西汉的骑兵突袭而来时，其溃败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它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汉王朝收复河南地，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不仅大大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西汉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加强。战后，汉武帝下令在河南地设置五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与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中大夫主父偃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② 汉武帝便停止正在进行的通西南的筑路工程，"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城）"③，又招募内地居民 10 万至朔方实边④，并修缮秦代的旧长城及沿河要塞，把河南地建成一个可以向东、西、北三面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昔日匈奴刺向汉朝后背的利刃，于是迅速转变为汉军指向匈奴前胸的长戟。

---

① 陶克涛：《毡乡春秋》，第 346 页，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③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

三、漠南之战

（参见附图4）

对匈奴来说，河南地本是阴山南麓的屏障，当时单于的王廷就设在阴山及其南麓。河南地为汉朝所夺，单于王廷就直接暴露在汉军的攻击之下。因此，匈奴尽管在元朔二年时又占领了汉上谷郡斗辟县之造阳地（今河北赤城县至独石口一带），但仍然无法弥补在“河南地”的损失。河南之战结束后，匈奴便乘汉军忙于巩固新设郡县防务之机，频频入犯汉境。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于丹。伊稚斜单于即于元朔三年夏亲率万骑攻入代郡，杀死太守共友，掠走千余人。同年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而去。元朔四年，匈奴9万骑兵又分兵三路，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也不甘心河南地之失，频频进兵河南地，袭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面对匈奴的全线进攻，汉朝起初只采取有限反击的战略，把打击的目标对准匈奴的右贤王，以巩固新设置的朔方郡。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命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于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几路大军凡10余万人，出击匈奴。其中，出高阙的卫青等主力军进攻右贤王的王廷，出右北平的李息、张次公主要是牵制匈奴左部。卫青指挥大军疾进六七百里，于夜间到达匈奴右贤王的王廷之地，并发动突然袭击。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①。遭到汉军的突袭后便仓皇北逃，一名爱妾和数百名亲兵跟随他逃遁。汉军追之不及，俘获其属下裨小王10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余人、部众 1.5 万人及“数十百万”头牲畜。卫青得胜归来，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此役的胜利，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朔方的防务，而且大大削弱了匈奴右贤王的势力和匈奴中、西部的联系，威胁到单于主力的右侧，从而为后来河西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右贤王的惨败并未使匈奴停止对汉朝的进攻。元朔五年秋，匈奴又出动万骑攻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掳走千余人。西汉君臣因此认识到，必须寻找匈奴的主力进行决战并给予有力的打击，否则，将无法遏制匈奴的入犯并有可能重新陷入被动的境地。汉武帝于是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击战，寻歼匈奴主力。元朔六年（前 123 年）春，他发布命令，对此作了精心的部署：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出定襄；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皆属大将军统辖。年轻的侍中霍去病也被派至卫青麾下，参加作战，被卫青任为票姚校尉。

二月，卫青受命之后，率六将军统率 10 余万骑，浩浩荡荡地开出定襄，向北挺进，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不料中途突然遭遇匈奴骑兵，双方仓促开战，汉军击溃匈奴军，斩首 3000 余级。由于暴露了目标，兼之气候寒冷，卫青随即还师，于定襄、云中、雁门一线休整，等待战机。四月，卫青再次率部出征。北进数百里后，与严阵以待的数万名匈奴伏兵展开激战。起初，汉军颇多失利，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受到匈奴单于军及左贤王军的两面夹击，激战一日，所部 3000 余骑伤亡殆尽，苏建仅得身逃；赵信原是匈奴降将，战败后便带领 800 余骑投降匈奴。卫青指挥部队猛攻，最终击溃匈奴军，共斩首 1.9 万级，转败为胜。匈奴单于北逃，汉军乘胜追击。霍去病神勇无比，他仅率 800 轻骑，孤军追敌数百里，不仅斩杀匈奴军 2028 人，而且“斩单于大父行藉若侯产”①，俘获匈奴相国、当户及单于叔父罗姑比等，功居全军之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大父行”，指伊稚斜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之同辈弟兄。

冠。凯旋归来后，被朝廷封为冠军侯。

这次漠南之战，就战略决策而言，汉军在击破匈奴右贤王之后，利用匈奴单于庭右翼暴露的弱点，选择单于本部为打击目标，显然是比较恰当的。但是，由于这个战役是继河南之战的第二次大规模战略反击战，汉军的进攻已失去了隐蔽性和突然性，匈奴军队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加强侦察，在战前即已设下埋伏，严阵以待，汉军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经过激烈战斗，汉军之所以还能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兵力上的优势和卫青、霍去病的英勇战斗精神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战役结束后，汉武帝虽然对霍去病褒奖有加，但却未给卫青益封行赏，说明他对这个战役的结果并不满意。不过，经过此役的打击，匈奴单于的实力毕竟受到削弱，他也由此正视了汉军的兵威，开始考虑如何避开汉兵锋锐的问题。赵信投降后，“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①。伊稚斜单于立即加以采纳，将匈奴的根据地迁至大漠以北。汉朝正北方向边界的战争因此便相对减少，匈奴频繁扰边的势头已被遏制。从这一点看，汉武帝发动漠南之战的初衷，还是部分实现了。

四、河西之战

（参见附图5）

在合黎山、龙首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处东南——西北走向、长达1000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古称“河西”，今因其地理特征又称为“河西走廊”。这个连接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走廊，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宜耕宜牧，又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汉文帝初年，匈奴逐走月氏人，占据了河西之地。匈奴单于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命浑邪王统治河西的西部，大约当今甘肃酒泉地区；命休屠王管辖河西东部，大约当今甘肃武威地区。他们据此而西控西域各国，南制西羌诸部，对西汉王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汉武帝即位之初，曾有一个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宏大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颇费周折，首先是北部战场压力太大，令汉军无暇他顾，其次则是月氏人无意东归故地，使汉军孤掌难鸣。因此，直至汉匈漠南会战之时，河西地区仍在匈奴人的牢固控制中。

漠南之战结束后，匈奴单于把主力远撤至大漠以北，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和河西的浑邪、休屠二王。左贤王虽仍不断袭扰汉边，但规模不大，且又局限在东北一隅，可暂时不必对他大动干戈。河西之地的匈奴军自身实力不强，尤其是在右贤王被汉军击破之后，更显得势单力薄；浑邪、休屠二王多年来又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西域和西羌之上，对汉军并不怎么注意。而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虽然带来了月氏人不愿与匈奴人为敌的信息，但他同时又极力主张经营西域，认为取得西域可“广地万里”，不仅能获取“天马”、“奇物”，而且可以招徕迤西各族为“外臣”，利用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孤立匈奴，以“断匈奴右臂”①。因此，汉武帝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夺取河西之地，以解除汉朝西部边境的威胁，并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北击匈奴奠定基础。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汉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骑自陇西出塞，进攻河西。由于当时汉廷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所以只以万骑出征，显然是带有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进行侦察与试探的性质。为避免被匈奴军和羌人所发现，霍去病带兵出陇西后，“逾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大约在今兰州以西渡河，过乌亭逆水（今庄浪河），沿乌鞘岭北坡的草地而行，经过遬濮部落牧地，又渡狐奴河（今石羊大河）②，尔后转战6日，接连扫荡了隶属

①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② 此处从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于匈奴的5个小部落王国，拒战者诛之，归附者赦之。随后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的大黄山，又称燕支山），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与浑邪、休屠二王遭遇。两军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激战，浑邪、休屠二王败走，汉军擒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8900余级，还缴获了休屠王的两个祭天金人。汉军取得了祁连山北麓的第一次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师率减什七”①，万余汉骑，只剩下3000余，霍去病只好引残兵而回。行至皋兰山下（今兰州南），遭到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的阻击。霍去病指挥士卒与敌展开短兵鏖战，杀二王而败敌军，胜利回师。

初战告捷，给汉武帝以极大的鼓舞，他决心乘河西匈奴惊魂未定之时，再次发动攻击。元狩二年夏，汉武帝命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领数万骑进攻河西；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率万余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

按照事先预定的作战计划，在西北方向，霍去病率部自北地出塞，是为北路；公孙敖率部自陇西出塞，是为南路②。霍去病所部是侧翼进攻，应从北侧插入敌后，断其退路，而公孙敖所部则负责正面进攻，同时又负有吸引敌方注意力，掩护北路汉军之迂回包抄的任务。霍去病率领一部“常选”即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骑，按计划自灵武（今宁夏银川北）渡河，先是翻越贺兰山，而后又“涉钧耆、济居延”，即穿过浚稽山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绕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而转向南，沿弱水行军，通过小月氏地区（今甘肃酒泉一带），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余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然而，公孙敖所部却因迷失方向而未能如约与霍去病军会合。面对此种意外，英勇非凡的霍去病当机立断，毅然指挥部队向匈奴军的侧背后发动攻击。匈奴军很快就一败涂地，30200人战死，单桓、

---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 此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则云霍去病与公孙敖“俱出北地，异道”。

酋涂二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另有五王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共59人和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63人被俘。汉骑则付出了“大率减什三”① 的代价。

当河西大捷之时，在北方，李广与张骞出右北平后，于进军途中失去联系。匈奴左贤王率4万骑兵将李广所部4000骑团团包围。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李广沉着冷静，令其子李敢率数十骑直冲敌阵，从敌军阵营左右接合部之间急驰而过，回来报告说：“胡虏易与耳！”② 汉军士兵大受鼓舞，李广乃令部下列为圆阵，手执弓弩向外对敌。匈奴骑兵连续发动冲击，箭如雨下，汉兵死者过半，弓箭也将用尽。李广令战士只引满弓弩而不发箭，自己用大黄连弩向匈奴裨将射击，接连射死数人，匈奴的攻势这才缓和下来。夜暮降临，“吏士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③。第二天，汉军又奋勇拼杀，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见不能取胜，只得解围北撤。疲劳不堪的汉军也很快撤兵而还。

霍去病在数月之间连败河西匈奴军，除了归功于汉武帝用兵河西战略决策的英明之外，还得益于下述的诸多因素。首先，汉军的作战时机选择恰当，战术运用巧妙。匈奴历来多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而汉军由于马匹有粮草饲养，故骑兵的作战并不完全受到季节的影响，春、夏两季皆可出击。此次，汉军在春季作战之后稍事休整，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这种连续作战的方式突破了匈奴骑兵的作战常规，完全出乎匈奴的意料之外，因而能取得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良好效果。其次，汉军统帅英勇、将士能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霍去病于漠南战役中脱颖而出，此次出战河西，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兵作战。这位年轻的主帅，一向具有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④，这不能不极大地鼓舞汉军的士气，激励他们英勇奋战。汉军广大将士的英雄主义行动和高昂的斗争精

---

①④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神，为夺取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第三，汉军注意区分主要敌人和胁从分子，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河西历来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霍去病在两次河西之战中，都注意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坚持“舍服知成而止”① 的政策，只要敌军表示归服便赦而不问，而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在拒不归服、坚持反抗的一小部分顽敌身上。第一次进军河西时过遬濮部落而不战，皋兰山下的鏖战也只诛杀“锐悍者”而不残无辜等，都是“舍服知成而止”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对分化瓦解敌军、夺取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且还对河西各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浑邪王的数万部众在后来归降了汉廷。

伊稚斜单于对河西匈奴军的两度惨败十分恼怒。当年秋天，他下令召见浑邪王、休屠王，欲加杀戮。浑邪王遂与休屠王密谋降汉。汉武帝闻报则喜，但又恐有诈，特地派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汉军出动之后，休屠王又忽然变卦，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部众也被吞并。霍去病的大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军队遥遥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②，局面一片混乱。霍去病立刻率领精锐突入匈奴军中，将浑邪王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同时纵兵斩杀了 8000 多名力战欲逃之人，稳定了局势。然后，派人护送浑邪王前往长安，同时命汉军监护号称 10 万实有 4 万多人的匈奴降众东渡黄河。汉武帝下令郡县出动大车 3 万辆相迎，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战国秦长城之外，“因其故俗，为属国”。同时，“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③。

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役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拔除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失，匈

①②③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奴人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①而对汉朝来说，由于河西匈奴势力的消灭，"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②，西部边郡的人民因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在河西之战胜利的当年，汉武帝下诏将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一半，"以宽天下徭役"③，这对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因长期战争而遭受巨大消耗的西汉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西汉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而且打开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始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汉匈的实力对比因此开始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汉匈双方还是保持均势的话，那么，此后匈奴便日趋衰弱并渐居下风，而汉朝的优势则日益明显，基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河西之战结束后，汉武帝特嘉奖霍去病，"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后来，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又下令隆重为其送葬，并"为冢象祁连山"，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战中的卓著功勋。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汉武帝对这次战役成果的重视。

五、漠 北 之 战

（参见附图 6）

元朔六年（前 123 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撤兵漠北的目的之一，是企图"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不料汉武帝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 120 年）春发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略千余人，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机，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他下诏实行币制改革，又令“初算缗钱”，实行盐铁专卖，以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力和财力。同时，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① 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尔后，他即调集10万骑兵，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出征漠北；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匹”② 随军行动，运载补给，补充作战时的马匹损失，还调拨数十万步兵，运送辎重。

元狩四年夏初③，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慨然踏上了征途。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5万出代郡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特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5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但队伍刚刚出发便捉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

---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 此据《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武帝元狩四年纪事。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载“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是一致的，官马即指骑兵十万；私马即指私负从马四万匹。

③ 史书对元狩四年的出兵时间记载不一。《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云：“其明年（元狩四年）春，汉谋曰……乃粟马发十万骑……”《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与之相同，《史记》卷一一一《卫青将军骠骑列传》及《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皆云出兵在春季，但《汉书》卷六《武帝纪》则在“夏，有长星出于西北”句后记卫、霍出兵之事，《资治通鉴》与此相同。所以，估计元狩四年之战是谋于春而发于夏，出兵时间或在春末夏初之交。

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单于主力，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左贤王。

赵信得知汉军北进，又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汉军即度幕，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单于依计而行，“悉远北其辎重”①。将全部家属人畜辎重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从定襄出塞不久，从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单于驻牧的地点，立刻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由东路前进，以掩护自己的侧翼并攻击单于军的左侧背②，自己则率主力直奔单于军的主力，准备从正面迎敌。他率部向北行进千余里，穿越浩翰的大沙漠。抵达漠北后，“见单于兵陈而待”，卫青当机立断，创造性地运用车骑协同的新战术，命令部队以武刚车“自环为营”，以防止匈奴骑兵的突然袭击，而令5000骑兵出击匈奴。伊稚斜单于乃以万骑迎战。两军激战一天，未见胜败。临近日落之时，突然“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③，卫青乘势派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将单于的阵营包围起来。伊稚斜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④，遂趁夜幕降临，跨上一匹善于奔跑的精骑，率领数百壮骑杀出重围向西北方向逃去。战至深夜，汉匈双方伤亡大致相当。汉军左校点视俘虏，发现单于已在天黑之前突围脱逃，卫青立即派轻骑追击，自率大军随后跟进。匈奴军溃散。至天明，

---

①③④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 据《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漠北之战前，汉武帝曾以李广年老为由，拒绝让他领兵出征，后经李广一再请求，乃委以前将军之任。实际上，担心李广年老误事，只是汉武帝的假托之辞，他真正忌讳的，是因为李广曾经数次败于匈奴，认为李广领兵出征于战事不利。所以，汉军出发之前，武帝便暗中交代卫青，毋使李广与单于交锋，“恐不得所欲”。卫青此时分兵，正是依照武帝之意而为。此外，卫青的亲信公孙敖因在河西之战中误失战机而被夺去侯爵，卫青欲使公孙敖再立战功，重新封侯，故率公孙敖与己一起迎战匈奴单于，为此也需要支走李广。不过，纯粹从战术的角度来分析，卫青分兵击敌又颇符战理，对此不能否定。

汉军追击200余里，俘斩敌军1.9万余名，但未见单于踪影。卫青乘胜向北挺进，攻入窴颜山（今杭爱山南面的一支）赵信城，缴获了匈奴屯集的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汉军在此驻留一日，然后放火烧毁赵信城及城内未能运走的余粮，回师南下。到达漠南之后，卫青与李广、赵食其会合。李广、赵食其从东路前进后，因无向导，半道迷路而未能参战。卫青派人查问迷路的情况，曾经威震敌胆、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李广愤然对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① 遂拔刀自刎。一代名将的死于非命，使此役的胜利大为失色。

东出的霍去病军虽然未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000余里，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一说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杀匈奴北车耆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今贝加尔湖）”②，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的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的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订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廷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

---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批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汉军虽然付出了丧失数万兵士和10余万匹马的沉重代价，但却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匈奴骑兵损失达八九万，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致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遂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①。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作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的退缩。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

六、汉胜匈败的主客观条件和原因

汉武帝前期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是西汉时期汉匈之间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内民族战争。就战争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汉朝是由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被动转向主动，由失败转向胜利，而匈奴却由主动变为被动，由胜利变为失败，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居住在北方草原的匈奴，同汉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汉匈之间的战争，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并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不过，其间仍有是非之分。尽管匈奴同北方的其他民族一起，首先开发了祖国的北部边疆，并首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各个分散和落后的氏族部落，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匈奴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仅残酷压迫和剥削被其征服的各个民族，而且不断发兵袭击汉朝的北部边境，掳掠人口，抢劫财物。据《史记》、《汉书》的记载统计，在军臣单于前，匈奴就将至少10多万口以上的汉人掠去充作奴隶。西汉朝廷在汉初的几十年间，虽然忍辱退让，委曲求全，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对匈奴实行和亲，每年向单于纳贡，还是不能填满匈奴统治者的贪欲。他们还是年年纵兵南下，烧杀掳掠，严重地破坏西汉边郡的社会生产，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西汉王朝的反击战争，完全是正义的，符合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汉朝所以能够战胜匈奴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战争的胜负，还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诸条件。汉武帝前期之所以能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还在于西汉实力的强大。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之时，西汉的国力已空前强盛。在政治上，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已被消灭，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十分稳固。在经济上，不仅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而且实行盐铁专卖，整顿币制与税收，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军事上，已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并且培养、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能够统率骑兵集团，大胆深入大漠，千里奔袭，实施远距离的迂回包抄，歼灭匈奴的主力。与西汉相反，此时的匈奴，其实力却在逐步下降。匈奴原是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内部蕴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不仅上层贵族集团常因争权夺利而酿成冲

突斗争（如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于丹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而且众多被征服的民族和部落，也因不堪重敛和奴役，对匈奴统治者充满着仇恨和反抗情绪。匈奴的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只能通过和亲、关市与掳掠，从中原地区获取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弥补其单一经济的不足。汉匈关系恶化后，西汉停止和亲，关闭关市，并以武力抗击匈奴骑兵的掳掠，使之难以获得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加上随着战争的失败，河南、河西与漠南的牧地不断丧失，匈奴的经济也就日益萎缩而衰落。此外，匈奴原先因其强大的骑兵而占有的军事优势，也因西汉骑兵部队的建立而趋于丧失。此长彼消，强弱易位，西汉的国力于是便远远地超出于匈奴之上，这就为其战胜匈奴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战争的胜负，还取决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反击匈奴战争的正义性和西汉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汉武帝具备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可能，而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则有赖于他和诸将优异的军事才能及其对战争的正确指导。

汉武帝在这场战争中，表现了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高超能力。汉武帝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即位之后，他就按照反击匈奴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允许，适时地健全和完善养马制度，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为深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时，基于开国以来汉军长期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韩安国、李广等一批老将习惯于守边、堵击一类的防御战法，缺乏统率骑兵集团进入大漠草原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经验，他又积极培养和选拔一批善于指挥骑兵集团的年轻将领，如卫青、霍去病等，把他们推到同匈奴作战的第一线，让他们从实践中学习和积累指挥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经验，从而能承担渡漠进攻的战略任务。尤为可贵的是，汉武帝善于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客观条件的变化，选择正确的进攻方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河南之战，汉武帝乘匈奴军逞威于西汉东北边境之时，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命令汉军突袭河南，进攻防御薄弱的白羊、楼烦二王，占领了河南地；漠南之战，汉武帝又利用匈奴右翼暴露的弱

点，派军奇袭右贤王，削弱单于与其西部的联系；河西之战，汉武帝则根据匈奴主力北徙、一时难以实施有效进攻的新情况，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力量较弱的河西匈奴军，以断匈奴右臂；漠北之战，汉武帝则利用匈奴单于的轻敌麻痹，派军东西两路远途奔袭，深入进击，予匈奴主力以致命打击。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年轻的骑兵将领，在这几次战役中，不仅充分表现出沉着冷静、英勇果断、机动灵活的特点，敢于统率骑兵集团大胆深入，千里迂回，远程奔袭，猛打穷追，而且在连续出击、迂回包抄、车骑协同作战等战术的运用上也十分出色。所有这一切，无疑也是汉军取胜的重要原因。

匈奴军的军事指挥，则显然要逊色得多。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匈奴的骑兵开始在军事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汉军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匈奴单于及诸王却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没有看到汉朝几十年的力量积蓄和骑兵建设的飞速发展，认为汉军不能渡漠，“即度幕，人马罢”，匈奴骑兵很容易将其击溃。因此，也就未能根据汉军大举反击后的形势变化，适当调整兵力部署，相应加强河南、河西等地的防御力量，甚至在退居漠北之后，还高枕无忧地等待“坐收虏耳”。这种轻敌麻痹思想，正好为汉军的突袭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由于匈奴各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密切，诸王之间在战争中往往难以密切配合，也容易被汉军各个击破。因此，在西汉骑兵的大举进攻前面，匈奴军队连吃败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第二节　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进攻

一、漠北之战后汉匈形势的变化

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西汉与匈奴之间出现了一个长达18年的基本上相安无事的时期。在

这一时期，虽然双方不时发生摩擦乃至小范围的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却基本停止，总的形势较汉武帝前期大为缓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汉匈双方都需要实行暂时的休战。

对于西汉王朝来说，休战首先是迫于财政方面的巨大压力。在前一时期，西汉虽然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由于“征发烦数，百姓贫耗”①，不仅“边郡久废耕织”②，而且国库也十分空虚，财政极为困难，“大农陈臧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③，最后竟然出现“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④的现象，因此不得不暂时收缩战线。其次，匈奴在漠北战役之后，大幅度地向西北退缩，汉朝的军事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自然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但战略重心的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量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如河西走廊的开发和建设、争取西域诸国的归附等等，都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何况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又在两越、朝鲜、西羌、西南夷地区接连采取军事行动，为避免多面作战，也需要与匈奴实行休战。此外，漠北战役结束两年后，抗匈名将霍去病即英年早逝，而卫青也在元封五年（前106年）病逝，这对西汉王朝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征战，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匈奴一方，比西汉更需要休战。前已述及，在遭受河西、漠北等战役的失败之后，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匈奴的势力范围已大大西移，单于的王廷更已徙至遥远的北方。尽管有人认为不能把单于王廷移向漠北看作是其虚弱的表现⑤，但匈奴丧失大片领土，损失大量人员、牲畜和财物，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却是不争之史实。昔日兵强马壮、地域辽阔的匈

---

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⑤ 陶克涛：《毡乡春秋》，第35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奴大帝国至此已不复存在，匈奴单于也已基本上丧失与汉朝争锋抗衡的能力。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公孙贺率1.5万骑出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赵破奴率1万骑出令居（治今甘肃永登西北），两军搜寻前进各达2000余里，“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①。显然，这是匈奴采取了避战的对策，而取此策无疑是匈奴自感实力不济、难以抵抗汉军攻势的证明。因此，匈奴也渴望能有一段休战的时间，以便能得到恢复喘息，并进一步加强对西域各属国的控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汉朝的进攻。

正是因为汉匈都需要休战，所以“和亲”又成为这个时期双方经常提及的话题。在漠北战役结束不久，伊稚斜单于就在元狩末年依从赵信的建议，向西汉“遣使好辞请和亲”。他重提和亲，仍然企图恢复从前汉朝处于屈辱地位的汉匈关系。汉武帝召集大臣廷议，多数人反对恢复和亲。丞相长史任敞认为：“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②主张匈奴只有臣服汉朝才能通好。由于双方的立场各自不同，所以和亲谈判不欢而散，出使匈奴的汉使任敞亦遭扣留。元鼎三年（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继为单于。汉武帝遂巡狩边郡，后又巡边至朔方，并率领18万骑兵向匈奴示威，同时派使臣郭吉赴匈奴传达汉军平定南越吕嘉之乱的消息，对乌维单于说：“南越王头已县（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③单于大怒，扣留郭吉，“迁辱之北海上”。他一面“休养士马，习射猎”，加紧备战，一面仍“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终不肯为寇于汉边”④。后来，汉朝使者杨信又提出“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⑤的和亲条件，遭到单于的拒绝。这样，双方使者虽往来不断，终因立场不同，达不成协议。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明汉匈双方的积怨甚深，都缺乏通好的诚意，重议和亲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条件成熟，势必重新开战。

---

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果然，从元封四年（前 107 年）开始，汉匈关系又逐渐紧张起来。这一年，乌维单于出于“欲多得汉财物”的贪心，曾对汉使诡称愿亲自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汉武帝闻讯后，专门在长安为单于建邸准备迎接。但单于却以种种借口未来，只委派一名“贵人”入汉。不料，这位贵人在长安患病不治而死，汉廷虽遣高级使节持厚币以隆重的礼仪还送其丧，但乌维单于却一口咬定贵人系遇害而死，将汉使扣留，又开始骚扰汉边。汉武帝针锋相对，拜郭昌为拔胡将军，与浞野侯赵破奴屯守朔方以东，以防备匈奴。

元封六年（前 105 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史记》、《通鉴》作“乌”）师庐立，因其年幼，号为“儿单于”。随后又将王廷更向西北迁移，“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①。此时，匈奴内部矛盾加剧，汉朝一面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一面加紧分化匈奴的活动。匈奴左大都尉准备杀单于降汉，汉武帝特下令在塞外修筑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并于太初二年（前 103 年）派赵破奴率 2 万骑出朔方西北 2000 余里，进入浚稽山（今蒙古境内之阿尔泰山以北）准备接应。因事机泄露，儿单于先行下手捕杀左大都尉，发兵攻击赵破奴。赵破奴且战且退，“捕首虏数千人”，行至距离受降城大约 400 里处，遭到 8 万匈奴军的包围。夜里赵破奴出营寻找水源，不慎被捕，汉军遂全军覆没。这样，在休战了 16 年之后，匈奴侥幸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此时，汉武帝正全力应付西征大宛战事，但针对匈奴的备战也在加紧行动。太初三年（前 102 年），匈奴詹师庐单于死，句黎湖单于继位。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在阴山北侧、大漠南缘千里筑亭障，修建长城，“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同时“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②，在居延海修筑长城。第二年，当李广利二伐大宛获胜，西域诸国纷纷归附汉朝之后，汉武帝立即将进攻的矛头重新对准了匈奴，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① 在为祖先复仇的名义之下,宣布与匈奴重新开战。

二、天山、浚稽山之战

太初四年(前 101 年)汉武帝的宣战诏书,并未立刻引发汉匈双方的大规模战事。这主要是因为匈奴未能做好战争准备而大行缓兵之计的结果。就在这一年,匈奴句黎湖单于死,新即位的且鞮侯单于担心汉朝发动进攻,主动做出许多友好姿态,不仅将路充德等一批扣押在匈奴的汉使悉数放回,而且还卑词自称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②汉武帝有所感动,于天汉元年(前 100 年)派中郎将苏武等人出使匈奴,以重礼厚币赠送单于。但"单于益骄,礼甚倨"③,后来又借口汉副使张胜涉嫌参与匈奴缑王的谋反活动,将苏武一行扣留。汉武帝既气愤又失望,决计向匈奴发动进攻。

天汉二年(前 99 年)夏五月,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率 3 万骑兵出酒泉,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北方向进军,至天山击败匈奴右贤王,斩敌万余人,但在还师途中又陷入重围,苦战几日,粮食殆尽,仍不得突围。假司马赵充国率数百精勇骑兵杀出一条血路,李广利引军跟进,这才突出重围。此战汉军损兵折将几近 2 万人,已不能言胜。同年秋,汉武帝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郡治平定,今内蒙古准格旗西南),强弩都尉路博德出居延,两军挺进匈奴腹地,会师于涿邪山(在高阙塞北千余里,今蒙古国境内满达勒戈壁附近一带),终因寻敌不见而撤回。

还在李广利出征之时,汉武帝曾令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引军跟随。李陵不肯接受为大军"将辎重"的任务,上书请求自领人马到兰干山南去牵制匈奴单于。汉武帝同意了李陵的要求并命路博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德为之接应，可是路博德又不愿为李陵做后援，上书请求晚到次年春天再与李陵一起出兵。汉武帝于是怀疑是李陵怯战而使路博德上书，心中恼怒不已。就在下令路博德引军与公孙敖合军共击匈奴的同时，汉武帝又严令李陵急速出兵。天汉二年九月，李陵仅率 5000 步兵孤军深入，出居延远行 1000 余里，30 余日后到达浚稽山与单于兵相遇。大约 3 万匈奴骑兵将李陵军包围起来，一场恶战随即展开。

李陵所率步卒，全是他精心训练出来的“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个个都能“力扼虎，射命中”①，战斗力很强。面对六倍于己的强敌，汉军沉着应战，先是“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李陵率战车出营外列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当匈奴骑兵纵马冲来时，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生者惊恐而退。李陵挥师追击，杀敌数千。匈奴单于大惊，自知遭遇劲敌，急忙调集 8 万骑兵增援。李陵见敌人势众，且战且走，数日之间又斩杀匈奴 3000 余级。匈奴军穷追不舍，李陵引兵向东南方向撤退，沿故龙城道行进，四五天后，又被匈奴军包围在大泽葭苇之中。匈奴军从上风纵火，李陵则令军中放火自救，乘势突出火阵，撤至山下，依托地势，与匈奴军“步斗树木间”，又杀敌数千。此后，李陵又指挥汉军与匈奴“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单于见作战不利，又担心继续追击会陷入汉军的埋伏，便打算罢战后撤。不料这时李陵的部下管敢临阵投敌，匈奴单于因而得知李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以及人数、战术的底细，放心大胆地加紧了对汉军的进攻，将汉军压在山谷，匈奴军从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虽然身处危境，但愈发奋战不已，至 50 万支弩矢全部射尽后，李陵下令弃车，率残兵 3000 人以车辐、尺刀为武器，与匈奴军展开激烈肉搏，“士卒多死”，最后还是被包围在峡谷之中。夜半时分，李陵率十余壮士杀出重围，匈奴数千骑兵追来将李陵抓获。李陵自觉“无面目报陛下”，遂投降了匈奴，他所

---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率领的5000精兵，最后仅有400余人返回。

天汉二年战事的失利，主要与西汉王朝的轻敌有关。自漠北战役后，汉朝便以强大的胜利者自居，对匈奴的实力估计偏低。太初二年汉军败于浚稽山，说明匈奴并非不堪一击，但汉廷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天汉二年又在优势感的驱使之下做出孤军深入的决策。而李陵的出兵，更是出于个人的意气用事，根本没有应付逆境的思想准备和具体措施。所以李广利与李陵的两次出征，都是孤军远征，既缺乏掩护，也没有后援，容易遭受匈奴优势兵力的围攻而败没。而匈奴一方，虽然其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战略殊无新意，但匈奴军队显然已吸收前一时期接连败绩的教训，其持续作战的能力提高了许多，对战术也作了相应的改进，更加注重作战的机动性和突然性，更加注意以多打少，以强击弱。因此，几支汉军接连败在匈奴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燕然山之战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调整

天汉二年的失利令汉武帝十分震怒。天汉四年（前97年），他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行动，准备与匈奴一决雌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6万骑兵和7万步兵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万余士卒策应作战；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卒3万余人出五原，因杅将军公孙敖率1万骑兵及3万步兵出雁门。四路大军共21万余人，声势之浩大不在漠北战役之下。匈奴且鞮侯单于探得汉军动态之后，迅速将其妇幼、资产全部转移到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以北，自己率领10万精骑列阵于余吾水南岸待敌。李广利引军来到，随即与匈奴军展开厮杀。见不能取胜，李广利引兵撤退，且鞮侯单于挥骑追击，交战10余日，汉军一无所得。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因接战不利便很快退兵。韩说所部则扑了个空，无功而返。

太始元年（前96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即位。此后几年，由于汉匈双方统治者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政，所

以汉匈关系比较平稳，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进入征和元年（前92年）以后，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而狐鹿姑单于则根基已固，又开始不断向汉朝挑衅滋事。征和三年（前90年），匈奴军攻入五原、酒泉两郡，杀二都尉，颇有占据上风之势头。

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汉武帝当然不肯示弱。他不顾当时西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巫蛊之祸①、政局尚且不稳的现实，准备向匈奴进军。朝中的方士、太史、太卜及治星望气者流，纷纷迎合汉武帝的好战心理，借助求蓍问龟的形式，声言："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并说"诸将贰师最吉"②。汉武帝决心遂定，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这个庸才为统帅，率军出征。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三路汉军浩浩荡荡开出塞外。其中，李广利率领由7万大军所组成的主力由五原北进，御史大夫商丘成率3万人出西河向西北挺进，重合侯莽通将4万骑兵出酒泉向北前进③。为防止受匈奴控制的车师国截击莽通，汉武帝又特派成娩率楼兰等六国之兵攻击车师，以保障莽通军侧翼的安全。

狐鹿姑单于闻知西汉大军数路并出，立即将其物资、辎重、家属及老、弱之人转移至郅居水（今蒙古国色愣格河）北岸，自己亲领精骑在姑且水（今蒙古国图音河）以西布阵，准备迎击汉军。匈奴左贤王则将其所部转移至余吾水以北六七百里的兜衔山地区，以避汉军之锋锐。

---

① 汉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有人使用"巫蛊"的巫术活动造成的。征和元年（前92年），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曾在汉武帝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下木偶人"祝诅有恶意"（《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汉武帝将公孙贺父子及其家族处死，后又将有牵连的后宫及大臣数百人以"巫蛊祝诅"之罪处死。翌年，汉武帝信用的江充又诬告太子刘据宫中埋有木偶人，刘据大惧，矫诏发兵捕杀江充。汉武帝发兵追捕，激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兵败后自杀。

②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资治通鉴》记商丘成部兵力为2万人。

商丘成率部进至追邪径，因未见敌军而后撤。行至浚稽山时，匈奴的一员大将及汉降将李陵率 3 万骑兵追杀上来，汉军且战且走，转战 9 天。汉军将士英勇杀敌，战至蒲奴水（今蒙古国翕金河）地区时，伤亡惨重的匈奴军终于支撑不住，主动退出了战斗。商丘成所领汉军取得了小胜。

莽通所部皆为骑兵，战斗力较强。他率军挺进千余里，在天山以北与 2 万匈奴骑兵遭遇，匈奴军见汉军兵马强盛，自知战不能胜，随即主动撤退避战。莽通军因而一无斩获，空手而还。

李广利率主力出塞后，初始一切顺利。行至夫羊句山（在浚稽山东南）狭谷，遭受匈奴右大都尉及汉之降将卫律所领 5000 骑兵的伏击。李广利令属国胡骑 2000 人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①，匈奴军开始后撤。汉军乘胜追击，直至范夫人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达兰札加德西，一说在夫羊句山北），匈奴军只顾狂奔溃逃，不敢交锋。就在这时，京师传来了令李广利惊惧不安的消息：原来李广利在出师之前，曾与他的亲家、丞相刘屈氂密谋拥立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之甥昌邑王刘髆为皇太子。在李广利出征之后，此事被人告发。六月，刘屈氂以大逆不道罪被斩，李广利之妻小亦被捕入狱。李广利闻讯方寸大乱，部属胡亚夫劝他投降匈奴以避祸，他犹豫不决，又欲“深入要功”②，希望能用赫赫战功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并援救自己的妻小。于是，他置汉武帝在出师之前所下“必毋深入”③ 的诏令于不顾，冒险孤军北上，来到郅居水上，仍不见匈奴军的踪影。李广利不甘心，又领 2 万骑兵渡过郅居水，一路搜寻匈奴主力，终于追上了匈奴左大将所部的 2 万骑兵。匈奴军没有料到汉军的到来，激战一日，损失惨重，左大将战死，士卒伤亡者甚多。就在此时，李广利的长史与决眭都尉烰渠侯私下合谋，认为李广利“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准备逮捕李广利而后撤退。李广利获知此事，遂先行下手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斩杀掉长史等人。但这样一来，汉军人心更加涣散，斗志低落，李广利无奈，只好往后撤至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匈奴单于亲率5万骑兵在此进行拦截，切断汉军的退路。两军交战，疲劳不堪的汉军"大乱败"，李广利贪生怕死，在阵前投降了匈奴。

燕然山之战，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也是他用兵匈奴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这次败仗，使汉武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悔远征伐"①。长期的战争，不仅使国力遭到巨大的消耗，导致国库的空虚，而且人民的徭役赋税负担极其沉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大批逃亡，武装起义不断发生。这一切，使汉武帝意识到，无限制地对匈奴发动战争实在得不偿失。他经过深刻反省，决心改弦更张。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遂发布著名的轮台诏令"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②从此，汉武帝不再主动出兵进攻匈奴，由尚武而转向重视农耕，重新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狐鹿姑单于因几次胜利而沾沾自喜，征和四年曾致书汉武帝，倨傲地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并骄狂地提出："今欲与汉闿（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这个要求遭到了汉武帝的拒绝。狐鹿姑单于的口气虽然不小，但由于"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疲）极苦之"③。所以匈奴实际上也无力再大举发兵南下，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样，汉匈双方又迎来了一个大致相安无事的新时期。

四、汉军失利的主客观原因

汉武帝后期对匈奴进兵的接连失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

①②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作用的必然结果。

西汉社会的动荡与政局的混乱，是导致汉军失利的深层原因。漠北战役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汉武帝师心自用，不顾西汉社会急需休养生息的事实，继续推行其开边兴利的政策，接连用兵，四面出击。加之他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元封四年（前 107 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①。天汉年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的暴动，他们“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②。这些农民起义虽然先后遭到镇压，但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局面并未改变，阶级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以卫太子为首的“宽厚长者”派反对汉武帝的开边兴利政策，“太子每谏征伐四夷”③，而那些“深酷用法”的大臣则对太子屡加陷害，终于在征和二年（前 91 年）爆发了“巫蛊之祸”的惨剧，朝政一片混乱。政局的动荡，不仅使西汉王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对匈奴的战争，甚至还直接导致了前线的失利，李广利投降匈奴就是个突出的实例。尤其严重的是，在汉武帝后期，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已变得十分强烈。汉武帝前期对匈奴的反击战争，目的是为阻止匈奴的骚扰与侵掠，保护中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因而是符合广大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具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因此，它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和积极参与。但在汉武帝后期，用兵匈奴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恶性发展的一部分，这对于饱受战乱之苦、急需休养生息的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便纷纷加入流民的行列以逃避兵役和赋税，甚至揭竿而起，与官府为敌。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汉军的士气和斗志，从

---

① 《汉书》卷四十六《万石卫直周张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而导致战局的失利。

西汉王朝综合国力下降所造成的汉军战斗力的下降，则是汉武帝后期对匈奴战争屡遭败绩的基本原因。自马邑之谋以来，汉武帝连年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①。不仅把汉兴六七十年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消耗一空，而且还导致了“天下户口减半”②、“海内虚耗”③的严重后果。尽管汉武帝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财政制度改革以聚敛财富，但仍然无法避免“民力屈，财用竭”④的困境的出现。综合国力大不如昔，汉军的整体作战能力也随之大幅度降低。例如，由于马匹严重不足，汉军在出征之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而代之以步兵。骑、步兵混合编制，固然有其优势，但面对素以快速灵活、机动性强而著称的匈奴骑兵，就很难在战场上把握战机，争取主动。由于缺乏足够的骑兵，汉军的行进速度也大大减慢，这不仅使匈奴在战前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备战，而且在撤退时又容易被匈奴快速追及并遭到包围。同时，由于马匹不足，汉军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变得脆弱起来，其远程作战与持续作战能力便往往因为粮草及装备供应不足而大打折扣。

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后期的几次战役也存在着兵力分散、缺乏统一指挥等不少弊病。另外，在后期作战中屡当重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原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他是凭借着裙带关系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其军事才能及威望均无法与卫青、霍去病相比。由他出任全军的统帅，实在是难孚众望。因此，汉军将领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也就不免要产生许多问题。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导致汉军失利的直接原因。

匈奴军作战方式的改变，也是汉军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漠南战役之后，匈奴就采用了远离汉朝边塞、以逸待劳的战略。不过，由于当时汉军远程作战及机动作战能力较强，加之战场距

---

①④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

②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

③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离汉军后方不甚遥远等原因，所以匈奴的诱兵之计未能奏效。到汉武帝后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此时，匈奴除将根据地迁往离汉朝边塞更为遥远的北方，以增加汉军奔袭的距离与难度外，又利用投降的汉将训练甚至指挥匈奴军队，在保持其高度灵活、机动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持续作战的能力。由于远途奔袭的距离加大，加上马匹数量的减少，后勤补给困难，汉军只有力求速战速决，才有取胜的可能。匈奴便发挥自己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和持续作战能力提高的优势，避开汉军的锋锐。待汉军疲倦、后勤补给不足之时，再穷追猛打，并针对汉军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弱点，在局部战场投入优势的兵力，重点打击为其追击或包围的汉军。汉军几次战役的失败，皆与此有关。

第三节　汉昭、宣、元帝时期与匈奴的关系

一、汉昭帝时期的防御作战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令并停止了对匈奴的用兵。两年之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西汉的朝政，掌握在汉武帝的托孤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之手。霍光乃抗匈名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是一位“知时务之要”的成熟的政治家。鉴于当时西汉社会“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① 的困难局势，霍光坚决地继承并执行武帝生前制定的改弦更张政策，“因循守职，无所改作”②，把主要精力，投入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巩固内政之中。

在此期间，匈奴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困难时期。连年的战争以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赞。

②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

及频仍的天灾，使得匈奴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恶劣，“民众困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中多不安”。与此相应，匈奴奴隶主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日渐激烈，相互厮杀和分裂日益成为匈奴社会的严重问题。始元二年（前 85 年），狐鹿姑单于死，临终之前，他以其子年少不能治国为由，遗令立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但在他死后，颛渠阏氏却伙同汉降将卫律等人“匿单于死，诈挢（矫）单于令，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①。这就引起了手握重兵的左贤王、右谷蠡王等一批匈奴贵族的强烈不满。左贤王、右谷蠡王甚至打算南下投降汉朝，最终则是“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②。这种公开的分裂，愈发削弱了匈奴的实力。因此，壶衍鞮单于即位后，不仅无力主动进攻汉朝，而且“常恐汉兵袭之”③。

在这样的形势下，“和亲”又一次成为汉匈双方的议题。壶衍鞮单于即位不久，便向汉朝的使者委婉表达了“欲和亲”之意，而汉朝内部则对与匈奴和亲一事有不同的认识。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强烈主张趁“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之机出兵，一举“击服”之④。而霍光等人却要求对匈奴采取“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之策⑤。不过，匈奴一方议和亲，是想与汉朝“结兄弟之约”，保持自己与汉朝分庭抗礼的独立地位，而汉朝此时议和亲，却是以匈奴对汉朝称臣为前提，双方立场的差距非常大。因此，尽管汉匈双方都做出了一些友好的姿态，如匈奴释放了关押达 19 年之久的汉使苏武，汉朝于始元五年（前 82 年）罢除了马弩关，部分恢复了与匈奴的贸易往来，但汉匈双方关系的基调，仍是冷淡和敌对的。只是由于双方都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一时期除却一些边界冲突之外，汉匈之间基本保持了相对平稳的态势。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盐铁论·西域》。

⑤《盐铁论·击之》。

在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

（一）加强边境守备

汉武帝去世的当年冬天，匈奴曾突入朔方郡，劫杀吏民。汉朝立刻发兵屯西河备战，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视察防务并耀武于匈奴，但最终未发兵攻击。壶衍鞮单于即位后，虽然有意和亲，但并未停止备战和袭扰汉边的行动，因此，汉朝在始元二年（前 85 年）冬，对北边和西边防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一面征发“习战射士”驻守朔方郡，一面又调集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故吏将”率兵屯田张掖郡。始元六年（前 81 年），为了弥补由于“边塞阔远”而造成的防线疏漏，汉朝又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划出两县之地，增设了金城郡，既加强边塞防务，又有效地防止羌人北上重与匈奴交通。此外，汉朝还在轮台增兵屯驻，在楼兰国的伊循城屯田、设置校尉。通过这些措施，汉朝在西、北边区的重要地区始终保持着严密的防务和优势兵力，从而保障了边境地区的相对安定。史称“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稀）复犯塞。”①

（二）坚持以就地反击为主的作战方针

在强化边界守备的同时，对于匈奴军的袭扰，汉军主要采取就地反击的作战方针，既保卫了边境的安全，又不使战争规模扩大。

元凤元年（前 80 年），匈奴发左右部 2 万骑，四路并入汉边为寇。汉军当即予以反击，“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②。由于担心被俘的瓯脱王引导汉军深入追击，匈奴单于“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次年，又“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③。可见汉军此次边界反击战对匈奴所产生的威慑力并不为小。

元凤三年（前 78 年）春正月，匈奴右贤王、犁汙王又领 4000

---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骑分三队进入日勒（今甘肃永昌西）、屋兰（今甘肃山丹西）、番和（今甘肃永昌），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反击，大破敌军，逃走者仅数百人而已，犁汙王亦被射死，“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①。

以上两个战例表明，汉军的就地反击方针虽然看似被动，但其实效却在某些远征之上。同时，汉军也不是一味死守此种战术，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有时候也主动出击。就在元凤三年，匈奴与乌桓发生冲突，单于发兵2万骑东击乌桓。汉朝闻讯后，立即派度辽将军范明友率2万精骑出辽东，意欲截击匈奴军。这是自武帝征和三年以来汉军第一次出塞远击匈奴。由于匈奴军望风而逃，使得汉军未能全部实现预期的作战目标，但是汉军的行动，仍然给匈奴以极大的震撼，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

二、汉宣帝初年的出击作战

（参见附图8）

经过汉昭帝一朝的苦心经营，至汉宣帝即位之时，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已重新稳固起来，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状况也有所好转，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田野益辟”，“流民稍还”②，“耕桑者益众”③，“百姓益富”④，封建国家也“颇有蓄积”⑤，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形势下，西汉王朝虽然在整体上仍对匈奴继续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但主动进攻所占的比重却是越来越大了。

与西汉王朝的重新繁荣相反，匈奴则是每况愈下。一方面，它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⑤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④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

在东方承受着汉朝和乌桓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威胁也日益严重。在汉朝的着意笼络之下，乌孙对匈奴愈发离心离德，直接威胁到匈奴势力在西域的存在。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生命线”①，匈奴转而用兵西域，攻击乌孙并屯田车师，切断了乌孙与汉朝的交通线。这样，汉匈争夺的重点就又一次转移到西域，从而引发了汉与乌孙联合攻击匈奴的战争。

汉昭帝末年，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上书昭帝，通报了匈奴进犯乌孙的情况，请求汉军支援。“汉养士马，议击匈奴”，但尚未作出断决，恰遇昭帝去世，朝廷只得把汉军出征之事暂时搁置，另派光禄大夫常惠奉命出使乌孙，助其御敌。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乌孙国王及汉公主的求救文书又急急而来，其辞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②对于乌孙国王主动提出与汉合击匈奴，西汉君臣十分高兴，立刻开始进行远征的准备。

这年秋，汉宣帝“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③。令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4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率3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率3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3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3万余骑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余里”，深入匈奴腹地，与乌孙兵合击匈奴。

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汉“五将军师发长安”④。汉军此次远征，直接参战的骑兵多达16万人，估计担任后勤支援的部队亦不会太少，规模之大可与武帝时期的几次大战相比。匈奴为汉军的强大阵容及浩大声势所震慑，根本不敢抗衡争锋，“老弱奔走，

---

① 《毡乡春秋》，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④ 《汉书》卷八《宣帝纪》。

驱畜产远遁逃"①。汉军聚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意图因此落空。

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自张掖出塞，深入匈奴境地1200余里，至蒲离候水一带，斩获敌人700余，获马牛羊万余头。前将军韩增亦出塞1200余里，至乌员、候山，斩首捕虏仅百余人，获马牛羊2000余。蒲类将军赵充国出塞1800余里，原计划与乌孙于蒲类泽（今新疆巴里坤湖）一带会师击匈奴，但由于乌孙军先期到达，汉军未能与之会师，后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卤马牛羊七千余"②。以上三将"皆不至期还"③，未完成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主力决战的任务。

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1600余里抵达鸡秩山地区，"斩首捕虏十九级，获牛马羊百余"，战果少得可怜。出使匈奴的汉使冉弘等人正从此地路过，告诉田广明鸡秩山以西集结着大批匈奴军众，但田广明却畏敌怯战，当即告诫冉弘不可再言鸡秩山西有敌，并不顾属下的力劝，引军后撤避战。

虎牙将军田顺更是等而下之，他率军出塞只走了800里，刚刚到达丹余吾水上便不敢再向前进，掉头回师。为蒙混过关，他居然"诈增卤获"，称自己"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卤马牛羊七万余"④。

相比之下，由汉使常惠监护的乌孙军队倒是战果不小，他们突袭了匈奴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⑤。乌孙人的胜利，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

汉宣帝对汉军的表现极为失望。他虽然没有追究范明友、韩增、赵充国三人的责任，但却将田广明、田顺二人逮捕问罪，逼迫他们自杀。

汉军的无功而还，首先是由于制订作战计划时对敌情了解不多，没有考虑到匈奴退却避战的因素，因此只是笼统地要求出塞2000里，缺乏具体的作战任务。其次，西汉五路大军互不统属，形

---

①②③④⑤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如散沙，各路人马都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落入匈奴的埋伏，因而都不敢按计划进入预定作战地区；一些将领更全无英勇杀敌、报效国家的精神，以全师保命为上，坐失战机，最终造成了劳而无功的局面。

匈奴虽然避免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但经济上的损失却是空前的惨重，仅被汉军和乌孙军队捕获的牲畜就多达80余万，在逃跑的过程中，“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①。正因如此，壶衍鞮单于十分恼恨乌孙。当年冬，他亲率万骑击乌孙，不料在归途中遭遇大雪，积雪在一日之内竟达一丈多深，匈奴“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②。丁零、乌桓、乌孙又乘机从北、东、西三面夹击，共斩杀匈奴数万人，掠走马匹数万，牛羊不计其数。此后，匈奴发生大饥荒，“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实力大为削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军乘机出动3000骑兵分三队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匈奴始终不敢与汉军正面交战。在遭遇上述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匈奴“兹欲乡（向）和亲，而边境少事矣”③。

三、匈奴的分裂、衰弱与呼韩邪单于降汉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立，是为虚闾权渠单于。新单于继承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危局，而他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又使得局势愈发恶化起来。虚闾权渠单于以右大将之女为大阏氏，同时废黜了在壶衍鞮单于时期专宠拥权的颛渠阏氏，这就引起了颛渠阏氏之父、左大且渠的强烈怨恨，不甘寂寞的颛渠阏氏又与右贤王私通，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伺机而发，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就在虚闾权渠单于即位的这一年，匈奴境内发生大饥荒，十分之六七的人民和牲畜死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亡，原为匈奴所征服并迁往左地的西嗕部落数千人以武力杀出一条血路，南下投降汉朝，这表明，匈奴的衰弱正在不断加剧。

虚闾权渠单于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支撑了 9 年，于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病死。就在他尸骨未寒、诸王大臣尚未聚会讨论继位人选之时，颛渠阏氏伙同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拥立右贤王屠耆堂即位，是为握衍朐鞮单于。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握衍朐鞮单于从一即位便实行暴虐的杀伐之治。他将虚闾权渠单于所重用的贵人全部杀死，又将其子弟近亲全部罢免，统以都隆奇和自己的子弟取而代之。于是，匈奴国中很快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况。神爵四年（前 58 年），东边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同时发左地兵 4 万人向握衍朐鞮单于发起进攻。人心丧尽的握衍朐鞮单于很快就兵败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逃亡到右贤王驻地，所领民众尽数归附了呼韩邪单于。几年的纷争，至此算是有了一个结果。

然而，匈奴内部的分裂并没有就此弥合，反而更加公开和扩大，因此，呼韩邪单于的统治也是好景不长。就在他即位的当年冬天，都隆奇和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与呼韩邪单于展开内战。其后，汉宣帝五凤元年（前 57 年），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自立为东犁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这样，匈奴国内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这些单于各有其势力范围。为争夺统治权，他们彼此相互攻击，混战不休，匈奴人民大遭祸殃，“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①。混战的结果，有的单于败降，有的单于自杀，最后是郅支单于击败了呼韩邪单于，占领单于王廷及漠北的广大地区。

呼韩邪战败之后，手下的左伊秩訾王为他出谋划策，“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犹豫未定，召集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诸大臣计议，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左伊秩訾王据理力争，指出匈奴日益削弱，再不是昔日的强国，“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①。呼韩邪单于最终依从了左伊秩訾王的意见，于甘露元年（前53年），率部南下向汉塞靠拢，同时委派他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前往长安城商议归附汉朝事宜。次年，呼韩邪单于又亲至五原塞下，表示愿在来年正月朝见汉天子。

当匈奴五单于纷争混战之际，汉朝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同时也有意加强了招降纳叛的活动。对于呼韩邪单于的主动来降，西汉君臣普遍感到欢欣鼓舞。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在汉军的夹道迎接之下，呼韩邪单于来到甘泉宫，向汉宣帝“赞谒称藩臣”。汉王朝待之以客礼，让呼韩邪单于“位在诸侯王上”，并对他进行册封，颁给黄金铸成的“匈奴单于玺”，既承认他为匈奴族的最高首领，又以法律（不成文法）形式确定其对汉朝中央政权的从属地位，在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之间建立起君臣的名分。此外，汉宣帝还赏赐呼韩邪单于大量的珍贵礼物和钱帛。一个多月之后，呼韩邪单于准备北归匈奴，由于担心自己实力薄弱，不足以抵挡郅支单于的袭击，同时也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和报效之心，他请求允许自己率部“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受降城”，即利用汉朝的边防设施以自卫。汉宣帝同意其请求，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率1.6万名骑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出境，同时又调发数千边郡士兵加以协助。待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杭锦后旗西南）后，韩昌率部留驻塞外，一方面“留卫单于，助诛不服”②，另一方面则对呼韩邪部实行军事监视。为了帮助匈奴民众渡过难关，汉王朝又前后调拨边谷米3.4万斛，以资救济。

黄龙元年（前49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亲自朝见汉宣帝。汉王朝对他“礼赐如初”，并增加了赏赐的数量，汉匈友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加强。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单于上书，称民众困乏，请求援助。元帝“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万斛以给焉”。次年，呼韩邪单于以汉塞附近禽兽已尽，所属部众渐盛、足以自保为由，向负责监护的汉车骑都尉韩昌等人提出了北归单于故廷的请求。韩昌等担心呼韩邪率众“北去后难约束”，遂与呼韩邪登诺水东山设盟立誓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详。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① 随后，呼韩邪单于“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②。

建昭三年(前 36 年)，郅支单于被汉军杀于西域。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既死，政敌清除，后患不复存在；惧者，以汉朝强大，己身孤弱，今后如不慎得罪汉朝，则不免落个像郅支一样的下场。为确保自身的安全，他决心进一步加强与汉朝的友好关系。竟宁元年(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汉天子，“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③。汉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与匈奴实行和亲并特下诏，改元“竟宁”以示庆祝。呼韩邪单于欢喜不已，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④。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更进一步得到发展。

呼韩邪单于的降汉及其最终与汉朝实现新形式的和亲，决不仅仅是他图谋自保的一种策略，而汉王朝对呼韩邪单于的优礼有加，也不是为暂缓边界冲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件事情的发生与发展，是汉匈双方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必然结果，是汉匈广大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意志的胜利。汉匈双方持续了长达 150 多年的敌对状况的结束，对于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呼韩邪单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应民心，在汉匈关系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⑤。

---

①②③④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⑤ 参见林幹：《试论呼韩邪单于稽侯狦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蒙古史文稿》1976 年第 1 期。

四、郅支单于的覆灭

郅支骨都侯单于乃呼韩邪单于之兄，原为匈奴左贤王，名呼屠吾斯。汉宣帝五凤二年（前 56 年），呼屠吾斯自立为单于。五凤四年夏，他击杀闰振单于，并打败呼韩邪单于，占领了匈奴单于廷。

呼韩邪单于兵败南下后，郅支单于十分关注其动向。他不愿意看到西汉王朝全力保护呼韩邪单于的局面出现，也不想开罪汉朝而使之把矛头完全对准自己。甘露元年（前 53 年），当呼韩邪单于遣子朝见汉宣帝后，郅支单于也派他的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前往汉廷。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朝见汉宣帝，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廷“遇之甚厚”。第二年，两单于又“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①。对于郅支单于的友好姿态，汉朝是表示欢迎的。应该说，对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两人，汉王朝是存有兼容并拢之意的。到黄龙元年（前 49 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朝见汉宣帝之后，郅支单于一方面感到在东方已无隙可乘，自己也没有力量统一匈奴，另一方面又看到西域城郭诸国皆尊事汉朝，担心彻底失去这个大后方，便不再和汉朝虚与委蛇，转而领兵向西方发展。经过一番征战，他先是攻杀匈奴的伊利目单于，接着又连破乌孙、乌揭、坚昆、丁零② 等国，这样积小胜为大胜，遂留居坚昆。随着势力的逐渐强盛，郅支单于对汉朝的态度也日益恶化起来。他既恼恨汉朝扶持呼韩邪而不帮助自己，又觉得自己距离西汉遥远，汉朝对他已无可奈何。因此在初元四年（前 45 年）遣使向汉朝索还侍子。汉元帝遣卫司马谷吉为使，护送郅支单于子回国。郅支单于竟将谷吉杀死，并极力隐瞒消息。正在这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② 丁零当时分为东、西两部，东部游牧于今贝加尔湖南，西部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郅支单于征服之丁零当指西丁零。

时，远在西方的康居国（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吉尔吉斯斯坦之锡尔河中下游地区）派人前来联络郅支单于，欲合力进攻乌孙。郅支单于立刻领兵西进，沿途因天寒地冻，人死马亡，抵达康居时，5万多的兵马只剩下3000余人，元气大伤。后得康居“贵人”的全力扶助，他的势力又逐渐恢复过来，最后不但把乌孙打败，而且还喧宾夺主，在康居国中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并强迫阖苏（即奄蔡）、大宛诸国常年向他贡献财物。一时之间，“郅支单于威名远闻”①，俨然已是西域的霸主。

郅支单于称霸西域，严重影响到汉朝的声威及其在西域的统治。汉朝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感到郅支“必为西域患”，决心“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②攻击之。建昭三年（前36年）冬，他先斩后奏，矫制调发西域城郭诸国的军队及汉屯田吏士共4万人马进击郅支。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虽不赞同陈汤的做法，但最终还是迫于形势，与陈汤引军分行。

郅支单于西入康居之后，一直以郅支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江布尔）为据点，此地虽然距离汉界遥远，但却缺乏坚固的城池和足够的强弓弩矢，一旦遭到汉军的包围，既难以守城自保，又无处可逃。陈汤针对郅支单于的这个致命弱点，将汉军分为六校两路，一路沿西域南道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而向郅支城进发，一路则从西域北道入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过乌孙（今伊犁河流域），涉康居，至阗池（今伊塞克湖）西，计划两路人马会师郅支城下，对敌形成夹攻之势。

由于得到了痛恨郅支单于的康居贵人的帮助，汉军顺利地到达郅支城附近，并很快完成对匈奴军的包围。起初，郅支单于还气焰嚣张，“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向汉军大肆示威。城上的匈奴兵还向汉军挑衅说：“斗来!”百余名匈奴骑兵还出城

---

①②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冲击汉营，见汉“营皆张弩持满指之”，又退回去。陈汤遂即令汉军神射手射击城门的匈奴步、骑兵，匈奴军士全部撤回城中。汉军一鼓作气攻至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①，将郅支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郅支单于听说汉军来攻，起初曾打算弃城而逃，但因担心痛恨自己的康居国充当汉军内应，又听说乌孙诸国已发兵助汉，感到无处可逃。所以他带兵出城后又折转回城，对部下说：“汉兵远来，不能久攻”②，命令部下坚守。

郅支城共分两重，内层为土城，外层为木城，从木城往外射击，杀伤力颇大。汉军放火焚烧木城，数百名匈奴骑兵企图冲出木城突围，被汉军射杀。郅支单于亲自披甲登上城楼，与数十名阏氏夫人一起引弓射击。汉军发箭还击，诸夫人多中箭死，郅支单于也因鼻子中箭而逃入宫室。夜半时分，木城被烧毁，汉军攻入土城。这时，康居万余骑也已赶来，与汉军一起攻城。战斗逐步向内宫发展。几近天亮，郅支单于伤重而死，阏氏、太子、名王以下 1518 人被杀，145 人被俘，残部千余人向汉军投降。这场攻城战，彻底消灭郅支单于所部人马，铲除威胁汉朝在西域统治的祸根，以辉煌的胜利结束了西汉之世对匈奴的战争。

①②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第七章　西汉中期开拓边疆的斗争

从汉武帝经昭帝至宣帝时，是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西汉政府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积极从事边疆的拓展与开发。除了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战，从其手中夺取河南与漠南之地，还积极通西域、征楼兰、伐大宛、联乌孙、争车师；平西羌；通西南夷；统一东瓯、闽越、南越；并与朝鲜卫氏政权作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将早已同中原地区存在广泛联系的许多边疆地区置于汉王朝的管辖与治理之下，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秦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巩固。这不仅进一步保障了边疆地区的安定与统一，加强了汉、匈奴、西域各族、越族以及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民族的融合，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中外交通的发展，促进中外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经营西域

一、西域概况

“西域”一词，始见于西汉人的记载①。但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我国先民，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与西域地区存在着交往。不过，至少在汉武帝以前，各个中原王朝都未与西域建立正式的、官方的联系。

---

① 参阅林剑鸣：《秦汉史》上册，第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西汉人所说的“西域”，今人一般认为有狭、广两种含义。狭义的西域，据《汉书·西域传》所称，是“南北有大山，中夹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地理范围，大体上就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今新疆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泛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的中亚、西亚、印度半岛乃至更远的地区。

西域地区以干旱荒漠为主要景观特征。由于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地表结构及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的影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低温干燥，少雨多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此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与压力。然而，这里又有众多的山坡草原、森林以及由发源于高山冰雪区的内陆河流所形成的大片绿洲沃野，从而为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提供了便利。

至迟在距今 1 万年左右，西域便有了人类的活动。在新疆帕米尔地区库尔干县东南 34 公里的吉日尕勒遗址中，发现了早期人类用火的遗迹①。在此后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里存在着特征非常鲜明的考古学文化②。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西汉初年，这里已经发展起几十个社会形态及经济类型各异的国家。东汉人荀悦在其《汉纪》一书中，将这些国家区分为“大国”、“次大国”和“小国”三种类型，而班固则将它们分为“行国”和“居国”两种：在山谷的居民随畜逐水草而流动，是谓“行国”；而在沙漠里分散的绿洲上生息的人民则有城郭田畜，是为“居国”。由于“居国”的数量多，地位重要，故而《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统称“居国”和“行国”为城郭诸国。

---

① 《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新疆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② 《新疆考古三十年》，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在汉武帝之前，原有36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今人黄文弼先生曾依据地形，将《汉书·西域传》中所述的53个国家分为五组：

塔里木盆地组。包括楼兰（后改名鄯善）、且末、精绝、扜弥（扜罙、拘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温宿、姑墨、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17国。这17国皆为“居国”，分处汉通西域的南北两道的要冲。

昆仑山谷组。包括婼羌、小宛、戎卢、渠勒、西夜、蒲犁、依耐、无雷、乌秅、难兜10国。这10国皆散布于昆仑山谷中，除难兜之外，其余皆是随畜逐水草的“行国”。

葱岭山谷组。帕米尔高原有一子午山脉，其上生葱，我国地理书称为葱岭，分布于葱岭山谷中者，有捐毒、休循、桃槐、大宛4国。大宛因在葱岭之西，通常不计在内。

天山山谷组。包括尉头、乌孙、乌贪訾离、劫国、单桓、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狐胡、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王国、车师后城长国、山国18国。

葱岭以西组。包括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6国。①

除上述诸国之外，在安息以东、兴都库什山西北有大夏国，康居属下有奄蔡国，大夏以南有身（yān 烟）毒国等。在汉代的史籍中，它们不属于狭义的“西域”范围，而是被列入广义的“西域”范围。

西域地区诸国林立，人种复杂。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各民族的交辏之地，除去汉族以外，尚有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大体说来，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里吉

---

① 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收入其《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思原野，因而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即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山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多是印欧种人，吐鲁番盆地则有较多的汉族人①。

二、张骞通西域

西汉初年，西域已经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在先后征服了乌孙、楼兰、呼揭等国之后，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危须（在今新疆焉耆县东100里）、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对西域各国、各族实行高压统治，“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②。

西汉王朝注意西域，始于汉武帝时，而其最初的目的，是寻找被匈奴逼迫西迁的月氏人。月氏人原在河西走廊游牧，当其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几万，匈奴等族都要送质子于月氏以示顺服。秦朝末年，月氏因不能抵御匈奴的进攻而放弃河西之地向西迁徙。但曾在月氏为质子的匈奴冒顿单于却不肯轻易罢战，仍对月氏人追杀不舍。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在写给汉文帝的信件中，冒顿单于声称他已经“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③。实际上他是把月氏人赶到了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期(前174～前161年)，匈奴又连破月氏，月氏王的头盖骨都成了老上单于的“饮器”④。月氏人被迫继续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他们对匈奴人恨之入骨。

汉武帝从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口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刻产生了联合月氏共击匈奴的设想。然而，要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首先与月氏人取得联系，他于是下诏招募出使西域之人。郎官张骞挺身而出，于建元二年（前139年）率领100多名随从，踏

① 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②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上了艰辛的路程。

张骞一行自陇西出塞不久，就成为匈奴人的俘虏，被送至远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一带的单于王廷。单于听说张骞等人欲往月氏，便责问道："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①？于是，张骞等人便被扣留下来。10余年转瞬而过，张骞虽然已在匈奴中娶妻、生子，但始终"持汉节不失"②，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后来，张骞终于乘隙逃脱，西行数十日，越过葱岭，来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又经过康居，终于在妫水（即乌浒水，今土库曼斯坦之阿姆河）北岸看到了月氏人的旗帜。

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找到月氏人，但他在月氏及其统领下的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逗留了一年多，"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③。原来此时的月氏人早已满足于目前安居乐业的生活，无意报复匈奴，又认为西汉太过遥远，因而对两国联合进攻匈奴一事毫无兴趣。张骞见此，只好返回。归途中，他有意沿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东行，意在躲避匈奴的截留，不料最后还是被匈奴拦劫扣留。一年以后，匈奴军臣单于死，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回了汉朝，这时已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当初和他一道出使的随从，只剩下堂邑父一人和他同时回到长安。

张骞此次出使西域，前后经历了13年的时间，他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和对祖国的耿耿忠心，无论对当代还是后代的人们，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他虽然没有完成与月氏结盟的具体使命，但毕竟揭开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回国之后，张骞将自己在匈奴、西域的亲身经历及见闻向汉武帝做了详细汇报，更加激发了汉武帝经营西域的雄心。此后进行的河西之战、通西南夷等，都是根据张骞的汇报作出的战略决策。

漠北会战之后，匈奴大幅度地向西北退却，控制西域日益成为汉朝进一步打击匈奴的关键所在。而"西塞"的修筑（详后），又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元狩四年（前119年），张

---

①②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骞又向汉武帝提出了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新建议。

乌孙本是与月氏同处在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后因不堪忍受月氏人的压迫而投降了匈奴。当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伊犁河流域之后，乌孙首领昆莫请求匈奴助报旧怨，西向攻破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以后，乌孙又与匈奴反目，“不肯复朝事匈奴”①。匈奴曾发兵攻打乌孙，但战不能胜，双方保持着不战不和的微妙关系。张骞认为，“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②。

张骞试图以故土、财物和美女来打动乌孙国王，想法未免失之于简单。但他的“断匈奴右臂”策略，却是形势所急需；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招徕西域诸国为汉朝“外臣”的设想，对早就有意耀武扬威于西域的汉武帝来说，真是正中下怀。所以，汉武帝很快就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着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队伍，携带着万头牛羊和数千巨万的金币绢帛等物，浩浩荡荡地向西出发了。

张骞到达乌孙之时，正值乌孙国内政局动荡、三派势力分立的非常时期。所以，尽管乌孙国王欣然接受了张骞代表汉武帝所赠予的财物，但对张骞要求乌孙与汉结为兄弟之国共击匈奴的建议却不置可否，加上乌孙距汉遥远，不知汉朝的大小强弱，其国地近匈奴且服属已久，大臣、贵族普遍不愿举国远徙并与匈奴开战。这样，汉朝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设想便暂告落空。

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收获仍然很大。乌孙国王在张骞回国时，特派了专使护送，并献良马数十匹以报谢汉武帝。这数十名乌孙使者亲眼目睹了汉朝的地广人众与物产富饶，回国后将其见闻报告乌孙国王，“其国后乃益重汉”③，为日后乌孙与汉朝的通婚结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同张骞出使的许多“持节

---

①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副使”奉命去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广泛传播了汉朝文明的信息。这些国家大多愿意与汉通使往来，有的还派遣使者随同汉使一同来至长安，从而开始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正式往来，所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被人称为“凿空”，其丰功伟绩，永远令人景仰。

三、楼兰之战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自乌孙返回。乌孙拒绝与汉结盟，使得汉武帝深感失望和不快，但这种情况也使汉武帝明了，要使乌孙成为汉朝的盟国，必须以汉朝在西域强有力的存在为基础。汉武帝感到，当务之急，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亦即西域地区的东部，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亲附汉朝的据点。

元封元年（前110年）四月，汉武帝举行了象征帝王“功成治定”的封禅大典。在此前发布的一则诏书中，武帝以“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之语来概括当时的边疆形势。事实上，汉与北夷即匈奴的战争虽未结束，但汉朝早已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真正的问题，是西蛮即西域诸国还不肯承认并接受汉朝的统治。从诏书当中不难看出，汉武帝已然下定了以武力迫使西域诸国改变态度的决心。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汉武帝此时也基本拟就了向西域推进的策略，即先派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如此反复循环，步步推进。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反击匈奴战略的继承①。所以，攻打西域已是如箭在弦，势在必发，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

元封三年（前108年），酝酿已久的对西域的战争终于爆发，汉朝首次用兵的对象，是楼兰和姑师。

---

① 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楼兰是西域的一个小型城郭国家。据今人研究，其国人属于印欧人种，方言与焉耆—龟兹语相近。据《汉书·西域传》载，在西汉末年，楼兰有户1570，人口1.41万，兵卒2912人，“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姑师又名车师，人种、语言与楼兰相同，人口约在万人左右，兵卒3000左右。这样两个地狭人寡的小国，何以会成为汉朝动武的对象呢？

楼兰和姑师都是“临盐泽”之国，盐泽即今罗布泊。汉武帝时，楼兰国都楼兰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孔雀河的入海处，正扼西域门户。这里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姑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姑师的国都交河城，即建在今吐鲁番西北，这里南通楼兰、西通焉耆、西北通乌孙，东北通匈奴，东南通敦煌，是西域重要的交通要冲。自汉初以来，楼兰便是匈奴的属国，而姑师则因地近匈奴，更是长期处在匈奴的直接控制之下。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汉与西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①。地当冲要的楼兰、姑师二国，既苦于供应汉使，又受制于匈奴，所以经常发生劫杀汉使之事。此外，两国又屡屡为匈奴充当耳目，为之提供汉使活动的情报。这样，楼兰和姑师便成为汉通西域的两个直接的障碍，于是，在保护西行使者的名义之下，汉军开始了对楼兰和姑师的进攻。

元封三年（前108年）冬十二月，从票侯赵破奴率领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人出征。汉使王恢曾遭楼兰劫掠，熟悉楼兰的情况，因而被任命为赵破奴的副手。赵破奴率轻骑700先行，突袭楼兰，擒获了楼兰王。然后，乘胜挥师北上，顺利地攻破了姑师。

数万大军攻击两个弹丸小国，犹如以石击卵，取胜乃是当然之事。楼兰在战后不久即向汉朝贡献礼品，并将一名王子送至长安为质。匈奴闻讯，亦发兵击楼兰，于是楼兰王又将一子送往匈奴为人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楼兰国一直在西汉和匈奴之间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可见元封三年的战事并未彻底征服楼兰。不过，这次战役毕竟迫使楼兰改变了公然与汉为敌的状况，消除了在通往西域之入口处的一个直接障碍。据《汉书·西域传》载，战役结束后，汉军曾有“暴兵威”之举，大肆宣扬胜利，这或许可以反映出，汉武帝发动楼兰之役的主要目的，是要扩大汉朝在西域的影响，“以动乌孙、大宛之属”①。

四、伐大宛

大宛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是一个由希腊后裔所建立的国家。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一说为俱战提），辖有大小属邑70多个，有户6万，人口30万，军队6万，是个农牧二业兴旺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产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康居，西南邻月氏、大夏，东北临乌孙，东经帕米尔的特洛克（Terek）山口可达疏勒，在当时东西方的交通线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于元光六年（前129年）至元朔元年（前128年）之间访问过大宛。《汉书·张骞传》说，“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所以大宛王对张骞的到来非常欢迎。当张骞离别时，大宛王“为发译道”，帮助他到达康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其副手又至大宛，而大宛则“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可是，在太初年间，汉武帝却接连向大宛用起兵来。

汉武帝用兵大宛的原因，古往今来，其说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仅以求汗血马来解释。汗血马是大宛特产的良马，据说此马“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②。张骞曾在武帝面前极言此马之好，于是武帝便委派使者“持千金及金马”去换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语。

买。大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①。汉使发怒而口出恶言，大宛王遂令其东部的郁成王攻杀汉使并劫其财物。武帝一怒之下，便下令攻伐大宛。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汉武帝伐大宛的目的，是为改良马政②。还有人提出了“求天马以升天”说③。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与步骤来考察，汉军开往大宛一带，实是多年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决非缘于汉武帝个人一时的物欲④。

前已述及，汉武帝开边的大致程序是：先派军队在攻击的方向占领据点，再在据点周围地区修筑城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远的区域扩大声威。楼兰之役后，汉朝的亭障自酒泉延伸到了玉门，又“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汉朝的声威远播，许多国家都遣使来汉。然而由于匈奴当时在西域的势力强大，因此许多小国仍不敢背弃匈奴而全然听命于汉；乌孙、大宛等大国，由于距离西汉遥远，所以也不热心与汉朝建立密切的关系。《汉书·张骞传》云，“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武帝欲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愿望还远未实现。这样，军事上就出现了进一步向西方进发的需求。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曾下诏征求可立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令各郡国“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⑤。这里所说的“绝国”，颜师古解释为“绝远之国”，当是指乌孙、大宛、大夏之属。所以，从这个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武帝已在积极筹划对西域的新的战争，目标主要集中在上述三国。由于后来乌孙接受了汉朝的同盟之请，而大夏又过于遥远，因此，即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 余嘉锡：《汉武帝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④ 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

便没有汗血马的吸引，对大宛也不能免于一战。

太初元年（前 104 年）秋八月，汉朝开始了向大宛的进军。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①，委派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汉军统帅，期望他能攻破大宛的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乌勒塔白）而取得宝马。

战役的第一阶段，汉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汉武帝轻信浞野侯姚定汉的妄言，以为“兵不过三千人”，即可“尽虏破宛矣”②。于是只给了李广利 6000 名属国骑兵和数万未经严格训练的“郡国恶少年”。这支队伍出师后，首先遇到来自沿途各国的抵抗。这些当道小国闻知汉军将至，纷纷闭城坚守，拒绝为汉军提供给养。李广利无奈，只好发兵攻打，有的一攻即破，汉军可以获得一些饮食补充；有的围攻数日而不克，汉军就只能罢战而走。这样一路且打且走，当行至大宛东部的郁成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奥希）时，汉军已是仅剩几千人的疲惫之师，而大宛军以逸待劳，据城坚守，“所杀伤甚众”③。李广利与左右商议道：“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④遂撤军东还。太初二年（前 103 年）夏，李广利撤至敦煌，士卒仅剩下十分之一二。李广利上书武帝，称西去大宛道路遥远，汉军给养匮乏，以至“士卒不患战而患饥”，加上兵力不足，因而请求汉武帝暂且罢兵，待重新集结大军后再征大宛。汉武帝见书大怒，急遣使者至玉门关宣诏：“军有敢入，斩之！”⑤李广利惊恐而不敢再言，只好屯兵玉门关外待命。

就在这一年的夏季，汉将赵破奴所率 2 万士卒被匈奴歼灭于浚稽山，汉朝公卿都建议汉武帝放弃伐大宛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对付匈奴。但汉武帝则另有主张，他认为，大宛不过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如果连它都不能降服，“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⑥。为此，他再度调兵遣将，重新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

---

①③④⑤⑥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太初三年（前 102 年），李广利率领一支由释放的囚徒、恶少年及边郡骑兵组成的 6 万人的大军二次出征，一支由 10 万头牛、3 万匹马及杂畜万余组成的后勤部队驮运军需物资随后，另外还有大批“私负从者”随军出征。同时，汉武帝又征发甲卒 18 万人屯守酒泉、张掖一带，以为远征军的后援。

由于此次汉军兵威强盛，沿途各小国一反上次所为，莫不望风而开门出迎，供给汉军食物。行至轮台（今新疆轮台），其国闭门不迎，李广利令部下攻打，最终屠城而去。自此再向西行，无人胆敢抗拒和骚扰。李广利的 3 万精锐部队“平行至宛城”①，很快就兵临贵山城下。

出征之前，汉军已知大宛国都“城中无井”，用水皆是汲取城外河流之水，于是特地派遣一批水工随军，计划在作战时首先将河水改道，断绝城中水源，然后围而攻之。到达贵山城后，李广利依计而行，然后又“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②，突入贵山城之外城。大宛贵族见形势危急，力图自保，遂杀国王毋寡并向汉军求和，表示愿意尽出其汗血宝马，任由汉军挑选。李广利此时“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③，又担心康居的援军乘汉军疲敝而发动进攻，便接受了大宛贵族的请求。

停战之后，大宛除了供给汉军大量的物资和食物之外，又“出其马，令汉自择之”④。汉军中善相马者挑选了“善马”数十匹，“中马”3000 余匹。李广利又扶立亲善汉朝的大宛贵人昧蔡为大宛国王，与之签订盟约，然后引军回国。其时已是太初四年（前 101 年）的春天。

当李广利围攻贵山城时，校尉王申生率千余士卒攻打郁成城，结果全军败还。李广利又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了郁成城，郁成王出逃，上官桀穷追不舍，直至康居才得而杀之，为汉朝报了以往屡为其人所难之仇。汉伐大宛的战争，至此结束。

汉军此番大胜，首先得益于兵力充足，后勤供应无虞。其次，

---

①②③④《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则是缘于战术运用得当。汉军主力不在沿途纠缠，长驱直扑贵山城，即节省了时间，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围城之前，又抓住城中无井的弱点，首先切断敌人的水源，令其不战自乱，从而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大宛西去长安万余里，其间旷漠、大山阻隔，人迹罕至，无论士卒征战还是饷糈供给，皆为困苦艰难之事。此战前后延续了 4 年之久，"天下奉其役连年"①，汉朝"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②而万里用兵，致使"天下骚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确是劳民伤财。然而，大宛战役又不全是汉武帝意气用事、好大喜功的产物。从汉朝经营西域以打击匈奴的大局来看，大宛战役具有确立汉朝在西域之优势地位的积极作用。《汉书・西域传》序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从伐大宛获胜开始，汉朝逐步掌握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对西域诸国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五、联乌孙

前已述及，结盟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总体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由于种种原因，乌孙对与汉朝结为同盟，一直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

元封三年（前 108 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楼兰战役的进行、汉长城的西延，汉朝的兵威远播西方，这就使对汉朝早就抱有好感的乌孙国王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汉朝的强盛，因而就愈发主动地与汉朝交往。匈奴了解到这个动态后，"怒欲击之"，企图凭借武力强行阻断乌孙与汉朝的联系。但是，匈奴的军事威胁，

---

①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

②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却反而促使乌孙国王坚定了与汉朝结盟的决心。他派出使者，向汉武帝进献宝马，并请求与汉和亲，“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①。

对于乌孙王的转变，汉武帝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欢迎。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朝接受乌孙国王昆莫良马千匹的聘礼，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昆莫为妻。汉武帝特赐细君以“乘舆服御物”，还为她“备官属宦者侍御数百人”。这样，西域大国乌孙终于与西汉政府建立起了同盟关系。

可是，汉与乌孙的结盟，起初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基础很不稳固，双方对同盟关系的期待也各不相同。汉朝是希望通过结盟与乌孙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对匈奴形成左右夹击之势；而乌孙则想通过和亲，借助汉朝的力量来威慑匈奴，使其不敢对乌孙轻举妄动。就在细君出嫁不久，匈奴“亦遣女妻昆莫”，对乌孙国王进行拉拢，而乌孙国王则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尽量在汉与匈奴之间保持中立的企图。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时，汉武帝曾派专使至乌孙，请乌孙王“大发兵并力击宛”，配合汉军作战，但乌孙王却只象征性地派出2000骑兵，而且还采取了“持两端，不肯前”的策略②。

显而易见，细君的远嫁并没有使汉朝在西域获得一个坚定的盟友。究其原因，仍然与匈奴在西域势力的相对强大以及汉朝在那里的影响力不够有关。对此，汉武帝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一方面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方面又不断采取措施，以期进一步密切与乌孙的关系。当昆莫以年老为由欲使细君改嫁其孙岑陬时，汉武帝便指示细君不得拒绝，要她遵从乌孙风俗，下嫁岑陬为妻。细君死后，汉武帝又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远嫁岑陬，充分表现了大国之君的风度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征和四年（前89年），有司奏请屯田轮台，奏折陈述此举意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义时有“威西国，辅乌孙”① 一语，从中可知汉朝在西域的既定政策。但此时的汉武帝已决意改弦更张，他颁布“轮台诏令”，宣布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军而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西汉王朝基本国策的转变，使得乌孙对于汉朝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轮台诏令颁布后的十几年间，史书中没有关于汉与乌孙交往的记载，这或许反映出两国关系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的史实。

汉昭帝时期，汉朝仍对匈奴采取以积极防御为主的策略，这就大大减缓了匈奴的军事压力，使其乘机在西域重新活跃起来。元凤年间（前80～前75年），匈奴以4000骑兵屯田车师，并与车师一起发兵攻击乌孙。因此，乌孙君臣普遍感受到西汉这个盟友的重要性，在昭帝末年使解忧公主上书汉廷求救。汉光禄大夫常惠奉命出使乌孙，商议两国协同作战事宜，因适逢昭帝去世，大军未发。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解忧公主与乌孙王又分别遣使告急，表示愿发5万精骑与汉组成联军，共击匈奴。宣帝一面部署汉五将军并出，一面令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指挥乌孙骑兵从西方袭击了匈奴右谷蠡王廷，大获胜利。

战后，常惠征尘未洗，又奉命出使乌孙，以汉王朝的名义，“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②。地节元年（前69年），常惠自乌孙经龟兹返内地，他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授意下，自行调发龟兹以东各小国合兵2万余人，调乌孙兵7000人，从三面围攻龟兹。这是继本始三年击匈奴之后，汉与乌孙联合进行的又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它标志着汉与乌孙同盟关系的日益成熟和稳固。

随着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扩大，特别是在西域都护设置以后，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愈发密切起来。作为汉朝在西域最高地方长官的西域都护，负责督察乌孙等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③，对乌孙实行特殊的政治统治。这种统治表现在，乌孙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佩汉王朝所颁发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③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序。

的印绶；乌孙国的王位继承与废立，亦需要得到汉王朝的认可；同时，对乌孙国内重大的政治事项，汉王朝均有直接处理的权力和义务。据《汉书·西域传》载，汉宣帝后期，乌孙国发生严重内哄，乌就屠与元贵靡兄弟失和，争权夺位，汉朝遂以武力相威胁，将乌孙国一分为二，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立具有匈奴血统的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同时“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①。由此可知，这时的乌孙国已经是西汉王朝的属国之一，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成为西汉王朝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六、争车师

汉伐大宛以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结好，汉朝在西域的势力迅速发展。一向视西域为外库的匈奴对此十分不安，愈发加紧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汉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由于车师（即姑师）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所以汉与匈奴在这里曾经反复较量，史称“五争车师”。

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曾率汉军击破车师，但当时西域尚未正式与汉交通，汉军在得胜之后即撤回，车师依然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至天汉二年（前99年），汉将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为配合他们的行动，汉武帝命匈奴降者开陵侯率楼兰之兵击车师。匈奴闻讯后，发右贤王数万骑兵驰救车师，汉军作战不利而退兵。此为一争车师，汉未得手。

征和三年（前90年），汉朝三路大军北进，其中重合侯莽通所部4万骑兵自酒泉出塞，借道车师北境而抵达天山地区。为防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 王灿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止车师兵截击莽通军或切断汉军退路，汉武帝又命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马向车师进击，“车师王降服，臣属汉”①。是为二争车师，汉初次得手。

车师乃西域门户，对匈奴控制西域及其自身安全至为重要，因而它决不肯轻易放弃这个战略要地。汉昭帝末年，匈奴又遣4000骑兵屯田车师，并联合车师兵多次侵犯乌孙，结果招来了汉与乌孙的联合反击。本始二年，汉与乌孙发兵夹击匈奴，屯驻车师的匈奴军惊恐而逃，车师复通于汉。是为三争车师。

三争车师的头两次，都只是某一重大战役中的局部战斗，第三次争车师，汉军甚至都没有到达这一地区。因此，匈奴在车师的力量并未遭受实质性的打击，汉军的军事胜利，往往会随着匈奴骑兵的去而复来而丧失。国小兵弱的车师，附属匈奴日久，对汉朝始终是离心离德。就在三争车师后不久，车师的乌贵王便“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②。车师再一次成为匈奴控制西域的据点。

事实告诉汉朝统治者，如欲在西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长期驻兵车师。然而，汉朝派兵屯守车师，这在当时却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兵力过少则无济于事，而屯兵较多则粮饷供应无法保障，因为由内地向西域运粮绝无可能，依靠西域本地的粮食也不可靠。为解决这个难题，汉政府采取了屯田筹粮的措施。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率领免刑的罪人在渠犁开始屯田，准备再次进攻车师。秋收时节，汉军积谷甚多，郑吉等遂调发西域兵1万余人及汉屯田卒1500人击车师。汉军攻破车师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车师王住其北石城中，故而侥幸逃脱。因随军所带粮草耗尽，郑吉等暂且罢兵，回归渠犁。秋收完毕，郑吉又调发大军进攻车师。车师王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③，车师王便攻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杀其王，略其民，以此作为礼物投降汉朝。匈奴闻知车师降汉，发

---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兵前来征讨。郑吉引军阻击，“匈奴不敢前”。郑吉留下少数兵士护卫车师王，自己率领大军回渠犁。车师王担心匈奴的报复，轻骑逃亡乌孙。这时郑吉接到诏令，要他“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①。于是郑吉将车师王的妻子送往长安，又命300吏卒屯田车师。是为四争车师，郑吉以军功晋升为卫司马，为护鄯善以西使者，护南道。

匈奴失去了车师，犹如被斩断了右臂，单于及其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②。从地节二年（前68年）至元康四年（前62年），匈奴频频发兵进攻车师。为抵御匈奴的进攻，郑吉将在渠犁屯田的全部屯田卒共1500人调往车师与匈奴激战。由于匈奴兵众而汉军人少，战局逐渐变得对汉军不利，郑吉等曾被匈奴军包围在城中，匈奴将领在城下明确通知郑吉：“单于必争此地，（汉）不可田也。”③后来匈奴自动解围，但数千匈奴骑兵经常往来于城下，汉军无可奈何。郑吉上书朝廷，请求增兵守卫车师。汉廷集议后认为车师距汉太过遥远，派兵戍守耗损巨大，决定暂罢车师屯田。于是，在长罗侯常惠所率内地骑兵的掩护下，郑吉由车师撤回渠犁，同时又将车师国人迁往渠犁，立故车师太子军宿为新车师国，空车师之地以与匈奴。这样，在第五次争夺车师的斗争中，汉军又暂告失败。

然而，匈奴在车师一地的再度得手，并未改变其日益衰落的颓势。两年之后，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新立的握衍朐鞮单于不和，率数万骑向汉朝投降。日逐王的领地原处匈奴右部的南边缘，以往匈奴控制西域，主要即依靠其人马，所以日逐王的降汉，不仅使汉朝唾手而得车师，而且也使匈奴无法在西域继续存身，原先由日逐王所设专门管理西域事务的匈奴僮仆都尉遂告撤销，“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④。而汉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④《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序。

朝的西域最高地方长官——西域都护则于神爵三年（前59年）正式建府，郑吉成为第一任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从此完全确立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自武帝通西域起70余年来，西汉王朝拓疆西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终于完全实现。

第二节 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一、西南地区概况

我国的西南地区，主要包括秦岭山地、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山地、川西南山地、滇中高原和滇西山地、贵州高原大部及鄂西、湘西北山地。这一广阔地带正处在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间的部分，由于三大板块的相对运动，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一系列深大断裂和断裂带，形成极为复杂而多样的地貌类型，区域内部在资源、气候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西南地区的生物资源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许多地方宜耕宜牧，生产条件较好，但由于境内盆地、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的交错分布，不仅造成了本地区内部交往的不便，也使得本地区与外部的联系十分困难。这种地理上的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状况，是造成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以及民族众多而又独立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汉时期，在今成都西南及西北、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的广大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经济类型各异的民族。当时的中原王朝，将他们统称为“西南夷”。根据今人的研究，西南夷的族属，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蜀郡（成都）西部至金沙江两岸的偏北地区，是冉駹、筰都、邛都、滇国、昆明、僰等族的活动范围，他们是南迁羌人后裔的不同分支，统属于羌语

①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诸族；在南北盘江流域的偏南地区，生活着夜郎、句町、漏卧、进桑等族，他们是西移越人的后裔，统属于越语诸族；澜沧江以西的偏西地区，主要是哀牢部族，他们和北上的孟高棉人有着较多的渊源关系。就经济类型而言，西南夷也可分为三种：夜郎、滇、邛都等是农业民族，冉駹、筰都等则是半农半牧民族，巂唐、昆明等区域还是游牧民族。①

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开始，西南地区就与中原王朝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进入战国时代，秦、楚等国积极开拓疆土，即与西南的一些民族直接发生了关系。如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灭蜀、灭巴，“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②。周赧王三十年（前285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其江南地”③，南渡金沙江，占领今云南宁蒗、丽江一带，把秦国的统治势力深入到西南的腹地。在秦灭巴、蜀之后，楚威王也“使将军庄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④。秦统一中国后，更进一步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⑤，“邛、筰、冉駹，……秦时尝通为郡县”⑥，从而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中。

二、唐蒙通夜郎

嬴秦的速亡，打断了西南夷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统治

① 参见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第六章，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

③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⑤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⑥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下生存发展的进程。西汉开国之后，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加上穷于应付来自匈奴的威胁，因而无暇经营西南。虽然民间的往来未曾中断，但中央政府却是“皆弃此国”①，除了高后六年（前182年）时分别于僰道（今四川宜宾）和青衣（今四川雅安）两地置关市管理民间贸易之外，基本上停止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对于西南夷诸族的分布及生活状况等，也是知之甚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才开始改变。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劝诫南越王归顺汉廷。他在南越吃到了蜀郡特产的枸酱，由此而知有一条自蜀郡经由夜郎而通南粤的商路。回到长安以后，唐蒙又通过蜀地商人，进一步了解到这条商路的详情，于是便上书汉武帝，建议朝廷开通夜郎道并在那里设郡置吏，然后征发士卒，沿牂牁江（今北盘江）而下，出奇制胜，征服南越国。

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唐蒙的建议。随后，唐蒙便以中郎将之职征发巴蜀吏卒千人，转漕万余人，自巴符关（今四川合江）进入夜郎地区。当时执政的夜郎侯多同初见唐蒙时尚不知汉有多大，唐蒙对多同厚赠财物并极力宣扬大汉之威德，终于说服多同甘心附汉，愿以其地为汉县。于是，唐蒙便与多同约定，以多同之子为县令，汉为其置吏。夜郎附近的一些小部落，也随后相约归汉。

汉朝遂在夜郎地区设犍为郡，以鳖县为治所②。接着，汉武帝又令唐蒙征发巴、蜀、广汉卒，修筑自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史称“南夷道”，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地区。

唐蒙初使夜郎时，因大量征发蜀地士卒并诛杀了一些地方首领，曾经引起巴蜀人士的惊恐和骚动。其后修治“南夷道”，又因天气湿热、运输不便，供应不足而致使数万筑路士卒累饿而死。工程进行了两年，耗费亿万之多，道路却仍未修通，巴蜀人民为此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② 此处从周振鹤。说见其《西汉政区地理》下编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由唐蒙通夜郎开始，西汉王朝正式恢复了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这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文化的发展，对于我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地区的作战

夜郎及其附近诸多“南夷”的归汉，在西南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邛、筰、冉駹等西夷君长，因闻知汉朝的强大富饶，又羡慕夜郎归汉后得到许多赏赐，纷纷要求比同南夷，归附汉朝。汉武帝就此征询臣下意见，来自成都的司马相如建议汉武帝接受西夷的归附之请，认为这些西夷地近于蜀，道路容易开通，加之秦时曾经在此设置郡县，如今重新设置，治理当较“南夷”便利。汉武帝欣然接受，于元光五年（前130年）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西夷”，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为副使。司马相如等不辱使命，先后招抚了筰、邛、冉駹、斯榆诸族，设置了一都尉及十余县；同时，又组织兵卒开通“西夷道”。于是，西达若水（雅砻江）和青衣江（大渡河），南到牂牁江的广大地区，都被纳入统一帝国的版图之中。

然而，开通“西南夷”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蜀地民众的负担，同时也在客观上侵犯当地富豪的利益，所以，“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①，西汉朝廷内部也颇有人与之相呼应，反对开发西南地区。加之当时北方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处激烈之时，汉武帝深感兼顾之难，遂于元朔三年（前126年）秋诏令罢西夷事务，仅置南夷、夜郎都尉，令犍为郡修城自保。这样，开通“西南夷”的进程便又陷于停顿。

不过，汉武帝对此并不甘心。当蜀地“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

① 《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下。

徒二十有七人”就开发西南夷而向朝廷发难时，他曾授意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予以驳斥。就在宣布罢西夷事务的当年，一批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者又在武帝的授权之下活跃于西南地区。

这年夏天，张骞自西域归来。他向武帝报告，说在大夏国看到了蜀布邛杖，据说这些物品皆是由身毒（今印度）运来。张骞推断，身毒既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又能购得蜀地物品，想来其地距离蜀郡必然不远。因此，他建议汉武帝派人寻找自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然后自身毒而通大夏。这样道路既近，又无匈奴阻隔之害，对汉朝经营西域极为有利。于是，汉武帝便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

这些使者历四年的辛劳，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却有一些人到达了滇、昆明和滇池地区，真实地了解到许多关于西南夷地区自然地理以及民族分布的详细情况，丰富了汉廷对于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激发起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决心和热情。

随着北方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也加紧进行重新开发西南地区的准备。元狩三年（前 120 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①，准备进军昆明。

元鼎五年（前 112 年）秋，汉廷征发犍为郡之夜郎兵以攻伐南越国，不料却遭到南夷且兰部落的反抗，朝廷使者及犍为郡太守皆被杀害；随后，邛、筰又叛汉，夜郎侯也投靠南越，武帝闻讯大怒，决心出兵平定西南夷地区的叛乱。

元鼎六年（前 111 年）春，汉军攻灭南越国。武帝遂命中郎将郭昌、卫广二人引兵进击西南夷。汉军兵锋首先指向率先叛乱的且兰部，“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②。接着，郭、卫又引兵击杀西夷的邛君、筰侯，改邛都为越巂郡（地当今四川西昌地区及云南楚雄州北部），改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汉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臣瓒曰。

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军的胜利，对西南夷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夜郎侯惧而入朝，被汉武帝封为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①，汉遂以其地为汶山郡（地当今四川汶川地区一带），又在白马氐族地区设置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地区）。至此，汉朝又在西南大部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此后，使者王然于又奉武帝之命，挟汉军连胜的兵威入滇，讽谕滇王入朝称臣。不料滇东北之劳深、靡莫二部却相依为援，不但力阻滇王入朝，而且还屡屡发兵袭击汉使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年）秋，武帝仍使郭昌、卫广为将，率巴蜀之兵击灭劳深、靡莫，随后大举入滇。在汉军兵临城下的强大攻势面前，滇王不敢应战，“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②。武帝乃赐滇王金印，领治其众，同时设置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其后数年，汉军又几次用兵今洱海地区，降服昆明人，以其地并入益州郡。

与抗击匈奴的战争相比，汉武帝用兵西南只是次要战场上的局部作战，因而，汉武帝在战役的总体谋划上，特别注意把握战机。元鼎六年击南夷之前，汉军已击灭南越国，夜郎等失去了后方依靠，汉军乘胜出兵，威不可当，故而有事半功倍之效。其次，为避免战事无限蔓延，影响大局，汉武帝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的战术，确保每战必胜，速战速决。同时，汉武帝还将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军事上的胜利迅速化为行政上的收获，平叛与开边并行，一举两得。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汉武帝用兵西南就取得了费时耗物不多，损失较少但收获颇丰的良好结果。

四、汉昭帝时对西南的用兵

在汉武帝设置的西南七郡中，益州郡是设置最晚、地处最为

---

①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边远的一个。它兼领西夷和南夷部分地区，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民族，情况较为复杂，因而，设郡之后的政治形势也就最不稳定。

益州郡的东部地区以滇池为中心，大致是由滇国及其旁邑劳深、靡莫以及牂牁、越巂数县组成。在汉军入境之前，这里已经发展起具有一定水平的奴隶制度。设郡之后，汉政府虽然对滇人奴隶主采取了宽容妥协的政策，保留他们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但毕竟又在政治、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其权力有所限制，这自然就导致滇人奴隶主阶层对汉朝统治的不满。至于益州郡西部地区，原是昆明、斯榆等游牧部族的领地，他们虽然被汉朝的武力所败，但由于这些民族不断的流动，分散而互不相属，又使得西汉王朝缺乏在此一地区实施严密而有力的统治的基础。益州设郡之后，汉政府乃招募死罪及奸豪来此屯戍，这一措施虽然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开发，但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

汉昭帝始元元年（前 86 年），益州境内接连发生反汉的武装叛乱。先是廉头、姑缯起兵攻杀长吏，后有牂牁、谈指、同并等 24 邑共 3 万多人的反叛。汉政府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募吏民并发蜀、犍为两郡万余精兵镇压。三年之后，姑缯、叶榆又反，领兵平叛的吕辟胡畏葸不前，致使益州太守死于敌手。叛军乘胜攻击吕辟胡，汉军战死、溺死者多达 4000 余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献中没有滇王直接参与叛乱的记载，但乱事在益州东部地区一再发生，郡太守又在滇王的直属领地被杀，而史书上却绝然不见滇王有任何拥汉平叛的举措，因此，大体上可以推断，此时的滇王已不再是汉家皇帝的“宠王”，而是与汉朝离心离德的地方割据势力了。

为平息叛乱，汉政府遣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率大军出征益州。始元五年（前 82 年），汉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①。滇国的奴隶制度在平叛战争中遭到严重打击，滇国的实力大为下降，滇王的地位则被协助汉军平叛的钩町

①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侯亡波所取代。从此以后，益州郡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静。

后来，在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汉政府遣蜀郡人士、太中大夫张匡出面调停，但夜郎王兴非但不听，反而污辱汉使。于是，汉政府便开始暗中进行战争准备，将金城司马陈立调任牂牁太守，全权负责对夜郎的战事。陈立乃临邛人士，早年曾在益州郡任连然县长、不韦县令，非常熟悉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其人为政严厉，向有威名，"蛮夷畏之"。他到任之后，立刻谕告夜郎王兴停战，兴拒不从命，陈立随即上奏朝廷，请诛兴。不待朝廷答复，陈立便率领随从数十人前往夜郎国之且同亭，兴带领从邑君长数十人及兵士数千来见，陈立怒斥兴并立斩其首，众君长被陈立之威势震服，数千兵士也全部放下武器投降。钩町王禹及漏卧侯俞闻讯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①。陈立见局势平定，便返回郡治。不料兴之岳父翁指又与兴之子邪务收拾残兵，胁迫周围22邑复叛汉朝。其年冬，陈立奏募诸夷与都尉、长史分将攻击叛军。翁指等据阸为垒，陈立巧出奇兵，先绝其粮道，又纵反间招诱降人，敌军心渐乱。陈立又乘天旱之机，攻绝叛军水道，叛军不能坚持，遂"共斩翁指，持首出降"②。叛乱由此平息。

第三节　对南越、闽越叛乱的平定

一、汉初同南越的关系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末，秦军经过数年苦战，终于将包括西瓯和雒越在内的"百越"之地全部占领，分别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广阔的岭南地区建立起帝国的统治。

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岭南地区因关山阻隔，断绝了与中

---

①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央政府的联系。其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原南海龙川令赵佗接任南海郡尉。他上任之后，便“诛秦所置吏”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并且断绝与中原的交通，聚兵自守。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赵佗在中原楚汉相争正酣之时，发兵吞并桂林、象二郡，自立为南越武帝，建立起一个“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逐鹿中原获胜之后，一时无暇顾及南越。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汉使陆贾来至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名有口辩”的陆贾鼓动口舌，使赵佗对西汉的国威既仰慕又畏惧，欣然接受了刘邦所赐的“南越王”金印，从此对汉“称臣奉汉约”①，成为西汉王朝属下的一个地方王国。

由于地处遥远的南疆，加上汉朝国力不强，所以汉初的南越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双方开设关市，互通有无；南越定期向汉朝贡，但中央政府却不能干涉南越的行政、司法诸事务。南越保持着远比中原各王国为大的政治独立性。

因此，西汉君臣都对南越抱有高度的戒备心理。为防止南越因经济强盛而更难制约，汉高后四年（前 184 年）夏五月，汉政府宣布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运往南越。这自然引起赵佗的极大不满，他怀疑汉廷此举乃是听信长沙王谗言所致，便派人向汉廷交涉，希望能解除禁令，“市易如故”。吕后非但固守成命，而且还将南越使者扣押起来，南越举国皆怨。就在此时，赵佗又风闻其在真定的祖坟被毁，宗族或杀或刑，于是便不胜其怒，决心拒汉自立。

高后五年（前 183 年）春，赵佗宣布恢复先前所有的“南越武帝”尊号，同时发兵攻袭汉长沙国，连破边地数县而去。吕后见赵佗公然与汉为敌，遂于高后七年（前 181 年）发兵征讨，但因北兵不服南国水土，尚未交兵就有大批士卒感染疾疫，大军只好停驻于湘粤边界。次年吕后死，南征诸军不战而罢，但赵佗却仍未停止敌对行动。他遣使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东西万余

① 《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里”①，不时以兵威胁汉边，成为汉朝南境的一大祸患。

当时汉朝正穷于应付来自匈奴的巨大压力，确实不愿再与南越开战。新即位的汉文帝一改吕后所为，对赵佗采取尽力安抚的政策。他先是派专使修复了赵氏在真定的祖坟，并“置守邑，岁时奉祀”，继而又搜求赵氏亲族，对他们均“尊官厚赐宠之”，然后又派陆贾持诏书第二次出使南越，劝谕赵佗去除帝号，继续为汉藩臣。赵佗与汉为敌，本非自愿，又深为汉文帝的善举诚意所感动，当即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不仅去除掉帝号，而且还立下誓语：“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② 从此以后，赵佗虽然对内仍然称“帝”，但对汉一直称“王”、称臣，而汉廷则完全不干涉南越的军政内务，双方保持相安无事的关系。

二、汉武帝时对吕嘉叛乱的平定

（参见附图 7）

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王朝经济富庶，国力强盛，南越国君更愿意把汉朝作为自己的宗主与靠山。建元六年（前 135 年），闽越发兵攻袭南越。此时赵佗已死，其孙胡继立为南越王。胡上书汉武帝，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③请求武帝裁决纠纷。汉武帝认为南越王“守职约”④，满心欢喜，立即派大军解救南越之急。南越王胡对此感激不尽，马上遣太子婴齐入长安朝见武帝并留为人质以示忠信，同时还表示自己随后也将赴京师朝见汉天子。虽然后来由于南越国大臣的反对，南越王胡一直托病未赴长安，但南越与汉朝的关系，较之文、景之世，还是密切了许多。

南越王胡死后，太子婴齐返国继承王位。婴齐在长安时，已娶邯郸女樛氏为妻，生有一子名兴。婴齐即王位后上书武帝，奏

①③④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

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请汉廷允准立樛氏为王后，兴为王太子。这一举动，显然是要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联系，争取汉朝更多的支持与保护。

然而，南越君臣又始终不肯放弃其内政的独立性，始终不能与汉朝同心同德。婴齐为王之后，汉武帝屡次遣使要他入朝，但他只派儿子次公入侍，自己却托故不朝。汉武帝对此自然十分不满。

南越与汉中央政府的藩属关系，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中央政权尚不够强大有力之时，南越政权的存在，对于维护一方的安定，促进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至汉武帝时期，这种明显带有割据色彩的地方政权，不啻成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障碍，也不利于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又热衷于扩大汉朝的统治疆域，所以，南越王国就势必为时代潮流所不容，亦为汉武帝本人所不容。

婴齐死后，兴继位为南越王，其母樛氏为王太后，南越国中的亲汉势力益趋增长。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遣樛氏的婚前情人安国少季及谏大夫终军等人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太后及南越王入朝。与此同时，武帝又令卫尉路博德率兵屯驻桂阳（今广东连县），以为接应。显而易见，汉武帝是决心彻底解决南越国的问题的。

以王太后为首的南越国亲汉派通过朝廷使者上书，表示愿意入朝，“请内比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①，武帝大悦，即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诸官印，诏令南越王比照内地的诸侯王，废除黥、劓刑，推行汉法。又令汉使者全部留镇南越，监督南越政务。诏书下达后，南越王太后及南越王便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北上朝见汉武帝。

亲汉派的活动及汉武帝的诏令，遭到以南越丞相吕嘉为首的拒汉派的多方抵制和破坏。吕嘉乃南越国的三朝丞相，“宗族官贵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

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①，不但势力遍布朝廷，在民众当中也颇有声望，实际上控制着南越政权。他先是多次谏止南越王内属，事不遂意，便生叛心，屡屡托病，不与汉使相见。南越王太后设谋欲诛吕嘉，机密泄漏，反倒打草惊蛇，促使吕嘉加紧进行叛乱的准备。

吕嘉的阴谋，未能瞒过汉廷。但汉武帝起初却并不为意。他认为吕嘉势单力孤，不足以大动干戈，准备派庄参率2000人前往宣谕。庄参坚辞不就，说：“以好往，数人足；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但故济北相韩千秋却说：“以区区粤，又有王应，独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三百人，必斩嘉以报”②。汉武帝于是派韩千秋与王太后之弟樛乐率2000人马进入南越。吕嘉见汉兵入越，遂借太后与安国少季犯有奸情之事，煽动越人作乱。元鼎五年（前112年）三月，他公开举起叛旗，攻杀南越王、王太后及汉朝使者，同时遣使联络苍梧王及诸郡县反汉，又立婴齐之粤妻所生子建德为南越王。韩千秋率兵入越后，起初曾取得小胜，攻破南越几个小的城邑，但终因人数太少，在距番禺城40里处，被越兵歼灭。一时之间，吕嘉的叛乱气焰甚嚣尘上。

汉武帝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下令大赦罪人为军卒，并征调江淮10万水师，准备南征。为确保必胜，武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下横浦；又以两名故越降将归义侯严、甲分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分出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一下离水（今广西漓江），一扑苍梧（今广西梧州）；同时，以故越降将驰义侯遗率巴蜀罪人，并调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五路人马总计20余万大军，水陆齐发，分头并进，从东、北、西三面对番禺形成包围之势。

元鼎五年秋，各路汉军出发。此后不久，亦即元鼎六年冬季，杨仆所部率先攻克寻陿（今广东韶关曲江至番禺以北地区）、石门

①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今广东番禺西北 20 里)，挫败南越兵锋，先立头功。路博德率千余名前锋部队随后赶到，两军会师后，迅速向前推进，兵临番禺城下。

南越王及吕嘉自知不可与汉军正面交锋，遂放弃城外野战，退入城内，闭门坚守，企图与汉军持久僵持，待汉军粮草给养发生困难时再寻隙出击。路博德与杨仆见此，当即议定分兵急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杨仆率部从东南方向攻打番禺，而路博德则领兵自西北方向攻城。战至黄昏，杨仆军攻破越军防线，纵火烧城。越兵素闻伏波将军路博德骁勇善战，又因天黑，不知他究竟带了多少军队，不敢轻易出击。路博德乘机“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①。杨仆军借烧城火势发起强攻，城中越兵纷纷逃向西北，向路博德投降。天色未亮，守城越兵已全部投降了路博德，番禺为汉军占领。吕嘉及南越王赵建德等乘夜色率数百人逃入海中。路博德从降人口中得知他们的去向，派兵追击，将其捉回。汉军大获全胜，存在了五世 93 年的南越国即告灭亡。与吕嘉结盟的苍梧王赵光闻知汉军出动，即刻宣布投降；揭阳令史定降汉、桂林监居翁也主动归降于汉，居翁还遣使谕告瓯骆（今越南北部地区)，使其部 40 余万人降汉，南越的叛乱遂告全部平定。

汉武帝用兵南越之时，正值北方与匈奴的战争暂告停歇，这就为汉军大规模的调动与部署提供了便利。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投入战斗，确保了速战速决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吕嘉叛乱被平定后，汉朝在岭南地区分置九郡，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郁林（治布山，今广西桂平西)、合浦（治合浦，今广东合浦东北)、珠崖（治瞫都，今海南琼山东南)、苍梧（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儋耳（治在今海南儋县西北)、交阯（治羸陵，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胥浦，今越南清化西北)、

①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日南（治西捲，今越南广治西北）①。

南越改郡，是岭南地区发展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它使得这里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对于当时统一的多民族的汉帝国的发展，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三、汉初同闽越的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发兵攻闽越并以其地置闽中郡。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等曾率众随同番阳令吴芮，参加反秦斗争。秦亡之后，因西楚霸王未给无诸、摇加封王号，所以二人在楚、汉交兵之时又统领其众辅助刘邦，为西汉立国建下一份功勋。由于无诸的势力相对强大，所以在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被册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市），闽地大部皆为其所有。摇的势力较小，迟至汉惠帝三年（前 192 年）才被封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俗称东瓯王。由于汉王朝起初有意扶持无诸，闽越的势力迅速扩大。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拉拢闽越王与东瓯王起兵参与叛乱。闽越王无诸拒绝了刘濞的拉拢，而东瓯王则参与其事。但刘濞事败之后逃入东瓯王国中，东瓯王将其杀死，以功补过。刘濞之子刘驹逃至闽越，无诸却将其收留，待若宾客。刘驹为报杀父之仇，经常离间闽越与东瓯王的关系，鼓动无诸攻击东瓯王。建元三年（前 138 年），闽越果然发兵进攻，东瓯王乏食难战，派人向汉廷告急求援。汉太尉田蚡认为：“越人

---

① 据周振鹤考证，吕后、文帝间，赵佗灭象郡以南之安阳国，置交阯、九真二郡。元鼎六年汉平南越后，将秦故三郡析为南海、苍梧、合浦、郁林、象郡等五郡，又在交阯、九真之南设日南郡；元封元年，又置儋耳、珠崖二郡，故岭南地区实置十郡。说见其《西汉政区地理》下编第四章。

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复，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① 汉武帝遣谒者汲黯前往调查，汲黯走至吴地，即还报曰：“粤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②但中大夫严助坚决主张出兵救援东瓯，说：“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③ 汉武帝同意严助的意见，即派他持节发会稽兵，渡海以救东瓯。会稽太守拒绝出兵，严助依军法斩一司马，太守乃发兵赴东瓯。但未等汉军开到东瓯，闽越已自行撤兵。东瓯王担心再次遭到闽越的攻击，请求举国内徙。得到准许后，即率4万余众迁入江淮之间，定居于庐江郡。

四、汉武帝时对闽越叛乱的镇压

闽越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实力，东瓯国内迁之后，一部分东瓯人及其领土归属闽越，无疑又使闽越的实力有所增强。但在西汉朝廷内部，却有相当一批大臣对闽越的坐大视而不见，主张对闽越采取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政策。闽越由此日益凶横起来。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又发兵攻打南越。南越王胡上书汉廷，请求武帝裁决。武帝立即派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为将，率兵分出豫章、会稽，讨伐闽越。自恃强大的闽越王郢不肯避战，居然“发兵拒险”，欲与汉军交锋。郢弟余善知其不可，乃与同宗贵族密谋说：“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④与谋者都不愿与汉为敌，于是便合力杀死闽越王郢，献其头于王恢。汉武帝随即诏令汉军罢兵而还，册立未曾参与拒汉行动的故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奉闽越祭祀。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

② 《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

③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④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丑本为闽越繇君，虽为无诸之孙，但在闽越之中势力很小，且无威望。汉武帝立此人为王，用心良苦。因为汉廷当时正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无暇南顾，所以要借越繇王的存在来压抑余善等人，为日后彻底解决闽越问题预作准备。余善对汉武帝的安排十分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是暗中自立为王，越繇王对他无可奈何。汉武帝了解到这种情况，索性又给余善加以东越王的封号，令其与丑共治闽越地。这样，闽越事实上已一分为二，其实力由此而削弱了不少。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吕嘉举兵反汉。东越王余善表面上主动上书武帝，请求发兵8000人，随从楼船将军杨仆征伐南越。但兵到揭阳（今广东揭阳西北），他就借口海上风浪太大，按兵不动。不但如此，他还暗中与吕嘉集团相互勾结。有鉴于此，在平定南越之后，杨仆便建议汉军挥师东进，攻击余善。汉武帝担心士卒劳倦，不利作战，因而没有批准杨仆的建议，只是诏令汉军留屯豫章、梅岭待命。

余善见汉军大兵压境，自知反迹暴露，遂铤而走险，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他刻玺自立为“武帝”，给手下的将军驺力等加以“吞汉将军”名号，“发兵距汉道”①，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率军留屯的大司农张成等人畏懦怯敌，不敢发兵出击。汉武帝闻讯，一面派人诛杀张成等人，一面调动大军，镇压叛敌。他命楼船将军杨仆率军出武林；横海将军韩说自句章出师，从海上进袭；中尉王温舒出梅岭，戈船、下濑二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汉军攻入东越。余善利用险要地势全力抵抗，命东越徇北将军坚守武林，迎击楼船将军杨仆，“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②。汉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顽强作战。楼船将军率钱唐（今杭州）人辕终古斩杀徇北将军。汉武帝派此前在汉的故越衍侯吴阳回东越劝说余善投降，遭到拒绝。横海将军韩说率水军浮海而至，故越衍侯吴阳率

①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

700 人倒戈，击东越军于汉阳。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又合谋诛杀余善，率部向横海将军投降。东越将领多军亦率部降。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

在平叛过程中，闽地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恢复。汉武帝对繇王居股等人员论功封爵后，令他们率众迁往江淮一带，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东越（闽越）地遂虚”①。

第四节　对朝鲜卫氏政权的战争

一、卫氏政权的建立及其与西汉的关系

朝鲜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与中国山水相连。在中国古籍中，保留着“箕子建朝鲜”的记载。据说在周武王灭商前后，纣王的叔父箕子率其部众远徙，来到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建立起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史称箕氏政权。这种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其真实性却颇可怀疑②。不过，朝鲜半岛从很早的历史时期开始，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人所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各种往来更加频繁，关系也日益复杂。据鱼豢《魏略》云：“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③。这里的“满番汗”，即是昌城江、大宁江、清川江这三条江的古名④。这是中朝之间历史上的首次划

---

①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② 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韩国学论文集》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韩传》裴松之注引。

④ 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

定疆界。据《史记·朝鲜列传》载，在燕昭王统治时期（前312～前279年），燕国对箕氏朝鲜实行武力扩张，占领了属于箕氏朝鲜的部分领土并在那里修筑障塞，派驻官吏，燕齐之地的许多百姓，也在此后移民至朝鲜半岛。

秦统一中国后，将原来燕国所略属的真番、朝鲜的土地划为辽东郡的外部边界，从而在箕氏朝鲜与秦辽东郡内界之间留下了一块禁止入内的缓冲地带，史称“秦故空地”，用以防备朝鲜方面的入犯并同时防范来自辽东方面的流民。

西汉开国后，朝廷认为朝鲜地处遥远，难以管理，因而便恢复了燕与箕氏朝鲜的旧界，“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①。但“秦故空地”仍为汉朝的燕国属地②。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燕王卢绾叛汉北降匈奴。混乱之间，燕人卫满聚集起千余人，脱去汉装，“椎结蛮夷服而东出塞，度浿水”③，亡命朝鲜。他们以“秦故空地”为根基，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最后竟将朝鲜王箕准驱逐，在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建立起新的政权，史称卫氏朝鲜。

此后，汉辽东太守与卫满相约：卫满承认汉王朝的宗主地位，负责管理塞外蛮夷，不使他们侵犯汉朝边境，但同时也不得禁止那些愿意朝见汉天子的蛮夷君长入境。这个协议，虽然在名义上使卫满成为汉朝之“外臣”，但实际上却等于汉朝放弃了对朝鲜的直接统治权。由于当时西汉王朝无力外顾，因而当辽东太守将此约定奏报朝廷之后，汉惠帝和吕后便予以批准。

凭恃着西汉王朝所给予的合法地位以及相对强大的武力，卫满先后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真番、临屯等都归属卫满，卫氏政权的统治区域迅速扩大，“方数千里”④。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卫满与西汉王朝也较为长久地保持了相安无事的关系。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

② 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

③④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二、汉武帝时对卫氏政权的作战

汉武帝即位之初，对偏在东方一隅的卫氏朝鲜仍然采取极为宽容的羁縻政策。但进入元封年间以后，汉武帝则对朝鲜半岛日益关注起来，这除了汉武帝本人扩张领土的侈心之外，还与卫氏政权自身的变化有关。

此时，统治朝鲜的是卫满之孙右渠。他自即位以来，便想方设法，不断招诱汉朝吏民逃往朝鲜，同时又百般阻拦愿意朝见汉天子的真番、辰国之君进入汉境，公然违背了其祖父与汉朝的约定。

面对右渠的如此作为，汉武帝不肯听之任之。元封二年（前109年）夏，武帝派涉何为专使赴朝鲜，督责右渠遵守前约。右渠不甘示弱，“终不肯奉诏”。没有完成使命的涉何不胜忿怒，在归国途中，行至浿水之畔，竟将护送他离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汉武帝不但没有追究涉何之罪，反而委派他出任辽东郡东部都尉，直接负责朝鲜事务。显然，汉武帝此时已不再打算修复与卫氏朝鲜的关系，而是积极地寻找时机，对卫氏用兵动武。

右渠闻知涉何又到辽东，就发兵进袭辽东东部都尉所，将涉何杀死，率先挑起了武装冲突。

汉武帝立刻作出反应。他下诏招募天下死罪之人从军，准备进攻朝鲜。根据朝鲜半岛的地理形势，汉军制定了水陆并进、两路夹击王险城的作战计划。元封二年秋，楼船将军杨仆率兵5万从齐地出发①，渡过渤海，向朝鲜西海岸挺进；与此同时，左将军荀彘则领军从辽东进入朝鲜，直扑王险城。右渠闻知汉军行动，积极备战，“发兵距险，”力争主动。荀彘的先锋部队由辽东兵充任，他们进入朝鲜境内不久，便在右渠的痛击之下溃败。接着，立功

① 杨仆军的启航地点，可能在东莱郡，说见黄盛璋《中国港市之发展》，《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心切的杨仆又不待全军登陆①，仅率7000楼船兵急奔王险城而来。右渠见登陆的楼船兵数量不多，以优势兵力出击，将其击败。杨仆见部众溃散，只身逃入山中躲藏了十几天，后来才逐渐将散兵游卒收拢起来。荀彘又率汉军攻击朝鲜浿水的西军，也未能得手。汉军之所以接连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右渠利用汉军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而汉军统帅的轻敌以及两支汉军之间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也是导致汉军初战失利的原因。

初战的失利，打乱了汉武帝的作战部署。汉武帝于是调整策略，他派卫山出使朝鲜，劝说右渠臣服汉廷。右渠虽初战获胜，但担心最终无法抵抗汉军的强大攻势，表示愿意降汉，并供给入朝汉军的粮饷。接着，他派太子携带良马5000匹，跟随卫山入汉，准备当面向汉武帝谢罪请降。为防不测，右渠派出万余名士兵携带武器护送太子朝汉。当他们准备渡过浿水之时，汉使卫山和左将军荀彘疑其有诈，要求解除朝鲜士兵的武装。朝鲜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之”②，当即掉头而回，和议因而告吹。

汉武帝诛杀了使臣卫山，下令汉军重新发起进攻。经过休整的汉军，很快就突破朝鲜军队的防线，推进至王险城下。荀彘率部围其西北，杨仆率楼船兵陈兵城南，把王险城紧紧包围起来。右渠在城中坚守，汉军经过数日的作战，一直未能攻破城池。

兵力上占尽优势的汉军之所以迟迟未能够攻破王险城池，除了右渠的顽强抵抗之外，主要是由于两支汉军未能同心同德、协同作战的缘故。左将军荀彘是汉武帝的宠臣，他率领的主力军是来自燕、代之地的精兵，素以能征善战而著称，因而不仅统帅气盛傲慢，而且“军多骄”，根本不把友军放在眼里。而杨仆所率齐地之兵，则在渡海之时，“已多败亡”，登陆之后，又为右渠所败，

---

① 杨仆军的登陆地点，据《史记·朝鲜列传》是在洌口（《汉书·朝鲜传》作列口），地在今朝鲜黄海南道殷栗附近。

②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将领怯战。包围王险城后，荀彘往往发兵急攻，而杨仆却并不卖力，“其围右渠，常持和节”①。两军步调不一，互不配合，遂给右渠留下可乘之隙。每当荀彘发兵急攻之时，他便暗中派出使者，假意与杨仆商谈降汉之事，以阻缓汉军的攻势，企图利用汉军远来征战、后勤供应不易的弱点，通过持久作战来赢得战争的主动与胜利。荀彘多次派人与杨仆约定合兵进击的时间，杨仆却贪求独降朝鲜的奇功，屡屡加以拒绝，致使彘军每每劳而无功。荀彘见久攻不克，派人向右渠劝降，右渠“心附楼船”②，又严辞加以拒绝。由于“两将不相得”③，王险城池因而久攻不下。

荀彘对杨仆的表现十分不满。他以为杨仆先有失军之罪，现在又与右渠私下议和，大有叛汉的嫌疑。这时，汉武帝得知他与杨仆的矛盾，派原济南太守公孙遂前来调解，命其“有便宜得以从事”④。荀彘将战事不利的责任完全推给杨仆，说：“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楼船数期不会”，并将他对杨仆的怀疑和盘托出，说：“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⑤公孙遂偏听偏信，以节召杨仆到荀彘营中议事。待杨仆一至即令荀彘麾下将其逮捕，将其所部兵众也全部交由荀彘指挥。汉武帝闻报大怒，立刻诛杀了公孙遂。

荀彘兼并杨仆之军后，加紧攻城。朝鲜相路人、相韩陶、尼谿相参和将军王唊见汉军攻势凶猛，唯恐城破之日己身难保，于是密谋降汉。韩陶、王唊、路人逃出王险城，路人死于道中，韩陶与王唊则逃入汉营。这次哗变大大削弱了右渠集团的力量，涣散了卫氏朝鲜的军心。元封三年（前108年）夏，尼谿相参派人刺杀右渠，又至汉营投降。但右渠的大臣成已仍率领吏民坚守城池，继续抵抗。荀彘一面指挥兵士进攻，一面令右渠之子长、路人之子最等策反，呼吁城中军民投降。结果成已被杀，王险城头终于挂出了白旗，持续将近一年的战争，遂告结束。卫氏政权至

---

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此灭亡，汉廷于其地置乐浪（今朝鲜平安南、北道及黄海北道各一部分）、玄菟（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南道一带）、真番（今朝鲜黄海北道大部及黄海南道、京畿道北部）、临屯（今朝鲜江原道及南江原道北部）四郡①。

第五节　对西羌叛乱的平定

一、西羌与西汉、匈奴的关系

羌人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大体上与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相仿佛。古代的羌人生活在中国的西部，大多分布于今甘肃、青海两省以及西藏东北部、四川西部等地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知，至少从殷商时期开始，羌人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

所谓“西羌”，是指居住于今甘、青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的羌人而言，或可称为“河湟之羌”②。

西羌的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初年。秦厉公在位时期，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人俘获为奴。后来爰剑逃亡，率领一支羌人来到河湟地区。“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乃以在秦国所学到的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民，使诸羌“田畜”，发展起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爰剑以此

---

①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治亦由今新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北迁至今辽宁新宾西。

② 公元2世纪前叶，亦即东汉安、顺二帝统治时期，汉廷文件中出现了“西羌”与“东羌”的名称。《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张奂段颎列传》及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均有当时人关于“西羌”与“东羌”的记载。元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顺帝永和六年的注文中，总结了东、西羌人的分别：“羌居安定、北地、上河、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

而“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西羌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羌人当中重要的一支。后来，一部分西羌南下，而爰剑之曾孙忍及其弟舞则留居湟中，种落繁衍很快，“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西汉时期西羌社会生产及政治组织的情况，因为史无记载而不为人知，但《后汉书·西羌传》中对东汉时期的西羌有如下记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西羌内部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在总体上已处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但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权。那么，西汉时期的西羌，应当是更多地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原始特征。

秦汉之际，西羌为匈奴所征服。据《魏略·西戎传》载，许多羌人被匈奴所同化，加入到匈奴族的部落之中。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休屠王，成为河湟北部地区诸羌的直接统治者。在匈奴的指使之下，西羌往往参与袭扰汉边的行动，威胁着汉朝西部边境的安定。

然而，由于匈奴对西羌实行残暴的奴隶制统治，也不断激起羌人的反抗。汉景帝时期，活动于湟水流域的研种羌豪留何因不堪忍受匈奴的压迫而上书汉廷，请求东迁入汉境，为汉朝防守陇西塞。汉景帝欣然允准，留何所部羌人分别被安置于陇西郡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与武都郡的羌道（今甘肃舟曲北），使其与汉、氐等族杂居共处，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

二、汉武帝时对西羌的作战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总体战略中，隔绝西羌与匈奴的联系以“断匈奴右臂”，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元狩二年（前 121 年）秋，

匈奴浑邪王降汉，原先在其统治下的羌人大多随同东来。此后，汉王朝在浑邪、休屠故地设郡徙民，逐渐完成了对匈奴和西羌的分隔。

西羌和匈奴对此俱不甘心，伺机反扑。元鼎五年（前118年）秋，汉发水陆大军10余万南征南越，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部的羌人乘机发难。先是先零羌与封养、牢姐诸羌释仇结盟，纠集起万人之兵，然后又“与匈奴通使”，相约攻汉。这年九月，匈奴攻入五原郡，杀汉太守；而西羌则攻令居，打安故，围枹罕。

由于羌人的战斗力不强，加上匈奴此时已不能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援，因而羌人的军事进攻并未给汉朝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武帝从开通西域的大局着眼，充分估计了西羌作乱的危害性，决心出兵扫除河西走廊东部侧翼地区的障碍。元鼎六年(前111年)冬，汉将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领10万大军出征，在击溃进犯的西羌之后，又挺而西进，扫荡河湟地区。经过五六年的间断作战，先零诸羌被赶到今青海湖一带，汉朝则在河湟之地筑塞、徙民，构成了专门针对羌人的防线。同时，汉武帝又特设护羌校尉，进一步强化了对塞外羌人的监控。这些措施，为此后40余年间西羌地区局势的相对平稳奠定了基础。

三、汉宣帝时对西羌叛乱的平定

汉武帝用兵西羌之后，匈奴与西羌的联络仍未彻底中断。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先零羌豪封煎等曾通使匈奴；而匈奴的使者也来至小月氏传告诸羌，约他们与匈奴合击汉张掖、酒泉郡。为了更加有效地阻断羌人与匈奴交通，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时，汉政府又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划出二县，新设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肃民和东南）。此后，汉朝逐步向西推进，沿湟水一线构筑邮亭，直至鲜水（今青海湖）附近，湟水以北地区皆为金城郡地，羌人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湟水以南。

汉王朝的这些措施，使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羌人为汉事苦”①，反汉情绪日趋高涨，到了汉宣帝时期，西羌地区的局势又开始动荡起来。

元康二年(前 64 年),汉军在对匈奴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了在车师的屯田基地,从而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又处下风。匈奴的一时得手,对蓄意反汉已久的西羌来说,不啻是个鼓舞。就在这时,汉王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先零羌首领向他提出了北渡湟水、重返故地,“逐民所不田处畜牧”②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在试探汉王朝的态度。而由于缺乏警惕,义渠安国答应要替羌人请示汉廷。谁知先零诸羌根本不等朝廷的答复,很快就以曾向汉使当面言明为幌子,自行强渡湟水,郡县对此无可奈何。

北渡湟水的实现，令诸羌极为振奋，反汉的密谋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元康三年（前 63 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③，形成一个以先零羌为主体的反汉联盟。此后，羌侯狼何也蠢蠢欲动，遣使向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④。

当此之时,后将军赵充国敏锐地觉察到了羌人叛汉的阴谋,料定他们将于秋季马匹肥壮之时作乱。他建议汉宣帝立刻“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⑤，同时派人深入诸羌，利用其内部矛盾，掌握诸羌动向。汉廷于是命义渠安国再次出使羌中。这位原是羌人的汉使，似乎是为了弥补上次为西羌代言北渡湟水之请的过失，此番出使,接连做出过激之举。他首先召集先零羌的 30 余名首领议事,随即给他们加以罪名,统统斩首。旋又纵兵击杀先零羌 1000 余人。这虽对西羌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与仇恨,甚至连那些早已降汉的羌人也决心与汉为敌，羌中的局势迅速趋于恶化。

神爵元年（前 61 年）三月，以归义羌侯杨玉为首的一些降汉羌人率先发难。他们劫掠小种诸羌，攻打城邑，击杀汉吏。匈奴

---

①②③④⑤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单于虚闾权渠亲率10余万骑，向南靠近障塞，与之遥相呼应。义渠安国率3000骑兵前往镇压，但在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被羌人所败，“失亡车重兵器甚众”①，义渠安国狼狈逃回令居，向朝廷报告消息。

西羌的叛乱，直接威胁到河西地区的安定，而河西之地的稳定与否，又关系到汉与匈奴争夺对西域控制权的大局。因此，汉宣帝对平息羌乱十分重视。接到义渠安国的报告后，他立刻下诏，“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②，加上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太守所领兵马，共集结起6万精兵，准备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平息叛乱。

四月，奉命负责指挥平羌作战的后将军赵充国来到金城。这位智勇双全的老将，并没有挟重兵之威而急于同羌人开战求胜，而是亲率1万骑兵挺进湟水，在金城郡之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民和南）附近设营扎寨，一面侦察敌情，一面积极备战。

在叛乱爆发之前，罕（䍐）、开诸羌的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向金城西部都尉告发了先零羌谋反的情况。叛乱爆发后，因为一些罕、开种人卷入，所以雕库便被扣押起来以为人质。赵充国抵达前线不久，便将雕库释放，并使其转告诸羌：“大军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希望那些被裹胁的羌人及早脱离叛乱阵营；同时公布汉军对反戈一击之羌人的优待政策：参与叛乱者若能“相捕斩”，即可免除罪过；若斩杀一名叛乱大豪，赏钱40万，斩中豪一人赏钱15万，小豪2万；斩成年男子一人赏钱3千，斩女子及老人、孩子者赏钱1千；凡捕获叛乱分子者，同时可以占有被捕获者的妻子和财产③。

---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 《汉书》卷八《宣帝纪》。

③ 参见《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不难看出，赵充国对羌人的战略，并非简单的武力围剿，而是要借助汉军的兵威，实行分化瓦解的招抚政策。他把重点打击的目标，集中于为首叛乱的先零羌，而对那些胁从者则网开一面。赵充国判断，待到秋冬之时，西羌的反汉联盟就会破裂，叛乱的中坚力量将会陷入势单力薄的困境，那时再以武力相向，取胜乃是必然之事。

然而，赵充国的这种着眼于西羌地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却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酒泉太守辛武贤极不赞成赵充国秋冬用兵的计划，他既担心匈奴利用汉军"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的漏洞而入境为害，又顾虑内地士卒、马匹不耐西北地区冬季严寒冰冻之苦。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奏曰："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境）外之册（策）。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耐）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但）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①。请求亲率 1 万骑兵，带 30 天的军粮，于七月上旬分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部落于鲜水。

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书转给赵充国，让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的吏士进行讨论。赵充国经过讨论之后，与长史董通年一起上书，指出辛武贤此策的诸多弊端：自张掖、酒泉二郡进击西羌，路途迂回遥远，汉军又携带 30 日的军粮，负担沉重，难以追歼敌人；待进入作战地区之时，汉军很可能已成疲惫之师，战斗力将大大下降；而羌兵则必将乘势退遁山林，不仅以逸待劳，而且据险守阨，阻绝粮道，待到两军交锋，遭受重创的反而可能是汉军，"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再者，武威、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一旦匈奴与羌人通谋，

---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便可以利用辛武贤引郡兵击羌之机大举进攻，令汉军首尾难顾。所以，为防止匈奴再次深入西域，张掖、酒泉之“郡兵尤不可发”。奏书最后重申坚持自己原先的平羌之策：“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开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①。

然而，急于速战速决的汉宣帝却十分欣赏辛武贤的建议，朝廷大臣中也有许多人对赵充国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汉宣帝最终决定采纳辛武贤的作战计划，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命辛武贤率兵 6100 人、敦煌太守快率兵 2000 人，长水校尉富昌及酒泉侯冯奉世率婼羌和小月氏兵 4000 人，总计约 12000 人，携带 30 天的给养，于七月二十二日进击罕羌。同时，汉宣帝还在诏书中指责赵充国，说他迟迟不愿进兵是“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配合许延寿、辛武贤的进军，而且要求他“急装”，立刻发兵，“勿复有疑”②。

面对皇帝的巨大压力，赵充国“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宣帝陈述己见。他认为，现今先零羌在其首领杨玉的率领下，固守于深山密林的险要之处，伺机进攻汉军，而罕、开之羌却并未侵犯汉军。如果放过先零羌不打而去攻击罕羌，无疑是“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有违仁道；先零与罕、开本有旧怨，只是出于反汉的需要才相互化敌为友，但其联盟的根基并不牢固；现在敌人兵强马壮，粮食丰足，攻打起来不大可能对其造成什么伤害，而且一旦汉军攻击罕羌，先零羌势必前往救援，这样罕羌自会感恩，双方联盟将会更加紧密，再去胁迫其他小部落反叛，兵力就越来越多，远远超出目前的 2 万之数。汉军征讨他们就得动用超出今天数倍的兵力，从而给国家造成几十年的忧患。基于上述分析，赵充国坚持

①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首先讨伐先零，促使罕、开部落脱离叛乱阵营，如果先零败而罕、开仍不投降，汉军则于来年正月向他们发动进攻①。赵充国的奏书终于说服了汉宣帝。七月，汉宣帝撤销进军罕羌的诏令，同意赵充国选择适当的战机，先击先零羌。

赵充国率兵至先零羌的驻牧地。他通过侦察了解到，由于长期屯聚不战，先零羌兵思想麻痹、戒备松弛。于是他突然发动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惊慌混乱的先零羌丢下车辆辎重，抢渡湟水逃命，赵充国率兵跟随其后，缓慢驱赶先零羌的败兵往后逃跑。有人认为他的行动过于缓慢，他答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②结果，先零羌的败卒纷纷夺路溃逃，有数百人落水淹死，500余人被杀或投降，10多万头牲畜及4000余车辆为汉军所获。

赵充国乘胜挥师西进，来至罕羌地区。他严令部下"毋燔聚落刍牧田中"③，即不得烧毁羌人房屋，不准在羌人田里割草喂马。罕羌深为汉军威德所感动，喜曰："汉果不击我矣！"羌帅靡忘主动投降，赵充国赐给饮食，"遣还谕种人"，结果正如赵充国所料，"罕竟不烦兵而下"④。

到了这年的秋天，先后投降的羌人已逾万人。但汉宣帝却急于扩大战果，要求赵充国继续发动攻势。赵充国则主张罢骑兵而屯田湟中，以守势等待羌人自溃。为此，他又前后三次上书，陈述自己"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使羌人"不战而自破"⑤的意见，并回答宣帝的问难。汉宣帝批准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但同时又同意了辛武贤的出击方案。

神爵元年十二月，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及中郎将、赵充国之子赵卬兵分三路出击，俱获胜利：辛武贤军杀敌2000人，许延寿军收降敌人4000余，赵卬军杀死和招降了2000多羌人。屯田湟中的赵充国部，虽不出战，也坐得降羌5000余人，显示出屯田制敌策略的巨大功效。

---

①②③④⑤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至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降汉的羌人已多达31200人，溺死于河、湟及饥饿而死者多达五六千人，又有7600人被汉军斩首，只剩下4000名叛羌在逃，羌乱已经基本平息。此时，赵充国审时度势，认为残余的叛羌已不足以烦劳汉军，完全可以交给羌帅靡忘去对付。于是他上书汉宣帝，"请罢屯兵"①。汉宣帝批准之后，赵充国振旅而还。是年秋，羌人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兒库等人共同执杀了先零大首领犹非、杨玉，率残余的4000叛军投降汉朝，羌人的叛乱彻底平息。

此后，汉宣帝在对降汉的羌人首领论功行赏之外，又设置金城属国，加强对羌人的控制。通过平叛，汉族与羌族的交往有所增强，羌人地区的发展步伐也因此而加快。此后数十年间，这里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

第六节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斗争的历史意义

一、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秦灭六国，首次在我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当时泛指秦代岭南地区），北据河为塞，旁阴山至辽东"②。但是及至汉初，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仅诸侯王国日渐坐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危害到国家的统一，而且在周边地区还出现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权，控制着西汉南北方的大片土地，严重地威胁到王朝的安全。在北方，匈奴在秦、汉之际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等部，南灭楼烦、白羊二王，并越过阴山，重占河南之地，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使西汉的北界退缩到陕北、陇东一线。在南方，秦亡之后，中央朝廷已中断对“西南夷”的统治。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也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而自立，建立南越国。东瓯则在吴、楚七国之乱时，追随吴王刘濞反对西汉中央政权。东越（闽越）王余善，也乘南越丞相吕嘉反叛之机，公然举兵反汉，自立为帝。这样，由于匈奴的南侵和三个越族政权的分裂行动，西汉南北方的疆域便比秦代的疆域大为缩小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作为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汉王朝的帝王毕竟是有魄力、有作为的。在西汉初期，他们一面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面积极地对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展开不懈的斗争，清除内部的割据分裂势力，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又开始了反击匈奴与攻打三越政权等一系列战争，以解除外部威胁，拓展其疆域版图。

在北方，汉武帝首先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命卫青出击云中，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又命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后又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破匈奴军，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于其地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前119年），再命卫青出定襄，远征寘颜山，霍去病出代郡，封于狼居胥山，迫使匈奴远遁西北，“而漠南无王廷”，进一步保障了河西四郡的安全。在同匈奴作战的同时，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又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令赵破奴攻楼兰、车师，李广利击大宛，迫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于乌垒城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诸国，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①。从此，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大宛，帕米尔的无雷，阿赖谷地的休循等国，都接受西域都护的直接统治。西汉朝廷有权

①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在西域册封各国的国王，颁赐各级官吏的印绶，调动军队和征发粮饷，西域已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今甘、青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的西羌曾与匈奴连兵攻汉，汉武帝曾命李息、徐自为统率大军将其征服，设护羌校尉加以监控。宣帝时又令赵充国在湟中屯田，并令辛武贤率兵再次征讨，尔后置金城属国，专职管理归附之羌人。在西南地区，汉武帝于建元六年（前 135 年）命唐蒙出使夜郎，招抚了夜郎王，于其地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 111 年）灭南越后，又命郭昌、卫广击败西南夷，于且兰置牂牁郡。之后各族相继降附于汉，又改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 109 年）再击降滇王，又置益州郡，并赐滇王金印，领治其众。其后数年，汉军复征服洱海地区，以其地并入益州郡。西南夷至此已大部分受到西汉王朝的管辖。在东南地区，建元三年（前 138 年），东瓯为摆脱闽越王的威胁请求内徙，汉廷允其举国迁居江淮之间。元鼎六年（前 111 年），东越（闽越）王余善举兵反汉，汉武帝命韩说进兵闽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降，闽越人后来也被汉廷迁至江淮一带。元鼎五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反汉，汉武帝命路博德进军平叛，次年于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及位于今越南的交阯、九真和日南等九郡。在东北，元狩四年（前 119 年）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后，将被匈奴征服的乌桓从乌桓山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于幽州设置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①。元封二年（前 109 年）燕人卫满所建的卫氏朝鲜起兵叛汉，汉武帝发兵攻讨。翌年，卫氏朝鲜灭亡，汉廷以其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并“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郡县而置之”②，将中国境内更

①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四，引应劭《汉官仪》。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多的土地和民族进一步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临大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以西、北到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强大帝国。与秦代相比，其疆域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不仅大漠以南与中原实现了统一，而且西域、河西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从而奠定了中国历史疆域的基础。后来清康熙帝在谈到清朝的疆域时，即曾指出："开基汉启疆"①。

二、推动各族人民的合作、进步与民族融合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这些交往，大体上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的人员。第一类是官方派遣的使臣、官员与和亲的宗室女。如西汉派往匈奴的娄敬、郭吉、路充国、苏武，派往西羌的义渠安国、派往西域的张骞、堂邑父，派往西南夷的唐蒙、司马相如等等。这些使臣出使时，往往不是孤身一人前往，而是携带大批随从人员，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使团人数即多达 300 人，此后则更是"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②。苏武出使匈奴，"与副中郎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③，使团的规模也相当庞大。至于遣宗室女远嫁，更有大批属官侍御相随，如元封时，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④。与此相对应，边疆各族政权，也向西汉派遣大批使臣，有的还派出"侍子"和留学的官员，如西域扜弥太子赖丹，汉昭帝时入长安为质，后任校尉，率兵至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汉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后来嫁与龟兹王绛宾，又与绛宾一起来到长安居住一年，

---

① 《康熙御制文》一集，卷三十六。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④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汉廷“厚赠送之”①。第二类是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如汉景帝时，将留何所部的羌人移置陇西郡的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县与武都郡的羌道县。汉武帝时，元狩二年(前 121 年)匈奴浑邪王降汉，汉政府将其所属数万迁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秦长城之外，设五属国。后来，在张掖还设张掖属国，安置匈奴及其他归附的少数民族。宣帝时又设金城属国，安置东迁的羌族。上述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迁东瓯、闽越之越人入江淮之间，也属于此类移民。此外，西汉政府还将大批汉族人民和兵士迁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筑城与屯田，这将在下章作专门的论述。第三类则包括各种逃亡、投奔和被俘的人员。这类人员，就数量来说，不算少数。如汉将李陵、李广利投降匈奴，匈奴的浑邪王、日逐王归汉，手下都带有成百上千甚至多达数万的人马。其中，有些人甚至来回易主，如赵信原为“故胡小王”，可能是匈奴人，降汉后被封为翕侯，曾多次引导汉军进攻匈奴，后又降于匈奴，单于“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②。有些汉族边民，也曾自愿逃亡匈奴，如“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时有亡出塞者”③。

各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因民族、地域、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隔阂，特别是大量汉人迁往边疆，不仅将内地的粮食、丝绸、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输入边疆地区，还将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当中，对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匈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人”、“汉人”，教会了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藏谷、冶铜铸铁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如寘颜山下的赵信城，即为从汉朝降入匈奴的赵信所筑，其附近一带的匈奴人除从事游牧业，也开始从事农业。卫青出击匈奴至赵信城时，便“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④。《汉书·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西域传》载，汉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说匈奴派骑兵到车师屯田，这是匈奴已学会农耕技术的又一证明。在今内蒙古诺颜乌拉的西汉时期的大型匈奴古墓中，曾出土了铜镜、铜钱以及铁鼎、铁镬等，大多仿自汉式[①]，说明当时的匈奴已掌握内地的生产技术进行某些手工业品的生产。匈奴的文化，也受到汉族的深刻影响。单于左右官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计算方法，以“计识其人众畜牧”[②]，征收赋税。单于的王廷均使用汉字，所有与汉朝往来的文书，皆用汉字书写。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历代单于因“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③]“若鞮”为匈奴的“孝”字。有些匈奴的墓葬，还仿效中原汉墓的棺椁制度，如内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西汉时匈奴大墓，其棺椁制度即与中原汉墓相类似[④]。在西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井渠开凿和冶铁技术也得到了传播。现在新疆的轮台、沙滩、若羌等县及罗布泊北岸，均发现过汉代的屯田与井渠遗址等[⑤]。井渠技术是汉武帝时在关中修建龙首渠时首次发明的，因渠首从商颜山（今陕西澄城铁镰山）经过，那里土质疏松，渠岸极易崩塌，“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⑥]。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坎儿井。不久，这种井渠的开凿技术便传到了大宛。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已“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⑦]。此后，这种井渠技术又在敦煌和罗布淖尔以东的白龙堆地区推广开来。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孟康注曰：“大井六

---

①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④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⑤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⑥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⑦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①]。后来，此项技术便被西域各地广泛采用。在新疆的许多地方，还发现过汉代的炼铁与炼铜遗址[②]。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与甘延寿出使西域，"胡兵""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但过了几年，却已"颇得汉巧"[③]。西汉的军政、礼乐制度，也被西域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居住长安一年，"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④]。莎车王延，汉元帝时曾入长安为侍子，"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⑤]。在西南夷地区，"夷"人也从迁入的汉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铜、铁工具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并已掌握了冶炼技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除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铁锛、铁削和铜柄铁刃斧等，共92件[⑥]。贵州清镇、平坝一带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铁制的犁、锄、刀、斧等出土[⑦]。一些比较先进的"夷"人，如楪榆（今云南大理、洱源）的僰人盛范、张叔还先后跟随司马相如学赋学经，后来盛范著有《赋心》四卷[⑧]。

与此同时，边疆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到中原地区，促进着内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匈奴的牲畜就源源不尽地输入中原，"骡驴馲駞，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⑨]。此后，骡驴逐渐成为中原的重要畜力。匈奴人的养马技术，对汉朝养马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西汉军队通过与匈奴骑兵的作战，更加成熟地使用大规模骑兵集团远途奔袭和迂回包抄

---

①④《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②《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③《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⑤《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⑥《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⑦《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七十八《大理府·人物》。

⑨《盐铁论·力耕》。

的战术。西域的良种马亦在此时传入中原。《汉书·张骞传》载，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天子“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同时传入的还有中原未曾见过的新的果蔬品种。《汉书·西域传》载，张骞通西域后，“汉使采蒲陶（葡萄）、目宿（苜蓿）种归……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西晋张华《博物志》称，其时从西域传入的还有石榴、胡桃（核桃）、胡蒜、胡葱、胡瓜、胡荽（芫荽）、黄蓝等。《草木经》又称，张骞通西域后，引进了胡麻（芝麻）、胡豆等。此外，匈奴的胡笳、鞞鼓等乐器和歌舞，西域的琵琶、箜篌、胡角、胡笛等乐器和歌舞，西南夷的巴渝舞等，也纷纷传入，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我国的古乐，打击乐器多，管弦乐器少，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与乐器传入后，引起了当时音乐的重大变革。有些乐曲和乐器，直到今天仍在我国的民族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不仅推动着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同时也逐渐打破了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促进着民族的融合。一些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逐步改变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过了若干代之后，就融合于当地的民族。例如史籍记载的，西汉时代出现在匈奴和西域的许多“秦人”、“汉人”，他们后来就大多融合于匈奴和西域的民族当中。与此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也融合到汉族中来。最突出的事例便是东瓯与闽越的越人。建元三年（前 138 年），东瓯王因受闽越王的进攻“请举国徙中国”，汉武帝将其 4 万余人徙置江淮之间的庐江郡。后来均融合到当地的汉族之中。留居原居住地的越人并入闽越。元鼎六年（前 111 年）闽越之乱平定后，汉武帝又将其王族臣民北徙江淮，这部分人也融合到当地汉族当中。留居原地的越人，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大部分也为汉族所融合，闽越之名号便不复见于史籍了。民族间的融合，既有利于各族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彼此的认同与依存关系，缩

小彼此之间的差异，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

三、沟通中外交通，促进中外的联系与交流

西汉王朝开拓边疆的斗争，将大片边疆土地统一在西汉的版图之内，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交通事业的建设，使中外交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的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

西汉中外交通的一项最伟大成就，是“丝绸之路”的贯通。丝绸之路的开辟，虽然可以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但它的正式开通则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随着汉置河西四郡，并开始在河西开展屯田，建设新的农业区，这不仅可为过往的使者商旅提供食宿和生活物资的补给，而且使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并进而与中亚、西亚及南亚的农业区也连结起来，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元狩四年（前 119 年），张骞便沿着通过河西四郡的农业区至天山南路农业区的道路第二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国正式建立联系。此后，西汉为同匈奴争夺西域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终于在神爵三年（前 59 年）设立西域都护，将西域各国置于它的管辖之下。河西四郡与西域都护的设置，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此后，“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贩客，日款塞下”，丝绸之路便日趋繁荣，成为一条著名的中西方交通大动脉。

西汉的丝绸之路是由许多条道路组成的。它的东端起自长安都城，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至楼兰（后更名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西行，经且末（今新疆且末西南）、精绝（今新疆民丰北尼雅）、扜弥（今新疆于田东北）、渠勒（今新疆于田南）、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南）、莎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后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西南行抵罽宾（今克什米尔）、身毒

（今印度、巴基斯坦），或西行至大月氏的国都兰氏城（今阿富汗北部的瓦齐拉巴德），再西行又至安息东境的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东）。北道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穿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以东沙漠戈壁地带），到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经危须（今新疆和硕县东北）、焉耆、尉犁（今新疆博湖）、乌垒、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尉头（今新疆阿合奇）、疏勒，然后越过葱岭，向西北到大宛、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下游），再沿妫水向西北行，可到奄蔡（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北岸）。

丝绸之路贯通之后，大批中西方的使者和商旅往来不绝，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大量销往西方，中国的丝绸更远销欧洲的罗马，成为罗马贵族喜爱穿用的衣料。中国的冶铁技术也传入中亚各地。原先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一作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①。中国的穿井技术也传至中亚乃至印度。与此同时，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土特产和艺术也开始东来。张骞通西域后传入内地的许多植物品种，有的就出自中亚等国，如石榴来自大夏，胡桃出自安息。中亚各国的音乐和西方的幻术（魔术）、玻璃制品，也相继传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出兵灭了南越，分其地为九郡，其中交阯、九真、日南三郡设在今越南境内。不久，汉武帝又出兵攻灭朝鲜卫氏政权，将其统治区划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这样，西汉与越南、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就更加密切。当时西汉严禁蚕种外传和铁器出口，但越南与朝鲜除外，中国的养蚕技术与铁农具便传入越南和朝鲜，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越南和朝鲜还通行汉字，这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西汉政府在统一了南越、东瓯和闽越之后，其远海航运中心也由齐地向南方转移，会稽郡的东冶（今福建福州）与南

---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海郡的番禺（今广东广州）逐渐发展为海港都市，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东冶可通航日本、琉球，番禺则成为通往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港口，从而推动了中国对日本、琉球、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至印度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八章　西汉中期的边防建设

从汉武帝时起，西汉王朝在大力反击匈奴的同时，又凭借其强盛的国力，积极加强边防的建设。首先是大力修筑长城，除重修前代的长城外，还在某些地段增修复线，并新建边城、亭障、烽台及军用道路，使之成为一项集国防、交通、通讯三位一体的完备的边防设施。其次，积极扩充边防军，除原有的戍卒、边郡正卒外，还利用募兵、谪卒、弛刑徒、属国兵，组成强大的边防部队，屯戍于绵延数千里的边防线上，或守备作战，或屯田耕作，或候望报警，或从事军需供应。第三，移民实边，将大批内地居民徙置会稽、辽东、朔方及西北各地，而以徙往西北为主，利用他们垦荒拓疆，并随时防御周边民族的侵扰。这些措施的推行，极大地加强了西汉王朝的边防力量，为取得反击匈奴、通西南夷及平定南越、东瓯、闽越战争的胜利并巩固其胜利成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第一节　大规模修筑边塞

一、西塞的修筑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随时防备匈奴的袭扰，令蒙恬在原来秦、魏、赵、燕等国旧长城的基础之上，修筑了一条“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① 的新长城。秦长城的许多部分，在汉代还较为完整地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当时人们称它为“长城”或

①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故塞"，成为汉初抗御匈奴南下的重要边防设施。早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时，高祖就曾令人"缮治河上塞"①，不久又修筑"辽东故塞"②，这些都是对秦长城的重新缮修。直至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之后，汉武帝继续对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卫青奉命"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③。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载，这次修缮并非都是对秦时长城的简单整治，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这些新筑的地段，与秦长城相比较，位置向南推移，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④；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⑤，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大大增强了汉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⑥。可见此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

然而，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仅仅依靠维修和利用秦长城，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的需要。因此，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这12年间，西汉王朝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当时人不以"长城"名之，而是统称为"塞"，或称这些边防防御工程为"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亭燧"等等⑦。这些障塞亭燧及边墙，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

所谓"西塞"，是古人对汉朝在占据河西走廊及开通西域过程中所修筑的防御工程的通称，因地处秦长城之西而得名。

---

①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

③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④ 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⑥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⑦ 参看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西塞的东部起点，是金城郡的令居，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①。由此逶迤而西，直至敦煌郡的玉门关。其直线距离约为950公里，折合汉里约为2375里，它的修筑，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汉将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数万兵士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同年秋，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数千里，对河西地区进行了最后一次扫荡。与这些军事行动密切配合，汉朝“初置张掖、酒泉郡”并调发“数万人渡河筑令居”。②这既是西塞建置的开始，也是西汉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地兴建新的长城③。

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之说，此次修筑的边塞，始于令居，止于酒泉，大约是从令居北行，经张掖、休屠（今甘肃武威北）、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而折向西行，即从北纬37°以南，沿东经103°以东向北行，至北纬39°以南折向西，经日勒、删丹至今张掖；然后又自张掖沿甘州河（今黑河上游）东岸西北行，经今临泽、高台、積夷营而至毛目（今甘肃鼎新），再折向西行至酒泉，全长的直线距离约为450公里。

这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东段”，它的修筑，有利于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局面，使西汉王朝初步实现了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同时也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西塞修筑的第二阶段，始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在此前一年，为保护汉朝的西行使者，同时也是为了在西域的东部取得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亲附汉朝的据点，汉王朝发动了楼兰之役。在攻破楼兰、姑师之后，汉军“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

① 令居塞之地望，传统说法是在今永登县西北的庄浪河西岸，但薛方昱则认为，令居塞即是永登西部微偏南大通河东岸的连城，说见其《汉代令居塞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③ “西塞”始建年代有元狩二年说。此处从陈梦家。

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①。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此处的玉门即玉门关，乃指玉门都尉治所而言，在敦煌郡治敦煌之西②。

此段汉长城，可称为"西塞西段"，它起自毛目以西，先沿北大河（今临水）至三墩西北，临水于此折而南流，长城则自此向西，直至酒泉西北营盘堡北，又傍疏勒河向正西而行至玉门关，全长大约500公里左右。

长城的西延，实际上是汉朝兵威西渐的一部分，它既是汉朝用兵西域第一阶段的战果之一，又对此后汉朝继续经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后，汉朝西筑亭障的行动仍未停止。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逼降大宛，汉朝的亭障又从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已伐宛，……岁余，……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③对于此事，《汉书·西域传序》则记为"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盐水"与"盐泽"，所指略有不同④，但其大概方位，均是今新疆罗布泊地区。通过考古调查可见，由营盘（东经87°30′，北纬41°）西北沿库鲁克塔格尔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在170公里以上的古道旁，发现了绵延不绝的烽火台，一直延伸到库车的西北（东经82°50′，北纬41°30′）为止。这些烽火台的建筑结构，与在甘肃境内的汉代亭燧相同，只是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接⑤。这应当就是文献中所说的"西至盐水"的亭障，它的终点，

---

①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

② 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③ 此处引文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更动了"置"字的位置。

④ 陈梦家以为，"盐水"专指"盐泽"以西流入盐泽之水，约当今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

⑤ 参见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

可能是渠犁附近、孔雀河上游的连城①。

这些亭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西塞的发展和延续。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构成了交通线和供给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亭障还为汉朝向更西的远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亭障西至盐水，表明当时汉武帝仍有继续向西拓展疆土的打算，只是由于后来国内形势发生剧变，促使汉武帝颁“轮台诏”而改弦更张，西筑亭障才告终止。

二、居延塞的修筑

在河西走廊的北侧，自东而西横亘着龙首、合黎和马鬃三山，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北山”。与位于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脉（又称“南山”）的陡峭挺拔、雄伟浑厚不同，北山的山势低平，而且还有几处缺口。这几处缺口不仅使强劲的朔风把大量飞沙带进了走廊，形成了大片的风成沙丘，而且也为来自北方的敌人突入走廊留下了通道。

出现在合黎山与马鬃山之间的分断，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缺口。这里地形平坦开阔，戈壁、沙漠广布、植被稀少，弱水（今额济纳河，又称居延水）南北纵贯，其终端汇潴成居延海，古称居延泽。弱水两岸及居延海周围灌丛密集，水草丰足，是一片宜农宜牧的大绿洲。

“居延”本为匈奴中地名，系因安置所获“居延人”而得名。秦汉之际，匈奴的骑兵沿弱水南下而进入河西走廊，既控制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冲，又可沿甘州河翻越祁连山而

---

① 此据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张维华认为轮台一带亭障之建置，当在汉昭、宣之间，说见其《中国长城建置考·汉边塞》，中华书局1979年版。

到达羌人的游牧地区①。显而易见，封堵此一缺口，对汉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筑西塞，将这一缺口用长城封锁起来，但自漠北沿弱水两岸通往河西的通道并未切断。自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王廷不断西移，渐与汉酒泉郡相直，因此，酒泉郡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而居延海一带更加成为关乎大局的战略要地。

针对此种情况，西汉朝廷不断采取措施，试图强化河西防务的这一薄弱环节。起初，汉朝以重兵屯守居延的方式来控制此地②，至太初三年（前 102 年），又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据《史记·匈奴列传》，负责修筑居延塞的，是强弩都尉路博德。居延塞起自居延泽西，索果淖尔（今内蒙古苏古诺尔）之南，沿额济纳河直至毛目之南，在东经 100°～101°30′之间、北纬 40°～41°30′之间西南斜行，全长约为 250 公里③。

与居延塞修筑相同时，汉武帝又下令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经考古调查可知，居延塞自居延泽之东北与上述塞外列城相连接。④ 又据《史记·大宛列传》，同是在太初三年，汉武帝为准备第二次伐大宛，“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即设置居延都尉和休屠都尉。显而易见，筑居延塞仅仅是太初三年汉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的一部分。就其直接的目的而言，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匈奴乘汉军远征大宛之机袭扰汉边而为。

果然，当李广利率军西征之后，匈奴便两路出兵，一支攻入

---

① 参见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②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路博德在失侯之后便领兵“屯居延”。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路博德失侯事在太初元年，是知汉军屯戍居延不会晚于此年。

③ 参见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 年第 1 期。

④ 参见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并沿途破坏五原塞外徐自为所筑城塞亭障；一路由右贤王率领攻酒泉、张掖，虏掠数千人。但在汉军的反击之下，右贤王军很快便败退，“尽复失其所得而去”①。

然而，居延塞的修筑又不仅仅是为酒泉等郡增添屏障，它实际上更是汉军的一个前方基地。由于这里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因而很快就成为西汉边塞屯田的一个中心，牢牢地控制了深入蒙古大漠的最捷近的路线，为以后西汉王朝犁廷扫穴创造了前提。

三、塞外列城的修筑

所谓“塞外列城”，是指汉武帝时期于秦长城以北亦即阴山以北所修筑的边防工程。

塞外筑城，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据《汉书·武帝纪》，当时匈奴乌（一作詹）师庐单于好杀伐，内部不安。是年五月，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而降汉。为接应左大都尉，武帝“遣因杆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此城具体地望不详，约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据《汉书·匈奴传》载，太初二年秋，乌师庐单于曾遣骑兵攻打受降城，不能下，乃侵边而去。其后，汉置受降都尉长驻此城，可以推见受降城的规模较大，屯兵亦较多，其作用相当于汉边的前哨阵地以及汉军出征的中转站。

太初三年，汉武帝在路博德筑居延塞的同时，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②。五原塞位处阴山南麓，系由原来的赵长城与秦长城构成，地当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徐自为所筑的塞外列城，则是建筑在阴山北麓的蒙古高原之上，又称“光禄塞”、“光禄城”、“武帝外城”等。

由考古调查得知，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实际上是南北两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卢朐，山名，地在阿尔泰山南麓某地。

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特拉后旗的乌力吉苏木、宝音图苏木、巴彦前达门苏木以及乌特拉中旗的巴音杭盖和乌兰苏木一带，两道长城相距 2 至 30 公里，呈不等距的并排排列。而后向东，北面的一道由乌特拉中旗的桑根达来苏木进入达茂旗的红旗牧场，约由百灵庙之北折向东南入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南面的一道则由乌特拉中旗的新呼热苏木进入达茂旗的新宝力格苏木、西河苏木和固阳县北部的边墙壕村，最后到达武川县西部，与大青山北麓的长城会合。在今武川县的哈拉合少和哈拉门独，有三条长城的会合点，似是“出五原塞”的起点。这两道长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部即东经 105°30′～106°之间进入蒙古国境内。据了解，北面的一道延伸至戈壁阿尔泰山脉之中，而南面的一道则于东经 102°30′处复入内蒙古境内，至东经 102°20′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东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遗迹联系在一起①。

汉武帝把长城修到了匈奴的腹地，其用意不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纵深，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向极北地区发展的战略动机。所以，塞外列城在当时对匈奴构成的直接威胁，似较其他边塞为大。因此，就在徐自为完成了塞外列城的构筑不久，匈奴军便大举入侵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在杀略数千人后退军时，又“行坏光禄所筑亭障”②。其目的之一，显然是想乘汉军部署未备之机，毁坏塞外长城，由此可见匈奴对这条伸入自己腹地的汉长城的惧怕。

---

① 关于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可参见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刘观民：《秦汉长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 1 版。史学界对此问题存有歧说，可参见《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 年第 5 期；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3 期。另有人认为武帝外城仅是塞外的一条行军道路，使用不久即被破坏，可参见《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 1 期。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正是因为塞外列城的战略意义重大，汉朝一直不惜财力、人力，坚守这道防线，直至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因“匈奴不能为边寇”，汉朝这才“罢外城，以休百姓”①。

综上所述，西汉边塞的修筑，不仅积极利用旧有的长城，如秦代的“河上塞”和燕国的“辽东故塞”，而且还新修了复线，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西汉边塞，东起今朝鲜的清川江，西至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再加上五原塞外的光禄塞等，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边塞。

四、边塞的构成

汉代的边塞，是一个庞大的国防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长城”一词给人的印象那样，只是接连不断的一条城墙。实际上，这个体系是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整体。这个体系，是以因地制宜、据险置塞为原则而构筑的。所谓因地制宜，一是指巧妙地根据所在地形条件来构筑工事，二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物产选择合适的质材为建筑材料。所谓据险置塞，主要是指利用天险御敌而言。这个体系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城墙、城障、亭燧烽台及军用道路四个部分。

（一）城墙

城墙是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主干部分，它是集阻障、防护、据守、观察、隐蔽等功能于一身的线式防御建筑物。由考古调查可知，汉边塞之城墙蜿蜒绵亘于山岭、沙漠、草原、绝壁等诸多复杂地形之中，其构筑的材料和方法，则因地形、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段，也互不相同。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试举数例如下：

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的最高一段，建在当谷隧以东约300米处。现存城墙系用流沙、散石、红柳或芦苇筑成。这完全是与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相应的，因为这一带没有黄土及石材，只出流沙与小石子，而附近的沼泽地中则生长有芦苇或红柳，于是筑城时便就地取材，以流沙、石子和芦苇等物掺和筑墙、层层上铺，一般每层的厚度为20－30厘米左右，整个墙体的高度可达数米。现存遗迹保存较好，沙粒与石子已牢牢压实，与芦苇枝、红柳枝条粘结在一起，十分牢固①。通过考察还可发现，西汉敦煌郡的长城大体沿疏勒河畔修筑，遇到湖泽、碱滩则或有间断，径以湖泽、碱滩为“墙”②。

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管辖的“北大河塞”，其塞墙的修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双重的粗石板垒起而填以砾石；另一种是仅用压紧的柴枝作成③。

塞外列城中南面的一道城墙，在锡尼乌苏以西，都是用石块垒砌而成，从锡尼乌苏向东，有一段是由石片包外而内实夯土，再向东行，则全部为土筑而成④。

各地汉长城的宽度与高度，也无定制：上述玉门关附近的长城遗迹现高3.2米，厚2米；“北大河塞”的两种墙体的基宽至少为2.5米，高度可达3米；而“塞外列城”中南塞墙的石筑地段基宽一般为3.5米，顶宽2.5～3米，残高在2～2.5米之间不等。而乌兰苏木胡勒嘎处的北塞墙则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笔直的砂土

---

① 参见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第118页，巴蜀书社1991年版。

② 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参见斯坦因：《亚洲腹部考古记》第406～407页，转引自陈梦家《汉简考述》。

④ 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见《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垅，现高仅有1米左右，其外(北)侧为浅宽的人工沟濠，土垅的宽度约有5米，沟濠则宽8米，说明这一段长城似以沟为主①。

《汉书·匈奴传》下载有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之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段说明汉代边塞修筑形式与方法多样性的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有力证实。

（二）城障

城障是某一段长城防线的守卫中心。《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同书《李陵传》颜师古又注："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战国策·魏策》鲍彪注曰："障，隔也，筑城垒为之。"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驻有戍卒守卫的长城沿线的支撑点，它们往往都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此类城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居延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这是一个构筑坚固的军事性小城堡，障坞毗邻，障在坞的西北隅，为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3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障顶东北角残存窄土楞，似为女墙。障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西侧有登临障顶的台阶式蹬道，东侧堆叠有防备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坞比障大一倍，坞墙系夯土筑成，每边长46米左右，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东墙辟一门，门外设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有四排尖木桩。木桩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作三角形排列。坞内东北隅也有登临坞顶的蹬道。障、坞内部还有甲渠候和吏卒的住室②。

---

① 参见罗庆康：《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② 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朝鲁伦发现的汉代石城，可能是属于“塞外列城”的一个城障。该城平面基本呈方形，从内墙角丈量，东西墙各为126.8米，南北墙各为124.6米，墙壁用石块垒砌而成，基宽5.5米、顶宽2.6米、残高2.8米左右；城门设在东墙，门道宽6.6米，外设瓮城，其门南向，宽5.6米，瓮城长14.5米；城门里的两侧、四角的两侧和南墙、西墙中段的内侧，都有登城台阶；城内西南部，还有一个大院的痕迹，实际上起到城中之城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城墙的四角向外凸出，凸出的部分也较方正，凭借这种墙台工事，可以控制整个城墙，消灭全部的射击死角，从而大大增强了该城的防御能力①。

城障一般都建在长城的内侧，但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者。它们的位置，大多处在长城防御体系内的防御要点之上。通过调查发现，处在交通要道、险要山口等位置的障城，面积都比较大，分布也较为密集；而在非主要防御的地段上，城障的面积比较小，间隔距离也比较大。

（三）烽燧

烽燧又称亭燧，因亭是望楼即烽台之故。作为城障的耳目，烽燧主要用于报警，是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哨所，亦是边防候望系统的核心，地位十分重要。

烽燧一般都建筑在视野开阔之地，而且也很注意利用天然屏障。例如，疏勒河下游及罗布泊洼地的河、湖相沉积受风力侵蚀，形成了风蚀土墩与风蚀凹地相间的雅丹地貌，而这里的烽燧遗址，大都坐落在星罗棋布的风蚀土墩上②。综观敦煌、酒泉二郡及居延地区的烽燧，有许多都是建筑在高地、山麓、岗或梁上。

汉代的烽燧大多沿长城一线罗列，一般以居于长城内侧者为多，但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烽燧遗址却多在长城的外侧，这可能和

---

① 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② 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监视羌人活动密切相关①。烽燧分布的密度，似无定制，主要由所在地段的地形地貌及防御需要来定。根据统计：汉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 164 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者为 8 公里，最近者仅 0.13 公里，各仅一例，90%以上的烽燧相距为 1～2.5 公里②。在内蒙古沙井苏木境内“塞外列城”的南塞墙内侧，大约每隔 1 公里左右置一烽燧③；而乌拉特后旗境内“塞外列城”的烽燧间距则为 2.5 公里左右④。

汉代烽燧的建筑手法及形式，也是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内蒙古地区的烽燧，设在山巅上，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 10 米，个别烽台的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 7～8 米，高 3～4 米，有的四周筑有围墙⑤。

西北地区的汉代烽燧，情况又有不同。据在敦煌、酒泉、居延地区的调查所见，烽燧绝大多数以土墼垒砌而成，间或用石块或石块与土墼混合垒砌。敦煌郡玉门都尉所辖烽燧中以夯土版筑而成者为数不少，而中部都尉所辖烽燧还有用湖沼中碱化的泥土间以柴木筑成的。这里的汉代烽燧，多呈下宽上窄的方柱形，台最高者可达 10 米多，烽台底基一般是 36 平方米至 81 平方米，烽台之上建一方形小屋，高 1～3 米，面积 4 平方米至 9 平方米左右，小屋四周墙壁开孔以便候望。许多烽台都有墙环卫，与坞相连。坞分内坞、外坞，内坞置居室，坞与烽台以阶梯相连；烽台和坞内

---

① 参见马杰英：《甘肃永靖县境的秦汉长城烽燧遗址》，《文博》1989 年第 6 期。

②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参见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

④ 参见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

⑤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405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屋以马粪涂地，以草或白土涂壁。①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烽燧遗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烽燧建筑的详情，下面略举几例说明：

敦煌玉门都尉所辖 T.6.b 烽燧：烽台底面积 40.94 平方米，残高 4.9 米，坞与烽台西、南两壁相连，烽台南侧与坞壁衔接部有坞陛，遗存阶梯六层，坞门北开，坞内有套房三间，炕、灶各一个。屋内灰堆土中出土 200 多枚汉简，共出的还有封泥匣、木梳、辟邪用的人面画杙、绘有人面的画板、麻鞋、丝织品残片等②。

敦煌中部都尉所属 T.22.d 烽燧：烽台底基 24.01 平方米，残高 2.7 米。坞与烽台东壁相连，内有套房三间，隔道一条。这条隔道可能是火墙或炕之类的遗存。烽燧西南有两片灰区，除发现十几支汉简外，还有木梳、木碗等遗物③。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长方形，底基 63.46 平方米，残高 1.87 米，为三层土墼中夹一层芦苇叠砌，无粘接材料。烽燧上部结构不明，烽燧四壁皆涂以草泥，表面刷白粉，由于多次涂草泥和粉刷，墙表草皮有的多达 12 层。粉刷的颜色，有土红色、浅蓝色和白色数种。此种情况，在堡内房屋中亦存在。在烽燧东南角早期留有一长方形缺口，攀登方式不明，晚期在此处向北砌筑台阶，现存四级。早期坞筑于烽燧东侧，坞墙与烽燧的东、南壁相连，坞墙夯筑，坞门西开，宽 0.76 米，有双重门，坞内有过道和套房三间。坞南墙外东侧为厕所，以苇编矮篱墙围成，长 3.4 米，宽 1.13 米、门宽 0.67 米；坞南 20 多米处，有苇篱墙筑成的长方形牲畜圈④。

居延卅井塞所属 P_8 烽燧：建筑在高戈壁梁上，8 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垒砌而成。烽台底面积 14 平方米，残高 5.5 米。烽台西、南两壁与坞壁相连。坞墙今残高 0.2 至 0.4 米，西壁长 16.8 米，

---

①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 34～44 页。

②③ 参见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

④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0 期。

南壁 13.3 米。坞内东南角有椭圆形土堆，似为房屋地基①。

塞墙、城障及烽燧是边防军事设施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配置情况，可以小方盘城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小方盘城遗址一般认为是西汉玉门都尉和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位于敦煌县城西北 80 公里，编号 T.14 障。障系夯土版筑，平面呈四方形，障内面积为 16.5 平方米，障外壁每边边长 26 米，墙高 9 米，障门开在西墙中部，门宽 2.4 米，高 2.7 米。障北与 T.13、T.14a 等烽燧相连，再北至塞墙，南与 T.14c、T.18a、T.18b 等烽燧相连。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塞墙、城障及烽燧通常都是配套设置，但在汉军一时不便或不宜筑墙的军事战略要地，往往也要设置亭、障、烽燧等军事设施；地位次要者，则构筑烽燧。例如，在盐水之西就分布着众多的亭障，它们对汉朝经营西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如，在内蒙古腾格里大沙漠与巴丹吉林大沙漠之间的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山沿线，也发现了烽火台群及城堡等遗迹，它们的存在，对西汉时期居延塞及武威等郡的防卫，给以有力的支持②。

（四）军用道路

军用道路，是长城防务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障塞烽燧犹如武士身上所穿甲胄上零散的铁片，那么，军用道路则是将这些铁片串联并紧系的坚韧的韦带。

在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当中，军用道路可能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是因为，数十万修筑长城的施工人员分布在连绵千万里的广阔地带，他们的给养输运不可或缺，而这就首先要求道路畅通。当长城防御体系初步完成之后，为满足皇帝巡边、大军出塞以及传递情报等方面的需要，也势必要对道路的平整和畅通提出较高的要求。

---

① 参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1989 年 6 月 23 日。

秦始皇在令蒙恬修筑长城之后，又命他修筑了由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至国都咸阳的“直道”。根据调查，秦直道的许多地段残宽 30～50 米，能够保证车、步、骑混合编成的大军团顺利通过。沿途还设有兵站，既可贮存装备，又可驻屯军队，从而保证了随时以物资、兵力沿直道支援长城防线①。

西汉时期长城沿线修筑军用道路的情况，史书中缺乏记载，考古调查所见遗迹也不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军用道路建设，成就依然很大。

西汉前期，曾经数次缮治秦时的北边长城，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对以秦直道为主干的军用道路的修整。汉武帝元光五年（前 130 年）夏，曾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②。修筑道路应是这项工程中的主要部分。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③。这表明，北边的道路已有适应帝王乘舆通过的规模。在汉武帝时期，汉军数次利用北边道路集结兵力，由北边各郡同时出击。特别是元狩四年（前 119 年）漠北决战的前夕，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临时调换出击地点，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系统作保障，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军用道路，大体上应和长城相并行。汉宣帝时，赵充国远在金城平羌前线，距离长安约 10450 汉里（约 4200 公里），但其上书在七日之内便可递交到宣帝手中，平均每日夜可传 250 公里。在当时的情况下，仅有良马而无良好的军用道路网络，是很难达到如此高的速度的。从居延汉简的材料中可知，修筑道路并保证其畅通无阻，是戍卒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当时，设有专职筑路养路的士兵，称为“除道卒”。E. P. T65：230 简文曰：

---

① 参见《陕西旬邑县发现秦代兵站遗址》，《人民日报》1986 年 10 月 3 日。

②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车马中央未合廿步溜漉不可

该简说明了对雨后养路的严格要求。而“中央”、“廿步”等，则反映出道路的规模很大。

在内蒙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山麓的56座烽火台群中，发现20多条石块铺设的道路，至今遗迹仍清晰可辨。它们分为上行道和下行道，路基各宽约6米，两道并行，将各个烽火台和障城连接起来①。雅布赖山位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在汉代并非防御的要害地段，但军用道路修治得如此之好，其他地区的军用道路的质量，自是可以想见了。

从以上对西汉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塞情况的叙述当中不难发现，西汉王朝为构筑边塞，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作为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的构筑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汉长城的修筑，对抗击匈奴及防范氐、羌等族的进犯具有重要作用，在军事上的意义十分重大。长城的最初兴建是为了战争防御，但西汉长城的修造则更侧重于对进攻的支持。西汉长城的兴建、包括对秦故长城的大规模缮治，几乎全是在汉王朝最为兴旺强盛的时期完成的，它更多地反映出了王朝开拓进取的姿态。检诸史实，可知西汉长城的兴建，往往是在某一重大战役获胜之后进行的，而某段边塞修筑完毕后，又常常进行新的战役，新近兴建的边塞，便成为汉军远离城墙的军事行动的有力支撑点，成为汉军作战逐次推进的出发基地。显然，汉武帝是把边塞的修筑纳入其反击匈奴、开拓边疆战争的总体战略之中来考虑的，因而它就具有其他时期修筑长城所不具有的军事上的主动意义和积极进攻的倾向。

第二，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区及西域诸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

① 参见《北方古文化又一奇观》，《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

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而西域诸国，更是所谓“化外之地”。当汉边塞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不可避免地同时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边疆地区社会状况的稳定。至于西塞及西域地区的亭障烽燧，对于汉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西域诸国的归附，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进了欧亚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自从张骞“凿空”以来，汉朝与西域便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关系；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西域广大地区都归属都护管辖。中国大陆通过西域与中亚、欧洲地区进行着各种贸易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一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济通道。为保障中外使节及商人的安全，汉政府凭借长城及亭障烽燧，设置许多关城或关卡，稽查行旅，维持秩序，从而保证了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供应和住宿地点，促使这个经济通道日趋繁荣。

第二节　大规模移民与军队屯田

一、大规模移民实边

前已述及，在汉文帝时期，西汉政府曾在晁错的建议之下，“徙民实塞下”，对抗匈卫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时至汉武帝之中期，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由于汉匈双方战事不断，向边疆地区移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由于西汉王朝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不仅使得徙边之民所面临的生存危险和压力较之以前大为减轻，而且还为边民提供了随军出征以获取战利品的良机。因此，在这一阶段，就接连出现了大规模国防移民的高潮。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收复河南地，汉武帝新置

朔方、五原二郡；是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夺得河西之地，汉政府“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②。

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③。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④。

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起事，遭到镇压后被“分徙酒泉郡”⑤。

与汉初的“徙民实边”相比，汉武帝时期向边疆地区的移民，具有下述几个特点：首先是规模巨大、人口众多，移民对象主要是在户籍的平民，而不是罪犯、奴婢等。从一次性移民的数量多达十数万、数十万的情况来推测，举家迁徙的方式应是移民的主要方式。其次，移民是与新置边郡相配套的举措，同时又往往和军队的屯戍与屯田相呼应。每一次移民高潮，都在各个新置边郡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三，西汉政府为推行“徙民实边”，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以元狩四年徙关东贫民为例，为安置这些移民，国家投入了相当多的财力、物力，“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最后竟然造成了“县官大空”⑥、政府财政枯竭的后果。

根据晁错的建议，政府对徙边的移民，首先要在一定年限内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即“先为室屋，具田器”，同时还要“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⑦。这对于政府来说，有时候确然为一沉重的负担。但汉武帝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大规模

①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序。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又《汉书·食货志》下记其事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

⑥《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⑦《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向边疆移民，主要是因为这项举措具有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长远利益。在经济上，它可以减轻内地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地旷人稀的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扩大全国的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在政治上，它可以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依托，安定生产，免致流亡，又可使那些罪谪、刑徒之辈获得自食其力的机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军事上，移民充实了边疆地区的人口，实际上为国家准备了更多的御敌之人，增强了国防力量。

从汉简材料可知，西汉政府对徙民实边的管理方式，是和内地完全一样的郡县乡里制度。移民的身份，仍然是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他们虽然在到达边郡的初始时间享受到国家的各项照顾政策，但超过规定的年限，仍和内地的农民一样，要向国家缴纳租赋。所以，西汉时期的"徙民实边"，与后世的"民屯"，并不相同。①

汉武帝以后，由于军屯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由于边境少事而边地人口繁衍增多，所以文献中不再见有大规模移民实边的记载。

二、军队屯田

"屯田"一词，始见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等人所上《屯田奏》中。其奏曰："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②"屯"，即戍守、驻守之义，"田"乃耕种、耕田之义，因此，"屯田"的原始意义，当以且耕且守为是。

---

① 参见刘光华：《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柳春藩：《西汉徙民实边屯田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汉代使用“屯田卒”即屯田兵进行的屯田，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具体说来，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战役之后。《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从文句推测，屯田开始的时间，当在元狩四年末或元狩五年。

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的屯田，最先是在朔方、五原、北地、西河等北部边郡，汉军占领河西之后，屯田的事业便发展到了张掖、武威、居延、敦煌等地。当汉朝的势力进入西域后，屯田又在轮台、渠犁、伊循、姑师、莎车、北胥鞬、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番西）等地出现。而当汉军进兵湟中之时，那里很快也开始了屯田。显而易见，西汉的屯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由国家经营的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兼具军事和经济特色但以军事功效为主的政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屯田和筑塞、徙民实边一样，同是一系列军事胜利的结果，是西汉王朝为巩固已经取得的军事成果、巩固边防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西汉屯田的区域，已如上述。屯田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长期屯田和临时屯田两种。长期屯田可以朔方郡的北假屯田点为例：这里的屯田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后，经昭、宣两朝而不衰，连续经营70多年，至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四月暂告罢止。由于这里的屯垦基础很好，所以王莽时期又在此地恢复了屯田。临时屯田可以赵充国的河湟屯田为例：它始于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0年）的秋末，至次年五月便随着汉军的撤回而罢止，屯田只做了一些修渠、整地、耕种等基础性工作，并未完成一个完整的收获过程，即将所屯之田转交给了边防军政有关部门。

无论是何种类型，在屯田地点的选择上，都具有共同的标准。首先应是军事重地，交通便利，战略上意义重大；其次则是土地肥沃，宜于耕种。例如，朔方郡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屯田点，东临黄河，西、北两面临阴山南麓，既有引水灌溉之便利，又扼守住了通往山后地区的要道路口。再如河西的居延屯田，选择在额

济纳河的带状绿洲之上，水草肥美，可种五谷，因而农业生产的经营状况一直很好，同时又可借屯田控制自蒙古高原进入酒泉、张掖的唯一通道，有力地卫护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又如西域的姑师，地当匈奴自蒙古高原进入西域之孔道，同时又是沟通天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是汉朝经由北道进入西域的必经之地，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汉与匈奴在此地反复争夺，双方争相屯田于此。

屯田的组织管理系统，由于屯田类型及屯田区域的不同而各自有异。赵充国在河湟的屯田，本是配合对羌人作战的军事行动而采取的一种对策，参与屯田行动的，是正规部队的现役士兵，因而其组织管理，完全是依照军队原有的编制系统来进行的，没有另设一套专门的屯田管理体系。

汉朝在西域屯田，起初是为了解除汉在西域供应之困难而起，经历了一个屯田点由少渐多，规模由小渐大的缓慢发展的过程。西域屯田的开始时间，据《史记·大宛列传》，是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最早的屯田点设在轮台①。但汉武帝时屯田西域的规模只是数百屯田卒而已，汉昭帝以后，屯田地点逐渐增多。至汉宣帝初期，汉在渠犁一地的屯田卒就已达 1500 人。但在西域都护设置之前，汉在西域的屯田没有一个主管长官，大致是由各屯田点的长官——“使者校尉”自行管理。汉制，校尉皆掌兵之官，在西域的汉朝各校尉亦然，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耕种、收获，而是凭借屯田以“积谷”，供应中外使者和商人，征伐那些亲附匈奴的西域国家。神爵二年（前 60 年），西汉王朝在西域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正式设置，西域的屯田事务也就有了一个最高主管。这样，西域的屯田管理，就被纳入西域地方军政管理的系统之中。所以如此，大概和西域屯田总体规模较小、人数不多、屯田卒作战任务较重的情况有关。在西域都护之下，有“戊己校尉”等屯田官，但其本职，仍是“处西域之中，镇抚诸国”的军

① 张维华先生认为，西域屯田始于汉昭帝时期，汉伐大宛后已有西域屯田之建议，但未被武帝所许。说见其《西域都护通考》，收入《汉史论集》。

事长官。可见汉在西域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屯田组织管理系统。

西汉在北方边郡及河西地区的屯田，规模宏大，时间久长，因而其组织管理系统也比较复杂。北边屯田的情况，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详情尚不得而知。但河西地区由于大量汉简的发现，使得人们对此一地区西汉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情况能够有较为详尽的了解。

一般说来，边郡的屯田事务不属于郡县政府所管辖，而是自中央到地方另有一套组织管理系统。在中央，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大司农是兼管各个边郡屯田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各边郡，则设有独立于郡府行政系统之外的农都尉，直接接受大司农的领导，为主持本郡屯田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农都尉之下设农令，相当于地方行政系统中的县令（长），农令常常是某一屯田大区的主管官。其下有农长，相当于地方行政系统中的乡长。再下是农亭，这是屯田最基层的生产单位，设农亭长，直接管理屯田卒①。

以上所言只是屯田组织系统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在某些屯田地区，管理方式并非一种。根据居延汉简的材料，至少在居延一带，存在着两个系统的屯田活动：一个是属于田官系统的田卒、河渠卒、牧士、戍卒家属、刑徒复作、佃客等所负担的屯田；另一个则是普通的戍边之卒所负担的屯田，他们直接隶属于边塞候望系统，边郡的军事长官如部都尉则是兼管该系统屯田事务的最高长官。显然，在边郡的屯田卒和戍卒虽有农耕与守备的分工，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戍边者要参与农田生产，而屯田者也当在需要之时参与防务。

西汉屯田的劳动者，除去一少部分弛刑屯士和免刑罪人外，主要是“戍田卒”或称“田卒”，即是戍卒屯田。所以，西汉的屯田是军屯，即是由封建国家依照军事和国防需要组织人员在边防重点地区且耕且守的一种徭役。因而，屯田的土地、屯垦所需要的

---

① 有关汉代西北屯田的组织管理系统的歧说颇多，可参阅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农具、籽种、耕牛以及田卒生活所需的口粮、衣物、零用钱等，统统都由国家提供，屯田生产的收获物也全部由国家支配。

西汉的屯田，是巩固新拓疆土的重要措施之一。屯田卒本身，即是边塞防御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同时屯田区又为徙民、设县做好了基础准备。前已述及，屯田区最初一般是设在边塞的水草肥美宜于农耕之处，屯田卒的初始工作，无外乎修筑房屋、道路，开垦土地，修建灌溉沟渠，然后田作、收获。待屯田区的生活、生产设施基本建成、有了积谷之后，屯田卒往往另行开发新的屯田区，原有的屯田区则募民往徙，使之至有所居，饥有所食，田有所作，安心其地，逐渐建成新的县邑。这大概是西汉屯田的一般通则①。例如，敦煌郡的效谷县，就是由屯田区发展而来的。《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又如，赵充国在河湟的短期屯田，也直接影响到了金城郡之破羌、允街二县的设置。《汉书·地理志》所载此二县的设置时间，恰是在结束屯田的神爵二年（前60年），二县的地望，均在赵充国的屯田区之内②。

西汉的屯田，又是开拓边疆的重要形式。这一点，在西域的屯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西域的屯田卒，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能手，而且还是能征善战的勇士。他们在西域且耕且战，对在这一地区确立汉朝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汉的屯田，经济上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屯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许多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如“代田法”等，最早就是在屯田区推广普及的。居延汉简中有储藏代田上收获物的“代田仓”的记载③，说明“代田法”已在当地屯田中推行。许多屯田点，如居延，还是某一地区农业生产的中心。屯田节省了从

---

① 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证》戊，《边塞制度·屯田》。

② 参见[日]尾形勇：《关于屯田的几个问题》，《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参见《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第1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内地长途转输所不可避免的大量消耗，补助了国家的军事开支。屯田所获，一般能够满足屯田及戍边之人的日常需要，甚至在内地郡县发生灾荒时，偶尔还有调发边郡屯田积谷以资救济之事。

第三节　边防屯戍与边防军

一、边郡的军事机构

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设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为太守）一人为最高军政长官，秩二千石，其下有郡尉、郡丞等属官，在这些方面，边郡与内郡并无区别。

然而，由于边郡地当国防前线，是军事重心的所在，时常处在战争状态，其境内又长期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因此，边郡的行政机构便比内郡更多了一些军事色彩，边郡行政官员在军事方面的职责也比内郡为重。

秦汉时期的郡守均兼掌军事，除了主持都试练兵，掌握兵权之外，还往往将兵作战，因此，汉人又称郡守为“将”①。边郡太守作为军政首长的特点较内郡郡守更为突出。卫宏《汉旧仪》云：“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此可知，边郡太守是某一区域边防事务的最高长官，全权负责本郡的防务，统率着一支多达万人左右、战斗力较强的骑兵部队。在文献中保留的一些边郡太守领兵作战的记载，证明了《汉旧仪》有关材料的可靠性。

由于边郡战事频繁，所以郡守在郡丞之外复置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汉旧仪》亦云：“边郡置长史一人，治兵马”。长史常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将军、车骑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所置，为所在官署掾

---

① 参见施丁：《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略说》，《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属之长。边郡太守特置长史并以六百石的低秩而领兵，显然是加强太守治军权的一种措施。

郡都尉本为郡守副贰，侧重在军事方面协助太守，但由于边郡的军事防务太重，往往需要把边郡划分成若干个防区，因而仅靠郡都尉一人是不行的，所以许多边郡都在不同的防区设置部都尉，类似于近世的军分区司令。在《汉书·地理志》当中可以看到：

会稽郡有西、南两部都尉各一人；

广汉郡有北部都尉一人；

牂牁郡有南部都尉一人；

陇西郡有南部都尉一人；

武威郡有北部都尉一人；

张掖有都尉二人；

酒泉郡有北、东、西三部都尉各一人；

敦煌郡有中部都尉一人；

北地郡有北部、浑怀都尉各一人；

上郡有匈归都尉一人，北部都尉二人；

西河郡有南、北、西三部都尉各一人；

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辽东六郡皆有中、东、西三部都尉各一人；

雁门、上谷、辽西三郡皆有东、西部都尉各一人；

乐浪郡有南、东部都尉各一人；

此外，《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蜀郡有西部两都尉，《汉书·赵充国传》载金城郡有西部都尉。

部都尉是由中央任免还是由郡守任免，史无记载，但作为郡守的军事佐官，他们都有单独的治所，只负责本部的防务而不治民。

在边郡还有关都尉，如敦煌有阳关都尉，治阳关；有玉门都尉，治玉门关；张掖有肩水、居延都尉，亦为关都尉。边郡又置骑都尉，如天水有骑都尉，治豲道县，安定有主骑都尉，治参䜌

县，均见《汉书·地理志》。此外，边郡因有大量屯田卒，往往又设农都尉以领其事。

综上所述，可知边郡太守以下多设军事佐官。又据《汉书·毋将隆传》言："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说明边郡的各级长吏皆有领典军务、参与边防之责。

边郡不仅在设官建置方面与内郡不同，而且还有一些不同于内郡的军事制度，例如：

汉制，每年八月秋收后，各郡国要将正卒集中起来校阅并进行军事演习，时称"都试"，在南方设有水军之地，都试科目为演习行船、水战，北方则是步、骑兵的骑射及战阵等。都试一般都在郡治举行，由郡太守主持，郡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考评优劣。

边郡的情况特殊，不宜将士兵集中于一地校阅，因此便以"秋射"代替都试。"秋射"与都试的不同，首先在于它不是由郡守主持的全郡范围的大比武，而是由太守或部都尉下"府书"将日期、参加人员及具体规定与要求事先通知各部、候官、燧，在规定的时间分别于各候官所在地进行。其次，秋射的参加者不是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正卒或一般的戍卒，而是各候长、士吏、燧长，其科目为"射"；同时对都尉以下的长吏也要进行"杂试"，如信号的辨别等；秋射结束后，要将有关情况"封移都尉府"，以书面形式报告都尉，都尉据此对参加者给予奖励或惩罚。

二、边防军的来源及其屯戍系统

西汉王朝在边郡、尤其是北方和西北边郡大规模地建置边塞，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边防制度，没有一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较强的边防军，则西汉王朝的边防守备体系仍是不完整的，边塞防御工事的巨大战略价值也就无从体

现出来，敌军对边郡的侵袭与破坏便得不到制止。

边防军，在汉代文献中往往被称为“戍卒”。许慎《说文解字》云：“戍，守边也，从人持戈”。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今天难以了解作为西汉王朝国防力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边防军的人数，也无法知道边防军在西汉军队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不过，通过对西汉历史发展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期边防军的建设，经历了一个由少而多又由多渐少的起伏过程。当西汉前期，由于边防线相对较短，战争规模又比较小，所以边防军的数量也比较少，只是在个别时候因为应付紧急军情而大量屯兵边境；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武帝用兵四方而引起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边防线的向外扩展和延长，边防军的数量大大增加，达到了顶峰；其后，由于西汉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日趋缓和，边防军的数量又下降了许多。如昭帝元平元年（前 74 年）曾经“减外徭”①，宣帝五凤 四年（前 54 年）又“减戍卒什二”②。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汉时期边防军的人数分布及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大致说来，东部沿海地区及西南地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边防压力始终不大，因而这里便成为边防军人数较少、分布疏阔的地区；华南地区在南越国被平定之后，边防军的人数大减；东北地区也不是边防的重点；只有北方和西北地区是边防军的云集之地。在西汉前期，由于对匈奴实行和亲并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所以边防军主要集中在北方诸边郡，但人数仍不为多；西汉中期以后，不仅北方边郡的边防军大增，西北边区也屯集了大批边防军，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上述情况说明，影响西汉边防军发展及分布的主要因素，一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由此而造成的边疆政策的变化，二是不同时期边疆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

西汉时期边防军的主要来源，是服兵役的戍卒，此外还有边郡的正卒、募兵、谪卒、弛刑徒及属国兵等。

---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② 《汉书》卷八《宣帝纪》。

（一）戍卒

戍卒即是由内地征发至边塞戍守服役的士兵①。在汉代，戍边又称“徭戍”、“外徭”或“屯戍”。据《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言：“（秦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

“屯戍一岁”之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庄公八年》载：“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至秦时，屯戍一岁已成定制。汉高祖时由于北边吃紧，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曾“兴关中卒乘边塞”②，或许当时并无戍期的明确规定，故高后五年（前183年）又下诏“令戍卒岁更”，但在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又曾一度“除……戍卒令”③，至景帝之后又恢复屯戍一岁之制，直至西汉末年不改。

《汉书·沟洫志》如淳注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不过，这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超期服役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例如《盐铁论·徭役篇》：“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内外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汉书·谷永传》：“使天下黎元咸安家乐业，不苦逾时之役”。从汉简材料来看，戍卒的役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有年仅12岁、13岁、14岁者，亦有60岁、69岁者④。

从汉简的记录中可知，在西、北边郡的戍卒，多数来自淮阳、

---

① 由于在京师服役的卫士亦属在家乡之外服兵役者，因而“戍卒”有时也用来指代卫士，如《汉书·叔孙通传》的“戍卒卫官”，《汉书·魏相传》的“河南戍卒中都官者二三千人”等。

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③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④ 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簿录》之“名籍类”和“车马类”，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昌邑、魏郡、汝南等郡国[1]，文献中也屡见"关中卒"[2]、"东方之戍卒"[3]、"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4]、"关东戍卒"[5] 等说法。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关中、山东等郡国之兵多为材官、骑士，比较适合与匈奴、羌人的作战需要，其次则是因为这里地近西、北边郡。

（二）边郡正卒

作为兵役的正卒，其名称由来于文献无征，有人认为这种兵役犹如近世兵役制度中的"正役"，故名"正卒"[6]。对于正卒的内涵，史家认识不一，今人黄今言认为，正卒是一种在本郡服役的兵役，期限为一年，《汉书·食货志》中的"为正一岁"及《汉旧仪》中的"一岁为材官、骑士"，皆指正卒而言；内郡人除在本郡为正卒一年之外，还需到京师或边境屯戍一年，称为"卫士"或"戍卒"，但边郡人的两年兵役皆是在本地完成[7]。即使情况未必完全如此，但边郡之人作为边防军的重要来源是毫无疑问的。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边郡、尤其是西北边郡多出骑士，这些骑士除了一些"良家子"有机会上调京师为期门、羽林军外，多数还是留在边郡为兵。他们自幼生长于边地，习知战事，精于骑射，通晓胡、羌地理风俗，加上其家族皆在边地，保家与卫国合二为一，因此作战积极性较高，作战能力较强，是西汉边防军的中坚力量，边郡太守所率领的"万骑"，极有可能就是以本地骑士为主组成的。

（三）募兵

募兵在汉初即已出现，但西汉募兵的大规模开始并形成制度，

---

① 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 201 页。

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③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④ 《盐铁论》卷七《备胡篇》。

⑤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⑥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 17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⑦ 参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 58、178 页。

还是在汉武帝以后。元封二年（前109年）四月，武帝“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天汉四年，又发“勇敢士”出朔方①。此后，关于募兵的记载史不绝书，不但在作战中使用募兵，在京师禁卫军中使用募兵，而且在边境也使用募兵屯戍。居延汉简中就保存了一些募兵屯戍的材料，例如：

建平五年十二月丙寅朔乙亥诚北候长□充言之官下诏诣☐

右□□□□□□□□募谨募□戍卒庸魏□等□□□□□☐②

出茭食马三匹，给尉卿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马一匹卒一人马一匹③

西汉时期以征兵制为主，募兵制尚处初起之时，因而募兵的数量并不很多。在这些募兵当中，屯戍边郡的又是少数。不过，由于募兵的职业兵性质，所以他们戍边的期限肯定要长于普通的戍卒，加上他们往往都有一技之长，因此在边防军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小。

（四）谪卒

《说文解字》云：“谪，罚也”。将犯罪之人流放到边地以为惩罚的做法，大约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迁”即戍边。根据出土的秦简材料可知，秦时有“谪罪”，凡判定为谪罪者，均要“冗边”即戍边。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王朝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人晁错称此为“谪戍”之制④。这种制度不仅将罪人，而且将一些并无罪行或过失的“赘婿”、“贾人”都纳入谪戍之列，较之以前，范围扩大了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137.3，224.18。

③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290.12。

④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不少。

西汉在高祖以后，未再实行谪戍制。至武帝时又重新恢复，且比秦朝的谪戍制度有所发展，建立了“七科谪”制。所谓七科谪，即将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在“七科谪”之外，“恶少年”亦是谪戍的对象。《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五年（前 76 年）时，“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这里的“恶少年”，唐人颜师古注为“无赖子弟”，大体上是一些不事生产，滋事扰民的地痞流氓，他们或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而未科刑。将这些人强制送往边境屯戍，既有利于内郡的社会治安，又为边防提供了兵员，可谓一举两得。

汉简材料中有一些关于“谪卒”的记录，例如：

□適（谪）士吏张博　闰月丁未持籍诣尹府

代適卒有不然负罚当所□▨

▨隧缺敬代適卒郭□今遣署录□▨①

由此可知，谪卒到达边郡之后是分散安排，使他们与普通戍卒混合编制并承担相同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防止谪卒滋事的一种监控措施，它得以实行的前提，是谪卒在边防军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五）弛刑徒

弛刑徒是指那些已然判刑但又因赦令或其他原因而去除了钳钛、赭衣即刑具和囚服的刑徒。征调弛刑徒戍边，西汉最早的文献纪录见于汉宣帝时期。据《汉书·宣帝纪》载，神爵元年（前 61 年）平定羌乱时，曾调发三辅、中都官的弛刑徒从军。后来这些弛刑徒与募兵及淮阳、汝南步兵万余人一起留屯湟中。居延汉简中常见弛刑徒屯戍的记载，例如：

髡钳城旦孙□坐贼伤人初元五年七月庚寅论初元五年

---

① 此三简分见《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编号 364，443，461，第 55、60、61 页。

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骑士居延广利里☐

完城旦钱万年坐兰渡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论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弛）刑故戍卒居延市☐①

施（弛）刑孙田，今留不☐②

要虏隧施（弛）刑傅当③

右五人施（弛）刑屯士④

从这些记录当中可以看出，弛刑徒与谪卒的安置办法相同，亦是与普通戍卒混合编制。他们在当时应有标明其身份的特殊标识，由于缺乏材料，我们不知这些戍边的弛刑徒和谪卒与普通戍卒的关系如何，但其地位似乎在普通戍卒之下。

（六）属国兵

属国是中原王朝安置归附的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形式，其始源不晚于战国时期。秦兵器铭文中有“属邦”，汉避高祖刘邦名讳而改称“属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朝设有“掌蛮夷降者”的典属国，说明当时已有属国之设，但其数目及组织形式不详。见于《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龟兹属国，很可能是秦朝安置龟兹归附部落而设立的⑤。

早在汉文帝之时，贾谊就曾经自荐“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⑥，《汉书·文帝纪》有以属国悍为将屯将军的记载。又据《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终西汉之世，共有安定属国（又称三水属国、北地属国）、天水属国、上郡属国、西河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七个属国见诸文献。属

---

①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第366页，227.8，文物出版社。

②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第435页，262.19。

③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488页，288.27。

④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第503页，308.19，308.5。

⑤ 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国的组织形式，大约是保留内附各族或部落原有的官职名号和组织，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变，使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行政上要接受属国都尉的管辖。属国都尉由中央直接任命，是领护境内属国吏民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单独的治所。属国都尉是郡守管理归附少数民族事务的助手，同时又接受中央的典属国的领导，下有丞、候、千人等佐官，地位似乎在郡部都尉之上。西汉属国的地理分布集中于西北边郡，属国吏民以匈奴和羌人为主。

利用内附的少数民族守御边疆的想法，早在汉文帝时晁错就曾提出过，他建议汉文帝令“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为汉朝屯戍边防。《后汉书·西羌传》载：汉景帝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幵种羌人留何因不堪忍受匈奴的欺凌而上书汉廷，“求守陇西塞”，汉景帝允准其请，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陇西郡南部的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地，成为汉朝的戍边者。汉武帝设立属国之后，属国兵更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对匈奴、西域的作战中，属国兵在属国都尉的率领下屡次出击。从“属国骑”、“属国胡骑”等称呼中可知，属国兵主要是骑兵部队，张掖属国有精骑万人，战斗力很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常惠以后将军之职兼任典属国，开西汉将军领典属国之先河，其后又有冯奉世以右将军典属国。这种情况，大约可以反映出属国兵在西汉边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汉廷对属国兵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各种不同来源的边防军，在边郡依照一定的制度组成不同的屯戍系统，承担起各自不同的边防任务。关于西汉时期的屯戍制度的详情及其发展变化，由于史料的缺欠，目前尚无法作出完整系统的叙述。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地域，屯戍制度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北方、西北地区的屯戍制度比较复杂，边防军的分类与分工较为细致，而其他地区的戍屯制度则较为简单。

大致说来，属国兵由于性质较为特殊，因而在西汉的边防军

中自成系统，独立成军，他们虽受命于中央，但大约也受所在郡太守的节制，《汉书·匈奴传》载，昭帝时张掖太守曾率张掖属国都尉出击匈奴；边郡的正卒，大多数可能属于直接归郡守所领的骑兵部队，从而在边防军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至于来自内郡的戍卒、募兵、弛刑徒、谪卒等，则打破年龄、身份、地区的界限，混合编制。西汉的边防军，有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并按分工的不同，形成了这样几个屯戍系统：

以屯田耕种为主的屯田兵系统；

以守备作战为主的将屯兵系统；

以侦察报警为主的候望兵系统；

以物资供应为主的军需兵系统。

其中，将屯兵系统和候望系统是边防屯戍的核心和主导部分。

三、将屯兵及其屯戍特点

“将屯”在汉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史记·傅宽传》：“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汉书·赵充国传》：“迁中郎将，将屯上谷。”依从古人的解释，“将屯”作为一种军事术语，其意是典领边郡的屯兵，或是领兵屯守边郡①。而“将屯兵”或“屯兵”则是屯驻于边郡的野战部队②。

将屯兵的来源不一。就现有材料看，将屯兵的主要来源，是长期驻扎在某边郡的部队。这种将屯兵主要由戍卒（包括边郡的正卒）组成，但其人员似乎经过筛选。《汉书·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战士诣朔方”。由此可知，将屯兵

---

① 《史记》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集解》引如淳曰：“有警则将卒而屯守也”；《索隐》引孔文祥云：“边郡有屯兵，（傅）宽为代相国兼领屯兵，后因置将屯将军”。《汉书》卷四《文帝纪》颜师古注：“典屯军以备非常”。

② 陈梦家视“将屯”为“将兵屯田”的省称，说见其《汉简缀述》第191页。此非确论，今不从。

的兵士在入伍之前需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挑选，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之外，还可能是为了适应将屯兵分类的需要，这即是说，将屯兵的兵种并非单一，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特种部队。例如，李陵曾以骑都尉之职“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这支部队当中既有少量“轻骑”，又多“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皆为“力扼虎，射命中”的武艺高强之人①。天汉二年（前 99 年）时，李陵率领这支 5000 人的步兵部队与匈奴单于的 8 万骑兵血战于浚稽山，被匈奴单于视为汉之“精兵”，战斗力大大强于普通的汉军。

为应付紧急情况而临时调防于边郡的野战部队，是将屯兵的另一来源。例如，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匈奴 10 万余骑欲入边寇掠，由于当时汉军屯戍北边的兵力不足，故汉宣帝令赵充国以后将军之职率 4 万骑兵急速北上，屯戍于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九郡的边防线上。这种屯兵往往事讫则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似乎并不属于边防军的系列。

作为边防常备的正规武装，将屯兵的隶属关系有直属中央和归属地方两种形式。前者通常是由都尉一级的武官负责其日常守备、训练诸事，前引李陵以骑都尉领兵屯守酒泉、张掖事以及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居延”② 事，大概皆属此类。在发生紧急情况或进行作战时，虽然都尉亦可将兵出击，但通常还是由中央委派的高级将领直接指挥，文献中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汉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 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③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 年）十一月，“卫尉李广为骁骑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1]。

汉武帝太初三年（前 102 年），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2]。

汉昭帝初即位，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发军屯西河，左将军（上官）桀行北边”[3]。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赵充国“迁中郎将，将屯上谷”[4]。

这些指挥将屯兵的高级将领，往往在完成其使命后便离开部队，前引李广、程不识分领云中和雁门的将屯兵，时间仅有 6 个月，而赵充国“将屯上谷”的时间也仅有数月。这种情况，与西汉兵制将不专兵、兵无常将的特点相符合。天汉二年（前 99 年）李陵出居延前曾经上书请战，而汉武帝则对这支部队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说明将屯兵的调动权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直接指挥将屯兵的将领虽可根据战机而便宜从事，但这仅限于战事进行之时。《汉书·韩安国传》载，元朔二年（前 127 年），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从俘虏口中得知匈奴远去，“即上言……请且罢屯”，这也说明将屯兵将领无权决定所领军队的去向。

归属地方的将屯兵，可能是西汉早期就有的。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齐相国傅宽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年后为丞相，“将屯”[5]。《汉书·卢绾传》载，陈豨“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陈豨因此而“擅兵于外”，终至发动叛乱。所以，把一部分将屯兵的指挥权收归中央，应是加强中央军力、削弱地方兵权的一项措施，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知这项变革始于何时。

边郡太守是将屯兵的主将。李广和程不识二人“俱以边太守

---

①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③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④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⑤ 《汉书》卷四十一《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将屯"①,也因率将屯兵屡战匈奴而成为名将。宣帝为平定羌乱,调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② 合兵。这些事件,可以证明归属地方的将屯兵直接由边郡太守节制。更为直接的材料出自汉简:

制诏酒泉大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假□如品司

马以下将卒长史将屯要害处　属大守察地刑依险阻坚辟垒远候望毋③

如前所述,西汉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这支骑兵部队可能主要由边郡骑士所组成,而边郡太守所领的将屯兵则是由外郡服役的戍卒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尚不清楚。至于边郡太守所领将屯兵与中央将领所领将屯兵有无区别及其他一些细节,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将屯兵的体系不一、中央将屯军与地方将屯军互不统属甚至相互制约的情况,今天我们已然可以看清。这种局面,应当是有利于封建皇帝独揽军权的一种精心设计。

由前引汉简材料而知,西汉将屯兵在边防屯戍,往往是"察地刑(形),依险阻","将屯要害处"。所谓"要害处",可以是形势险要的军事重地,如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苏意所屯的雁门句注;也可以是某一边防区域的防务薄弱之处,如路博德在居延筑塞之前就已屯兵于此;还可以是新近开辟的防区,如韩说所屯的徐自为塞外列城。至于将屯兵在边地如何设防布阵,史无明文,究明不易。不过,从发现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的《驻军图》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较为具体和清楚的认识。

西汉初年,赵佗的南越国不断与汉朝发生摩擦,与南越接壤的汉长沙王国因此而成为边防重地,屯集了大量的军队以抗御南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③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47页,242。

越国的袭扰。《驻军图》就是当时屯戍于长沙国南境的某将屯兵防区的军事地图。复原后的这幅绢质地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用黑、红、田青三色绘制。图上根据作战意图、计划并依照地形条件，标出了该防区将屯兵的兵力及武器配置、作战态势等。由于它只表示汉军一方的情况而未涉及南越国，是一幅侧重于守备的用图，所以又可称为《守备图》或《三军防区图》。由于与该图同时出土的一件随葬木牍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样，故可以断定该图是在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二月以前绘制的。

《驻军图》所绘制的主区，位于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最南部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沱江流域一带，比例大约为1∶80000或1∶100000。防区正面大约宽40公里，纵深50公里，整个防区的界线大致通过四周的山脊线，南界基本上与南岭山脊相重合，前面正对南越，当为防区的前沿。从这幅地图中，可以观察到当时汉军的屯戍特点是：

第一，复线部署兵力。在这个防区总计集结了九支部队，他们大致呈梯形分两线部署。第一线为徐都尉所辖的三支部队，部署于南沿的山脊北侧，他们大体上成一线配置。第二线兵力距离一线大约15公里至20公里不等，东侧是周都尉所辖的两军居东居中，徐都尉所辖的另一军居西。指挥部设在整个防区的中央，其左后方部署着司马得军所辖的两支部队，从而形成了前线、中军及后方预备队分区配置的纵深防御体系。另外，在防区的左侧又有"桂阳□□军"，与本防区驻军呼应。

第二，巧妙利用地形，凭险恃固。第二线的三支部队，分别隐蔽在山背面的三条大谷内，而四处兵器、辎重、装备仓库则设于防区右后方的山谷之中，并以大深水作为屏障。指挥部的位置，选择在数水交汇之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通过水路可与前、后方建立通畅而方便的联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这一地区的自然中心点。由于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开阔，所以把指挥部建筑成一个三角形的城堡，它有城垣、五个箭楼、四个战楼，朝前沿的南边城外又增设一瞭望楼，以"复道"与城垣相连接，可见指挥部

本身即是一处坚固的复合防守工事。从图中可知，当时汉军特别注重对制高点的控制。在这幅地图上，山名大多从略不书，但却对留山、昭山、蛇山、参於山、木堇山等九个山头标注了名称，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是军事上的制高点。各支驻军营地，也大多选择布设在河谷地带的制高点上。

第三，防区内实行移民并村。守备区域内分布有50余处居民点，其中“龙里”原有108户，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村落。在当时，这些居民村落也被纳入了边防体系之中，屯戍的汉军对这些村落的位置、户数等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一一标注于图上。从图上所云将“兼里”并入“虑里”的情况看，当时为了战备需要，曾在防区内实行过移民并村的措施，所以在整个防区内的居民已经很少。这种做法，有利于保护边地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同时也为汉军的作战提供了方便。

第四，防区各军保持密切联络，注重整体防御。从图上可以看到许多相互通连的道路，南部即防区的前沿通道尤多。其中，不少似专门为驻军的调动与联络而开辟，有的还标明了里程，如正南面徐都尉军营附近有一“封里”，图上标注曰：“到廷里五十四里”、“到袍廷五十里”，这显然是直接为军事行动服务的。通过这些道路及水路，防区内各军基本上可以保持相当的快速机动性，相互支援，发挥整体防御的作用。

第五，强化警戒侦察。在第一线的前沿，顺山坡向下前出大约5～10公里，设有八个利用居民点而成的前哨点，形成了一个警戒阵地。而在防区前方的山脊上，又有七处烽火台凭高瞭望，它们都处在水道的最上游，利用了最便于同指挥部及驻军往返联络的地理条件，以保证敌情的及时发现与快速传报。

《驻军图》所反映的虽然只是汉初南方地区的屯戍状况，后来汉军在边地的屯戍制度肯定不会全然与此相同，但图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设防原则颇合兵家之理，在汉代的边防屯戍中应该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

四、边塞候望系统

候望系统是指以烽燧及其戍卒为主的边防侦察报警体系，它是汉代边塞防御组织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候望”一词，与“烽火”、“烽表”、“举烽”诸词俱首见于《墨子》一书，但将烽火作为传递军情警报的信号，至晚是从西周时期就已开始的。从文献记载中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已实行了烽燧制度，经秦王朝的过渡，西汉之世的烽燧制度更加完备和严密，对巩固西汉的边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据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驻军图》，汉初在与南越国接壤的边郡即有烽台之设。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地区时，巴蜀与西南夷的边界上亦置有烽燧①。但自汉兴以来，烽燧的分布就集中在与匈奴邻境的北方边郡，后来则又沿长城扩大到西北和东北地区。《汉书·赵充国传》载其奏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近代以来，在西北地区长城沿线发现许多汉代烽燧遗迹、遗物，出土大批反映当时烽燧制度的简文，这使我们能够对西汉边防体系中的候望系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候望系统的组织机构

《汉旧仪》云：“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据此，边塞候望系统的最高长官，是边郡的太守。也就是说，侦察敌情并举烽报警，是由边郡地方负责的防务。

由于太守职事繁重，所以直接负责候望系统的长官，是佐助太守掌武事的郡都尉和部都尉。都尉有候、千长、司马等属官，其所在称城。

---

①《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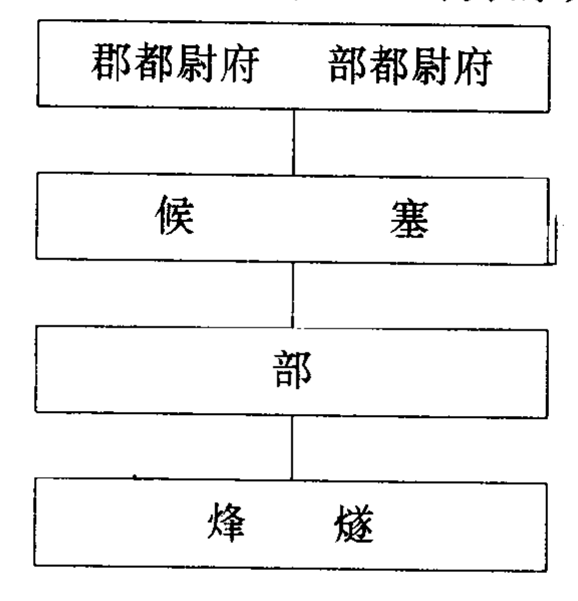
作为都尉属官之一的候（意即军候、斥候、关候），是都尉之下置于塞上警戒防御的一级机构。由于所处位置及任务的不同，都尉之下所设候官的数目不等。候秩比六百石，总领约百里边塞的守望诸事，其下有丞、掾、令史、尉史、候长、士吏等属吏。候官又指官署，候官所在称障。

汉制，“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西汉称“塞尉”，秩二百石，是候之属吏，位在士吏、候长之上。西汉一般以候官名塞，如居延都尉府所属甲渠候官名为“甲渠塞”或“甲渠候官塞”。

每一候官治一塞，下置若干候长，候长官署称部。候长负责若干烽燧，同时候官又派士吏分驻各部协助候长。一塞所置部之多少及部之大小因候塞的地位不同而各异，如甲渠候官塞地处居延中枢，故下置28个部，而与之辖区相连的肩水都尉治下的广地候官却只见3个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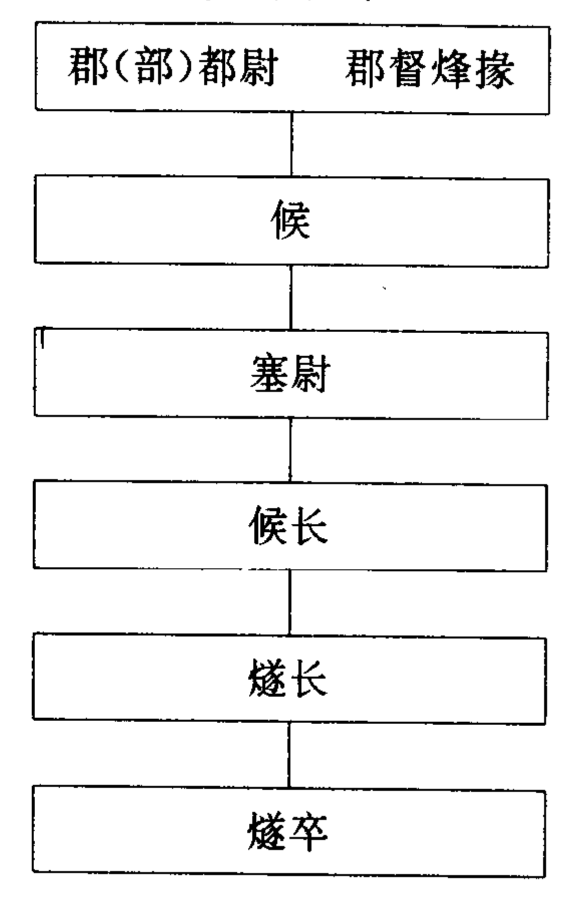
部下置烽燧，当时烽燧可与亭、燧互称，它们在一定场合又可称作亭障、列亭、列燧。烽燧是候望系统最基层的单位，因位置或任务不同，烽燧大小不一，人数各异，最小者仅有一二人，最大者则近30人，一般是在10人左右。烽燧有燧长一人。

综上所述，可将候望系统的组织机构表示如下①：



①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一文有详细考述，可参看。

候望系统的官吏卒亦可列表如下：



我们不难看出，候望系统属边防军系列，不同于将屯兵野战部队编制，而是兼有地方行政的某些特征。

（二）烽火品约

“烽火品约”乃汉简之文，是西汉时期关于烽火的品种、品数及其施放的法律规定，它是边塞烽燧举烽报警的准则。在当时，除了中央政府有关于举烽的律令章程之外，各边郡都有自己的烽火品约，而各边郡的都尉府又在郡级烽火品约的规定的指导下，结合本防区的实际情况，把烽火传递的路线及所辖不同候塞均一一注明，从而形成了都尉府的烽火品约①。

据汉简所示，西汉时期居延边塞的烽火信号分为烽、表、烟、苣火和积薪五类：

烽为白昼使用的信号，其初义大概是以草薪燃火为报警信号。汉边塞之烽有布烽和草烽两种：布烽是以缯布、布或绢帛制作，即

①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在一种被称为“埊”的框架四周蒙上布帛而成；草烽即用草编成一笼形物（兜零）作为烽号。两种烽皆分赤、白两色，布烽不可燃，草烽可燃，置于竖在堠坞上的烽架（桔槔）之上，遇有警报则举布烽或燃草烽，按置烽的位置，又有堠（坞）上烽和旁烽、地烽（皆在坞旁地上）之别。

表是以布帛蒙在一长方形木架之上，其形制如桔槔。从某种意义上说，表是布烽的一种，以大小不一分大表、小表，置所不一分坞上表、地表，又以用途不同分为亡人赤表、兰（阑）入表和诟表。所谓“亡人赤表”是以赤色的表告示烽塞警戒追索逃人；“兰入表”用于敌寇侵犯塞防之时；“诟表”可能是对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信号。表用于白昼。

烟是烽燧白昼与烽、表相配合的烽号。烽燧备有施烟灶，灶在台下，烟囱出台上堠顶女墙。报警时在灶膛内燃柴草、粪，烟火借烟囱施烟于堠顶，远方得以望见。汉代施烟多是灶与积薪并举，尤其是在军情紧急之时多以燔积薪以施烟，其效果更佳。

苣火是夜间使用的信号，简称火。因其形制、作用不同，苣分大苣、小苣、桯苣、角火苣，但都统称烽苣或苣。苣之形状，据居延甲渠第四燧出土的二枚所见，残长 82 厘米，径 8 厘米，芨芨草把束绳 4 道，分 5 节，中间 3 节贯以小木橛，原长大约 1 米①；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的苣长 233 厘米（最长者 244 厘米），径 5 厘米，小苣长 33～35.5 厘米、径 4.5 厘米，最小者长 8.7 厘米、径 3 厘米，皆用芦苇制成②。苣火通常是由燧卒手执燃举，或竖于堠顶燃举，还可以置于兜零（烽苣）中燃举。

积薪是烽燧燔燃积薪以浓烟或烈火表示的一种烽号，昼夜皆可使用。积薪有大、小之别，一般大积薪白昼施烟，小积薪夜间

---

① 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

②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0 期。

放火。凡积薪皆置于距烽燧10米以外（敦煌汉烽积薪一般距烽台50～100米），与烽燧线相垂直排列，以便于候望应和。在居延金关烽台东北10米处的一垛积薪遗存，底径150厘米，高60厘米，由杂草秸、树枝构成。敦煌D3（T6b）烽燧积薪下层垫胡杨木柱，中层叠苇束，上层盖红柳枝，长200厘米、宽100厘米，残高65厘米。D.D.21（T×11a）烽燧外50米处有16堆积薪，南北排列成四组，每组四堆，堆距20米，东西组距14米、为一方阵形。D.D.20（T×1×a）的一垛积薪，重约1.5吨，合汉计量50石左右①。

上述五类烽火信号并非各自孤立使用，一般是根据敌情组合使用。从发现的郡府烽火品约来看，当时是依据敌人的多寡及远近把敌情分为五品，敌情品级不同，烽火的组合品级也就不同，烽号的举放次第及次数（数量）也随之而变。例如，敌1000人以上入塞或500～2000人攻亭障为第三品级，烽火组合为烽与积薪和苣火与积薪，其举放为昼三烽、燔二积薪，夜三苣火、燔二积薪。在都尉府的烽火品约中，又增加依敌人入侵方位而制定的一些特殊信号，规定了不同的举烽方法。

由于烽火传递只依靠燧卒的肉眼观察信号，所以如遇阴晦风雨，警烽便难以传递。此外，有时还会发生举烽失误的情况。对此，则采取遣驿骑驰告或传檄等措施来给予补救。

由汉简可知，当时边塞烽火的传递不仅是定向的，而且也是有次序的。一般是由前沿始发烽燧向后一烽接一烽传递，直至本塞应和，再由所属塞将警烽传到都尉府。以居延塞的情况为例：烽火总是从北向南传递，因为当时匈奴犯塞皆自北边而来。从北境的烽燧逐次向南传递直到部、塞、居延都尉府，都尉府再把警烽沿居延邮路上的烽燧向东南传至张掖郡。

由于烽火关联紧急军情，所以对它的传递不仅要求准确，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迅速。据测算，居延塞烽火运行的速度是每昼夜

---

①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63页。

1280～1440 汉里（汉里约合 400 米强），或是每昼夜 1600～1800 汉里①。

（三）燧卒职责

候望系统的燧卒，其职责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瞭望伺敌动向并利用侦迹设施侦察敌情，汉简记为“谨候望”、“明天田，谨迹候望”。烽燧是边塞警戒瞭望的哨所，设有“深目”、“望火头”等观测装置。“深目”即坞壁垣堞上的探视孔。“望火头”是烽台上专设的观察烽火信号的装置。燧卒“以候望为职”，其候望的内容，一是敌情，二是候视烽警给予应和。由于候望是燧卒的第一项重要职责，所以西汉烽燧多有以候望为名者。如居延殄北塞有“望远燧”、“望熹燧”、“察虏燧”，甲渠塞有“驷望燧”、“望虏燧”、“察微燧”等。烽燧又设有“天田”、“柃柱”、“悬索”等侦迹设施以供燧卒观察、掌握敌情。所谓“天田”，是在烽燧前方或塞墙外侧修治一宽约 2 丈的长条软沙（铺沙）地带，这样人马一过就必留痕迹，由此可知敌之人数与去向。“柃柱”“悬索”是木桩、绳索之类，作用是拦截非法出入边界者。燧卒除瞭望之外，每天都要巡视、检查这些侦迹设施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其次为举烽报警，即汉简所云“通（惊、备、定）烽火”、“举和烽火”。这是设置烽燧的基本目的，也是燧卒最重要的工作。当时制度要求燧卒必须记诵烽火品约的条文，熟炼掌握施放各种烽警的方法。如果“不知烽火品”，或是举烽不符合有关规定，轻者遭斥免，重者逮下狱。为监督检查燧卒的工作，各烽燧都有烽火记录簿，注明放烽的燧名和司烽人员的姓名职别，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运行时间等详情。这个烽火记录簿要定时上报或存档备查，上级据此考课成绩，检校事故。

第三项职责是防御入寇之敌和应付盗贼等，即汉简所云“惊戒便兵”。烽燧地位边塞前沿，往往首当敌锋，史籍中常见匈奴入

---

① 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 100 页。

塞后首先攻击烽燧的记载，所以燧卒虽以候望、举烽为本职，但同时又必须兼行战士之事。为增强烽燧的战斗力和安全防护能力，燧内都配备有弩、矢、剑（刀）、方（戟）等兵器和多种守御器。在修筑烽燧时还特意增加垣墙、槖户墼和虎落等守御设施。“槖户墼”用以闭门或加固坞门，每烽备 300 块，“虎落”即栏篱，是置于烽燧前拦截敌人的障碍物。这样，每一处烽燧都犹如一个战斗堡垒，每一处烽燧也就成为一个最小的独立的作战单位。

汉代边塞烽燧部署兵士的数量很大。前引赵充国奏书所言自敦煌至辽东有燧卒数千人的说法，应是昭、宣以后已经大为减少了的统计数字。今人曾测算居延、肩水二都尉所辖燧卒的数量在 1044 人到 2610 人之间，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燧卒人数甚多。尽管燧卒作战主要是防御敌人对烽燧的围攻和协助屯兵扫荡或清除亭障附近之敌、捕获盗贼、亡人，但他们仍然是边塞防御作战当中的有生力量。

为保证燧卒尽职尽责，西汉在边郡太守府置有督烽掾，代替太守循行边塞、督察烽火，对玩忽职守者举劾，轻者杖笞、重者处死。此外还有一套详细的劳绩制度用于控制和管理候望系统①。

在候望系统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它对西汉边防的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之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宣帝时期，由于数千“乘塞列燧”的吏卒辛勤戍边，“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②。

---

① 参见李振宏：《居延汉简中的劳绩制度》，《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第九章　王莽改制及其对周边民族发动的战争

自汉元帝开始，西汉王朝便如夕阳西下，逐渐地走向衰落。此时的汉朝皇帝，个个昏庸无能，最高的统治权力落到宦官与外戚手里，使政治日趋腐朽与黑暗。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使阶级矛盾逐渐激化。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中虽有个别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改革的呼喊，但却被一片争权夺利的吵闹声浪所淹没。王莽于是利用社会各阶层对西汉政权的强烈不满与失望，施展其阴谋手段，代汉而创立“新”朝。但是，他毕竟回天无术，无法使这个腐败的政权起死回生。相反，他为摆脱社会危机所实行的托古改制，却造成社会的更大混乱，而他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所推行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更激起周边民族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对周边民族所进行的战争，除征服高句丽外，也以失败告终。新莽政权统治的结果，使本已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

第一节　西汉末期的社会危机

一、政治的腐败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西汉末期，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最高统治权力落到了宦官与外戚手里。

汉元帝继位不久，辅政的三个大臣史高、萧望之、周堪便因争夺权利而展开争斗。萧望之、周堪都是汉元帝的老师，颇受元

帝的信任，“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①。史高是汉元帝妃史良娣兄史恭之子，因外戚关系领尚书事，位居萧、周之上，见萧、周二人受皇帝信任，心中十分嫉恨。于是，便和中书令、宦者弘恭与石显勾结起来，想排挤萧、周二人。萧望之上书请求汉元帝罢斥宦官，任用士人。但“仁柔好儒”②的汉元帝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萧望之于是联合宗室刘更生、侍中金敞等人，与外戚宦官集团相抗衡。初元二年（前47年）正月，弘恭、石显等利用萧望之出休日不上朝的机会，唆使其爪牙上奏诬告萧望之等图谋罢除车骑将军史高，并疏退许、史等外戚。弘恭、石显又上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③。号称“多材艺、善史书”④的汉元帝竟以为“召致廷尉”是令廷尉调查讯问的意思，糊里糊涂地批准这个奏章，使萧望之等三人被捕入狱。后来，又下令将他们罢官，释放出狱。不久，弘恭、石显又鼓动汉元帝将萧望之逮捕入狱，导致萧望之含冤自杀。萧望之死后，支持他的大臣，或被捕入狱，或被免官归田，或被合家流放，或被害致死。后来，弘恭病死，石显代为中书令，气焰更加嚣张。他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一伙，凡依附者皆得高官宠位。从此，朝中公卿以下对石显皆畏惧三分，就连敢于直言极谏的谏大夫贡禹，对他也保持沉默。而汉元帝却“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认为“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⑤。石显因而得专朝政，形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死，汉成帝继位。不久，汉成帝将石显等罢官，清除其党羽，结束了宦官专政的局面。但是，这个汉成帝比汉元帝更加腐朽昏庸，把朝政全部委托给他的生母王太后(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王太后一家乘机操纵朝政，帝舅阳平侯王凤

---

①③《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

②④《汉书》卷九《元帝纪》。

⑤《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

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总断朝政，王崇为安成侯。河平二年（前27年），谭、商、立、根、逢时等王氏五兄弟又同日封侯。此后，“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①。王凤执政凡11年。他死后，又“固荐（王）音自代”②。其后，王商、王根也相继辅政。整个成帝一朝，西汉政权一直为外戚王氏所把持。

绥和二年（前7年），汉成帝死后，弟定陶王之子刘欣继位，是为哀帝。汉哀帝也是个沉湎于声色犬马之徒，他虽贬抑外戚王氏，但又大封其祖母傅太后与生母丁太后的家人，使丁、傅两家外戚把持朝政。后来，心理变态的汉哀帝因见东宫属官郎董贤“为人美丽”，“说（悦）其仪貌”，对其大加宠幸，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公卿，权侔人主。丁、傅外戚遂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彼此倾轧不休。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死，后无子，太皇太后（王政君）以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为大司马，共征立年幼的汉元帝庶孙刘衎，是为汉平帝。此后，又重新出现王氏外戚专政的局面。

宦官与外戚集团，大多是一些图谋私利，贪鄙庸碌的小人。他们相继把持朝政，必然导致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汉元帝时，“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③。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④。贵族官僚横暴纵恣，骄奢淫佚，如侍中中郎将张放“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③ 《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等之其家，贼伤三人”。连其爪牙奴仆，也“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①。“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②，吏治更是每况愈下。至汉平帝时期，吏治之坏，更是达于极点，正如申屠刚在对策中所指出的那样：“今承哀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③

由于吏治的败坏，封建纪纲的破坏，地方豪强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肆虐一方，更成为西汉末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汉成帝时，“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萬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④。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⑤。哀帝时“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⑥。平帝时，“司直陈崇举奏其（指辛通、辛遵、辛茂等人）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⑦。许多地方豪强富至千万，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官府。因此，许多官吏便同地方豪强串通起来，沆瀣一气，为害一方，从而使吏治益趋腐败。

由于政治的腐败，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土地的不断集中，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早在汉武

---

①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② 《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④ 《汉书》卷七十六《赵严韩张两王传》。

⑤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

⑥ 《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⑦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帝之时，贵族、官僚、地主与豪商就大肆掠夺民财，特别是贵族、官僚更是凭借权势兼并农民的土地，如衡山王刘赐就“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①，武安侯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②，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③，从而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④ 的局面。加上武帝时期连年的战争与种种好大喜功的举措，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⑤，因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加剧。不过，在昭、宣以前，尤其是武帝时期，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皇帝拥有绝对的君权。西汉政府出于政治上与经济上的需要，借助绝对君权的威势采取了一些抑制和打击地主、豪强的政策，从而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而在汉武帝死后，昭、宣二帝又“知时务之要”，重新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⑥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阶级矛盾也相对地趋于缓和。

但是，自汉元帝以后，西汉的各代皇帝已不具有武帝和宣帝那样的绝对君权，他们不得不放弃限制和打击地主、豪强的政策，一些官僚地主于是便利用其政治经济特权，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如号称“为人谨厚”的丞相张禹，先后得到汉成帝的赏赐“数千万”，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⑦。而据《汉书·沟洫志》所载，自汉武帝太始二年（前 95 年）修成白渠以来，关中之地可引泾、渭之水灌溉的良田，总计不过 4500 余顷，张禹一人就占去百分之九，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另一丞相匡衡，在汉元帝初年官至博士、给事中，曾经上疏指斥当时政治腐败说：“今天下俗贪财贱义，

---

①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② 《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

③ 《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④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⑤⑥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⑦ 《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但为相之后，也做出“专地盗土以自益”的丑事，在其封地临淮郡一次就多占了400顷土地①。汉成帝的舅父、红阳侯王立则与南阳太守相勾结，将南郡数百顷垦草田占为己有，其中不少原是少府借与贫民的已垦熟田。当他把这些强占的土地“献”给朝廷后，居然得到超过市价一亿钱的报偿②。至于诸侯王、列侯、公主更是“田宅亡限，与民争利”③。就连皇帝本人也积极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如汉成帝即置“私田”于民间，汉哀帝还一次赏给董贤“二千余顷”土地④。一般地主和豪商也无不拼命“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⑤。成、哀之际，有人提出限田方案，建议私人拥有土地不得超过30顷，这从反面证明，当时拥有30顷以上土地者已是为数不少。

在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西汉政府又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尽管在西汉末年，王朝政府也常冠冕堂皇地下诏减免赋税徭役，但赋税徭役的征派实际上仍有增无减。如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仅一个珠崖之役，就有“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⑥。汉成帝为修建昌陵而征发徭役，“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⑦。他在位时，觉得用度不足，还“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⑧。百姓对官府的征敛一有不满和反抗，便施以残酷的刑罚。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⑨，甚至“榜箠瘠于炮格，绝灭人命”⑩。

---

① 《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② 《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③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

④ 《汉书》卷八十六《何武王嘉师丹传》。

⑤⑦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

⑥ 《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⑧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⑨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⑩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

此外，西汉末年，各种天灾又频繁发生。因此，广大农民纷纷破产丧失土地，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贡禹在一份奏疏中曾经描述了农民的悲惨状况："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①。汉成帝的一道诏书也承认："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② 至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更将农民的苦难概括为"七亡七死"：

>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③

破产的农民，只得被迫离开故土而流亡他乡。汉元帝以后，流民的数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贾捐之的奏文曰："今（元帝初）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④。到了汉成帝永始二年（前 15 年），农民"流散冗食，餧死于道"已是"以百万数"⑤。还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得出卖儿女，甚至自卖为奴。当时许多地主、贵族蓄养奴婢动辄数千，而官奴婢竟多达"十余万人"⑥。整个西汉的官私奴婢，有的学者估计有 23 万左右⑦，有的则说在 30 万至 60 万人之间⑧。

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汉元帝之世，已有"盗贼并起"⑨ 的记录，至汉成帝时开始爆发为

---

①③⑥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② 《汉书》卷十《成帝纪》。

④ 《汉书》卷六十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⑤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

⑦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第 15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⑧ 翦伯赞：《秦汉史》第 27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⑨ 《汉书》卷九《元帝纪》。

连续的起义。建始四年（前 29 年），傰宗率数百人在关中的南山（终南山）地区起义，他们“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①，震动京师，长安城为之警戒。西汉政府派出千余名士兵镇压，傰宗等人坚持斗争长达一年多。河平三年（前 26 年），东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②。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 3 年），陵阳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③，声动朝廷。与各地农民的起义相呼应，西汉末年还普遍出现了刑徒的暴动。汉成帝阳朔三年（前 22 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发动起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④。永始三年（前 14 年），山阳郡铁官徒 228 人在苏令的带领下又举义旗，“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⑤。广大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猛烈地冲击着西汉王朝的统治，刘汉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挽救危局的最后挣扎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阶级内部先后有人提出了改革政治、挽救危机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哀帝即位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的限田限奴婢之议。《汉书·哀帝纪》载其奏文曰：

>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

---

① 《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

② 《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

③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④⑤ 《汉书》卷十《成帝纪》。

依照这一方案，上至诸侯王、列侯，下至各级官吏和豪民，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30顷，占有奴婢的数量则从200人到30人不等；商贾不得为官，不得拥有土地。凡超过限量的田地和奴婢，一律没收充公。这一方案，无疑具有某种进步性，但在当时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它触犯了达官贵戚及豪强地主的利益。当时绝大多数官僚贵族地主不仅都已超出了最高限额，而且也绝不情愿交出超逾限额的土地和奴婢。结果，这一方案根本没有实行便被搁置起来，成为一纸空文。

在不断恶化的形势面前，统治阶级内部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对西汉王朝的命运感到悲观和绝望，汉运将终的论调一再重弹，最后引出了一场“再受命”的政治闹剧。

所谓“再受命”之说，原是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的发明。他伪造《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12卷，以皇权神授观念为基础，杂以五行学说，认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①。由于此说可为企图取代刘汉政权的人所利用，所以当时甘忠可被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致死。建平二年（前5年），汉哀帝久病不起，国势越发衰颓，甘忠可的弟子、待诏夏贺良等人又乘机奏上“赤精子之谶”，认为“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②。昏庸的汉哀帝急于寻找救命稻草，遂于六月甲子日下诏宣布“再受命”，宣布“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③。在他看来，这样一纸诏书，就可以结束在此之前的衰败乱世而迎来一个崭新的天下，由于又一次接受了“天”的任命，刘氏政权将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戳穿了这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再受命”后一个多月，汉哀帝之病毫无转机，朝廷之“病”也日甚一日，而夏贺良等却“欲妄变政事”，致使统治集团内部纷争迭起。

---

①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②③ 《汉书》卷十一《哀帝记》。

汉哀帝下诏指责“再受命”之说“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宣布“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①。夏贺良等人被处死，“再受命”的把戏就此收场。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许多人都希望出现新的契机，急于寻找新的政治靠山和出路。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百姓，更是渴望通过改朝换代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的客观条件，把外戚王莽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扮演了“代汉”的主角。

第二节　王莽代汉及其改制

一、王莽的身世及其早年经历

王莽（前45～23），字巨君，西汉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王莽自称是黄帝之后，在他所撰的《自本》中，他这样追述其家族的历史：

>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②

王莽所以要精心杜撰出这个虚无飘渺的世系表，目的不仅仅是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血统高贵和神化自己，更重要的是在为他代汉寻找一个神圣的历史依据。因为刘汉统治者自称是唐尧之后，而唐尧则将天下“禅让”于虞舜，所以依照西汉之世盛行的“五德终始”理论，刘姓皇帝将皇位交予王莽，乃是早已注定的“天命”。

---

① 《汉书》卷十一《哀帝记》。

② 《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显而易见，王莽关于自己身世的说法，并无历史的真实性可言。王莽的先祖中有事迹可言者，据《汉书·元后传》所载，是其曾祖父王贺。当汉武帝之时，王贺曾任绣衣御史，因“奉使不称”而被免官，遂举家迁至魏郡元城委粟里；其祖父王禁，曾任廷尉史，为人好酒色，多娶妻妾，生有四女八男。王莽的父亲王曼，是王禁的第二子，其生母是王禁之妾。

汉宣帝五凤年间，王禁将18岁的次女王政君送入宫中为家人子，不久，王政君被选为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之妃，王氏家族的境况开始有所好转。甘露三年（前51年）王政君生子，这个“世嫡皇孙”（即后来的汉成帝）的降临，为王氏家族日后的荣华富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龙元年（前49年），汉元帝即位，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禁为阳平侯，位特进，王氏家族由此贵幸于朝廷。当汉成帝于竟宁元年（前33年）即皇帝位后，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她的弟弟王凤则出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断朝政，王氏家族开始飞黄腾达。这一年，王莽13岁。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王莽并没有像他的同宗兄弟们那样“争为奢侈”，过起骄奢淫逸的贵族公子的生活，相反，他倒是在“孤贫”的境况中摈弃声色，“折节为恭俭”，拜当时名儒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①。他的这种做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父王曼的早死有关。王曼与王政君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当他有生之时，王氏家族虽已发迹，但他却没有得到什么荣宠，所以，王莽在王氏家族中似乎颇受冷遇，在争权夺势的活动中处于先天不足的弱势，这种情况迫使王莽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做人行事。此外，由于自幼诵经读史，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因而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也远在那些纨绔子弟之上，这也促使王莽比较注意用封建道德所肯定的忠孝节义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家中，他恭谨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待亡兄留下的侄儿如同亲子；在社会上，他广泛结交“英俊”，不显山、不露水地扩大着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自己的声誉，同时，他还不惜卑身曲意，努力博取官高位重的伯父、叔父们的欢心。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生病，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①。他的亲情孝行终于感动了伯父，在临终之前，王凤特意嘱咐元后和汉成帝任用王莽。于是王莽被授以黄门郎之职，很快又升为射声校尉，由此步入官场，这一年王莽24岁。

此后，王莽愈发表现得谦恭谨慎，进一步博取了家族长辈及皇帝的欢心。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汉成帝，表示愿将自己的户邑分出一部分给王莽，这实际上是在替王莽向皇帝请封。与此同时，一批在朝为官的所谓“当世名士”也纷纷在汉成帝面前对王莽大加赞扬，汉成帝便封王莽为新都侯，同时提拔他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在成为皇帝的宿卫近臣之后，王莽充分施展“匿情求名”的拿手好戏，“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②。他以种种沽名钓誉的举动，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赏，使自己的声望逐渐超过诸叔父，成为王氏家族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绥和元年（前8年），大司马、大将军王根病重而数次请求辞职，早就对此官职垂涎三尺的王莽抓住时机，设法除掉了自己的姑表兄弟淳于长，使自己“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登上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成为西汉王朝的百臣之首。这一年，王莽年仅38岁。

在中国封建社会，外戚专政通常具有某种先天的脆弱性，皇位的更替，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当政外戚的命运，这一点，在王莽身上也得到了应验。就在他出任大司马、大将军的第二年，汉成帝病死，其庶侄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刘欣与王氏家族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王莽执政的根基因此而动摇。为了维护自身及本家族的既得利益，王莽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压制汉哀帝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双方很快就发生激烈冲突。王莽上疏求退，

---

①②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向汉哀帝施加压力，但汉哀帝却顺水推舟，赏给王莽黄金500斤和安车驷马，让他离职还家，赋闲京师。两年之后，汉哀帝又将王莽赶回他在南阳郡新野县的封国。入仕以来一直春风得意的王莽，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三年的“杜门自守”的蛰居生涯。

二、王莽代汉创立“新”朝

王莽虽然蛰居南阳，不问政事，但他的党徒、亲信在朝廷的势力依然不小。元寿元年（前2年）春正月辛丑日发生的一场日蚀，成为王莽的党徒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迫于压力，汉哀帝只好把王莽从南阳召回，让他在长安居住以“侍太后”。次年六月，汉哀帝病死，由于哀帝无子，而傅、丁两太后又前于哀帝死去，所以收拾局面的使命只能落到元后身上。就在哀帝去世的当天，元后就来至未央宫，下诏罢免大司马、卫将军董贤，自知在劫难逃的董贤当即携妻自杀。大司马的印绶，又一次落到了王莽的手中。

卷土重来的王莽，气势较第一次执政时更盛。出于前此失职赋闲的切肤之痛，他把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视为当务之急。为此，他把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衎立为皇帝，又让72岁的元后临朝称制，自己则以大司马的名义操纵大权。他又罢免了董贤所引进推荐的全部官吏，没收了董贤的全部家财，将其亲族一律流放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又迫令孝成赵皇后（即赵飞燕）、孝哀傅皇后自杀，丁、傅两家外戚及其亲族统统被赶出京师。与此同时，他又重用孔光等人，培植亲党，经过一番“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①的努力，很快就形成了王莽独步朝廷、为所欲为的局面。

然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王莽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已与自己的实际地位不太相称，他想方设法，谋求更高的名分和更大的权力。元始元年（1年）正月，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王莽官拜太傅，封“安汉公”，位居三公之上；然后，他又以“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为由，让元后下诏宣布自己只过问封爵大事，其他诸事，皆由王莽与四辅决断。诏书中还明确规定：“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①。凭此诏旨，王莽名正言顺地垄断了朝廷的选官用人大权，为他在中央和地方进一步广泛地网罗亲信，结党营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元始四年（4 年）四月，在王莽的幕后导演下，他的女儿成为汉平帝的皇后。此后不久，王莽又采古之伊尹、周公称号，受封为“宰衡”，位上公。至元始五年五月，王莽又受“九锡”之封。由此，王莽从仪仗服饰到起居行止，都与皇帝相类似，其代汉自立之心已昭然若揭了。

当王莽在迈向极峰的道路上步步前行之时，他始终没有忘记伪装自己。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不接受那些加于其身的荣耀，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将皇帝的赏赐分发于他人，给人留下了矢心为公、全无私念的印象。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收揽人心，曾经建议朝廷恢复了一批汉宗室后裔的王侯之位，封汉兴以来功臣后裔 117 人为列侯、关内侯，又为退休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增加了俸禄。元始四年末，他下令在京师大兴土木，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增加博士员，笼络地主阶级的各类知识分子。

在这一时期内，王莽还采取种种措施，使西汉帝国相对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宁。因此，他也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希望之所在。

元始五年末，汉平帝病死。从这个时候起，全国各地不断出现了各种要求王莽代汉做皇帝的祥瑞、符命。王莽也就随波逐流，加紧了代汉的步伐。就在汉平帝葬仪的哀乐声中，王莽开始“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②，当上了“假皇帝”即代理皇帝。居摄元年

①②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6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气度和排场举行了祀天、迎春和大射典礼。三月，又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帝，刘姓王朝实际上已经成为王家的天下。初始元年（8年）十一月，王莽颁发诏书，宣布“即真天子位”，建国号为新。始建国元年（9年）元旦，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西汉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三、王莽的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虽然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但却没有结束西汉末期以来的社会危机，他所面临的，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残破之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王莽在建国之后便附会《周礼》，实行大规模的托古改制。其主要内容是：

1、**王田私属制**

始建国元年（9年）四月，王莽发布诏令，对秦汉以来的土地兼并及奴婢买卖现象严加抨击，同时宣布：

>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①

依照此一诏令，非但土地及奴婢买卖被严格禁止，而且那些占地超过900亩的八口之家还需将超额部分分给宗族、乡里的无田而应受田者，无田之家的受田标准，是一对夫妇受田百亩。

王莽的王田私属政策，是为了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大量增加这两大社会问题，它反映出了王莽的政治见识和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危机的强烈愿望。但是，这项政策又与社会实际相差甚远，具有很大的空想性而根本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

王田制并不是彻底取消私有制，而是试图给地主阶级的私有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土地套上封建国家国有土地的外衣，其核心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抽有余以补不足。这不仅与战国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取代土地国有制的历史进步与发展相背离，而且也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因此，它不仅为那些拥有大地产的贵族、官僚和地主所反对，同时也遭到了广大小土地所有者的抵制。

奴婢问题与土地兼并问题密切相关，所以王莽试图将它们一并解决。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动机，并非仅仅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始建国元年四月的诏书中，王莽抨击奴婢买卖说："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①。由此可知，对于人之地位与尊严的理性认识，也是王莽推行"私属"制的原因之一。

但"私属"制的核心，却又是在承认使用奴婢合法性的前提下禁止奴婢的买卖，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在私奴婢的范围，与大量的官奴婢毫不相关，所以它不仅具有极大的妥协性，而且还有相当突出的自相矛盾之处。王莽确定此一政策的用心，是要阻止农民大量转为奴婢的势头。但他的一道诏令，并不能改变奴婢的奴隶属性。同时，由于不能实行"王田"制即不能遏止土地兼并，所以也就根本无法阻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

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弊病，王田私属制从未得到真正的实行。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被迫下令，宣布对买卖土地和奴婢者不再治罪，承认了这项改制的破产。

2、**五均六筦**

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颁布了"五均赊贷"诏令并且"初设六筦之令"。

所谓"五均赊贷"，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置五均官，由原来管理市场的"市令"或"市长"兼任，改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他们除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照旧负责征收市税外，还负责平抑市场物价。司市所辖钱府还负责办理城市居民的赊贷，其中贷款的岁息为十分之一或月息3%。“六筦”是对工商业经济活动的管制，即由政府控制盐、铁、铸钱、沽酒及名山大泽，加上“五均赊贷”，共计6种。

“五均六筦”的许多内容，都是武帝以后西汉王朝经济政策的变种，如五均赊贷即是平准法的一个发展。实行“五均赊贷”的主要目的，是平抑物价，杜绝不法奸商的投机与垄断，打击高利贷者；“六筦”也主要是为了抑制豪民富贾的过分盘剥，因而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有其良好的一面。但是，在私有制度和封建商品经济已较为稳固的当时，企图完全依靠国家权力取代私有经济，完全用政府统制的办法取代民间的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这是注定要碰壁的。更为致命的是，被王莽用来推行这些经济新政的官员，多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往往“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①，将五均六筦逐渐变成了一个官僚、富豪相互勾结从中渔利的新途径，而广大劳动人民得到的是更为沉重的负担。由于王莽要依靠这项改革来聚敛财富，所以尽管天下百姓叫苦连天，但他一直坚持到其灭亡的前一年才下令废除。

3、**币制改革**

早在王莽尚未代汉的居摄二年（7年），他就曾下令在当时流行的五铢钱之外，另增加三种货币，一是值5000钱的错刀，二是值500钱的契刀，三是每枚值50的大钱（即“大泉五十”），从而将流通百余年的五铢钱降为辅币，三种新币则成为主币。至始建国元年，王莽又将先前所发行的两种刀币及五铢钱废止，另铸“小泉直一”和原铸的“大泉五十”并行；次年，王莽又另造了“宝货五品”，把货币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即五种不同的币材：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六种货币，二十八品即是28种不同名称、不同重量、不同长度、不同价值的货币，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交换比值，

---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包括了“泉货六品”、“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宣布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废除大小泉，改为货泉（重五铢，值一）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两种。总计王莽先后铸造了37种不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不同比价的货币。

在王莽众多的经济改革措施中，货币改革是最为混乱也最为荒唐的。如果说，其他改革措施还尚有一点改良社会状况之动机的话，那么，王莽的币制改革就只有一个目的，即打击货币持有者以聚敛财富。例如，王莽第四次货币改革后通行的货币为“货布”、“货泉”及原先所铸“大泉五十”。本来“大泉”是值“小泉”五十的，但此时却和“货泉”一样，“枚直一”，即仅值旧五铢钱的一枚，所以，“大泉五十”的持有者一下子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八，如此大幅度的贬值，不能不对当时的人们造成极大的损害。此外，与每次改币相伴随的都是严刑峻法，因触犯法令而“大陷刑”者多达“数十万人”①，他们便成为王莽政权的无偿劳动力，这其实是对人民的又一种掠夺。这样的币制改革，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和货物流通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它自始至终为人们所激烈反对，是一项彻底失败的改革。

除去上述三项改制之外，王莽的改制活动还包括了大量的改易名称的活动，其基本情况可大致分为两类：首先是对地名和行政区划的更改。例如，把首都长安更名为“常安”，同时也将汉长安城的宫殿、城门之名改易殆尽，长乐宫改为“常乐宫”，未央宫改为“寿成堂”，未央宫前殿改为“王路堂”，霸城门成了“仁寿门”，宣平门成了“春王门”，直城门成了“正道门”；原来的十三州被重新划为九州，全国100个郡国、666个县邑被换以新名，有的郡县甚至不止一次更名。与此相应，王莽又改原先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为州、部、郡、县四级，为此不得不对旧郡县进行分割调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整，如从东郡之地分出一个新的寿良郡，从平原郡中分出阿阳郡，从沛郡中分出延城郡等。由于这种调整的随心所欲，以至出现了旧郡被瓜分、名存而实亡的混乱局面。如陈留郡（治今开封东南）原领17县，天凤元年七月，王莽诏令将其郡益岁以南诸县划归新平（原淮阳郡），雍丘以东划归陈定（原梁郡），封丘以东划归治亭（原东郡），陈留以西划归祈隧（原荥阳郡），如此一来，“陈留已无复有郡”①，其郡长官只好回到京师去重新等待任命。

其次是对官名、官制的更改。王莽建国后，依据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了王舜等人为“四辅”，甄邯等人为“三公”，甄丰等人为“四将”，合称“十一公”，后又变为“新室十四公”。除了这些重臣之外，王莽又先后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等数百人，建立起新朝的官僚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王莽增加了许多新官职，如在中央增设了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列于九卿的高官，增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五大夫等。在地方增置州牧副、部监副等。但王莽用心最多的，却是将原来的官名更换新称呼，如改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郡太守为大尹（或称卒正、连率）、郡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等等。其中，在兵制方面的改易也很是不少。例如，王莽置五威将12人，持节分镇天下，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五帅，总计72人。据《汉书·王莽传》，这12名五威将，分别享有不同的名号，如五威将军、虎贲将军、厌难将军、震狄将军、振武将军、平狄将军、相威将军、镇远将军、诛貉将军、讨秽将军、奋武将军、定胡将军等。这些称号很可能不是固定的，往往要依据具体情况而随时加封，如王嘉就有五威后关将军和振武将军两个名号。王莽还命令七公六卿皆挂上将军的名号，分别镇守历代各名都。当农民起义爆发后，王莽又于地皇元年（20年）下诏确立军制改革的目标：“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候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士吏四十五万人，士千三百五十万人，应协于《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将条备焉。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属令长裨将军，县宰为校尉。"①这样一来，一地往往既有兼掌军事的地方长官、专掌军事的领兵官，又有出镇一方的五威将军及其部属，还有七公六卿之类的镇将，他们的统属关系极不明确而人数却极多，在军队上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内耗与混乱，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上述改制活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是为了表现"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的新气象，是为了巩固新朝的政权。但这些改制的依据，不是现实的实际需要，而是儒家经典和一些符命图谶，所以它们便很少有实际的作用和意义，多数只是徒自增加混乱与麻烦而已，王莽的食古不化和自欺欺人，于此暴露无遗。

第三节　边陲的民族纠纷与战争

一、王莽执政时的周边形势

自汉武帝开边兴利以来，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汉朝政权公然为敌的匈奴、西羌等民族日趋衰败，最终走上了与汉族政权交好讲和的道路，汉朝政权完全掌握了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动权。在这个新的格局下，基本保持了一个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宣、元以后，随着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停止，汉朝的边境地区基本保持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这几十年的光阴，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

①《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然而，这样一个积极的发展进程却在新莽时期遭到了破坏。出于汉族独尊的狭隘民族自大心理，王莽无视当时民族关系相对稳定和洽的事实，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陈腐观念出发，认为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称王都是“违于古典，缪于一统”①，因此必须更改新名称。同时，他又蛮横无理地要求周边各少数民族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接受并服从新朝的统治，否则他就要诉诸武力，加以征伐。这样，从王莽建立新朝之日起，汉武帝以后汉民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局面便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系列边陲战争的烽火与狼烟。

二、构难匈奴

自呼韩邪单于在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降汉以来，汉与匈奴之间便开始了友好往来。特别是汉元帝以后，由于昭君出塞，汉与匈奴重结和亲，关系更为密切。匈奴每有新单于即位，必派名王重臣奉献或遣子入侍为质，复株累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曾分别入朝汉成帝和汉哀帝，陪同单于朝汉的人员也从200人增加到500人。匈奴单于名为汉臣，但汉朝统治者却给予他极大的自主权，很少干涉其内部事务，汉匈之间的高级使者往来不绝，边境平静少事。

王莽二次执政以后，为了表现他“威德至盛异于前”②，加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之心作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破坏汉匈友好关系的蠢事。

元始二年（2年），王莽为显示自己的权威，示意匈奴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过去匈奴派何人来汉入侍，完全由单于自行决定，西汉朝廷从不干预。但匈奴囊知牙斯单于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还是遵照他的旨意，令王昭君之女来汉入侍太后。王莽却得寸进尺，步步逼进，加紧构难匈奴。当时，正遇车师后王姑句与婼羌去胡来王唐兜因对西汉王朝失去信任，率妻子及部众投向匈奴。匈奴单于将他们安置在左谷蠡地后，立即遣使上书报告西汉朝廷。但王莽却派使臣责备匈奴单于，单于据理争辩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此外国也，得受之。"使臣硬说："匈奴骨肉相攻，国几绝，蒙中国大恩，危亡复续，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宜有以报厚恩。"①单于无奈，只得将姑句与去胡来王唐兜交给汉朝使臣，请求释其背叛之罪。但王莽不仅将二降王于聚会西域诸国之际斩首示众，还遣中郎将王骏等人出使匈奴，收回了汉宣帝时期与匈奴所制定的"约束封函"，将原来汉匈之间相互不得接受降人的旧约，更改为凡汉人、乌孙、乌桓亡降匈奴者及西域各国佩汉印绶而逃入匈奴者，均不得接受。匈奴囊知牙斯单于对此虽然不满，但仍采取退让态度，接受了王莽的新约。王莽在自鸣得意之余，又以"中国不得有二名"②为由，讽谕匈奴单于改汉名，单于只好上书将"囊知牙斯"之名改为"知"。王莽大悦，但不知他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建立新朝的当年（9年）秋天，王莽又派五威将军王骏等6名将帅为特使，携带着大批金帛来到匈奴单于廷，向单于宣布新朝的威德，同时收回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匈奴单于玺"，另行发给一枚"新匈奴单于章"。对于这种蓄意降低匈奴单于政治地位的做法，单于十分不满，坚决要求退还新印，索回旧印。但旧印已被新朝使者椎碎，单于只能上书朝廷，要求依汉印原型重铸"匈奴单于玺"。王莽置之不理，单于便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10余人率万余骑兵屯驻朔方塞下，此举虽在名义上是遵从王莽旨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意护送为匈奴劫掠的乌桓人返回故地，但实际上已是匈奴单于欲反王莽的一个信号。

次年，接连发生了匈奴策应车师国狐兰支及西域戊己校尉令史陈良、终带等人叛离的事件，王莽对此十分不满，但他却不知道该怎样去缓和与匈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是火上浇油，于始建国二年(10 年)十二月采取了进一步激怒并侮辱匈奴单于的行动，下诏将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宣布要将匈奴的土地、人民分为 15 部分，另立呼韩邪单于的 15 个子孙为新单于，同时又宣称要派立国将军等 12 将军率大军 10 道并出，讨伐乌珠留若鞮单于。

始建国三年，王莽的使者来到云中塞下，以所携带的大量珍宝“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①。但由于应者寥寥，最后还是采用欺骗加强制的手段，将右犁汙王咸父子二人分别拜为孝单于和顺单于。

王莽试图以外加兵威、内施离间的策略来压迫乌珠留若鞮单于臣服，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早就对王莽离心离德的乌珠留若鞮单于被逼不过，终于公开宣布与新朝决裂，他说：“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②？匈奴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及左贤王共将兵入犯云中益寿塞（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大杀吏民，北边的战火就此重新燃烧起来了。其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③。

色厉而内荏的王莽对匈奴单于的反抗和报复并无充分的准备。面对匈奴的军事行动，王莽制定了一个六路大军齐出合击匈奴的庞大的作战计划，这六路大军是：

五威将军苗䜣、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

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

---

①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

相威将军李棽、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

诛貉将军杨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

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

按照这个计划，六路大军共需“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①，同时要备齐300天的军粮，然后“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②。

这个作战计划，真可谓是大而无当，不切实际。它不以歼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为目标，而是虚张声势，想迫使匈奴退至极北的地区，使其远离新朝的边境。由于强调同时行动，就使部队完全失去作战的主动性和机动性，失去了战机。加上作战所需兵员、给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聚齐，势必将备战的时间拖得很长，造成将士的斗志涣散。

由于备战，从江淮至海岱的广大内郡地区被催征军资，急如星火，许多农民及手工业者被逼得家破人亡，成为流民。而先期到达边境的部队屯留日久，将领和士兵便大肆骚扰，抢劫财物，勒索钱粮，又给边境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样，虽然新朝的兵士尚未出征，但天下的百姓已是叫苦连天了。

有鉴于此，讨秽将军严尤上书王莽，指出了进击匈奴所面临的“五难”，认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严尤还建议修改作战计划，让先至边境的部队相机出击，他自请率部首先深入匈奴境内给敌人以打击并鼓舞军心民心。但刚愎自用的王莽却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仍旧“转兵谷如故”。由于“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疲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③。

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乌珠留若鞮单于于始建国五年死去。匈奴内部的亲汉（族）派、王昭君之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成为执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②③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政大臣，遂拥立曾被王莽立为“孝单于”的右犁汙王咸为新单于，是为乌累若鞮单于。

乌累单于即位后，因其子在新朝为质，加之不愿大动干戈以祸害百姓，便于天凤元年（14 年）的七月遣使与新朝讲和。为表示诚意，乌累单于还依允王莽的要求，将早年杀死戊己校尉刀护的陈良、终带等叛臣交还给新朝。于是王莽便宣布罢兵，调还在边诸将。为了顾全面子，王莽又下诏将“匈奴”之名改为“恭奴”，将“单于”改为“善于”。这自然引起了乌累单于的不满。后来，他又获悉自己在新朝的质子早已被王莽所杀害，更对王莽怨恨不已，便重新开始袭扰新朝的边境。王莽无奈，只得“复发军屯”，刚刚有所缓和的局势，立刻又变得紧张起来了。

此后数年，匈奴的侵边日甚一日，危害也越来越大。王莽虽然一直在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但新朝的军队却始终没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主动的出击作战，至少就文献记载而言是如此。十余万甚至数十万大军长期屯驻边疆备而不战，这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所以如此，恐怕与备战不充分等情况关系不大，很可能是因为王莽根本就没有与匈奴决战的勇气和决心，他对付匈奴的策略，实际上就是虚张声势的口头进攻与大军屯戍相结合。不论这种策略是出自王莽的胆怯或是清醒，它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震慑匈奴、使其不敢大举发动进攻。当然，新莽时期的匈奴，就其整体实力而言，似乎也不能像汉武帝时期其先辈那样，对新朝构成重大的军事威胁。

问题在于，王莽以数十万大军长期屯驻北边，对国内的民众滋扰甚烈。由于备战而征兵征粮，使“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①。更有甚者，备战匈奴最后逐渐演变成为一场闹剧。天凤六年（19 年），王莽招募有奇技可以攻匈奴者，上万人毛遂自荐，有的声称可以不用舟船而渡水，有的说能连续驾马飞车接济百万兵众所需的粮草，有的妄言可以制造一种灵丹妙药，

---

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令军士吃下不觉饥渴，有的则宣称自己可以一日飞行千里，到匈奴的后方去侦察敌情。王莽居然将这些骗子一一委以理军的官职，发给他们车马和官服，令其整装待发。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地皇二年(21年)，为国内重重矛盾弄得焦头烂额的王莽又一次下令，“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①。其用心，似是为转移国内矛盾而欲采取对外用兵的策略。但大军尚未出动，新朝已近覆灭，王莽构难匈奴，最终以不战自败而结束。

三、对西南夷的战争

自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汉军平定益州之后，因协助汉军作战有功被晋封为句町王的亡波，取代了滇王而成为汉朝在南疆所倚重的少数民族首领。亡波之后，句町国的君长及人民仍然忠服于汉，对维护西南夷地区局势的相对平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莽代汉后，将周边各族之称“王”者一律贬称为“侯”，句町国王亦不能幸免。当时的句町王邯“怨怒不附”，拒不接受新朝的册封。王莽大光其火，居然指示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②。句町国人不胜其忿，起而反抗。始建国四年（12年），邯弟承率众攻杀了周歆，公开与新朝为敌。州郡发兵镇压，但战不能胜，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由于当时“三边蛮夷愁扰尽反”③，王莽正忙于调兵遣将攻伐匈奴，无暇南顾，所以只能听任西南夷地区的混乱局势蔓延。至天凤元年（14年），益州大尹程隆被杀，新朝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周歆，《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周钦。

③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一触即溃。王莽乘匈奴重议和亲之机，给冯茂加上“平蛮将军”的名号，令其率军镇压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

冯茂奉诏征发巴、蜀、犍为士卒，并在三郡实行“赋敛民财什取五”之制①，以筹办军需。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费以亿计”②，参战士卒仅死于疾疫者就多达十分之七，益州地区被战乱破坏得十分严重，巴蜀等地也由于支援战争而搞得民怨沸腾，频频出现社会骚动，但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新朝统治的烈火仍在熊熊燃烧。气急败坏的王莽于天凤三年将冯茂召回处死，又派宁始将军廉丹及庸部牧史熊南下指挥作战。为尽快平定西南夷地区的局势，王莽特地调发大批天水、陇西骑士参战，又再度征发广汉、巴、蜀、犍为吏民 10 万人从军，加上在后方转运军饷者，总计纠集了 20 余万人进击句町。

来势汹汹的王莽军在初期作战时连获小胜，“颇斩首数千”③。但句町国人坚持战斗，逐渐又与莽军形成僵持局面。廉丹“复大赋敛”，“訾民取其十四”④，梁州（即益州）为之空破。即使这样，莽军依然为军粮前后不继而困扰，3 年之间，士卒因饥饿、疾病而死者达数万人，最后非但没有臣服句町，反而促使西南夷地区更加纷乱不安。邛人在任贵的率领下攻杀了越巂郡守枚根，任贵自立为邛穀王，新莽在这里的统治，愈发难以为继了。

有鉴于此，就都大尹冯英上书王莽，请求改变策略，“罢兵屯田，明设购赏”⑤。王莽不甘心失败，怒而罢免冯英，后又有所觉悟，委派文齐出任益州郡太守，实行冯英之策。文齐以屯田戍守为本，“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使西南夷地区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在此基础上，他又“率兵厉马，修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周歆，《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周钦。

②④⑤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③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障塞”，逐渐“降集群夷，甚得其和”。①但此时新莽政权已告覆灭。

四、对西域的战争

自宣帝时期在西域设置都护以来，西域各地虽然还保留着原先的“国”名及其行政系统，但汉中央政府对它们的直接统治却大大加强。至汉成帝时期，由于西汉统治的日益衰乱，汉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控制能力逐渐降低。到王莽二次执政之时，西域地方乱事频出。车师后王姑句和婼羌王唐兜因与汉官发生矛盾，分别投降了匈奴。在汉朝的压力下，匈奴单于将此二人送交汉官，王莽不问青红皂白，为立威于西域，竟将他们当着西域诸国王之面斩首，西域诸国君由此惶惑不安，各怀异志，汉朝在西域的威信一落千丈。

王莽代汉后，西域诸国王均被改称为侯，前来宣传新朝建立之“命天明命”的使者们，对西域诸国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令西域诸君长疲于应付，怨声载道。始建国二年（10年），广新公甄丰奉诏出使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听到消息后十分忧虑，担心无力接待甄丰而获罪，于是便与其属下密谋逃入匈奴。长驻车师的戊己校尉刀护听到风声后，不由分说便将须置离关押起来。当须置离身披枷锁被送往都护府时，车师国民皆知其难以生还，纷纷号哭于道相送，车师局势，一触即发。新朝的西域都护但钦不察其情，将须置离斩首示众。于是车师举国皆怨，须置离之兄狐兰支遂率领2000余民众，赶着全部的牲畜投降了匈奴。当时匈奴单于正对王莽更换自己的印绶等事恼恨不已，于是发匈奴军与狐兰支共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这样，在事隔60余年之后，匈奴的旗帜，又一次出现在西域。

当此危急之时，戊己校尉府内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奉命备

---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战迎敌的戊己校尉令史陈良、终带及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四人，皆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深知西域诸国颇有背叛新朝之心，更为“匈奴欲大侵”的气势所吓倒，担心与匈奴交战而送命，于是便合谋杀死了正在养病的戊己校尉刀护，胁迫戊己校尉府中吏士男女共 2000 余人一起投降了匈奴。

由此开始，新朝在西域的统治土崩瓦解。地近匈奴的焉耆国在匈奴的策反下，于始建国五年起兵，杀死西域都护但钦，王莽鞭长莫及，只能徒呼奈何。

天凤三年（16 年），王莽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等出兵西域。西域各国不敢抵抗，“皆郊迎，送兵谷”①，焉耆国也“诈降而聚兵自备”②。王骏等不知中计，率莎车、龟兹兵 7000 余人分为数部向焉耆开进，结果为焉耆的伏兵所截击，姑墨、尉犁、危须三国皆发兵助焉耆，共击王骏，“皆杀之”③。郭钦乘焉耆兵未还国之际袭杀其国老弱后撤兵，李崇则收拾残兵退保龟兹。7 年之后，新朝亡灭，李崇也死于西域。地近匈奴的北道诸国大多又重新役属于匈奴，而莎车王则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势力相对抗，整个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又告隔绝。

五、王莽对周边各族战争的后果

王莽备战匈奴及用兵西南夷、西域和高句丽，本意是想凭借武力制服对手、巩固新朝的统治。但除了征服高句丽之外，在其他战场上均未取得预期的战果，甚至遭受到了意外的失败。因此，这些军事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

首先，这些军事行动直接破坏了边郡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本来，汉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边郡军民辛勤开发了百余年，才使得往昔人烟稀少、经济状况十分落后的边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

郡地区初步出现了相对繁荣、富庶与安定的局面，但当战火重新燃起之后，边郡人民被迫备战、参战，不仅人员伤亡惨重，而且也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财产损失；边郡地区的生产、贸易活动被迫停止，社会秩序大乱，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历史倒退。

其次，这些军事行动同时给广大内郡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或是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王莽的种种改制措施，本来已使天下的百姓纷纷破产或罹罪，而为备战和作战而屡兴不止的人员、物资征调，更把他们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阶级矛盾，使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日益严重起来。

再次，这些军事行动，牵制了王莽政权的一大部分有生军事力量。当国内广大地区纷纷爆发农民起义之时，王莽不能及时调集兵力，进行有效的军事镇压，使得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的规模迅速扩大，直接动摇了王莽统治的根基，加速了新莽的灭亡。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军事行动完全破坏了汉宣帝以来各民族和平相处的良好环境，破坏了汉朝中央政权通过西域等地向更远的前方传播中华文明的积极进程，使前此百余年间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丧失殆尽，在很大程度上迟滞、延缓了西域、西南夷及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建设的进程，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十章　绿林、赤眉大起义与新莽政权的灭亡

新莽政权的统治，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众庶各不安生"①。处境本已十分悲惨的广大劳动人民，此时更是每况愈下。繁重的赋税、徭役和严刑酷法，将愈来愈多的人推到了死亡线上。普通地主、富商阶层也因为本身的利益受到王莽政策的侵犯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现象。劳动人民已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无法再继续维持其统治了。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于是便由小到大，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渐汇聚成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广大起义农民以其英勇的战斗，机动灵活的战术，向新莽政权发动猛烈的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不满新莽统治的一些地主也组织武装，与农民军结成联合阵线，使反对王莽的力量更加壮大。随着斗争力量的扩大与作战经验的积累，农民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以出色的战略战术，在昆阳一举歼灭王莽军队的主力。尔后，农民军又确定北图洛阳、西取关中，推翻新莽政权的战略方针，乘胜追击。在各支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之下，反动的新莽政权终于轰然倒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第一节　农民起义的爆发及绿林、赤眉军的发展壮大

一、农民起义的爆发

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王莽利用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西汉政权的强烈不满与失望，充分施展其阴谋手段，最终取代刘姓皇帝，成为新朝的开国之君。为了解决当时危及自身统治的社会问题以"致太平"①，使新朝长治久安，王莽在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他的那些以加强封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占有为基调的改制措施，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和普通地主、商贾阶层的利益为前提的，它们除了能够满足以王莽本人为代表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的贪欲之外，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也不可能给社会其他阶层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因此，王莽的每一项改革，都受到了普遍的抵制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不得不依靠滥施刑罚来强制推行改制，把大批的民众投入了监牢。根据记载，至地皇二年(21年)时，仅因触犯了改制禁令而被没为官奴婢者竟然多达数十万人，可见当时刑罚严酷的程度与西汉末年相比，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讨伐匈奴及镇压周边少数民族，王莽又兴师动众，把沉重的赋役强加在早已被榨干了血汗的劳动人民身上，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荡和灾难，不仅严重破坏了本来就已十分困难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自西汉末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危机，造成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王莽的政权，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

最先起来反抗王莽统治的，是以刘氏宗室为主的旧贵族。早在王莽居摄的当年（6年），安众侯刘崇就曾起兵于南阳；次年九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月，东郡太守翟义又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纠集起10余万人讨伐王莽；王莽建国之后，徐乡侯刘快又起兵造反。这些旧贵族的活动，虽然揭露了王莽虚伪奸诈的面孔及其罪行，但其目的，却是在维护刘汉统治的名义下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并不能真正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也不能对王莽的统治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都很快地归于失败。推翻王莽统治的历史使命，只能由饥寒交迫的农民来承担。

农民起义的烈火，最初是从北方边郡燃烧起来的。始建国三年（11年）时，由于王莽备战匈奴，并州（约当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一带①的百姓深为沉重的徭役和滋事的屯兵所苦，纷纷“弃城郭流亡为盗贼”②；至天凤二年（15年），五原、代郡一带的百姓也因同样原因而“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③。王莽派遣捕盗将军孔仁与郡县士卒联合镇压，用兵一年多，才逐渐把局势平定下来，但边郡地区也同时被莽军虏略殆尽，残破不堪。

北边的烽烟未熄，东方的烈火又燃。琅玡海曲（今山东日照西）的吕母起事，为莽末农民大起义开了先河。

吕母本是海曲县内一家“资产数百万”的地主，其子吕育曾为县吏，天凤元年时因犯小过而被县宰冤杀。悲愤的吕母决心为子报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收买当地的青少年。数年之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吕母率领这些人“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斩杀县宰，然后又“复还海中”④。吕母攻克海曲，其事约在天凤四年（后17

---

① 《汉书·王莽传》中原作“并州、平州尤甚”，考汉及莽新时期均无“平州”设置，颇疑“平州”乃“幽州”之误，因无确证，故此处以“并州一带”指代。

②③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④ 此段文字依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其中“海曲”，《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校改为“海西”，误。今从《汉书》、《资治通鉴》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年)①。吕母本人虽属于地主阶级，但参与其事的却主要是贫苦的农民，吕母以“杀人当死”的理由处死县宰，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苛政的心声，因此，吕母起义是一次农民武装反抗新莽统治的斗争。

此后，一方面由于新莽的统治愈加腐朽与黑暗，一方面则是遍及全国的水、旱、蝗灾，广大劳动人民被人祸和天灾共同逼上了绝路，纷纷走上了起义造反的道路。据《汉书·王莽传》载：

在南方，天凤四年（17年），临淮人瓜田仪率众“依阻会稽长州”（今江苏吴县东）；同年，荆州地区发生大饥荒，王匡、王凤被推为“渠帅”（即大帅），后来的绿林军由此肇始；其后，南郡张霸、江夏羊牧亦起兵，“众皆万余人”，南郡的秦丰起义也“众且万人”。

在东方，东海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刁子都）和琅玡人樊崇于天凤五年分别率领饥民起义，“众皆数万”；次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起义军的队伍更加壮大，樊崇所部成为日后赤眉军的主要来源。

在北方，自大河以北至燕山以南，先后兴起了数十支农民武装，他们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人数多达数十万，后来著名的铜马部、城头子路部、檀乡部、五校部、青犊部等农民军，都起于此时。

甚至在王莽统治的心脏——关中地区，这时也出现了许多小股农民起义，“三辅盗贼麻起”的记载，说明新朝的天下已经找不到一块平静的国土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起义浪潮，王莽虽然惊慌不安，但起初并不十分重视。他觉得这些饥民的叛乱并不足以威胁新朝的江山，加

---

① 史书中没有关于此事的明确记载。《汉书·王莽传》称吕母起义于天凤四年，《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则云在吕母起义“后数岁，琅玡人樊崇起兵于莒”，而《汉书·王莽传》称樊崇起义事在天凤五年，所以，吕母攻克海曲县城的时间，似在天凤三年与天凤四年之间。

之当时大军屯守边境，调遣不利，因而没有派出大军前往各地镇压，只是责令各州郡"急捕殄盗贼"，另外又派出使者到处"即赦盗贼"，企图不动干戈就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与此同时，他又装神弄鬼，幻想借助天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天凤四年（17年）秋八月，王莽铸成了"威斗"，这件采五色铜矿冶炼浇铸而成的奇怪器什，是一个长二尺五寸、形似北斗七星的物品，据说具有镇压平息一切反叛者的神奇魔力。王莽命专人整天肩负着这件法器陪伴自己，随着"威斗"斗柄方向的转换，王莽的御座也不断变更方向，"欲以厌胜众兵"①。另外两项自欺欺人的措施，是颁新历和建九庙。所谓颁新历，是命太史推算出新朝统治36000年的历纪颁告天下，"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②。所谓建九庙，则是在地皇元年（20年）时在长安城南郊修建起九座祖庙，祭奠上至黄帝，下至其父的列祖列宗，希望凭借死人的亡灵来保佑新朝的社稷。

当各地农民起义初始之时，起义者的直接目标，并不是推翻新莽的统治，而是为了求得生存，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各地的农民军虽然人数不少，但并未联合为一体；有的农民军还"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他们往往"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③。此时王莽如果真能采取实际措施改善政治状况，解民倒悬之苦，局面并非绝对不可控制。然而王莽始终不肯正视"四方皆以饥寒穷苦起为盗贼"的事实，大肆玩弄自欺欺人的伎俩，终于使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声势与规模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又于地皇元年下令置前、后、左、右、中五大司马，诸州牧至县宰皆有大将军、偏、裨、校尉之号，将全国的行政与军事一体化，推行全面的军事镇压政策。这种做法，更加激发了各地农民军与新莽政权斗争的决心，在与王莽军队不断作战的过程中，各地农民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赤眉、绿林即是最为突出的两支。

---

①②③《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二、赤眉军在东方的作战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决口于魏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①，大批的难民涌入琅邪（治今山东诸城）、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二郡，使得这一带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百姓的日子愈发艰难。饥寒交迫尚且不说，法网严密更使他们度日如年，他们“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②。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便合族合家“悉起为盗贼”，参加到反抗新莽统治的斗争中来。因而，这一地区便成为莽末农民起义的首发地和重要区域之一。

樊崇字细君③，原是琅邪郡一个没有文化、以务农为生的普通农民。天凤五年，他为生活所迫，带领数百名贫苦弟兄在莒县起义，随后即转入泰山地区活动，“自号三老”，队伍逐渐扩大。与樊崇同郡的逄安及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各起兵，合数万人”，因为仰慕樊崇的勇猛，便率部上了泰山。这样，在樊崇的名号之下便聚集起几万民众，成为当时东方诸多农民军中势力较大的一支。

随着人数的增多，樊崇等人逐渐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组织和纪律，以约束和管理自己的队伍。起义的领导人多是纯朴的农民，不懂得如何设官建制，他们只能从自己在宗法制度下从事生产与生活的经验出发，模仿当时普遍实行于农村的乡官制度，并且借用“三老”、“从事”、“卒史”等小乡官的名称，建立起自己的三级组织机构。以三老最尊，从事次之，卒史又次之，农民军相互以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③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李贤注引《东观汉纪》。

"臣人"相称①。由于起义者绝大多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以这支队伍便"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等繁复的规章制度，而是"以言辞为约束"②。例如，"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③即是义军将士所需遵守的一条纪律。凡此种种，无一不表现出了他们淳朴的农民本色。

地皇二年（21 年），樊崇等人率部前往攻打当地的中心城市——莒县。由于装备低劣，农民军未能攻破莒县坚固的城防。他们转而攻打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大败王莽的探汤侯田况，取得了歼敌 1 万余人的胜利。然而，胜利后的农民军在这一带仍无法存身，又进入青州进行一系列的流动作战，最后再返回泰山地区，在东海郡的南城（今山东枣庄北）屯驻休整。

田况在遭受樊崇义军的痛击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他在未经王莽授权的情况下，又将其辖区的 4 万多名 18 岁以上的男子组织起来，"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④，形成一支新的地方官军。田况率领这支军队出击，"所向皆破"，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所以王莽不仅没有追究他的"擅发兵"之罪，而且还委以他领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职。根据自己对付农民军的作战经验与教训，田况提出了"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的办法，认为这种坚壁清野的对策可以使农民军既得不到粮食又失去群众，"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⑤。他还建议王莽不必派遣中央大员领兵前来围剿，而是要"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⑥，充分发挥地方官员及地方军的能量来各个击破农民军。田况的建议本是有利于新莽统治的，但猜忌成性、"尤备大臣"的王莽却对这个忠实的臣下大起疑心，他一面用明升暗降的

---

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作"巨人"，今从刘修明之说，可参见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第 225 页注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③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

④⑤⑥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手法将田况调离，一面又派出以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为首的中央军前来东方，寻找樊崇军决战。樊崇等人采用避实就虚、游动出击的战术与敌周旋，使景尚的大军疲于奔命而又一无所获。地皇三年的二月间，樊崇军抓住战机，一战打败敌军并击杀景尚。这是他们首次战胜中央军，也是起义以来对新莽作战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景尚身为太师羲仲，是宰辅副贰，地位甚高，他的死讯极大地震动了朝廷，也促使王莽更进一步把樊崇等东方义军视为心头大患。同年四月，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奉命率领 10 万大军向东方杀来，企图一举平定这里的动乱。樊崇等闻讯后毫不畏惧，立刻开始备战。为了避免在混战中误伤自己人，樊崇的义军将士一律“朱其眉”即以红色涂眉。从此，这支义军就有了“赤眉”的名号。

当时关东地区“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人民生活十分艰难。但王匡、廉丹的大军却“所过放纵”，一路任意烧杀抢掠，奸淫勒索，无恶不作。东方的百姓对这支匪徒般的官军十分痛恨，编了这样一首民谣四方传唱：“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①。

因为一路骚扰百姓，所以王匡、廉丹军的东进速度十分缓慢，而东方的农民军则在迅速扩大。心急如焚的王莽给廉丹下了这样一道诏书：“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② 在王莽的严令催促下，王匡、廉丹不敢怠慢，加快行军速度，终于在地皇三年冬来至兖州地区。这时，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发生了索卢恢起义，义军攻占县城，声势颇大。王匡、廉丹遂即由定陶北上，向无盐进攻。由于立足未稳又寡不敌众，索卢恢部 1 万余名战士惨遭屠杀。初战的胜利，使年轻气盛的王匡愈发骄横，当他得知赤眉别部董宪数万人正游弋于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一带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上。

的消息时，立刻调转马头南下，欲寻找董宪部决战。久经沙场的廉丹以新历征战、士卒疲劳为由，力主暂且休整部队，但王匡却根本不听，独自率其所部冒进。廉丹无奈，只好勉强跟随其后。这时，樊崇率领10万赤眉军主力赶来，在成昌聚（今山东东平西）以南设下埋伏。当王匡、廉丹军进入伏击圈后，赤眉军突然杀出，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经过一番激战，同仇敌忾的赤眉军凭借人数的优势击溃官军，斩敌万余人。王匡、廉丹率残部后撤，赤眉军乘胜追击至无盐。王匡见大势不好，竟然弃军而逃，拣回了一条性命，廉丹及其手下的20余名校尉与赤眉军苦战，最后全都成了赤眉军的刀下之鬼。

这次成昌之战，是赤眉军的第三次重大胜利，是莽末农民起义爆发以来农民军与官军第一次大会战，也是东方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莽军虽然不断战败，但尚能保持主动进攻的态势。成昌之战后，“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①，新莽在东方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王莽一面派大将军杨浚把守东方的大粮库“敖仓”（今河南荥阳北敖山上），一面派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派国将哀章东驰与太师王匡会合，全力抵御赤眉军西进，在军事上完全放弃了对赤眉军的主动进攻而采取守势。

军事压力的减轻为赤眉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成昌战役后，原先发动海曲起义的吕母病逝，其部分人马并入赤眉军，其他一些小股农民武装也纷纷投靠赤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万人左右。然而，由于赤眉军领导层缺乏谋略，缺乏远大的目标，所以当莽军停止了围剿进攻之后，这支庞大的农民军并没有乘胜大举向西推进，而是在黄淮大平原上游弋，随机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作战，最后停顿于濮阳（今河南濮阳）一带，除了吸引莽军部分兵力之外，他们并没有对新莽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起自南方的绿林军已然壮大，成为莽末农民起义的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中坚。

三、绿林军的发展

天凤年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无食可吃的穷苦农民纷纷涌入野泽，挖掘凫茈（野荸荠）为食。然而野莱毕竟有限，而饥民却是如此众多，以至于为争夺一点野莱而经常发生纠纷。来自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的王匡和王凤二人，不断为饥民“平理诤讼”，排解调停，在饥民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后来，二人被饥民推举为渠帅，初步形成了一支数百人的小队伍，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这一年是天凤四年（17年）。

不久，邻近地区的一些流民纷纷前来参加王匡、王凤的队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绿林军主要将领的江夏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队伍不断扩大，再多的野荸荠也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王匡等人便率领起义者“转掠求食”，攻打附近的村镇，抢夺地主豪强富户的贮粮和物品，从而引来了官军的清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他们退往绿林山（即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间之大洪山）。这里方圆100多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水源丰足，各种食物也不少，很适合起义军的生存与发展，数月之间，绿林山上就汇聚了七八千造反的农民。

这种情况引起了王莽的注意。天凤五年，他委派大司马司允费兴出任荆州牧。在费兴离京之前，王莽向他询问关于处理绿林山上农民军的对策。费兴回答说，他认为百姓造反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实行“六筦”，侵夺百姓的利益；二是“连年久旱，百姓饥穷”①。所以，他打算到任后立即令流民回归田里，政府贷给他们耕牛、种子，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同时还要降低租税，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本是平定局势的上上之策，但王莽听了却勃然大怒，认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为费兴太过软弱，当即撤销了对他的任命。在王莽看来，造反的农民都是十恶不赦的匪徒，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安抚，而只是强力的镇压。

由于王匡的义军一直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加之东方形势吃紧，王莽迟迟派不出军队南下。直到地皇二年（21年）时，才令荆州牧调集2万地方军围剿绿林山的义军。王匡、王凤等经过商议，认为绿林军兵力处于劣势，如果在绿林山固守待敌，势必陷入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处境将是十分被动，决定主动出击，出敌不意地攻击正在前进中的王莽军队。于是率部迅速向莽军前进的方向挺进。到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时，王匡将主力埋伏于道旁，另派马武率部分兵力断敌后路。当荆州牧率莽军进入伏击地点时，王匡指挥埋伏的战士突然发起攻击，杀得莽军人仰马翻，歼敌数千人，缴获全部辎重。荆州牧率残兵向随县方向仓皇逃命，中途又遇到马武所部的截击。莽军兵败如山倒，溃不能战。荆州牧的乘车被钩翻，驾马被杀死，只是由于马武当时还不敢杀死朝廷的高官，这才使他拣了一条命。起义军乘势进攻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云杜、安陆（今湖北云梦），一路胜利不断，待重新回到绿林山时，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粮食、物资，而且队伍已扩大到5万余人，“州郡不能制”①。这支队伍当时尚未自立名号，因其以绿林山为根据地，所以后代史家便以“绿林军”称之。

正当绿林军蓬勃发展之时，一场大瘟疫在绿林山蔓延开来，缺医少药的绿林军有将近一半的人染疫而死。为保存实力，绿林军将领决定分散转移出山，另图发展。地皇三年，王常、成丹等率部分人马向西进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率另一部向北进入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绿林军将领皆“自称将军”，开始了绿林军事业的新的阶段。

这年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州东北）人陈牧、廖湛发动千余人起义，呼应新市兵的行动，称“平林兵”。当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

绿林军的兵锋逼向舂陵（今湖北枣阳南）附近时，一支由刘縯、刘秀兄弟领导的反莽武装也乘机而起，称“舂陵兵”，大约有七八千人。舂陵兵不是农民的武装，而是代表南阳地方豪强地主及刘姓宗室利益的队伍，他们加入绿林军的行列，不仅扩大了反对新莽统治的社会阵营，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绿林军的声望和战斗力。这年十一月，新市兵、平林兵、舂陵兵三军联合行动，进攻长聚和唐子乡，杀新野、湖阳两尉，攻克棘阳（今河南南阳南），取得了接连的胜利。舂陵兵首领刘縯欲乘势夺取南阳郡首府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匡、陈牧各引其兵配合，但新莽的南阳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赐却率兵在小长安一战中打退了绿林军。舂陵兵受到较大损失，绿林军只好退至棘阳防守。甄阜、梁丘赐乘胜追击，他们根本不把绿林军放在眼里，居然不顾兵家所忌，将辎重全数留在了蓝乡（今河南新野东），率领10万轻锐南下，在黄淳水及沘水两川之间扎营，并且“绝后桥，示无还心”①，大有灭此朝食的嚣张气焰。

当此形势严峻之时，起义军内部却矛盾骤起，新市、平林兵诸将领在遭受挫折之后产生了畏敌情绪，欲分兵撤退，避敌锋芒，而刘縯兄弟则主张重整旗鼓，再战强敌。正在起义军将领论议不决之时，由王常、张卬率领的5000多名下江兵进抵棘阳附近，使起义军的临战形势顿时改观。

原来下江兵出山不久，便在蓝口与新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率领的大军遭遇，下江兵仓促应战，伤亡惨重。王常等人自忖进入南郡难以立足，当即改变原先的西进计划，掉头向东北方向转移至南阳郡随县的蒌溪一带，后来又将队伍拉到石龙山和三钟山之间休整。待元气恢复之后，王常等人便率下江兵继续北上，试图与新市兵会合。行至上唐乡（今湖北枣阳县境内），下江兵与荆州牧所领的地方军接战并取胜，顺利地挺进至宜秋（今河南唐河东南），与新市、平林、舂陵诸兵形成呼应。

---

①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刘縯闻知下江兵到来，十分兴奋。他与刘秀连夜赶往宜秋，向王常等人介绍情况，“说以合从之利”，鼓动下江兵参与对甄阜军的作战。王常欣然同意了刘縯的请求，并利用他在绿林军中的威望，说服了下江、新市和平林诸将，共同制订了迎敌计划，“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①，决心与官军一决雌雄。

起义军抓住敌军的弱点，决定首先袭取敌人的后方辎重要地蓝乡，在夺取敌军后勤给养的同时，切断敌军的退路。地皇三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下江、新市、平林、舂陵诸兵分为六部，“潜师夜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有力的奇袭方式，一战而攻取了蓝乡，打了莽军一个措手不及。随后，起义军不顾连夜征战之辛劳，乘甄阜军惊魂未定之际，向他们发起总攻。战斗从地皇四年（23年）的正月初一日②清晨开始，起义军分为左右两翼投入进攻：舂陵、新市、平林诸兵自西南方向攻击甄阜；下江兵则自东南方向攻击梁丘赐部，战斗进行至“食时”即近午时分，下江兵首先击溃了梁丘赐所部莽军，战局迅速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移。甄阜见大势已去，更无心恋战，仓皇引兵而退，莽军阵脚大乱，刘縯等部奋起急追，莽军遂告大败，“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③，甄阜、梁丘赐二人也在混战之中毙命。

起义军的这一胜利，使前来增援甄阜军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风丧胆。他们不敢与士气正旺的起义军交锋，立刻率部向宛城方向逃跑，企图凭借宛城坚固的城防工事来与起义军周旋。刘縯当机立断，“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④，激发起义军将士连续作战、奋勇杀敌的勇气。起义军“鼓行而前”，迅猛追击，终于在淯

---

①《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②《汉书·王莽传》记此战在地皇四年正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元年（即王莽地皇四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地皇四年正月初一日为壬子日，而甲子日则是正月十三日。

③④《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阳（今河南南阳南）城下截住了严尤、陈茂的大军，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惊魂未定的莽军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严尤、陈茂弃军逃命，莽军被斩首者3000余人，起义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四、更始政权的建立

棘阳、淯阳大捷之后，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反莽联军已经发展到了10万多人，当地的中心城市——宛城则陷入反莽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些情况，标志着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当时各支反莽义军只是在军事行动中结成了松散的同盟，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政治组织，“众虽多而无所统一”①。显然，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反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在攻打宛城的战役开始之前，反莽联军的许多将领，尤其是舂陵兵诸将领，纷纷提出建立起义军政权的“立君”要求。舂陵兵的首领刘縯，成为君位的有力竞争者。

刘縯字伯升，新莽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乃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景帝庶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自其曾祖父辈始，刘縯这一世系失去了贵族的高爵，但其祖父曾任巨鹿都尉，父亲曾任南顿县令。汉元帝初年，刘縯的家族已迁居南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西汉末年时已经成为当地颇具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地方豪强。

王莽代汉之后，对刘氏宗室均采取抑制政策，“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②。刘氏宗室失去前朝所有的许多特权，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大不如前，因而普遍不满于新朝的统治。《后汉书·刘縯传》载，刘縯在王莽建国后“常愤愤，怀复

---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他的这种表现，反映了刘氏宗室的普遍心态。

王莽的改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地主豪强的利益，一些地主豪强便在莽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乘时而起，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一方面对付农民军，另一方面也参与反莽的斗争。一些刘氏宗室更是直接参加到农民军的队伍中来。

南阳是刘氏宗室聚集的地区，最早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安众侯刘崇就曾在宛城与官军交战。当新市兵北上之时，“南阳骚动”①，刘縯感到机不可失，便召集当地豪强发动亲族，组织武装，自称“柱天都部”②，公开打出了反莽的旗帜。

和穷苦农民造反以求生存的情况不同，刘縯兄弟起兵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借助当时群起反莽的天下大势和农民军的力量去“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③，以自己为主，重建刘姓的王朝统治。刘縯兄弟的这种个人打算，在当时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整个社会对王莽的统治都感到失望之后，人们又普遍对汉朝的复辟抱有希望。“汉家当复兴”④，“百姓思汉”⑤，逐渐成为新莽末年社会思潮的主流。不仅豪强地主阶层重新寄希望于刘氏，而且广大贫苦农民也对一个新的刘姓王朝抱有幻想：例如，樊崇的义军以赤色涂眉，可能即是出自拥汉的心理，因为当时人都知道红色是刘汉的象征；再如，下江兵的将领王常之所以同意与刘縯联合作战，也是因为看到了“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的社会现实，认为“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觉得辅助刘氏兄弟乃是“下顺民心，上合天意”的正义之举⑥。

所以，在竞争新君之位的斗争中，刘縯具有先天的优势。此外，刘縯又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军事才干，在对莽军的作战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深得南阳地主豪强及部分农民军将士的拥

---

①⑤⑥《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④《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戴，“豪杰咸归于伯升”①，王常也是刘縯的坚决支持者。至于刘縯本人，更是踌躇满志，这从他在击破严尤、陈茂后便改号自称“柱天大将军”一事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然而，农民军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反对拥立刘縯为帝。这首先与农民军和刘縯春陵兵集团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绿林诸兵与春陵兵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同面临着南阳地区莽军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不全是由于在反对王莽统治这一大目标上的一致。从合军之初始，绿林诸部就与春陵兵不断发生摩擦。在攻打长聚和唐子乡后，农民军因为“军中分财物不均”而“众恚恨，欲反攻诸刘”②。小长安作战失利后，新市、平林将领见春陵兵伤亡较重而甄阜的大军又步步逼来，曾经“各欲解去”③，解散联盟。下江兵的另外两名将领成丹、张卬也曾极力反对王常联合春陵兵，对王常辅佐刘縯的想法也颇不以为然，认为“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④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绿林诸将都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与春陵兵的联合，不愿意在政治上受刘縯的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由于阶级的不同所决定的。此外，绿林诸将毕竟出身于农民，具有散漫气息和流寇主义倾向，他们“乐放纵”⑤，考虑较多的是自行其是和如何分配财物，缺乏远大的目标和长远的谋议，所以不免对“性刚毅”⑥又与己屡有摩擦的刘縯畏惧三分。因此，他们虽然一致主张拥立刘氏宗室为帝，但选择的却是一个无权无势又不知名的刘玄。

刘玄字圣公，他的六世祖亦是长沙定王刘发，与刘縯原是同族兄弟。莽新末年，刘玄因“客犯法”的牵连而逃离家乡，来到了平林。后来，他只身投入平林兵，因为有文化，被陈牧任为安集掾，负责安顿新征集的军众，后又被提拔为更始将军。与刘縯

---

①③⑤⑥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②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④ 《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相比，刘玄的个性不是很强，从绿林诸将“刁圣公”①、“狎圣公”②等记载来看，刘玄为人较为随和，在绿林军只是一名普通的将领，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与绿林诸将关系较为亲密、融洽。他虽为刘氏宗室，但与其家族的关系并不深厚，也不是南阳豪强地主的政治代表，立他为帝，比较有利于绿林诸将的操纵与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在反莽联军中，新市、平林、下江诸兵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舂陵兵起事既晚，人数又少，从实力对比的角度看，由出身于平林兵的刘玄为帝，被绿林诸将视为必然之事。

面对自己的族兄，刘縯无法公然反对，但又实在不甘心将帝位拱手让给刘玄，于是他提出建议，让刘玄暂且“称王以号令”，理由一是认为反莽联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二是担心东方的赤眉军亦拥立刘氏宗室为帝，从而出现“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的局面，不利于攻灭王莽的大局。所以他主张刘玄缓称帝，如果赤眉军所立之君贤德，大家便“相率而从之”，如果赤眉军没有立君，那么等到“破莽降赤眉”之后，刘玄再称帝亦不为晚③。

刘縯的分析与建议确实不无道理，但其真实用心，却是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再伺机争夺帝位。所以，尽管许多绿林将领都被刘縯堂而皇之的言语所迷惑，但张卬和朱鲔二人却识破了刘縯的缓兵之计。张卬当即拔剑击地，斩钉截铁地说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④。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纷纷附和，刘縯迫于压力，只好让步，一场由谁来当皇帝的争论就此结束。

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初一日，新市、平林、下江、舂陵各

---

① 四库本《东观汉纪》卷二十三《载记·刘玄》。按，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则为卷八《传三·刘玄》。

② 《后汉纪》卷一《光武皇帝纪》。《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云，“新市、平林将帅……贪圣公懦弱”，现代史家多认为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③④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路义军汇集淯阳河畔，为刘玄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当了皇帝的刘玄随即发布诏令，宣布大赦天下，恢复大汉国号，改地皇四年为更始元年；任命其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皆九卿、将军”①，正式建立起政权。

刘玄的更始政权，是起义军内部农民势力与豪强地主势力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产物。刘玄虽是按照农民军将领的意志所拥立的皇帝，但他既是起义农民的代表，又是刘氏宗室及地主豪强阶层的象征。在更始政权内部，来自农民军的将领赫然占据了许多重要的位置，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治、军事实权，使得更始政权在开始阶段能够比较多地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体现农民起义军的意志。但是，更始政权毕竟又是以刘氏宗室为皇帝，打出来的是汉家的旗号，其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承袭了汉朝的政治制度，其领导层内部的豪强地主势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因此，更始政权并非是纯粹的农民政权，而是由农民与豪强地主共同执政的联合政权，内部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了更始政权不会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同时也决定了更始政权后来向地主政权的演变和蜕化。

不过，更始政权的建立，仍是莽末农民起义达到高潮的重要标志，它对推动全国各地反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更始政权的领导之下，起义军迎来了新的更大的胜利。

第二节　昆阳决战

（参见附图9）

一、王莽调集大军进攻更始军

在更始政权建立之前，王莽把战略进攻与防御的重点，集中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

在东方的赤眉军之上，对于南方的绿林军，他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在与绿林诸部的作战中，王莽没有大规模地动用中央军力，而主要依靠那些战斗力并不很强的州郡地方军和一些临时招募而来的士兵，作战指挥系统又较为分散，所以在南阳郡的作战中便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

更始政权的建立，使王莽坐卧不安。自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以来，莽军虽然屡遭败绩，但毕竟还没有哪一支起义军公开宣布要推翻新莽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的出现，不啻是为王莽的统治敲响了丧钟。心惊肉跳的王莽预感到自己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决心把军事重心南移，调动大军对付更始政权。在加紧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王莽又大肆玩弄虚张声势的把戏。为了让天下人都感到到自己的意气从容，他不顾国库空虚、烽烟遍地的窘状，欣然染黑须发，迎娶新的皇后，又大封淑女 120 人，与方士日日在后宫里考验方术，纵情淫乐。为了瓦解各地起义军的斗志，王莽又发布诏书，宣称大赦天下，同时却以封五万户侯、赏黄金 10 万斤、位上公的高价悬赏刘縯等①。最为可笑的是，为了欺诈威吓各地的起义军，王莽又发布诏书宣布：

> “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车骑将军王巡、左队大夫王吴亟进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迫措前队（即南阳——引者注）丑虏。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复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击，殄灭之矣！……如黠贼不解散，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②

王莽杀气腾腾的诏书根本吓不倒士气正旺的更始汉军将士，相反倒更激发了他们迎敌作战的斗志和勇气。在建立政权之后，更始汉军一面“移书称说”于天下，大力宣扬农民军的胜利，一面由刘縯指挥主力开始攻打南阳首府宛城，同时，更始政权还派遣

---

①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大将分头出击，在南阳周围地区流动作战，积极扩大战果。例如，王常亲率一部“别徇汝南、沛郡”①；赵熹在降服了舞阳大姓之后又“进入颍川，击诸不下者，历汝南界还宛”②；王凤、宗佻、刘秀、李轶等人则分别攻占了昆阳（今河南叶县昆阳镇）、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今河南郾城西）三地。这些外围作战，有力地扩大了更始政权的政治影响和势力范围，同时又缴获大批粮食、牲畜及其他物资，很好地配合和支持了宛城主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昆阳的占领，对王莽更是个严重的威胁，因为更始军占领此地，就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

更始政权的上述行动，促使王莽加速调兵遣将，他授大司空王邑以军政大权，令王邑驰赴洛阳，与屯守在那里的大司徒王寻一起指挥对更始政权的围剿行动。这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号称百万（实为 42 万）的大军抵达颍川郡，这些所谓的“虎牙五威兵”主要是由各州郡精选出来的锐卒，由各州郡牧守亲自率领，其武器装备及作战能力均在普通兵卒之上。为壮军威，王莽还特地任命一位身高一丈、腰大十围的巨人巨无霸为垒尉，同时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③，另外还有“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④，为王邑、王寻出谋划策。文献称王莽的这支大军“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⑤。不难看出，已近穷途末路的王莽决意孤注一掷，企图以压倒的优势，一举歼灭更始汉军，彻底扭转被动局势。一场决定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命运的大决战，就此来临了。

二、更始军与莽军的作战决策

昆阳位于南阳盆地的东北外缘，距离南阳大约 210 华里，北

① 《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

③④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⑤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扼著名的“方城缺口”，正处在黄淮平原与南阳盆地的交界地带，它既是南下进攻南阳盆地、襄樊盆地的桥头堡，又是北上用兵中原的咽喉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所争。西汉之时的昆阳城池虽小，但其城防设施却十分坚固，原因即在于此。

更始元年（23 年）三四月间，更始军占领了昆阳，表现出了兵锋直逼洛阳的进攻态势。当王邑、王寻的大军出颍川南下时，在更始政权中担任太常偏将军的刘秀曾率数千军士在阳关聚（今河南禹州西北）实施阻击作战，后因寡不敌众，刘秀遂引军后撤至昆阳。

当时在昆阳城的更始军将领，有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五威偏将军赵玊等人，诸将所领军卒，总计约在八九千人左右。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强敌，在兵力上处在绝对劣势地位的更始将领们普遍产生了畏敌怯战的情绪，他们“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①]，即打算分兵不战而退，大家各自逃命。刘秀强烈反对这种自取灭亡的决策，他主张坚守昆阳，待机破敌，并为诸将分析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②]

刘秀的分析，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南阳郡战场的重心，是宛城的攻坚战，刘縯率 10 余万更始军主力围城数月，破敌已指日可待，如果昆阳的更始军不战而退，就会使莽军长驱直入，对正在攻打宛城的更始军形成前后夹击，如此，更始诸部确实就有被莽军各个击破的巨大危险。相反，坚守昆阳则可以保持更始军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又可以阻滞莽军的大举南下，为保障主力攻取宛城争取宝贵的时间。如果宛城在握，即便昆阳等地失守，更始政权仍将不失全局的主动。

然而刘秀的意见起初并未说服已无斗志的王凤诸人，面对刘

---

①②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秀的指责，他们还大光其火。正在此时，王邑的“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①。王凤等人见状，只好放弃南逃的打算，转而请求刘秀制订应敌之策。胸有成竹的刘秀提出了坚守昆阳，以迟滞、消耗莽军兵力，同时外搬援兵，再伺机内外夹击敌军的作战方案，得到众将的一致赞同。

当天夜幕临近时分，王邑、王寻的大军已有将近10万人马抵达昆阳城下，他们从北、东、西三面完成了对昆阳城的包围，只有南门外尚未合围。这时，更始军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由刘秀、宗佻、李轶等13骑乘着夜色从已经布满敌军的南门杀出，前往定陵及郾城两地调集援军，王凤、王常则率部留在城内坚守。

身为莽军主帅的王邑，是个刚愎自用而又不知军事战略的狂妄之辈。早在始建国二年时，他曾以虎牙将军之职领兵镇压了翟义起义，因未能生擒翟义而受到王莽的斥责。此番率领大军南下，他抱定每城必克、一路攻杀至宛城的决心。当他指挥大军对昆阳城实施包围时，纳言将军严尤曾表示异议，认为“昆阳城小而坚”，易守难攻，莽军不应在此与敌纠缠，而应当先挽救宛城，主张率部绕过昆阳向宛城“亟进大兵”以击敌要害，“宛败，昆阳自服”②。但王邑却置宛城于不顾，认为自己“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③，未免太丢脸面。在他看来，人数不多的更始军据昆阳城而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坚信自己可以“屠此城，喋血而进”④，给更始政权一个下马威。

三、决战昆阳城

按照王邑的部署，莽军10余万人将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在城外排列了百余座军营，“旗帜蔽野，埃尘连天”。莽军攻城之时，

---

①②③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④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钲鼓之声震天动地，“闻数百里”，气势夺人。莽军架起了高达10余丈的云车，“瞰临城中”，监视守城更始军动静，同时以挖掘地道和楼车撞击城墙、城门的战术日夜攻打昆阳城。由于城墙的基础深厚，城墙又十分牢固，加上更始军将士的死拚苦斗，莽军的进攻连连失败。王邑见此又改变战术，令军士登云车俯射城中，“积弩乱发，矢如雨下”。守城的更始军及城中百姓到井台汲水，都需要头顶门板才敢出来。异常激烈和艰苦的战斗使更始军伤亡甚重，城中又余粮无多，王凤等自觉难以坚持，便向王邑乞降。这时，严尤又向王邑提出改变战术的请求，建议王邑依从“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的兵法，故意放已近失败的昆阳更始军逃出城去，让他们去涣散正在宛城作战的更始军将士的斗志，莽军乘势追杀，必胜无疑。然而王邑却沉迷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的幻想之中，以为自己已稳操胜券，破城歼敌只在须臾之间，因而不仅又一次拒绝严尤的良策，而且还极其傲慢地拒绝了王凤的请降。

这种情况从反面教育了守城的更始军将士，使他们清醒地看到，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坚守城池才有一线生机，斗志因此而更加旺盛，作战因此而更加英勇。由于更始军将士的顽强抵抗，王邑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皆未得逞，汉家的旗帜，一直飘扬在昆阳的城头。

不久，刘秀、李轶、宗佻等人率领着定陵、郾城等地近万名援军来至昆阳城外。六月初一日（23年7月7日），刘秀亲率步、骑千余为前锋，挺进到距大营约四五里处列阵，准备冲击敌营。王邑、王寻以为这只是小股更始军的骚扰，所以只派出数千人迎战。为鼓舞士气，保证初战必胜，刘秀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斩首数十级”。诸部将士十分兴奋，他们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①！于是刘秀又一次拍马上前，莽军后退，更始军诸部乘势掩杀，“斩首数百千级，连

---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胜，遂前”。这时，刘缜已经于三天前攻克了宛城，但刘秀等人尚未获知此消息。为了涣散莽军的斗志和激发更始军的士气，有勇有谋的刘秀又出奇计，精心制造了“宛下兵到”的假情报，在送往昆阳城中时故意让它落入莽军之手。王邑、王寻得之，“不驼”，被昆阳小城阻滞已久的莽军阵营也开始出现骚动，更始军将士则“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①。刘秀见军心可用，迅速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由他率领涉过昆水，从城东迂回到城西，向莽军的中坚即指挥部发起进攻。王邑、王寻根本不把这些更始军放在眼里，又一次犯下了大意轻敌的错误。他们首先严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②，以避免由于无谓的混乱而造成全军不安，然后亲率1万余人“独迎”刘秀的敢死队。刘秀在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即发动猛烈的冲击。敌军阵势大乱，双方展开混战，莽军副帅王寻在乱军之中被杀。其余各营因有军令而“不敢擅相救”③，王邑所部很快就一败涂地。昆阳城中的更始军抓住战机，迅速从城中“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④，在更始军的夹击之下，“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⑤。正在这一片混乱之际，狂风大起，电闪雷鸣，“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昆阳城北的滍川（今沙河，位于河南鲁山、叶县境）洪水暴涨，心惊胆颤的莽军士兵争先恐后渡河逃命，“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⑥。王邑、严尤等人乘马踏着死尸渡过滍川，逃命而去。就这样，一场决定更始政权和王莽新朝命运的历史大决战以更始军的完全胜利、王莽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四、更始军胜利和莽军失败的原因

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势

---

①④⑤⑥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②③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胜优势的又一典型战例。莽军的总兵力多达42万人，而更始军的总兵力大约不到2万人①。莽军不仅在人数上超出更始军21倍，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装备精良、供给充足等方面也都大大强于更始军。理应成为胜利者的王莽军为何成为惨败者，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更始军的胜利，就其基本原因来说，在于全军将士高昂的斗志和顽强、勇猛的作战。当他们被王莽的大军置于死地之时，能够把对王莽黑暗统治的切齿痛恨化作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能够把求生求胜的信念化作以一当百、猛打猛冲、奋勇杀敌的具体行动，所以才能取得全胜。而莽军的失败，就其基本原因来讲，则是由于军心不稳，士气低落。莽军士兵的绝大多数，都是强制征调而来的备受新莽黑暗统治压迫与剥削的贫苦农民，他们对王莽也同样充满了阶级仇恨，而根本不愿意为他卖命。所以莽军士兵斗志很差，稍遇挫折便不战自溃。人心的向背，就这样决定了双方的成败。在这次战役中扮演了统帅角色的刘秀，之所以会有必胜的信念和超凡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对莽、汉两军的人心、士气有着正确的分析。

作为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昆阳之战交战双方在战略决策及战术运用方面的得当与否，也对各自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莽的大军中并不缺乏军事指挥人才，且不说那数百名担任军吏的“能为兵法者”，从纳言将军严尤几次在关键时刻的谋划来看，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将领。但是统率这支大军的王邑、王寻却是极不称职的庸才，他们既没有通观全盘、把握大局的战略远见，又没有具体策划、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又狂妄自大，

---

①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战前昆阳城中有更始军八九千人。来自定陵、郾地的援军数量不详，但从《论衡·恢国篇》中所载“光武将五千人”的记载来推测，援军的总数，可能达到万人左右。

自以为是，拒谏饰非，一意孤行，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估计了更始军的战斗力，在昆阳之战中接二连三地做出错误决断，终于把数十万大军引入失败的绝境。

王邑、王寻的错误决断，首先是选择昆阳城作为攻击目标。如前所述，昆阳城作为控制南阳盆地的军事要地，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但当时对新莽政权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据守昆阳的不足万人的更始军，而是正在围攻宛城的10余万更始军主力。宛城是南阳盆地的中心，南蔽荆襄、北控汝洛，当豫、鄂、陕之间的交通孔道，自战国秦汉以来，这里就是天下一大都会，为兵家所必争。秦朝末年，刘邦听从张良的劝告，首先占领了宛城，然后挥师西入武关，直扑咸阳，取得了灭秦的首功。所以，宛城的得失，不仅关乎南阳盆地的有无，而且还对关中、汝洛及荆襄之地的安危具有影响。刘秀当初所以坚持死守昆阳，目的之一就是阻滞王莽大军南下解宛城之围，掩护更始军主力的攻城行动。王邑、王寻久攻昆阳，恰好中了刘秀之计，完全是一种舍重就轻、贪小利而弃大局的愚蠢选择。

兵多将广，本来是王莽军的优势所在，但这个优势在昆阳之战中却始终没有发挥出来，这是王邑、王寻在指挥上所犯的第二个错误。由于坚守昆阳城的更始军人数很少，而王邑、王寻军阵庞大，完全可以采取分兵的战略，用较少的兵力围攻昆阳，主力大军则绕城南下，挺进宛城，然而他们却使数十万大军全部留屯于昆阳这个弹丸之地。由于战场过于狭小，只能投入不多的兵力攻城作战，所以，如何保持那些没有参战的数十万大军之间的联络和稳定，就成为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兵多将广反而成为莽军的一个包袱，优势转化成了劣势。当刘秀率领援军从外围发动进攻时，王邑、王寻仅遣数千人迎战，当刘秀的敢死队向莽军的指挥部杀来时，王邑、王寻又严令各营不得擅自出战，这除了有轻敌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担心出现大军自乱的危险局面。跟随王邑、王寻南下的大军，主要由各州郡的锐卒组成，他们的直接统领者，是各州郡的牧守，由

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不能了解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部队是如何组织和配置起来的，但从王邑、王寻的战场指挥当中可以看出，由于这支大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所以在相互联络、配合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至于王邑、王寻指挥起来缩手缩脚，使莽军完全失去了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根本不能应付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完全陷入到被动挨打的局面。《论衡·恢国篇》载："汉伐亡新，光武将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将三万人，战于昆阳"。由此可知，虽然双方在总兵力上相差十分悬殊，但由于在昆阳直接投入战斗的莽军只有3万人，所以双方实际交战的兵力却相差无几。

战术单调而缺乏变化，是王邑、王寻所犯的第三个错误。昆阳虽然城防坚固，但城内守兵不多，城内存粮又十分有限，莽军即便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昆阳守军也难以长期坚持。然而王邑、王寻先是为求速胜而急攻猛打，当昆阳守军出现动摇时，他们又为求战功而继续猛攻，必欲屠城而后快，这种战术看似凶狠，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不仅挫伤了自己的锋锐，而且愈发激起了守城将士拼死抵抗的决心。当刘秀引来援军回救昆阳时，王邑、王寻不是主动出击，以大军将其阻击于外，而是任其逼近自己的军阵。在初战失利之后，他们仍然执迷不悟，未能改变战术去主动迎敌，以致中军溃败，全军失利。

更始军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将士的英勇无畏，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一切都将无从谈起。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昆阳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刘秀个人的大智大勇有关。当昆阳附近的更始诸将打算弃城南逃之际，刘秀敏锐地认识到，昆阳城的守与弃，并非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事关更始政权及全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同时，他也看到了昆阳作战取胜的可能性。所以，他说服了诸将，稳定了军心，制定了内守坚城、外集援兵，内外夹击的胜敌大计。当定陵、郾城两地的更始军将领因"贪惜财货"而"欲分留守之"时①，刘秀又说服他们改变想法，全

---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军出动，驰援昆阳战场，保证了昆阳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因此，刘秀实际上是指挥更始军大战昆阳的统帅。此外，刘秀还是昆阳大战中的一员骁将，在数倍于己的强敌面前，刘秀毫不畏惧，身先士卒，杀敌陷阵，极大地鼓舞了更始军将士的勇气。他用兵果敢坚决，重视初战，善于捕捉战机和连续作战，当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毅然集中兵力，选择敌军的中坚作为突破口，这种擒贼擒王的凶狠战术，是更始军速胜的基本保证。

作为起义军与新莽军的一次战略决战，昆阳之战彻底改变了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为王莽的黑暗统治敲响了丧钟。

第三节　新莽政权的灭亡

一、新莽政权的瓦解及其挽救危机的措施

更始汉军在昆阳之战的胜利，极大地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而沉重打击了新莽政权。它虽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对全国的统治，但实际上已是千疮百孔，陷入了土崩瓦解之中。

新莽政权的瓦解，首先表现为全国各地反抗新莽统治的浪潮愈加高涨。昆阳之战以后，不仅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斗争进一步蓬勃发展，而且各地的豪强地主和部分刘氏宗室也纷纷起兵。据《后汉书·刘玄传》载，当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其中势力较大者有睢阳的刘永，琅玡的张步，汝南的刘望，庐江的李宪，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的董宪，陇西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河西的窦融，汉中的延岑等。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在玩弄火中取栗的把戏，搞武装割据。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农民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当时却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王莽政权，使其实际的统治范围局促在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及其周围地区和一

些州郡的治所城市。

新莽政权的瓦解，还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日益加剧。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这两员大将，在昆阳战后就背叛了新朝，投靠在汝南郡自立为天子的前汉钟武侯刘望。在长安，则发生了一场险些置王莽于死地的宫廷政变。

昆阳战败后，王莽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人都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卫将军王涉听信方士之言，认为“刘氏当复兴”，新朝国师公刘歆将是天意所在的新主。于是，他便与大司马董忠合谋，说动刘歆，决定利用王涉掌握宫廷卫队、董忠掌握中军精兵、刘歆长子“主殿中”的优势，劫持王莽，然后“东降南阳天子”①。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待机而发时，有人告发了他们的密谋。七月的某一天，王莽突然动手，杀死董忠，又逼迫王涉、刘歆二人自杀，挫败了这起宫廷政变。

刘歆原是西汉宗室，因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功高勋重，曾被王莽任命为新朝的羲和，地位仅次于太傅王舜、大司马平晏之后，他的女儿还嫁给了王莽的儿子，是王莽的心腹之臣。而王涉则是王莽的叔父王根之子，与王莽有骨肉之亲。他们的背叛，充分说明了王莽是何等不得人心。《汉书·王莽传》载，当时王莽面对的是“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叛），左右亡（无）所信”的败局，新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众叛亲离的王莽虽然已经陷入绝境，但他仍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的挣扎。

为了挽救危机，王莽继续玩弄自欺欺人的花招。当听说更始政权揭露他毒杀汉平帝的消息后，王莽便召集公卿朝会，将自己当年仿效周公、为身患疾病的汉平帝祈祷，表示愿以身代死的金縢之策昭示于众，以表白自己当年对大汉的耿耿忠心；他命方士张邯当众“称说其德及符命事”②，再次郑重发布新莽必将长久统治的预言；他还下令从东方随意抓捕了几个无辜之人，用槛车押

①②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送至长安，沿途大肆宣传，说这些人就是刘縯等起义军首领，然后将他们杀掉，又编造出“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等多至不可胜记的谶语，企图依靠这种种骗术来刺激士气，振奋人心。

为了挽救危机，王莽还对其中央机构进行了改组。他将昆阳之战的败将王邑从洛阳召回长安，任为大司马，任命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苗䜣为国师，王林为卫将军。这些人除了会对王莽阿谀逢迎之外，并无什么治国救世的真才实学，但王莽却对他们委以重任，希望以高官厚禄来换取他们为新朝效忠卖命。王莽让这些人主持朝政并负责京师地区的防务，同时又令远在洛阳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加强戒备，试图以重点防御的战略对付各地的义军。此后，心力交瘁的王莽非但“不能复远念郡国”，而且也“忧懑不能食”①，只能靠饮酒和食鳆鱼来苟延残喘了。

二、新莽政权的覆灭

在王莽手忙脚乱地应付危局的同时，更始政权则渡过了一个喜气洋洋又杀气腾腾的休整期。昆阳大捷后，更始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大批辎重，各种物资堆积如山，不可胜计，将士们接连搬运了一个月也没有搬完，最后只好把余下的物品放火烧掉。胜利给广大贫苦人民带来了不尽的喜悦，但也促使更始政权的内部矛盾从隐蔽走向公开并迅速激化。刘縯、刘秀兄弟在宛城攻坚战和昆阳守御战中各建大功，威名远播，成为更始政权中最受人敬仰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仅对无功而居帝位的刘玄是威胁，而且对那些有勇无谋又缺乏号召力的其他将领也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出身舂陵兵的个别将领则恃功自傲，公然表示了对刘玄等人的轻蔑与不屑。于是，刘縯在昆阳战后不久便被杀，而刘秀则以忍气吞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声的韬晦策略保全了性命和官职。

内部稳定之后，更始政权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他们认为，远在关中的长安是王莽统治的老巢，有重兵屯守，单凭起义军现在的实力，恐怕无法突破新莽的防线；而作为新朝陪都的洛阳聚集了不少兵力，对定都宛城的更始政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但由于是孤城一座，所以洛阳被起义军攻克的可能性很大。更始元年八月，起义军两路出动，向王莽政权发起新的攻击。其中，定国上公王匡等率领10余万更始军主力北上，进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则领数千人自宛城西去，攻打武关以威胁关中，为洛阳主战场提供侧翼支援和掩护。显而易见，更始政权的这个作战方针，是北图洛阳、西夺关中，推翻王莽政权的方针，即是先取洛阳，平定东方，然后再挥师西进，直捣长安，完成推翻新莽的统治。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更始主力还在洛阳城下激战方酣时，关中的义军已协同西路更始军杀入长安城中，砍下了王莽的人头。

前已述及，在昆阳大战之后，各地人士纷纷起兵呼应更始政权，距离宛城不远的析县(治今河南西峡)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申屠建、李松的西路更始军尚未靠近武关之前，析人邓晔、于匡已率领数百人在南乡起事。他们对析县宰说以天下大势，使其不战而降，析县起义军收编了当地的官军，队伍猛增至数千人。邓晔遂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自称辅汉右将军，他们率部先后攻克了析县、丹水(今河南淅川县境内)两城，然后进兵武关并迫使武关都尉朱萌开关投降。此后，邓晔等人率部西进，击杀新莽的右队大夫(即弘农郡太守)宋纲，攻占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进入京兆尹界，迅速逼向长安，起义军的队伍也扩张到了数万人之多。

面对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王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付。崔发献计说："《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①。王莽居然听信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了崔发的鬼话，率领群臣百官到长安城南郊设坛祭天，“陈其符命本末”，祈求苍天保佑垂危的新朝，说到伤心处，王莽“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他又亲作了自陈功劳的告天策，哀求上苍保佑自己渡过难关。光是自己悲痛欲绝还不够，王莽还下令让长安诸生与百姓每天早晚各在南郊大哭一次，凡表现出极度悲戚并能诵读王莽告天策文者，一律被任为郎官。几天之间，这样的郎官就已多达5000余人，从而上演了一出中国古史上极为罕见的荒诞闹剧。然而，这种闹剧并不能阻止邓晔、于匡军的西进，王莽只好发兵抵挡。他临时召拜了九个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①，让他们率领数万北军精锐东出长安，阻击邓、于义军。因为对这“九虎”不放心，害怕他们会反戈一击，所以在他们出征之前，王莽特地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扣留在宫中作为人质，逼他们为自己卖命。王莽在宫中收藏了无数的财物，仅黄金就有60万斤，但他发给“九虎”士兵的赏钱，却是每人4000钱，这在物价飞涨的当时，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钱。王莽如此对待本来就不愿成为新朝殉葬品的将士，只能使他们更无士气和斗志。结果，“九虎”刚走到华阴的回溪就与邓、于义军遭遇，“于匡持数千弩，乘堆挑战”，从正面阻击莽军，而邓晔则将2万人绕至敌后出击，莽军在此前后夹击之下很快溃败。“九虎”之中有2人自杀，4人逃亡，剩下的3人率领残兵败将退至华阴灌北渭口处的京师仓负隅顽抗。邓晔、于匡攻不能下，便回师东去，开武关迎接申屠建、李松的更始军。申屠建令李松率2000更始军与邓、于义军一同进攻京师仓，但作战颇不得利。李松遂与邓晔协商，引大军屯驻华阴，筹置攻城器具，等待更始军主力，同时分兵进入关中，骚扰敌人。于是，邓晔遣校尉王宪将数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界攻城略地，李松则遣偏将军韩臣直扑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打退了王莽的波水将军部，游弋于长安城的远郊。

王宪、韩臣两支奇兵的活动，促使三辅地区到处出现了自号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为汉将军的反莽武装，他们与王、韩所部呼应，造成了“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且“皆争欲先入城”① 的大好形势。手中已经无兵可调的王莽下令，将长安城中所有的囚徒释放，分发给他们武器，强迫他们发誓效忠新朝，然后让他的岳父、更始将军史谌带领这些囚徒士兵出城作战。谁知这些囚徒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一些人去挖掉王莽的“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另一些人则去南郊烧掉王莽所建的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②，王莽只有徒呼奈何。这时，有人告诉王莽，说把守长安各城门的士卒都是“东方人，不可信”，于是王莽又临时以越族骑士更换各城门的守卒，每一城门置一校尉，领 600 人把守，完全成了惊弓之鸟。

更始元年九月初一日③，关中的义军从东北角的宣平门杀入长安城中，正在巡城的新莽大司徒张邯被杀。突入城中的义军与莽军展开巷战，很快就攻至未央宫附近，王邑等人率部在未央宫之北阙下拼命抵抗，试图阻止义军冲入宫中。至黄昏时分，城中所有的官邸府第几乎都被义军占领，只有未央宫还未攻克。第二天，长安的两位少年朱第和张鱼率领城中自动汇集而来的市民投入战斗。他们放火焚烧未央宫门，并劈开敬法殿的小门，冲进未央宫。人们大声呼叫：“反虏王莽，何不出降？”而王莽却手持匕首作困兽之斗，说什么“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④！混战进行到第三天早晨，未央宫的多数宫殿都已落入起义军之手，王莽在千余名败将残兵的卫护下逃到沧池中央的渐台之上，企图凭借一池污水来阻断义军的进攻。义军尾随而至，将渐台“围数百重”，渐台又成战场。双方先以强弩展开对射，后又短兵相接，王邑等大批将士先后战死。待到黄昏时分，“众兵上台”，一个名叫杜吴的商人冲进王莽藏身的小屋，一刀结束了这个独夫民贼的性命，随后，义军校尉公宾就割下其首级，其余士兵争先恐后地拥

---

①②④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③ 《汉书·王莽传》误作“十月戊申朔”，兹从《后汉书》及《资治通鉴》。

上，将王莽的尸体砍了个七零八落。公宾就手持王莽首级献于王宪，王宪自称汉大将军，统领城中数十万兵众。三天之后，即九月初六日，李松、邓晔及将军赵萌、申屠建等人率领更始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城中。时隔15年之后，汉家的旗帜，又重新飘荡在长安上空，新莽王朝的黑暗统治正式宣告结束了。

三、农民军胜利与新莽政权失败的原因

新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爆发的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农民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推翻王莽统治的伟大胜利。双方胜负的原因，就其首要和最根本的一点来说，在于农民军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王莽政权的彻底失去民心。

如前所述，王莽代汉自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导致了广泛的社会灾难与动乱的改制措施，同时又广开边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自西汉末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空前大尖锐，新朝的统治很快就达到了极其腐朽与黑暗的程度。在王莽的统治下，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小生产所有者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许多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地主、豪强及商人地主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样，无论王莽怀有多少改造社会、挽救危机的大志宏图，他的统治却完全失去了本来就不为雄厚的基础，他本人也彻底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民心，因而也就不可逆转地走上了速亡之路。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对此有所论述，这里还可以再以长安的陷落为例，重作分析。关中素称四塞之地，易守难攻，长安城经过西汉与新莽两朝的建设，其城防设施之坚固，绝非一般城池所可比拟。但占据地利的王莽政权却未能据险而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城破国亡。更需特别指出的是，攻克长安并非是更始军采取重大战役

行动的结果，文献中也不见有人精心组织和指挥这场战斗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是当地的起义军民攻陷的。当王莽被斩首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抢上前去斩割其尸体，使之“支节肌骨脔分”；当王莽的首级被传到宛城、悬于宛市街头后，“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①。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了人民对王莽的切齿痛恨，也是王莽政权人心丧尽的绝好说明。

农民军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及时实现了与反莽地主武装的联合。综观新末农民战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与秦末农民战争的一个很大不同：秦末农民起义在突然爆发不久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一个革命中心，将全国各地的反秦斗争迅速推向高潮；新莽农民起义则是在灾害与苛政并重的地区逐次爆发并经历了一个6年之久的缓慢发展阶段。从天凤四年（17年）至地皇三年（22年）初，参加起义的农民虽然不断增多，但各地的义军除了客观上的相互呼应之外，并未联合行动，因而起义的总体规模并不为大。在这个阶段，各自为战的农民军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饥寒之苦，尚未提出推翻王莽统治的明确目标，也没有建立什么政治组织，农民军队伍本身甚至连文书、号令、部曲、旌旗之类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所以，起义农民虽然坚持了武装斗争，但这种斗争尚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农民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军事上仍居于被动的劣势状态，在政治上也未对王莽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直到地皇三年以后，新末农民战争才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以赤眉、绿林为代表的农民军接连在军事上取得大胜，绿林军还建立了起义者自己的政权，从而将全国范围的反莽斗争引向高潮并很快推翻了新莽王朝。

上述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农民军与反莽地主武装在军事、政治上的大联合。我们知道，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双方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深刻而尖锐的冲突。但在新莽末年特定的历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史条件下，王莽政权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却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广大贫苦农民和一般地主豪强在反对王莽统治这一重大问题上并无分歧，具有实现联合的基本前提。事实证明，农民军和反莽地主武装的联合，对推动新末农民战争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赤眉、绿林这两大农民军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寻得证明。

如前所述，活跃于东方的赤眉军是一支基本上由纯朴的农民组成的武装，其队伍人数、活动范围、社会影响似乎一直都在绿林军之上。当后者尚未与官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之时，赤眉军已将景尚、王党所领的中央军打败；当绿林军刚刚进入南阳盆地之时，赤眉军已经取得了成昌大捷，给王莽政权以前所未有的打击。此时的赤眉军已经扩充为一支 30 万人的大军，是对王莽政权威胁最为严重的农民武装。但当王莽急调大军屯守洛阳一线，试图阻止赤眉军西进之后，赤眉军却在东海、楚、沛、汝南、颍川、陈留等地兜起了圈子。接连不断的流动作战给赤眉军带来了新的胜利，但这些小胜却最终使这支扶老携幼的农民军成为疲惫之师，失去了其原有的生气与活力，最后只好拉到濮阳一带休整，从而基本停止了对王莽政权的进攻，游离于新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之外，使王莽得以调集大军猛攻绿林军。直到王莽政权被彻底推翻之后，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人才匆匆赶往洛阳，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册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肯定与赤眉军领导层的基本素质有关。樊崇、徐宣等人都是农民出身，没有文化，见识不多，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他们虽然不乏反抗王莽统治的决心与勇气，又在战争的实践当中学到并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军事谋略，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做到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提不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把握不了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即使是在军事上，他们也只擅长流动作战和反击战，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因而很容易使到手的胜利果实重新丧失。显而易见，这样的队伍无法长期成为反莽农民军的中坚，也难以完成推翻新莽政权的历史重任，更无法避免其最后的失败。

绿林军的早期发展，大致与赤眉军相似。但自从与舂陵兵结为同盟之后，他们的情况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毋庸讳言，以刘縯、刘秀兄弟为代表的南阳豪强地主和刘氏宗室地主集团，在文化水平、政治见识、社会经验、社会影响、军事才能诸方面，都远较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优越，他们起兵反抗王莽的目的虽与农民军有所不同，但在他们加入到绿林军的战列之后，绿林军领导层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更加丰富起来，绿林军的社会号召力大为提高。他们促使绿林军进一步明确了推翻王莽统治的政治目标，建立了足以号召天下的更始政权，为后来的一系列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也对农民军和新莽政权的成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农民军一方来说，在战争的前期，他们主要采取了流动作战的形式，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官军，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实力。赤眉军对景尚军及对王匡、廉丹军的作战，绿林军的云杜之役，都是在此种战略战术指导下取得的胜利。在战争的后期，绿林军则采取了初始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作战形式，以敢于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积极姿态，用凶狠、顽强的战术作战，棘阳、淯阳之战，宛城攻坚战和昆阳守御战，皆是此种战略战术的体现。农民军战略战术的运用与变化，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符合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适应了形势变化的需要，所以能够把他们从胜利引向胜利。

反观新莽政权一方，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对付农民起义的战略谋划上，王莽犯了许多错误。首先，在起义初始之时，王莽完全为其虚妄骄纵之心所左右，在拒不改善政治的同时，又不采取积极有力的军事措施，而是不切实际地指望各地的官军将起义军分而歼之，遂使起义的烈火愈燃愈炽。其次，当农民军蓬勃发展之后，王莽又拒绝了田况关于实行坚壁清野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议，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远征的中央军身上，但结果是欲速而不达，那些不熟悉地形、不了解地方情况的官军连连败北，使得新莽的军事力量大伤元气。第三，王莽对于那些非亲信的将领限制

过多，防范太重，使得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将领既无重兵又无实权。《汉书·王莽传》载，纳言将军严尤曾经抱怨王莽“遣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这种指挥方式，必然导致贻误战机。但更为可怕的是，王莽每每对自己的亲信委以大军重权而根本不去考虑这些人是否胜任，如成昌之战中的王匡、昆阳之战中的王邑等人，都是军事素质极差的庸才，临战指挥能力极低，王莽任用他们为统帅，焉有不败之理？第四，昆阳之战后，王莽被意外的惨败吓得惊慌失措，在部署最后的防线时，居然在长安与洛阳两大城市之间留出了一大块空档，又完全忽视了武关对保卫关中的重要性，未派亲信领重兵把守武关，使得邓晔军及西路更始军得以顺利靠近长安。凡此种种，均表现出王莽在军事方面的低能，其可耻的失败乃是必然之事。

第十一章　西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

西汉时期，军事活动的频繁展开与军事改革的深入进行，锻炼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将领。冒顿、项羽、张良、韩信、彭越、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等名将皆以赫赫战功而彪炳史册，而刘邦和汉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和张良等谋士，更以谋略超群而著称于世。与此同时，由于时代的需要与战争的实践，西汉的军事思想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局面，富国强兵思想蓬勃高涨，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得以创立和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多有创新，战术战法不断变革，兵书的整理与撰述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幅西汉初年的《驻军图》，反映了西汉军事地图的绘制与测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幅实用军事地图。

第一节　西汉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成就

一、富国强兵思想的发展与屯田戍边国防思想的创立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匈奴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曾想借助战胜项羽的余威，着手解决匈奴的问题。但当他率兵北上迎击匈奴时，却在平城陷入了重围。这使他意识到，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西汉政权，国库空虚，“民无盖藏”，尚不具备战胜匈奴的实力，于是改取先内后外的方针，集中力量致力于内部的统一

和经济的恢复，而对匈奴实行忍辱、退让的政策，以“和亲”和开放关市来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其后继者遵守他的遗训，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继续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力求使国家富强起来。然而，匈奴的奴隶主贵族，却认为西汉王朝的忍辱、退让是软弱可欺，他们尽管每年从西汉王朝获得大量财物的馈赠，但仍不时举兵南下，扰掠西汉的北部边境。特别是汉文帝之时，由于汉使中行说投降匈奴，“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①，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骚扰更加频繁，对西汉政府与边地人民造成的损害也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形势，西汉君臣既无比愤恨，又无限忧虑。他们深知，西汉王朝之所以会处于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那是由于民穷国困、武力不强的缘故。许多大臣继承战国时《管子》首倡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的思想，纷纷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贾谊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如国无贮积，“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国有贮积，“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他认为，要使国有贮积，则需驱民力农，发展生产，故当务之急是“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②。晁错也上书汉文帝，力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③，并提出了贵粟主张。他认为，“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是由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如果实行贵粟政策，“使民以粟为赏罚”④，便可驱民归农，促进农业的发展，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论积贮疏》，《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③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④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使蓄积丰盈。他还援引古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①。主张加强军队的建设，并提出徙民实边与利用归降的义渠胡人组建边防骑兵的建议。他们的建议为汉文帝所采纳，并不同程度地付之实施。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西汉的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力量空前壮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积极拓展边疆，富国强兵的思想因而更加高涨。桑弘羊就是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突出代表。他极力主张加强战备，对匈奴的侵扰予以坚决的反击，说："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②。为了富国强兵，他提出了农工商俱利的观点，认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③，所谓富国强兵就是一句空话。他强调"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④，除了"使民务本"，还应大力发展工商业，如"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⑤。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积极协助汉武帝，制订并施行盐铁酒专卖与均输平准制度，统一铸币，推行屯田，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为反击匈奴、统一边疆的战争提供了保证。

在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西汉社会上普遍形成一种尚武的风气。许多人竞相以"勇"、"雄"、"猛"、"安汉"、"广汉"等字命名。习武成为人们的时尚，不仅武士、军人习武，就

---

①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② 《盐铁论·备胡》。

③ 《盐铁论·本议》。

④ 《盐铁论·力耕》。

⑤ 《盐铁论·非鞅》。

是文人、学士也多练习骑射、击剑和兵法，如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①，东方朔“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②。当时的许多文臣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郑吉等，都能文能武，能够带兵打仗。而且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有一股勇当重任、立功异域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如张骞主动应召出使西域，李广年过60犹自请出征充当“先死单于”③的前锋，70高龄的赵充国自请统兵讨伐叛羌。“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④霍去病的豪情壮志，正是这种英雄气概的一个典型代表。

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不分轻重地起同等作用的。战争的胜负首先决定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无法战胜敌人，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但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又取决于双方经济力量的对比，因为经济实力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任何军事家都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外去企求战争的胜利。富国强兵思想，把握住战争同军事、经济诸因素的辩证关系，强调要大力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抓好军队的建设，由富国而强兵，因而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它对推动西汉的经济和军事建设，夺取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每当遭受外来强敌的威胁之时，这种富国强兵思想，又常常成为人们改造社会，振兴国家，拒敌御侮的有力武器。

在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中，西汉的政治家、军事家还创立了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②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④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西汉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与移民实边的国防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实边的国防思想萌生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挥师北逐匈奴，夺取河南地后，即曾“徙民以实之”①，用以阻挡匈奴的军事袭扰。西汉初期，针对匈奴的进犯，晁错建议汉文帝徙民实边，认为这样做“可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同时实边之民久居边塞，“知胡人之能”，“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能够发挥更大的御敌效果，可使“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②。汉文帝采纳他的建议，开始移民实边，至汉武帝时期形成高潮，范围遍及东南的会稽、东北的辽东、北方的朔方、西河、上郡、北地，而以西北的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为多。实践的结果证明，移民实边既可开发边疆，安定社会，又可增强国防力量。但是，实边的移民，毕竟不能代替为数众多的边防驻军。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西汉的疆域不断拓展，边防线不断向外推移，边防驻军的数量日多。但边疆地区的生产远比内地落后，北方和西北又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如何解决边疆驻军的粮饷供应便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屯田戍边的国防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汉武帝便令汉军在朔方以西一带“通渠置田”，且战且耕，以实现军粮的部分自给，减少军粮长途运输的劳役负担和严重损耗，河西之战后，又将军队的屯田推广到河西及西域的轮台、渠犁一带。汉武帝末年，桑弘羊等人建议在轮台以东一带屯田，当时因武帝“悔远征伐”未被接受。后来，汉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在轮台、渠犁一带继续屯田。汉宣帝时，还在车师、湟中等地屯田。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实践，军队屯田的军事、经济意义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奉命率兵平定西羌叛乱。他在击溃首倡叛乱的先零羌后，决定“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毙”。为了说服持有异议的大臣，在《屯田制羌疏》中首次

---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集解引臣赞曰。

②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对屯田的重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指出军队屯田可“因田致谷”，生产粮食以供军饷，减省大量军费，减轻从内地输送军粮的徭役负担；可利用农闲“缮治邮亭”，修筑道路桥梁，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可保护边境居民的安全，使之安心耕作，“不失农业”，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的安定；可以充实边境的武备，达到不战而制敌的目的。总之，军队屯田具有“内无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① 的重大战略意义。此后，军队屯田的国防思想一直为历代军事学家所继承，对历代王朝的国防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略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创新

西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战争的发展，战略指挥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并且涌现出许多超越前人的创新之举。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一开始处于劣势地位，楚强而汉弱。他采取以智取胜的指导思想，除按照张良的献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并尽可能在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外交、人才等各个方面调动一切于己有利的因素，为自己营造全局的优势之外，还注意根据不同的战争形势，灵活地调整作战指导方针。如在鸿门宴后，面对项羽咄咄逼人的势态，他回避楚军锋芒，移师巴蜀、汉中，着力营造战争基地，以待时机。齐、燕、赵起兵反楚后，抓住项羽、章邯的弱点，还定三秦，再乘楚军主力陷于各地无法脱身之机，由函谷关出陕东进，联合众诸侯军攻占彭城。彭城兵败后，又及时总结教训，改取持久防御对付项羽的速决，并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开辟多种战场来打击、消耗、疲惫楚军：刘邦自己坐阵正面战场，主要任务是防御；英布在南方战场，主要任务是牵制；韩信在北方战场，主要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任务是进攻；彭越在敌后战场，主要任务是干扰；陈平指导的间谍谋略战场，主要任务是瓦解楚军的领导集团。由于多种战场、多种手段、多种力量的互相配合，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鸿沟和议后，强弱彻底易势，则不失时机地全力发动追击，终于全歼楚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此战充分显示了刘邦在战略谋划与指挥上的优异才能，特别是其多种战场、多种手段、多种力量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更是我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在削平诸侯王的战争中，西汉王朝又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异姓诸侯王虽然手握重兵，但彼此分立，互不联络，且多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朝廷，刘邦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或以权术诈谋计除，或以强大武力讨平，逐个加以铲除。同姓诸侯王则是在汉景帝采取削藩政策之时，联合举兵叛乱的，并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汉军处于遭受夹击的不利态势。汉景帝只能以武力加以还击，并选择吴、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首先以主力进攻吴、楚，另以一部兵力钳制齐、赵。由于吴王刘濞是策动叛乱的主谋，吴、楚联军又是叛军的主力所在，汉军按照景帝的这个战略决策，先集中兵力击溃吴、楚，便赢得了全局的胜利，最后终于将这场叛乱平息下去。

汉武帝反击匈奴、开拓边疆的战争，不仅改变秦始皇对边疆的南攻北守为全面出击，而且在指导思想上更有许多创新之举。公元前 5 至前 3 世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各诸侯国都已先后建立了骑兵，但到西汉王朝建立之时，尚无中原骑兵深入北方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记录。西汉前期，由于国力有限，加上骑兵数量不多，而步、车兵又难与匈奴骑兵相抗衡，对匈奴的南下只能采取防御的战略。所以，西汉初期的将领都缺乏运用骑兵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经验，每次开塞出击，大多是无功而还，甚至损兵折将。汉武帝即位后，借助完备的马政制度，大力扩充骑兵队伍，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并通过元光六年（前 129 年）的关市诱敌奇袭战，试验骑兵集团进入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能力。此战的总体效果虽然不很理想，但年轻将领卫青统

率万骑深入到匈奴的龙城之地，歼敌700，获胜而归，首开汉军运用大兵团远程奔袭的成功记录。此后，汉武帝对匈奴改取进攻战略，提拔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统率骑兵大兵团，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些年轻将领勇于实践，善于学习。他们依靠熟悉边情的汉人和匈奴人，解决了骑兵进入荒漠草原的向导和粮草、饮水的供应问题，果敢地深入匈奴境内，渡漠作战，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使用大规模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略思想，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形势，实行不同的作战方针。河南之战，乘势力强大的匈奴左部逞威于东北边境，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方针，避实就虚，从正面突破河南，攻击防御薄弱的白羊、楼烦二王，一举夺占河南地。漠南之战，利用匈奴右翼暴露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出击漠南的右贤王。河西之战，根据匈奴主力北徙、一时难以实施有效进攻的新情况，采取牵制强敌、打击弱敌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力量较弱的河西匈奴军。漠北之战，则利用匈奴单于的轻敌麻痹，因势利导，兵分两路，大胆深入匈奴腹地，寻歼匈奴主力，予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①。与此同时，随着造船业的进步，舟师规模的扩大，汉武帝还多次向江南地区大规模进军，救援遭受闽越进攻的东瓯，平定南越与闽越叛乱，并出兵朝鲜，讨伐起兵叛汉的卫满政权。在这些战争中，杨仆、韩说、路博德等将领分别统率步兵、舟师，由陆路、水路或海上多路并进，予叛军以沉重打击，又进一步发展了多兵种大集团互相配合、水陆或海陆协同作战的战争指导艺术。

在新末农民战争中，绿林、赤眉和河北一带农民军，继承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军的传统，采取流动作战的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走制敌，使强大集中的王莽军队顾此失彼，陷于被动而遭到疲惫、消耗和打击。在经过长达6年的分散战斗之后，绿林军与反莽豪强地主武装实现联合，一批文化水平、

---

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政治识见、斗争经验和军事才能较高的豪强地主与刘氏皇族成员加入到农民军的战斗行列，不但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号召力，而且推动农民军提出推翻王莽的政治目标，建立自己的政权，将反莽斗争迅速地推向高潮。农民军的作战形式，也具备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的初始形态。他们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态势，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莽军发动强大的攻势，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夺取推翻王莽统治的胜利。这种初始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攻坚战，和秦末农民战争一样，为后世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武装斗争形式。

三、战术思想的更新创造

战术从属于战略、战役，又对战略、战役产生一定的影响。西汉时期，随着战争、军事技术、战略思想的发展，战术思想也在不断地更新变革，奇正战术的运用更加出神入化，骑兵战术与水（海）陆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不少新的创举。

楚汉战争中的韩信，对奇正战术的运用极为娴熟、巧妙，战斗时往往以正兵诱敌，出奇兵制胜。如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八月，他奉命率兵击魏，魏王豹预料其将从临晋渡河，率主力扼守蒲坂。韩信将计就计，调集船只于临晋渡口，佯示必渡，暗中率部从上游之夏阳以木罂渡河，迂回奔袭魏军后方之安邑，前后夹击，一举灭魏。又如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十月，他自代挥师数万击赵，赵王歇及陈余集中号称 20 万的兵力扼守井陉口。他采用“陷之死地而后生”之策，背绵蔓水布阵，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之腹背受敌，尽歼赵军。再如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十月，韩信率数万汉军击齐，与齐楚联军 20 余万夹潍水对峙。他乘夜派兵潜至上游以沙袋堵住水流，天明再率兵越潍水向楚军挑战，佯败而退，引诱楚军追击，使其半渡，再搬开沙袋放水，将楚军分割在潍水两岸，然后乘势攻击，歼灭齐楚联军，平定了齐地。所有这些胜利，韩信都不是靠特殊有利的政治

条件、外交谋略或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的，而是因时、因地、因敌活用古兵法的奇正理论而取得的。其破魏之战的佯示必渡，声东击西，潍水之战的沉沙断流，半渡而击，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出奇制胜的成功范例，而灭赵之战的背水设阵，更是对“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古兵法的一大突破，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灵活用兵的著名战例。

彭越在楚汉战争中，则以“游兵击楚”而著称。他早在秦末聚众起兵时，即在巨野泽一带从事游击战的活动。后归附刘邦，被封为魏相国，略取梁地。刘邦在彭城败退后，他北居河上，成为汉军敌后战场的游击统帅，“常往来为游兵击楚，绝其粮于梁地”①。在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当项羽在正面战场对刘邦发动强大攻势时，他适时率游兵千里奔袭，南下梁地，威逼楚都彭城，迫使项羽撤兵回救，从而帮助刘邦粉碎楚军的攻势。如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春，项羽对荥阳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势，夺占成皋重镇，并在四月包围荥阳。在这个关键时刻，彭越于五月间大举南下，千里跋涉，渡越睢水，绕到彭城东南的下邳，形成威逼彭城之势。项羽被迫千里回师，刘邦乘机解了荥阳之围，夺回成皋。而彭越在楚军南下追击时，则引兵北上，使项羽无功而返。项羽听说成皋复失，又发动第二次正面进攻，迭克荥阳、成皋。此时，彭越又率兵南下，重点进攻梁地，迭克睢阳、外黄等 17 城，使楚军的后方梁地陷于瘫痪状态，逼迫项羽再次回师南下，花费 15 天的时间去收复梁地，使刘邦得以乘机夺占成皋，进军广武，占领敖仓，粉碎了项羽的第二次正面攻势。项羽闻知成皋失守，韩信又攻克齐地，于汉高祖四年十月发动第三次正面进攻。彭越又再度南下，攻克昌邑周围 20 余城，并略定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八月，楚军粮尽，加上韩信破齐后将向楚地发动进攻，项羽预感形势严重，只得被迫与刘邦订立和约，划鸿沟

---

①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②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为界。彭越这种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堪称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

对匈奴的反击战，则首次创立了使用骑兵集团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汉武帝时期，年轻的将领卫青、霍去病等奉命统率大规模的骑兵集团，深入到匈奴境内进行机动作战，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骑兵新战术：一是远程奔袭，迂回包围。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卫青与李息率汉军精骑从云中向西大迂回，到达高阙，然后南下，突然掩袭白羊、楼烦二王，一举收复了河南地。这种远程奔袭、迂回包围的战术，既充分利用荒漠草原地区地形开阔、便于驰骋的自然条件，又充分发挥骑兵集团灵活机动、快速敏捷的特点，往往能够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此后，汉军出塞，每每使用这种战术，都是屡试不爽。二是连续攻击，乘胜穷追。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霍去病在春季第一次由陇西深入河西走廊，进攻匈奴，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因实行正面突击，只能迫使匈奴远遁，未能彻底歼灭其军事力量。同年夏，霍去病在稍事休整之后，再次率精骑出击，并改取大迂回战法，自灵武渡河，越贺兰山，向西北挺进，绕居延海，由北转南经小月氏，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2000余里，进至黑河流域，从侧背后向浑邪王、休屠王发动突然进攻。匈奴骑兵一般都是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没有料到汉军会在春、夏两季发动进攻，更没料到汉军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发动攻击，被打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浑邪王等力竭而降。三是正面冲击，两翼迂回。元狩四年（前119年）夏，汉武帝经充分准备，派兵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匈奴伊稚斜单于闻汉兵将至，按赵信的意见，“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①，准备迎击。卫青自定襄出塞，穿越沙漠千余里，抵达漠北，见单于严阵以待，下令以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敌骑的袭击，而命5000骑兵出击匈奴单于，单于以万骑应战。双方战至黄昏，大风忽起，飞砂扑面，两军难辨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单于的大营。单于自度难以取胜，遂率数百壮骑突围逃窜。汉军虽追赶不及，但取得了歼俘1.9万人的胜利。卫青、霍去病等将领所创造的使用骑兵集团远程奔袭、迂回包围、连续攻击、乘胜穷追以及正面冲击、两翼迂回的战术，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的骑兵战术，对开拓边疆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西汉王朝就是运用这种战术打败匈奴的，此后许多中原王朝的军事家也常使用这种战术来击溃边疆游牧民族铁骑的进犯。

在开拓边疆的战争中，西汉王朝针对东南和南方地区江河纵横又濒临大海的地理特点，多次调发舟师，与步兵一起出征，协同作战。如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王因遭闽越王的进攻向汉朝求援，汉武帝命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渡海往救；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汉，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①；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又"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粤（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②，前往镇压。元封二年（前109年），因卫氏朝鲜招诱汉朝吏民逃往朝鲜，并阻拦真番、辰国之君朝见汉天子，汉武帝"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荀彘出辽东"③，海陆并进，共击朝鲜。这一系列的战争实践，使西汉的水陆配合和海陆配合作战的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在新末农民战争中，农民起义军在前期针对敌强我弱的状况，采用流动作战的形式，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来打击官军，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如地皇二年（21年）绿林军的云杜之战，就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③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是运用这种战术的成功范例。当时荆州牧奉王莽之命，调集2万官军围剿绿林山。绿林军首领王匡等人面对优势的强敌，不是死守绿林山，而是主动迎击，率部下山，在云杜附近设伏，出其不意地打败官军。在设伏的同时，又派兵切断敌军的退路，以全歼进犯之敌。在伏击成功，歼敌数千之后，绿林军乘胜进攻竟陵、云杜、安陆。待重新回到绿林山，队伍已从几千人扩大到5万余人。同绿林军一样，赤眉军对景尚军和对王匡、廉丹军的作战，也都是运用游击战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打击官军，壮大自己的。这些成功的战例，大大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农民战争的游击战术。到地皇三年，绿林军与舂陵军实现联合，农民军又开始学会使用阵地作为战斗的依托，并以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的积极姿态，集中兵力，力争主动，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当年十一月，在小长安战败的绿林军退守棘阳，遭到甄阜与梁丘赐10万官军的跟踪追击。绿林军转守为攻，先于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夜袭蓝乡，夺取甄阜的辎重，切断敌军的退路。再于次日清晨乘敌惊魂未定之际，兵分两翼，出击陷于黄淳水和沘水之间的孤立无援之敌，一举击杀甄阜与梁丘赐，歼敌2万，取得棘阳之战的胜利。尔后又发扬连续作战的勇猛作风，乘胜追击逃向宛城的严尤、陈茂军，在淯阳歼其3000余人，取得淯阳之战的胜利。接着，再进围宛城，准备尔后西出武关，进图关中；另以数万向北推进，攻占昆阳、竟陵、郾城等地，以保障主力对宛城的攻取。王寻、王邑率领42万官军自洛阳经颍川直逼昆阳，欲先克昆阳再解宛城之围。昆阳守军仅八九千人，起义将领刘秀以守军牵制强敌，与13骑突出重围，至定陵、郾城搬取万名援军，捣敌要害，内外夹攻，大破官军主力，又取得了昆阳守御战的辉煌胜利。此战为汉军进军洛阳、长安，推翻新莽政权创造了条件，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新末起义军所创造的这些战术，使农民起义军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推动中国农民战争战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兵书概况

一、两次大规模整理兵书

西汉时期，出于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视兵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西汉立国之初，就开始着手兵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是西汉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兵书。不过，有关这次整理兵书的具体情况，史无明载，今已不得其详。从上引的史料得知，这次整理兵书，共计搜集到 182 家的著作，张良与韩信经过一番筛选之后，只"定著三十五家"，其余 147 家皆舍弃不录。而经他们删取定著的 35 家兵书，后来也被"诸吕用事而盗取之"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兵书的一大损失。

应该说，西汉第一次搜集与整理兵书，对兵书的搜集并不完全。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批儒生遭到迫害，包括兵书在内的大批著作被焚毁。刘邦入关攻占咸阳后，诸将只顾忙于掳掠秦宫的金帛财物，就是较有眼光的萧何到丞相御史府也只收藏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和档案资料、法律文书的"律令图书"。刘邦还军霸上后，项羽进入咸阳，一把大火烧掉了阿房宫，秦朝皇家收藏的大批图书包括历代兵书便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因此，西汉初期，张良、韩信为进行整理而搜集的兵书，自然是不可能齐全的，肯定会有大量的遗漏。

随着秦朝的灭亡，焚书坑儒的时代宣告结束。汉初的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之策，对文化不再进行干预。汉惠帝四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年（前 191 年），又“除挟书律”①，文化学术的研究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到汉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②。到汉武帝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取得辉煌的成就，文化学术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武帝除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之外，还通令全国，广泛征集各类图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③。大批古代兵书，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家的藏书室。随着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的开展，汉武帝还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提供军事部门制定作战方略参考之用。不过，由于兵书的搜集尚不齐全，杨仆的“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④。到汉成帝时，皇家的秘藏之书颇有亡散，又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藏书的数量迅速激增。至河平三年（前 26 年），汉成帝便组织一批学者，令杰出的学者刘向（即刘更生）负责对这批皇家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校雠，“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⑤。每整理完一部图书，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该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情况，上报朝廷，尔后汇总成为一部《别录》。但是，刘向没有完成这项清理校雠工作就病死了，后来汉哀帝又命刘向之子刘歆接替其父的工作。刘歆“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埋头进行了多年的整理。他“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将《别录》所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 33090 卷图书分为七略，即七大类，写成一部类别分明的图书目录《七略》。七略为：“一曰辑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⑥，其中“辑略”属提要性质，实际上是六大类。这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包括了兵

---

① 《汉书》卷二《惠帝纪》。

②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③⑤⑥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书在内。就兵书而言，则已是西汉时期的第二次整理了。

刘向父子在这次图书整理中写成的《别录》、《七略》均已在唐末佚失。但班固《汉书·艺文志》系按《七略》的六分法，将当时所见的西汉图书分为六大类，并将《七略》的《辑略》对各家学说著作及流派的论述按其内容分开，作为各类目的大序、小序置于各个类目之后，又将《七略》的叙录进行简化，择取其中的主要部分作为小注，附于各书之下。根据《汉书·艺文志》，人们便可得知刘向父子这次整理图书包括兵书的概貌。《汉书·艺文志》按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的分类法，将兵书共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目。“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此目共著录13家，259篇。“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此目共著录11家，92篇，图18卷。“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此目共著录16家，249篇，图10卷。“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此目共著录13家，199卷。四目共著录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①。此外，刘歆《七略》的“兵家”略中，“权谋”一目还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共259种，班固考虑到这些著作已在其他类目中著录，为避免重复，《艺文志》兵书类“权谋”一目便省略未录；《七略》的“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司马法》，《艺文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类的“礼”目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录有《墨子》一家，《艺文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类的“墨家”之目，也省略未列，另增录《蹵鞠》一家。

---

① 上述各目及其综合的家数、篇数、卷数均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文字叙述，而与《汉书·艺文志》内容中实际所载各目及其综合的家数、篇数、卷数往往有出入；造成这一差误的原因盖出于刘向、刘歆、任宏、班彪、班固、班昭等人统计、分类时的标准不一和疏忽所致。

这样，如果加上《艺文志》兵书类省略未录的10家271篇，移入礼目的1家155篇，再除去新增的一家25篇，《艺文志》共录载了《七略》著录的兵书63家，1191篇，图43卷。

不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尚不是西汉第二次整理兵书时刘歆《七略》所录载的全部兵书。因为西汉皇家的图书，在王莽之末已被大火焚毁。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所利用的皇家图书，则是在东汉初期重新搜集的。《隋书·艺文志》对此有段记载，说西汉皇家的图书，“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共著录西汉图书596家，13269卷，这个数字远远少于《七略》著录的33090卷。据此推断，《七略》著录的兵书当大大超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63家，1191篇，图43卷。

西汉两次大规模的整理兵书，对皇家收藏的历代兵书作了系统的整理校勘，不仅纠正了因“简札错乱、传说纰缪”而出现的许多讹误，而且“删取要用”，“撮其指要”，便于军事部门和兵家的参考、研究，这对西汉王朝取得平定诸侯王叛乱和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以及促进军事科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淮南子·兵略训》

西汉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开展与军事改革的深入进行，军事思想、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艺术、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等等都比前代更加成熟，研究军事学理论的兵书也相继涌现。仅《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西汉的兵书即在20种上下。其中，讲兵权谋的有《广武君》1篇，《韩信》3篇，《黄石公三略》3卷。另外《蒯子》、《陆贾》、《淮南子》、《晁错》等书中，也有不少论及兵权谋的篇章。赵充国的《屯国制羌疏》，由于篇幅

不大，未曾刊刻成册，《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但它也属于此类著作。至于讲兵形势的，则有《项王》1篇，讲兵技巧的有《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道》38篇，《手搏》6篇，《杂家兵法》57篇，《蹵鞠》25篇等。可惜这批兵书，今已大多散失不存了，留传至今的只有《淮南子》、《黄石公三略》两部著作和《汉书·晁错传》所载的晁错《言兵事疏》、《汉书·赵充国传》所载的赵充国《屯田制羌疏》。

《淮南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今存有多种版本和注本，据吴则虞考证达162种之多。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少子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刘长于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因谋叛被废除王爵，死于流放途中。刘安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袭封为淮南王。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①。于是便招纳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共同讲论汉初的统治思想黄老之学，探讨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及帝王之道。最后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写成《淮南子》一书，于建元元年（前140年）献给汉武帝。“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读到其所献的《淮南子》内篇，“上爱秘之”②。后来，刘安因谋反事发，参与其事的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尽皆被诛，刘安自杀而亡。

《淮南子》一书的定名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类杂家目内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另在“术数”类天文目内著录了一部不见于传的“《淮南杂子星》十九

①②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卷”，而全志未见载有传说中所说的“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不知这部“《淮南杂子星》十九卷”是否就是“《中篇》八卷”，或者是“《中篇》八卷”的残篇。《汉书·艺文志》本自刘向的《别录》与刘歆的《七略》，故学者一般认为《淮南内》、《淮南外》之称为刘向所定。由于《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及小说家总称为“诸子十家”，后人遂沿袭之，在淮南之后加个“子”字，称此书为《淮南子》。外篇后来亡失，只有内篇留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载有许慎、高诱的两个《淮南子》注本，一为21卷，一为21篇，显然都是内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①，现存的《淮南子》，其内容都是论道，与此说正好相符。内篇最后一卷《要略》有云：“此《鸿烈》之泰族也。”下注：“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因此，学者认为，此内篇本名《鸿烈》。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在《叙》中论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瓌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后世亦称《淮南子》为《淮南鸿烈》。

《兵略训》为《淮南子》的一篇，专论军事。该书的《要略》，曾对《兵略训》的内容作了如下的说明：“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由于《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法、阴阳等家之说，并揉合了儒家的一些观点，所以《兵略训》也透露出浓厚的道家思想。但其军事思想仍然处处闪烁智慧的火花，蕴含不少颇具价值的见解，反映了西汉初期军事理论的发展水平。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

作者在《兵略训》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战争观。作者认为，“人有衣食之情”，当物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又分配不均时，就会发生纷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战争便不可避免，于是“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①。基于物质利益而引发的战争，有“得道”与“失道”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因而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义的战争“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澹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正义的战争“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战争的性质，将对战争的胜败起着决定的作用，因为“失道”者必将失去民众的支持，“得道”者必将得到民众的支持，“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作者拥护正义的战争，认为“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并坚信“得道之兵”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终将打败不义的战争。

《兵略训》还继承前人优秀的军事思想，提出“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作者从“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的思想出发，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坚甲利兵，而在为政得失。甲坚兵利是“佐胜”之具，而非“必胜”之本。“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将用兵分为上、中、下三策：“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伪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彭錞（大钟）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分合）之数，维枹绾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

①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作者发展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① 的全胜战略思想，主张用兵者应该牢牢抓住“必胜”之本，“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依靠自己政治上的强大，不战而使敌人屈服。

《兵略训》提倡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并不是不要进行战争，而是客观地指出：“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胜愚，智侔则有数者禽无数。”也就是说，政治不是唯一的致胜条件，还必须同“智”和“力”结合起来。因此，《兵略训》也十分重视对现实的作战指导的研究。作者特别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张用兵作战，必须先注意战略的谋划。认为“庙战”主要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只有在战前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粮储、士卒、武器装备等几个方面对双方的状况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论证自己确已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做到“胜定而后战，钤县（悬）而后动”，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这就叫做：“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

在战术运用方面，《兵略训》对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精湛的论述。作者认为善用兵者既要能以动制敌，又要能以静制动。动以制敌，要做到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使敌人无所防备。同时，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威丧敌胆，使之失去抵抗的勇气。作者还认为，以动制敌，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是指“气势”，即“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地势”，即“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簦）居，羊肠道，发笱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因势”，即“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暍，推其揞揞（摇），挤其揭揭

① 《孙子·谋攻》。

（欲拔也）”。所谓“二权”，是指“知权”，即“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事权”，即“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抟，前后不相撚（揉蹈），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掌握了“三势”、“二权”，“权势必形”，计定谋决，便可“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兵接刃而破敌”了。

对于敌人的进攻，善用兵者以静制动。作者推崇黄老之学，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军事思想，主张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兵略训》强调：“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则威可立也。视其所为，因与之化；观其邪正，以制其命；饵之以所欲，以罢其足”，如此“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作者认为，“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是借助天时、地利、巧举、人和，然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均可用相应办法破除之，“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唯无形者无可奈也”，只有无形之举，才是无法破除的。所谓无形之举，就是作者所推崇的那种“其情不可得而观”、“其陈不可得而经”的“无法无仪”、“无名无状”的军事韬略。

《兵略训》极其重视将帅的作用，对将帅理论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根据“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四条标准，把将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将”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且用兵坚决而有气势，因而无坚不克；“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但得人心，且有气势，虽未能万全，但胜多败少；“下将”博闻广知，但无主见，“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故动辄败北。据此，作者对将帅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一）对敌人应“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坚）凝如冬”，能随时而移，推理而行，因形而变，含而不露，“所乡（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使敌人无所防备。（二）对士卒要信明赏罚，并且同甘共苦。这样，“上足仰，

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三）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的品行。所谓“三隧”是：“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是：“便国不负兵（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是：“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谓“十守”是：“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滥）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四）要有独见独知，“见人所未见”，“知人所不知”，特别是要知士气之“虚”、“实”，两军相争，胜在得威，败在失气，“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

最后，作者高度评价正义战争的进步作用。《兵略训》在全篇的末尾，用这样一段话赞扬正义的战争：“兵之所加者，必无道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谷丰昌，风雨时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是故名必成而后无余害矣！”

三、《三 略》

《三略》相传为黄石公所撰，故又称《黄石公三略》。宋《武经七书》之一，原书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现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

《三略》未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而首次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该志载：“《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但《三略》之名远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之前即已在载籍中出现。王应麟认为《三略》始见于魏明帝时李萧远的《运命篇》一文，其《困学纪闻·诸子篇》有云：“魏李萧远《运命篇》：‘张良受黄石公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其实，早在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陈琳在其《武军赋》序中，即曾

提到"《三略》、《六韬》之术者"[1]。至于说"张良受黄石公之符"，则源出于《史记·留侯世家》，其具体情节为：张良于博浪沙暗杀秦始皇未遂，亡匿下邳，"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从这段记载来看，下邳老人即黄石公，不过他送给张良的书却是相传为西周时姜尚所著的《太公兵法》而非《三略》。《太公兵法》与《三略》是出自不同作者的两部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由于黄石公的行状有类仙迹，加上其所授之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所以后人对《三略》为黄石公所撰而授之张良的说法大多持怀疑态度。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卷 11 对此有如下的评论："使张良有受书之事，则其书当即在《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之中。盖良既亲受之于老父，知其为太公书，则其后与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为三十五家，自当次入太公一家之内，不应别有所谓《黄石公记》与《三略》也。使良并无其事也，则即因《太公兵法》而附会，盖流俗人震于留侯之筹策如神，因转相传言，以为是尝受太公之书于下邳神人云尔，尤不当别有此书也。此其出于伪作，可据《史记》一言而决"。可谓确论。

---

①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九十二。

当然，说《三略》是后人的托伪之作，并不是说它同《太公兵法》没有任何关系。《汉书·艺文志》是将《太公》的著作包括《太公兵法》85篇列入道家著作之列的。《三略》虽不专主一家，而是广泛吸收了道、儒、法、墨各家的思想，但仍以摄取道、儒二家思想为多。书中提倡"三皇无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等等，就都是道家的思想观点。因此，后人推断，《三略》系在《太公兵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挥论说而写的。《鳌头七书·三略》载张居正之言曰："《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张良字子房）。"说《三略》为黄石公授张良之书有误，但谓《三略》本太公书而推演之，却是确论。

那么，《三略》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呢？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说法，而以西汉末年说的说服力较强。据《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载：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左中郎将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献灭匈奴之策，汉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诏书所征引的《黄石公记》与《三略》中的两段话大同小异。《三略》之《上略》云："《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下略》云："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

世受患。制作过制，虽成必败。”据此推断，汉光武帝所引《黄石公记》这段黄石公之言当出自《三略》。因此，《三略》当即《黄石公记》。而《中略》又明言：“《三略》为衰世作”。则《三略》的成书时间，当在东汉之前的西汉末年。

《三略》全书3800余字，共分为上、中、下三篇谋略，故称《三略》。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它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在内容上，《孙子》等兵书侧重于军略的论述，着重研究制胜破敌的战争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略的论述，着重探讨战胜攻取的政治手段，正如《中略》所概括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在形式上，《孙子》等兵书一般都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述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三略》则往往借助征引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如《上略》就大量征引《军谶》之语，《中略》也常引用《军势》的论断。作者这样的意图，显然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但征引的数量过多，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尽管如此，《三略》仍不乏独到的见解，故而受到历代军事家和封建政治家的重视。

《上略》共2100余字，占到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作者论述的重点所在。它“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着重探讨了将帅同百姓及部下的关系。作者强调：“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蕴藏于民众之中。“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所以，“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必须先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使“国富而家娭（嬉）”，“政行而无怨”，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无往而不胜。否则，弄到国虚民贫，敌人从外面进攻，人民从内部反抗，必然会陷于崩溃。此外，不论统率军队还是治理国家，还要随时随地“察众心，施百务”，掌握百姓的心理活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

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后方稳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民本思想出发，作者强调：“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将帅只有团结和依靠广大的部众，才能克敌致胜。为此，作者主张：第一，将帅必须“通志于众”，做到“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上下同心，士卒统一。第二，将帅既要做到“以身先人”，处处起模范表率的作用，又要能“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第三，将帅要信赏明罚，“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要把礼和禄作为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奖赏手段，做到“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将无还令，赏罚必信”。

“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因此，《上略》还对将帅的品德才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作者认为，将帅必须“能清（清廉），能静（镇静），能平（公平），能整（整肃），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将帅不能“专己（专任私智）”、“自伐（自伐其功）”、“信谗”、“贪财”、“内顾（顾念家室）”。将帅“专己”，部下就会归咎于上；“自伐”，部下就不愿多建功业；“信谗”，士卒就会离心离德；“贪财”，奸邪就无法禁绝；“内顾”，士卒就会贪恋女色。将帅犯了其中的一条，“则众不服”，犯了两条，“则军无式（法规）”，犯了三条，“则下奔北”，犯了四条，“则祸及国”。作者还指出，将帅要有深谋远虑，要有勇气，不可轻举妄动，不可迁怒于人。否则，“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上略》的最后，作者还接连列举十条军谶，强调在处理百姓及部下的关系时，要注意防止和杜绝下述十种现象的出现，即：“赋敛重数，刑罚无极”；“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群吏朋党，各进所亲”；“强宗聚奸，无位而尊”；“世世作奸，侵盗县官（官

府)";"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善善不进，恶恶不退";"枝叶强大，比周居势";"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奸雄相称，障蔽主明"。为此，君主在选择将帅时，要善于洞察诡异之言，聘用儒士贤才，任用年高德劭的人，"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

《中略》是《上略》内容的延伸，"差德行，审权变"，侧重于阐述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作者着重强调：第一，国君与武臣要互相信任，"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在行军作战之时，国君更要放手让将帅指挥调度，"出军行师，将在自专"。第二，君臣双方都要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和威信的树立。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武臣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多则"身蹶"。第三，国君既要善于收揽英雄之心，又要用权术加以控御，"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对智、勇、贪、愚各种类型的武臣，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使用。尤其要注意，"使义士不以财"。义士不替不仁的人卖命，使用他们不能利用财货。不能让仁德的人"主财"，这样的人会多施财物而使下人亲附。不能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说敌美"，以免让他蛊惑士卒。应该禁止巫祝，不能让他们为官兵"卜问军之吉凶"，以免扰乱军心。第四，战事结束后，国君要收回武臣的兵权，但不能采用诛杀功臣的办法，而应给予封官晋爵，"以显其功"，赐给肥沃土地，"以富其家"，赏给美色珍玩，"以说（悦）其心"。武臣要懂得"威多则身蹶"的道理，功成名就之后应"义退"。这两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双方才能"美而无害"。《中略》的作者，对自己的这些观点颇为自信，认为："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而后世的封建君臣对这些观点确也颇为重视，不少人将它们奉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阐述了国君与臣民的关系。作者主张：第一，国君的尊严与权威必须得到维护，臣下应该绝对服从国君的政令，不可疑主，不可犯上作乱。第

二，国君应该善恶分明，任用贤臣，“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求贤以德，致圣以道”。第三，“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国君不可好大喜功，施行苛政，而应“使人均平”，“治民以平”，使百姓穷富均等，不失其所。第四，用兵作战必然会损伤人与物，故“天道恶之”，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它来“诛暴除乱”，又是符合“天道”的。因此必须反对违背“天道”的不义之战，而“以义诛不义”，用符合“天道”的正义之战来消灭之。

《三略》除阐述政略之外，也用一定的篇幅阐述军略问题。作者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认为作战之前，必须先做好侦察工作，充分掌握敌情，以便“伺其空隙”，从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作者还提出“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的观点，主张在作战中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改变策略，不要首先发难，要后发制人，待敌人行动再采取相应的对策。作者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获固守之”，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防守；“获厄塞之”，占据了险隘之处要加以阻塞；“获难屯之”，获得不易攻占的地方要屯兵驻守；“获城割之”，攻占了敌人的城邑要封赐给作战有功之人；“获地裂之”，夺取了敌人的土地要分封给功臣；“获财散之”，缴获了财物要散发于众；“敌动伺之”，敌人行动要注意侦察；“敌近备之”，敌人靠近了要加以防备；“敌强下之”，敌人强大时要故意表示甘居下风；“敌佚去之”，敌人闲逸时要避开它；“敌陵待之”，敌人盛气凌人时要待其锐气消失再发动攻击；“敌暴绥之”，敌人施暴时要安抚民众；“敌悖义之”，敌人悖逆时要宣传正义；“敌睦携之”，敌人和睦时要离间之；“顺举挫之”，要根据敌人的举措采取相应的行动挫败之；“因势破之”，要因势利导来打垮敌人；“放言过之”，要散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四纲罗之”，要网设四面来包围敌人，等等。这些主张都颇受后代军事家的重视。

四、晁错的《言兵事疏》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初从轵县（治今河南济源南）儒生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汉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曾奉诏至济南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旋迁博士。他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①，力主以术数训导太子，受到文帝的赏识，被拜为太子家令。他因此得幸太子，号曰“智囊”。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诏举贤良文学士，亲加策试，“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策，繇是迁中大夫”②。太子继位为汉景帝后，以晁错为内史，旋又擢升为御史大夫。他一生坚持重农贵粟、富国强兵；主张徙民实边，积极抗御匈奴；并力主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其各项建议基本上都为文、景二帝所采纳实施，对汉初国防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素与晁错不和的吴相爰盎乘机进谗，遂使晁错被斩于西市。晁错著有《言兵事疏》、《论贵粟疏》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晁错》31篇，今已亡佚，清马国翰等人有辑本。

晁错的《言兵事疏》写于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自汉高祖白登脱围之后，西汉王朝限于国力，不得不对匈奴实行屈辱性的“和亲”之策，每年奉送给匈奴大量黄金、缯絮、食物等财物，但仍然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随着匈奴势力的坐大，西汉政府和边地人民遭到严重的损失。西汉王朝的许多大臣，纷纷上疏痛陈匈奴为患之害。如汉文帝即位之初，梁太傅贾谊上《治安策》，即曾沉痛地指出：“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

①②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为流涕者此也”。他对汉文帝大声疾呼：“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①。其情虽可感，然而毕竟提不出对付匈奴的有效计策，仍然无法改变匈奴进犯的局面。晁错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总结了汉兴以来抗击匈奴的各种经验教训和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结合当时汉匈双方的军力对比，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②的思想和汉夷并用守边的抵御匈奴的“万全之术”。

在《言兵事疏》中，晁错提出了战胜匈奴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得地形”、“卒服习”和“器用利”。他对各种不同的地形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的地形，利于步兵作战，“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的地形，利于车骑作战，“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利于使用弓弩，“短兵百不当一”；“两陈（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的地形，利于使用长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的地形，利于使用矛铤（铁把短矛），“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陀相薄”的地形，利于使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接着，晁错指出，士不选练，卒不服习，打起仗来将“百不当十”；兵不完利，甲不坚密，打起仗来将“五不当一”。如果器械不利，就等于将士卒交给敌人；卒不可用，就等于将将帅交给敌人；将不知兵，就等于将国君交给敌人；君不择将，就等于将国家交给敌人。故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乃“兵之至要也”。

《言兵事疏》根据上述的观点，从地形、技艺的不同，对比了汉匈双方的军力。晁错指出，匈奴军队具有汉军所不具备的三大长技：第一，匈奴军马能迅速敏捷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汉

---

①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②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以下引文皆出此传，不另注。

军马匹不如；第二，匈奴骑兵能自如地出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汉军骑兵不如；第三，匈奴士卒能忍耐“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汉军士卒不如。但是，汉军也具有五大优势，为匈奴所不及。第一，汉军在平原地区利用车战，“轻车突骑”，容易冲乱匈奴的骑阵；第二，汉军使用劲弩长戟，“射疏（辽阔）及远”，匈奴弓箭难以抵挡；第三，汉军采用混编军阵，“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军队无法抵御；第四，汉军材官的骑射，“矢道同的”（用矢者同中一的），匈奴的革甲木盾很难抵挡；第五，汉军士卒下马肉搏，“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士卒无法匹敌。晁错认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再加上出动数十万军队，去对付匈奴的几万军队，“以十击一”，是完全有把握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在论证战胜匈奴的可能性之后，晁错的《言兵事疏》又根据以往同匈奴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思想。他看到，匈奴是先兼并周围的各族各部落，利用他们的人力物力向汉朝发动进攻的，“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汉朝的对策，应该利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来反击匈奴的袭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当时有降汉的义渠胡人数千，其“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如果利用他们来抗击匈奴，就可以抵消匈奴的长技。再加上汉军特有的优势，战胜匈奴便更有把握。因此，晁错建议将降汉的这些胡人组织起来，“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熟悉义渠习俗且又善于安抚的汉将统率，驻守要塞险阻之地；仍以汉军的轻车材官驻守平原之地加以控制，汉夷并用，共同防边。这样，“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此乃“万全之术也”。晁错的这一战略思想符合对匈奴作战的客观规律，后来被汉武帝加以采纳，并付之实施，对西汉王朝夺取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起着重大的作用。

五、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

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产生于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地节、元康年间，西羌诸部擅渡湟水北徙，并派人联络匈奴，准备共击鄯善、敦煌，阻绝西域商路。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奉命行视诸羌，反而激起诸羌的大规模叛乱。神爵元年，赵充国受命前往平叛。他采取集中力量打击首倡叛乱的先零羌，争取协从叛乱的罕、开部落的策略。七月，率军突进湟水流域，击溃先零羌，迫使羌人渡湟水而走。随后进至罕羌地，施行招抚政策，罕羌纷纷投降。赵充国认为羌人不久即可溃散，“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①。但是许多大臣反对他的建议，主张坚决出兵讨伐。汉宣帝于是下诏，令赵充国与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合兵，在十二月再度进击先零羌。此时，羌人投降者已达万余人，赵充国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于是反复三次上书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后终于为汉宣帝所采纳。他的这三个奏疏，被概括称为《屯田制羌疏》。

赵充国在《屯田制羌疏》中，首先阐述了他的“慎战”与“贵谋而贱战”思想。他认为：“兵势，国之大事”，“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② 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不可不慎。但是，他主张慎战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反对的是不义的战争，而拥护“明德除害”的正义战争，因为这种正义之战“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他强调：“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是“用谋”，只有“多算”，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乃至实现“全胜”的战略目标。

---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以下引文皆出此传，不另注。

从“慎战”与“贵谋”的原则出发，赵充国认为“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善用兵者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根据当时叛羌的情况和边防的全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唯一计策，便是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因为出兵讨伐，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而且还会削弱对匈奴、乌桓等族的防御能力，“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罢骑兵而留弛刑、应募及步兵万人实行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这才是对羌人的“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

针对众多大臣的责难，赵充国还在《屯田制羌疏》中具体分析了实行军队屯田的重大军事意义：一、留兵屯田，既可“以为武备”，又可“因田致谷”，可谓“威德并行”，一举两得；二、可将羌人排挤到贫瘠之地，使之因贫困而导致内乱，“以成羌虏相畔（叛）之渐”；三、边地居民可以安心耕作，“不失农业”；四、军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士兵一年的口粮，罢骑兵便可节省大量军费；五、到来年春天可用停止征战所节省的兵员，沿河湟漕运粮食到边境，以“视羌虏，扬威武”；六、屯卒可利用农闲修缮邮亭，充实金城；七、可迫使羌人“窜于风寒之地”而罹“霜露疾疫”之患，使汉军“坐得必胜之道”；八、汉军可免受征战死伤之害；九、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十、屯田不会惊动河西黄河之南大开、小开羌人，激起他们的反叛；十一、可利用屯卒修治湟陿中道桥梁，通至鲜水，便于行军，以制西域；十二、既省军费减徭役，又可防备不测事变的发生。奏疏的最后结论是：“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军队屯田在赵充国之前即已存在，但从理论上深入论证屯田的作用，赵充国却是第一人。他的《屯田制羌疏》指出，军队在边境地区屯田，不仅可以省军费，息徭役，而且可以保护当地居民的生产，加强边防的力量，迫使敌人不战而自溃，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赵充国对我国

军事学的一大贡献。此后，赵充国的屯田之举，常为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效法，用作守边之计策。明代的商辂即曾指出："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汉赵充国、诸葛亮、晋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验，著在史册。今日守边之要，莫善于此。"①

第三节　主要军事人物

一、项　羽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战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

项羽自幼养于叔父项梁之家，秦时项梁因杀人携其避仇吴中。项羽少时学书学剑，皆无所成，遭项梁怒责，他却说："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项梁遂教他兵法。他立志做一名军事统帅乃至人间天子，见到秦始皇东游会稽时，他说："彼可取而代也！"②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反秦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项梁杀会稽郡守起兵响应，项羽被任为裨将，收精兵8000人，攻略会稽诸县。陈胜牺牲后，其部将矫陈胜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让他引兵向西击秦。项羽遂与项梁渡江向西，与秦兵交战。此后，项羽逐渐成为灭秦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巨鹿之战中尤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胆魄和指挥才能。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阵亡，项羽和刘邦在秦将章邯的军事压力之下，分别退守彭城和砀县（今河南夏邑东南）。章邯率秦军乘胜渡河北上击赵，与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起义军拥立的楚

① 《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八，《边务疏》。

② 《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

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宋义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军46日不进，坐观成败，项羽遂以宋义密谋反楚为名，袭杀宋义，统率全军救赵，大破秦军，招降章邯，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刘邦首先入关灭秦，项羽统兵近40万破函谷关而入，进驻鸿门。统兵不足10万的刘邦亲至鸿门向项羽卑辞请罪，退出咸阳。项羽率军入秦都，烧毁秦宫，掳掠宝货、美女东归，同时分封天下各路诸侯为王，自称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刘邦被封为汉王，迁至汉中。他乘项羽忙于平定齐地起兵反楚的田荣，还定三秦，进逼西楚，引发了一场楚汉战争。在这场长达4年多的战争中，尤其是彭城之战及对荥阳、成皋的反复争夺，项羽显示出英勇善战的特点。

彭城之战发生在汉高祖二年四月。当恋战齐地的项羽听说刘邦还定三秦后已进占彭城，立刻领兵回救。他亲率3万劲骑从齐地向南出胡陵，直插彭城，乘刘邦疏于戒备之机，猛击汉军，将刘邦打得大败而逃，一举消灭汉军数十万，成为中国战争史上速战速决、以少胜多的一个著名战例。刘邦逃至下邑后，方收拾散兵，补充汉军给养，退至荥阳，开始了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

项羽在相持阶段中，不断袭击汉军后方的运粮甬道。刘邦眼看汉军陷于困境，被迫向项羽求和。但项羽凭借手下的几十万大军，继续发动猛攻，夺取荥阳，后又一举攻拔成皋。

由于项羽回师反击彭越，成皋丢失。汉高祖四年，项羽再返成皋，对汉军发起强大攻势，重新夺回了成皋。两次荥阳、成皋之战，项羽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当他再度攻占成皋后，第二次回师平定彭越对楚后方的骚扰时，成皋又为刘邦所据，项羽第三次攻夺成皋，已显得力不从心。汉高祖五年终于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

纵观项羽率军灭秦及与汉军争夺天下的战绩，无论是巨鹿大战，还是势如破竹地击破齐地田荣，抑或是回夺彭城，几拔成皋，都反映出项羽英勇善战及其战术战法的鲜明特色。

第一，项羽深明兵贵神速之理，每次作战，他一抓住战机，便迅速出击，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巨鹿战前，赵军危在旦夕。项羽看到，一旦秦军灭赵，势必集中兵力攻击起义军，起义军就有被章邯所率大军击破的危险。他在劝请宋义出兵救赵遭到拒绝后，击杀宋义，迅速率兵渡过漳水，九战九捷，大败王离军，解了巨鹿之围，挽救赵军，然后乘胜追击，于漳水南岸围攻章邯军，猛攻汙水秦军，最后终于迫降章邯，取得了歼灭秦军主力的重大胜利。项羽征战齐地之时，闻知刘邦攻占彭城，他留下诸将继续攻齐，自己即率 3 万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回救彭城，对汉军发动猛烈进攻。此时的刘邦，正陶醉在夺占彭城的胜利之中，根本没有料到项羽会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丝毫未加戒备，被打个措手不及。项羽在一日之内，即取得歼灭汉军数十万人的重大战果，重新夺回了彭城。

第二，项羽用兵，善于使用实施突然袭击。巨鹿大战与彭城会战，他都是使用此种战法击败强敌的。巨鹿决战之前，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以为楚地残兵不足为忧，遂移兵北上，与守卫北疆的王离军合师，攻略赵地，围赵王歇、张耳于巨鹿。项羽利用章邯骄傲轻敌的麻痹思想，杀掉反对救赵的宋义后，即突然率军北上，不仅解了巨鹿之围，而且全歼秦军主力。彭城会战，项羽自齐地回袭彭城，他不是由南向北实施正面攻击，也不是自东而西将汉军击溃，而是不惜绕道而走，从城阳东北经鲁至胡陵再进至萧，走了一段反“S”形的路，绕到汉军的侧后，由西向东猛攻，这就不仅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而且切断汉军的退路，收到了全歼敌军的效果。

第三，项羽在作战时，善于激励士气，鼓舞士卒，调动全军拼死决斗。巨鹿大战中，他率部渡漳水时，“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①。楚军士气因而大振，士卒奋勇作战，“无不以一当十”，九战九捷而大败秦军。

---

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但是，项羽尽管英勇善战，掌握一套独特的战术战法，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最后却败在力量比自己弱小的刘邦手下。究其原因，是由于项羽不懂得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而是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地理、外交、人才、智力等各种条件的对比。因而他在战争中，单纯地迷信武力，“欲以力征经营天下”①，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的征战，完全忽略战场以外的斗争，放弃对战争全局的指导，犯下了种种致命的错误。首先，忽视政治对战争胜负的重大作用。灭秦之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搞分封，破坏业已形成的统一局面。加上在战争中又不讲政策，坑杀降卒，焚烧宫室，掳掠财货，大失民心，遂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局面。第二，忽略军事地理对战争胜败的重要影响。他自称西楚霸王之后，不采纳接受韩生的意见，不都于四塞之地关中，却都于四战之地彭城，使自己置于无险可守、四面受敌的困境。第三，忽视后方基地对坚持长期战争的重大意义。他始终未下力气去抓根据地的建设，长期处于无后方作战的状态，不仅无法为前线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的支援，而且不时为后顾之忧所困扰。第四，既不注意团结内部，也不重视盟友的争取。他对内不善用人，不注意团结部将和谋士，致使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因失意而投奔刘邦，就连范增也愤然离他而去。对外又不重视盟友的争取，刘邦在楚汉战争之初逐一消灭关中、河东、河西、河南各诸侯国，他坐视不救，彭城之战后出现诸侯背汉向楚的局势，他也不知加以利用，因此始终处于孤军奋战的被动状态。第五，既不能适时地正确选定和变换主要打击方向，也未重视侧面战场与正面战场的配合。田荣在齐地起兵反楚，使彭城受到威胁，固然应该派兵北上攻齐，但当刘邦袭取三秦，继续挺进关东之后，他仍然执行“先齐后汉”的作战方针，就导致刘邦的坐大。击败田荣后，他仍未及时转移主力击汉，又使楚军的主力受制于齐之田横，而陷于被动的局面。彭城会战取胜后，他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却又只重视正面作战，把全部兵力都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投入到正面战场，不注意组织和指挥其他战场相配合。虽然在正面战场接连获胜，而两翼和后方却全部丧失，最后只能落个四面楚歌、败亡乌江的悲惨结局。这说明，项羽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谋略家。

二、冒 顿

冒顿（？～前174），匈奴族，姓挛鞮氏。头曼单于子。

在秦代，匈奴左右的东胡和月氏强盛，南面是强大的秦王朝，匈奴曾一度北徙。秦末农民战争时，头曼单于乘中原内乱，再次南下夺取河南之地。头曼单于宠爱后娶的阏氏及其所生的少子，欲废太子冒顿而立少子，于是将冒顿送到月氏作为人质。不久，头曼单于又发兵急攻月氏，想使月氏怒而杀害冒顿。冒顿乘夜盗得月氏善马，驰归匈奴。头曼单于觉得冒顿勇壮，任命他为“万骑长”，统率万名骑兵。

冒顿领兵后，改革兵器，整饬军伍。他使用鸣镝箭，射出时带有响声，既可以作为杀伤敌人的有力武器，又可以用于指挥作战。他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① 公元前209年，冒顿随他父亲头曼单于行猎，突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父亲，将士随之乱箭齐发，射杀了头曼。冒顿遂自立为单于。

冒顿即单于位后，强大的东胡王派使者向他索要头曼单于生前所骑的千里马。冒顿不顾群臣的反对，将宝马送与东胡使者。东胡王以为年轻的冒顿害怕东胡，又派使者索求冒顿之妻阏氏，冒顿又取一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更加骄横，又派使者索取匈奴之地。冒顿向群臣征求意见，有的主张将一些弃而未居之地让给东胡。冒顿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②他尽杀主张予东胡地者，令国中骑士上马出征，袭击东胡。东胡王轻视匈奴，未作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临战准备，被打得大败。冒顿攻占了东胡之地，尽掠其民众、畜产以归。

冒顿灭东胡后，乘胜西击月氏，迫其西迁。接着，又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部夺回秦将蒙恬所占的河南地，并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后来，又出兵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各族。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冒顿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区完全统一起来，控地东尽今辽河中游，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军事国家。

冒顿单于既是匈奴的最高行政首领，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他总揽匈奴一切军政大权，实行兵民合一的统治，使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平时治民，战时统兵，官兵相知，战斗力极强。

冒顿身为匈奴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出马，率兵作战。最能表现其军事才能的，是围攻汉高祖刘邦及汉军于白登山的战役。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以大兵围马邑，韩王信投降，冒顿率匈奴兵及韩王信军南下，越过句注，攻占太原，占领晋阳。汉高祖亲率30万大军迎击，夺回了晋阳。但汉军士卒因寒冻而“堕指者十二三”①，战斗力明显减弱。冒顿遂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计策，指挥匈奴骑兵且战且退，并故意“匿其精兵，见其羸弱”②，引诱汉军北上，以求在寒冷的地方与汉军决战。汉高祖求战心切，在未弄清敌情的情况下，只率少量骑兵冒进，驻扎在平城东南30里的白登山。退至代谷的冒顿果断地抓住时机，发挥匈奴劲骑的优势，挥师直趋平城，将汉高祖围困于白登山。为了避免汉军强行突围，冒顿令匈奴骑兵在汉军四周列阵示威，围而不攻。汉高祖及汉军被困七天七夜不得脱围，只得采纳陈平之计，派人贿赂单于阏氏，让她劝说冒顿解围。冒顿恐汉军后援赶到，为避免遭内外夹击，围开一角，使汉军突围而出。匈奴保存了全部实力。

---

①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冒顿不愧为杰出的少数民族军事家，他志向远大，东征西讨，为匈奴的统一和强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军事统领方面，他建立了完整而又适合匈奴社会特点的军事指挥系统。在具体作战指挥中，他注重骑兵的运用，重视战机的把握，能战时则战，不能战时则有节制地撤退。在战术上，他善于利用假象欺骗敌人，造成敌军的错觉，以使自己处于主动。在战备方面，冒顿亲手改革武器装备，制造出兼有指挥及杀敌功能的鸣镝箭，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兵器宝库。

三、张 良

张良（？～前 186），字子房，相传为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其祖父、父辈曾“五世相韩”。秦灭韩后，张良一心为韩报仇，他倾全部家财，结交刺客，乘秦始皇东游之机，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从此更名改姓，亡匿于下邳。相传他在此地遇见黄石公，得《太公兵法》，刻苦钻研，因而精通谋略。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良聚众响应，后归附刘邦，被拜为厩将。他多次依据《太公兵法》向刘邦献计，并多次被刘邦采纳，为刘邦在灭秦及楚汉战争中击败敌军，建立西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灭秦战争中，刘邦入武关后，准备以 2 万兵击秦峣下军。张良认为秦兵尚强，不宜硬拼，建议刘邦“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俱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刘邦采用此计，秦将果然叛归刘邦，准备与汉军联合西袭咸阳。张良又说：“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① 刘邦乃引兵进击秦军，大破之，遂入咸阳，降秦王子婴。

刘邦入秦宫后，贪恋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及美女，想留

---

①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居宫中。张良又劝刘邦还军霸上。项羽入关后，张良为刘邦献策，至鸿门向项羽陈情请罪，使项羽在鸿门宴上放弃消灭刘邦的计划，从而使汉军保存了实力。

项羽封王后，刘邦率军就封时，张良又建议刘邦烧绝所过栈道，表示无东还之心，以麻痹项羽，为后来刘邦还定三秦创造了条件。

刘邦还定三秦后，张良助刘邦向东击楚，攻占了楚都彭城。不久，项羽夺回彭城，张良建议刘邦争取九江王英布和反楚于梁地的彭越，并重用韩信。刘邦从其计，联合英布、彭越，任韩信为左丞相率兵击魏，形成反楚的各个战场共同对付项羽。

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韩信破齐后，欲自立为假齐王。张良劝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并作为刘邦的使者亲自至齐册封，使韩信全力攻楚，最大限度地牵制项羽。至当年年底，汉王兵多食盛，项羽日益不支，被迫与刘邦议和，双方划鸿沟为界，东归楚西归汉。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也准备领兵西撤。这时，张良与陈平共谏汉王："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 刘邦遂利用楚兵东撤、麻痹疏忽之机，发起战略追击。当汉高祖约齐王韩信、魏相彭越前来会歼项羽，而韩、彭未按期赴约时，汉军遭项羽反击，大败于固陵。张良又对刘邦分析韩、彭未能按约击楚的原因，建议刘邦给予韩、彭封地，满足二将的要求，以使其出兵灭楚。刘邦依计而行，韩信、彭越前来会师，数路汉军围项羽于垓下，终于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

刘邦称帝后，令张良自择齐地 3 万户为食邑，以酬其"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之功。但张良只求封留而已，最后被封为留侯。从张良为建立西汉所出的一系列谋略来看，可以说张良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在灭秦前，他曾策划刺杀秦始皇；在灭秦战争中，他使刘邦最先入关，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在楚汉战争

---

①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中，他十分透彻地了解楚汉双方的实力，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不惜封爵和食邑，满足可以争取的各路诸侯，使他们纷纷归附于汉王麾下，团结一致，合力反楚，终于消灭了强大的项羽军事集团。

在具体的战略设计方面，张良注意引导汉军抓住每一次战机，消灭秦军如此，消灭项羽更为典型。在鸿沟划界后，张良果断地建议刘邦乘胜追杀，不拘泥于兵法所言“穷寇勿追”的教条，最后终于大获全胜，这是张良灵活运用兵法的极好战例。

张良熟知兵法，多出奇谋，为刘邦战胜敌手、建立西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良一生多病，很少驰骋疆场、建立拼杀战斗之功，但他对军事谋略的研究和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在西汉军事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西汉建立后，他曾与韩信一起，整理兵书，“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①。

四、韩信

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人。早年家贫，常寄食于他人之家。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投奔项梁反秦起义军。项梁阵亡后，归属项羽，被任为郎中。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未被采纳。刘邦被封为汉王后，韩信投奔刘邦，随汉军至南郑，被任命为管理粮草的小吏。后犯法当斩，他仰视刘邦的亲信夏侯婴，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夏侯婴见他气貌非凡，将他推荐给刘邦，刘邦任命他为治粟都尉。他认为未受重用，逃离南郑，萧何连夜将他追回，再次向刘邦推荐：“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② 刘邦于是破例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不负重托，为刘邦打天下建立了不朽功勋。

---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②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韩信首先为刘邦还定三秦献上良策，他指出，项羽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义帝之约，大封亲信，众心不平，而所过无不残灭，百姓多怨，所以“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建议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①。刘邦按韩信的建议，挥师关中，攻占三秦，又东出武关，攻取了彭城。

当项羽夺回彭城，诸侯纷纷倒向项羽之时，刘邦任命“可属大事”之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打魏王豹。韩信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明里在临晋布置兵力，摆设船只，大造渡河声势，暗中却在临晋之北的夏阳用小口木桶作为工具，东渡黄河，迅速占领魏军后方重镇安邑。魏王豹仓皇调兵回救，兵败被俘，韩信很快平定了魏地。

韩信平魏后，请刘邦“益兵三万人”，“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②。刘邦立即批准他的请求，派张耳协助他进击赵、代。韩信又在井陉口战役中设背水阵，大破赵、代 20 万大军，再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奇才。接着，韩信又采纳归降的赵王谋士李左车的建议，使燕不战而降。

灭魏、破赵、降燕，韩信之军一路势如破竹。项羽几次派兵渡过黄河攻赵，均被韩信军击退。

汉高祖三年（前 204 年）六月，刘邦一度收夺韩信兵权，命其为相国，收集赵兵攻齐。韩信在齐地所向无敌，一举攻占了历城、临淄，迫使齐军退至高密。项羽在齐王田广的请求下派大将龙且率 20 万大军相救，与齐军在潍水摆开阵势。韩信深知自己兵少，不能与齐、楚联军硬拼。于是，他沉沙断流，半渡而击，大破齐、楚联军，击杀龙且，俘获齐王田广。平齐之后，他被刘邦立为齐王，奉命南下攻楚。他拒绝武涉、蒯通的劝说，不肯背汉自立，又参加了围歼项羽的大规模作战，终于使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卓著功绩，实难有人与之相比，声望极

---

①② 《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

高。刘邦称帝后，对其放心不下，先改封他为楚王，又借机将其降为淮阴侯。汉高祖十年（前 197 年）九月，韩信趁刘邦出兵镇压代相陈豨反汉之机，准备袭击吕后及太子，事泄被吕后、萧何用计斩杀。

一代名将韩信虽未能善始善终，以悲剧结束了一生，但他的军事思想及卓越的指挥才能，却名垂青史。他的军事指挥特点是勇于作战，善于用兵，尤其是敢于指挥大部队作战，善于江河作战，又十分重视夜战。在勇于作战方面，韩信几次以少胜多，敢于以少量兵力迎击数十万大军，井陉之战、平齐之战无不如此，充分表现了过人的胆略。在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韩信曾言，自己统兵是“多多益善”。他击魏、破赵、降燕、平齐，经常是指挥数万人作战。在围歼项羽的最后决战中，他更是驰骋千里，指挥自若，合理布兵，战无不胜，表现了一个大将军的风范。韩信善于临水而战、重视夜战的这一特点，在井陉之战及潍水之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两个光辉的战例。韩信之所以能够数建奇功，除了他忠于汉王、英勇作战之外，还由于他谙熟兵法。西汉建立之初，他曾与张良一起整理兵书，并撰著兵书三篇，还搜集、补订了军中律法，惜均已失传。

五、周 亚 夫

周亚夫（？～前 143），秦末汉初名将周勃次子。曾任河内太守，后因其兄胜之杀人而被处死，他嗣爵受封为条侯。

周亚夫的军事生涯始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 年）。当时，匈奴 6 万骑兵分两路侵袭上郡、云中。汉文帝任命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一日，汉文帝亲自至霸上，巡视慰劳长安附近的军队。文帝每至一营，将士们都是开门迎接。他到周亚夫的细柳营时，却见军营紧闭，戒备森严，不许进入，随行官员说明是天子前来巡视，守营卫士回答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汉文帝只得令侍从拿出皇帝的符节，传话给周亚夫，

说皇帝要入营劳军。周亚夫这才命令军士打开军门，迎他进入营中。当文帝车驾及其随行官员进入军营后，营门的守卫军士又对皇帝的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只得吩咐侍从按辔徐行。周亚夫全身披戴盔甲，站在中营迎接汉文帝，拱手揖礼道："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听后，大为震动，马上手扶车轼，俯身答礼。接着慰劳全军将士，随后离营而去。在回长安的路上，侍从们都认为周亚夫对皇帝无礼，但汉文帝却认为周亚夫治军严明，军容整肃，令行禁止，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对臣下说："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① 一个月后，匈奴退兵，汉文帝下令提升周亚夫为中尉。

第二年六月，文帝病逝，临死前，他告诫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②刘启即位后是为汉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汉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正月，吴、楚七国联合起兵，发动叛乱。汉景帝根据文帝遗言，提升周亚夫为太尉，令其率 36 将军东击吴、楚叛军。周亚夫针对吴、楚叛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个暂时放弃部分梁国土地，诱使吴、楚叛军深入，乘机断其粮道，待其疲弊、再聚而歼之的作战方案，奏报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③得到汉景帝的批准后，他率军离开长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周亚夫平定吴、楚联军后回到长安，继任太尉。汉景帝七年（前 150 年），周亚夫被提升为丞相，受到景帝特别的器重。后因周亚夫反对景帝立刘彻为太子和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加上窦太后与梁王刘武的攻击，以及反对封匈奴降者为侯，引起景帝对他的不满，他因此称病不朝，汉景帝遂于中元三年（前 147 年）免去其丞相职务。

周亚夫晚年，其子为他买了 500 件工官尚方甲盾，准备用作葬器，因未给搬运者工钱被诬告为盗买官府器具，遭到逮捕。廷

---

①②③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尉诬说他要谋反，周亚夫据理力争，廷尉硬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他受不住不白之冤，一气之下，绝食五日，于汉景帝后元元年（前 143 年）八月吐血而亡。

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一代忠臣周亚夫含冤而死了，但他那闪光的军事业绩却永远留在史册之中。周亚夫细柳治军的严整、规范，成为历代军事将领的楷模。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更显示出出众的战略指挥才能。面对不可一世的吴楚乱军，周亚夫勇往直前，率军出征，不惧强敌。在战略部署上，周亚夫始终掌握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叛军，因此，不争暂时的一城一池之得失，而是坚决阻止住叛军向长安的进攻。当叛军进至梁地时，他攻占昌邑，深沟高垒，然后又派军绕至叛军背后，断其粮道，疲敝敌军。当梁王请景帝下令周亚夫救梁时，他根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然按兵不动，坚持自己的战略部署。直至吴军疲惫不堪，他才出兵决战，一举平定了吴楚的叛乱。这场平叛战争，周亚夫处处表现出他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六、卫 青

卫青（？～前 106），字仲卿，其先平阳（今山西临汾）人。

卫青的生父姓郑名季，早年以县吏给事平阳公主① 家，与婢女卫某私通，生下卫青。少年时期，卫青曾一度投靠郑季。由于家穷，郑季让卫青牧羊，郑妻所生的几个孩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②。大概是由于无法忍受郑家的虐待，卫青后来又回到母亲身旁，遂冒姓卫氏。长大之后，便在平阳公主府里当了一名"侯家骑"，跟随平阳公主。

建元二年（前 139 年）春，卫青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被汉

---

① 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嫁与平阳侯曹寿为妻，随丈夫的封号称平阳公主。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武帝宠幸并带回宫中，卫青很快就因卫子夫的缘故得以在建章宫中当差。随着卫子夫地位的稳固和上升，卫青也步步高升，由建章监、侍中而至太中大夫，成为汉武帝的高级顾问。

卫青骑术高超，膂力过人，元光六年（前 129 年）被汉武帝拜为车骑将军。他从此成为汉匈战争舞台上的主角，先后七征匈奴。

元光六年，卫青第一次领军出击匈奴。当时汉军分四路北上，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卫青以车骑将军出上谷。四将军各领 1 万骑兵，除了卫青是初出茅庐外，其余 3 人皆是久经沙场的宿将。但最后的战果却是公孙贺无功而还，公孙敖损失了 7000 人马，李广被俘后死里逃生，唯独卫青深入敌境，进至匈奴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龙城，杀敌 700 余。这是马邑之谋以后汉军主动出击所获得的第一个胜利，虽是小胜，但意义重大。汉武帝对卫青的旗开得胜很是高兴，封他为关内侯以示嘉奖。

元朔元年（前 128 年）秋，匈奴大举攻入辽西、渔阳、雁门，卫青受命统率 3 万骑兵出雁门，杀敌数千，打退了敌军。经过这两次出击匈奴之后，卫青作为汉军主将的地位便已奠定。

次年冬，卫青率领汉军铁骑千里奔袭，一战击溃匈奴白羊、楼烦二王，夺取被匈奴长期占领的河南地，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对西汉首都长安的威胁，为进一步反击匈奴取得了战略基地。为表彰卫青的功绩，汉武帝封他为长平侯。

元朔五年（前 124 年）春，卫青第四次出战匈奴。他引军出塞六七百里，奇袭了匈奴右贤王部，“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①。汉武帝接到战报，立刻派出使者至边塞持大将军印迎接卫青，并在军中拜他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②。汉武帝还益封卫青 8700 户，封他的三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为列侯。卫青从此完全确立了抗匈战争中汉军统帅的地位。

---

①②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第二年春，卫青又统领6将军共10万余众两出定襄，虽杀敌将近2万，但“汉亦亡两将军，三千余骑。右将军（苏）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①。汉武帝认为卫青这次战功不多，没有益封他。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做出了在漠北地区与匈奴决战的决策，卫青受命与霍去病各领5万骑兵，私负从马4万匹和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别出击匈奴。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与匈奴伊稚斜单于大战。单于突围溃走而精锐却丧失殆尽，卫青率军乘胜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这是卫青第七次亦即最后一次出击匈奴，也是作战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后，卫青虽未益封，但被拜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则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之任与他并驾齐驱。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汉与匈奴之间开始了一段长达一二十年的休战时期。离开了战场的卫青在一种既尊贵又无聊的生活中无所作为，于元封五年（前106年）溘然辞世。汉武帝下诏让卫青陪葬茂陵，他的坟墓封土形如庐山（或云指匈奴境内之寘颜山），象征着他生前的赫赫战功。

在卫青之前，汉与匈奴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边境战争，磨练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将领。但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打响之后，却是初出茅庐的卫青屡建战功并最终成为汉军的主将。卫青的作战究竟有何特点呢？

首先，是擅长使用骑兵进行长距离的奔袭战，擅长打进攻战。河南之战是西汉王朝对匈奴发起的第一次战略性进攻，卫青的铁骑出云中而往西北方向疾进，首先占领高阙以隔绝匈奴军的联络，然后迅速向南推进，对匈奴白羊、楼烦二王形成包围态势。这支汉军在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转战数千里，一战肃清了匈奴在河南地的势力。这其中的功劳有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卫青的指挥。骑兵作战的许多方面不同于步兵，进攻作战又与防御作战不同。卫青自领兵之日起，就是指挥骑兵打进攻战，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

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不断丰富、提高自己，迅速成为汉军当中以善于率领骑兵进行快速、机动的进攻战而著名的将领。

其次，是胆识过人，处变不惊，善于捕捉战机。例如，漠北战役打响之前，匈奴单于就把全部粮草和辎重转移到大后方，亲率精兵在大漠以北严阵以待。当卫青率领大军艰难地涉过大漠、正值疲惫劳倦之时，匈奴的精骑突然出现在前方。面对这种意外的险情，卫青镇定自若，立刻令部队以武刚车环绕成营，阻止了因匈奴骑兵的猛烈冲击而造成汉军阵脚大乱局面的发生，然后又指挥5000骑兵向匈奴发起冲击，变被动为主动；当两军激战方酣、天气突变之时，卫青又当机立断，利用恶劣的气候，命令汉军分左右从两翼夹击、包围匈奴。为不失战机，卫青指挥汉骑在夜间大战匈奴军，充分发挥他所领汉军长于夜战的优势，最终取得了大胜。

正是由于卫青在带兵用将、行军作战、攻防进退诸方面都优于当时的一些宿将，更好地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大规模进击匈奴的战略需要，因此他才能够被汉武帝破格任用，担当起汉军主帅的重任。司马迁说他虽“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①。这个评语，是恰如其分的。

七、霍去病

霍去病（？～前117），其先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他自幼生长在平阳公主府中，是卫青的外甥。

霍去病的父亲霍仲孺，早年曾在平阳公主府服役事，与侍婢卫少儿私通，生下去病。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于元朔元年（前128年）成为汉武帝的皇后，卫氏家族从此荣宠加身。卫少儿后来嫁给詹事陈掌为妻，霍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②，成年以后才知道自己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

②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

的身世。所以霍去病虽然生而贫贱，但却基本上长成于富贵之中。

霍去病“少言不泄”①，性格内向，言语不多。由于是皇后的外甥，年仅 18 岁就入宫为侍中，成为汉武帝的左右近臣。霍去病“善骑射”，武艺高强。元朔六年（前 123 年），汉武帝命他跟随其舅父、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卫青让他担任票姚校尉②，特地调拨 800 名最精壮的骑兵归他指挥。这一年，汉匈进行漠南会战。霍去病跟随卫青两出塞外，在第二次出战时，他率领自己“轻勇骑”脱离大部队数百里追击敌人，“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③，功冠全军，被封为冠军侯，开始崭露头角。

元狩二年（前 121 年）是霍去病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春，已经成为骠骑将军的霍去病将 1 万骑兵出陇西塞，越过焉支山千余里而与匈奴交战，斩首虏 8960 级，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取得了祁连山北麓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同年夏，他再次进军祁连山，捕斩首虏 3 万余级。同年秋，霍去病又至河西，顺利完成接应匈奴浑邪王归降的任务，使河西之地为汉所有。由于在这一年中他接连建功，所以汉武帝三次为他益封共 9300 户，连同初封冠军侯时的 2500 户，霍去病成为万户之侯，地位也迅速上升，“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卫青）”④。

元狩四年（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各自领兵渡漠远征匈奴。霍去病领 5 万骑兵出代、右北平 2000 余里，“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⑤，军功又在卫青之上。汉武帝不仅益封霍去病 5800 户，而且还设置大司马之职，令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同时出任大司马。为进一步提高霍去病的地位，武帝特地下诏，使骠骑将军的秩禄与大将军完全相等。“自是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② 票姚，唐人颜师古注为“劲疾之貌也”，即是对行动勇猛迅捷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

③④⑤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①。

元狩六年（前 117 年）九月，未满 30 岁的霍去病因病而死。汉武帝哀痛不已，下诏将霍去病的遗体埋葬在自己的陵墓之旁，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了纪念他的军功，特地为其修建了一座外形模仿祁连山形状的坟墓。

霍去病不是一个长于兵家理论的将领，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霍去病也不是一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相反，他在历史上又以"不省士"即不关心士卒的饥寒饱温而闻名。他出征之时，汉武帝曾遣太官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②。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穿域蹋鞠"③，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家。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霍去病具有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即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凶狠顽强。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例如，他为票姚校尉时，居然仅率 800 骑兵而脱离大部队，追击数百里而与数倍于己的强敌交战④。又如，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将兵迎接欲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匈奴军众"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局势十分混乱。

---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③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④ 据《汉书・匈奴传》，元朔六年春卫青第二次引 10 万大军出定襄击匈奴，虽杀敌逾万，但汉军也"亡两将军，三千余骑"，可见匈奴军当时的战斗力之强。霍去病此战斩敌 2028 人，已是自己所率兵士的三倍弱，当时与之交战的匈奴军，人数肯定要多于此数。

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先“驰入”匈奴军中，“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控制了局势。由此可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霍去病作战“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之言不虚。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如元狩二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 1 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敌数千。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师大率减什七”①，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

其次，霍去病绝不是只有意气之勇的匹夫，而是一员既勇且谋、能够决胜千里的战将。前引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语虽不无偏颇，但从中也可约略看出他的为将之道，这即是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同时又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仗，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再次，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无论是 800 人的“轻勇骑”，还是 1 万人、5 万人的大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如漠北之战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②。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作战勇敢，加上优良的装备，所以霍去病的部队很可能是汉军的精锐之一，战斗力远远强于“诸宿将所将士马”③。此外，在霍去病的麾下，还汇集了一些投降汉朝的匈奴族校尉，他们熟知匈奴道里，可以引导汉军长驱直入而不迷失方向，还可帮助汉军取食于敌，使他们得以轻装“绝大漠”，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快速的优势，捕捉战机，创造战机。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

---

① 《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②③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① 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功。

八、李 广

李广（？～前119），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出身于将门世家，其先人李信曾是秦统一中国战争中的一员战将。

由于是将门之后，李广从小就善骑射。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大举南下，兵锋直指关中。汉文帝大发兵将御寇，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参战，因“杀首虏多”②，立下军功，被选为中郎，成为汉文帝左右的武骑常侍。汉景帝即位后，李广调任陇西都尉，初次成为镇边武官，后徙为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李广以骁骑都尉跟从太尉周亚夫平叛，因功显名。此后15年间，李广先后在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六郡担任太守，足迹几乎踏遍了西汉的北部边疆，因作战凶狠而威震匈奴，亦为时人所敬重。

汉武帝即位后，“左右言广名将也”③，武帝随即将他调回长安，出任典领未央宫卫士的未央卫尉，颇有倚重之意。元光二年（前133年），李广以骁骑将军领兵参与了马邑的伏击行动。元光六年（前129年），又以卫尉为将军，率万骑出雁门。此役因陷入匈奴大军的重围，寡不敌众，士卒伤亡殆尽，李广也受伤被俘。虽然他设法逃归，但仍被判死刑，最后交了赎金，才保全性命。此后的两年多，李广过着闲散的平民生活。元朔二年（前127年），

---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②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屯守右北平（郡治平刚，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的韩安国病逝，他才被重新起用，接任右北平郡守。匈奴久闻其威名，数年之间不犯其界，右北平一带成为相对平静之地。

元朔六年（前123年）初，李广奉调回京，接替死去的石建出任郎中令。这一年，他以后将军之职两次跟从大将军卫青出师定襄，但均是无功而返。元狩二年（前121年）夏，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战河西，同时又让李广、张骞领军出右北平向西迂回，进击左贤王部。立功心切的李广率领4000骑兵先行，出塞北数百里后便为左贤王的数万骑兵包围。李广率军苦战两日，坚持到张骞所领1万人马赶来。他虽然杀敌超过4000人，但自己的军队也伤亡殆尽，功过相抵，无赏无咎。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决定出动大军深入漠北与匈奴进行决战，年逾60的李广主动请战。汉武帝嫌他年老，又认为他数次为匈奴所围，运气不济，没有允准。李广再三请求，武帝只好答应，但私下嘱咐领军的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单于对阵交锋。卫青自己也想让他的好友、中将军公孙敖立功以重新封侯，当他得知匈奴就在自己前方的消息后，立刻采取分兵措施，让身为前将军的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改从东道北进。李广见东道不仅迂回路远，而且"水草少，其势不屯行"①，曾要求充当汉军先锋，与单于死战，但卫青拒不收回成命。气恨不已的李广未与卫青辞别，便愤然踏上东道。由于没有向导，迷失道路，因而没有到达漠北。依汉军法，李广此次又有"后期当死"之罪，他对卫青愤恨不已，又不愿以高龄去面对刀笔吏的审讯，遂于卫青的大将军幕府引刀自刎。消息传出之后，其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②。

李广从古至今都被人引为英雄。他有生之时便称名将，匈奴

---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人对他既敬且惧，呼之为“汉之飞将军”①。此后，李广的名字以及“李将军”、“飞将”等称呼更成为杀敌卫国之勇将的代名词。这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李广武艺非凡，尤以“善射”著称。他“为人长，猿臂”②，具有成为优秀射手的先天条件。作为将门子弟，又长于边郡，李广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自幼就喜欢骑马射箭，其射术之高，非常人所可比拟。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在某一次出猎时，“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同传中所记李广作战时以射杀敌诸事当非虚言。

第二，李广的胆略超众。元狩二年，李广引4000骑兵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匈奴军对李广部发起猛攻，“矢下如雨”，汉军死者过半，箭镞殆尽，形势万分危急。此时的李广镇定自若，令军士列成圆阵，弓拉满，箭上弦，人人瞄准目标但引而不发，他亲自持大黄弩弓，接连射杀敌军裨将数人，吓退了敌兵。“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③。

第三，李广机智过人，是个智勇双全的猛将。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为上郡太守时，曾与匈奴的数千骑兵突然遭遇，匈奴军控制了附近的山头，摆好应战的阵势。李广所部仅百骑，皆胆战心惊，想调转马头逃命。但李广处变不惊，对部下说：“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他命令部众迎敌前行，至距敌二里处，又令下马解鞍，就地休息，说：“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匈奴军见状，不敢轻举妄动。僵持之中，匈奴军阵出现骚动，有一白马将军出阵监护其军。李广立刻率10余骑急冲上前，将其射杀，然后从容退回原处，“令士皆

---

①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②③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纵马卧”。匈奴军还是摸不清李广一行的底细，龟缩原地。至夜半时分，匈奴军担心“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乘夜色仓皇退去。李广则坚持到第二天凌晨，方才率部回营，充分显示其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

第四，李广还是个不贪钱财、爱兵如子的将领。他为人清廉，所得赏赐皆与部下分享。担任二千石级的高官长达40余年，但“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他身为高级将领，但“饮食与士共之”。有时在行军作战中遇到缺粮断水，李广总是以兵为先，“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加之他“宽缓不苛”，所以士卒“爱乐为用”①。

李广从青年时期即从军从征，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②，其间打了不少硬仗和苦仗。当他为边郡太守时，因“数与虏敌战”而打出了威名，“匈奴畏李广之略”③。但李广始终没有显赫的军功，至死都没有实现他的封侯之愿。这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李广可能是个边界防御战的专家，擅长打防守反击之战。他在御边作战中，善于充分发挥自己熟悉边境地理的优势，用兵神出鬼没，作战灵活机动快速，所以每每取胜。但是，同西汉初年一些抗匈的宿将一样，他并不擅长指挥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进行攻击性的机动作战，因而也就很难适应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形势，难以担当统领大军远征匈奴的重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广的带兵之道中来获取旁证，即：李广治军以简易粗阔而著称。他行军时“无部伍行阵”，即没有严格的编制和行阵，驻扎时往往选择水草肥美之地，使“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连夜间的巡逻放哨也一概免去，只是在前敌的远方布置些哨探，军中的文书簿籍等事也尽量从简。这样虽使士兵轻松愉快并乐于为他效命，但毕竟不是一种正规的做法。当率领少量部队在边界地区防御作战

---

①②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③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时，它或许有其合理性，因为这种做法虽然存在着无法抵挡敌军突袭的危险性，不过在客观上也有隐藏兵力及不暴露作战部署的效果。但在统领大军千里决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则断不可取。实际上，李广数次陷入匈奴的包围，与此不无关系。在置全军于被动之后，无论李广个人如何神勇，士卒如何顽强，都是难以达到歼敌取胜之目的的。

李广为人质朴少言，不会攀龙附凤，“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①，个性又很倔强，有时还意气用事②，所以就不容易赢得皇帝的欢心，受到重用。加上年纪偏大，更无力与新贵竞争，所以屡遭排挤。李广这样的抗匈名将，没有在杀敌的战场上捐躯，反而死在自己的佩刀之下，这是永远让人为之扼腕叹息的。但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封建时代，又是不足为奇的。

李广著有《李将军射法》三篇，今已亡佚。

九、赵充国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上邽县（今甘肃天水）人，后迁居金城郡令居县（今甘肃永登西北），又徙家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

赵充国出身“良家子”即所谓家世清白的殷富人家子弟，自幼生长于边郡。早年曾为骑士，约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因“善骑射”被选入羽林军。天汉二年（前99年），以假司马之职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出酒泉进击匈奴右贤王，立下军功，晋升车

---

①《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②《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元光六年获罪赎为庶人后，曾为霸陵尉所辱。后广为右北平太守，他请求以霸陵尉为随从，结果一到边郡即将该人斩首。元狩四年卫青自漠北返回后，起初本无恶言问罪之事，他只是在遣长史送酒食于李广时询问有关情况，但李广因余恨未消而拒不作答。卫青由此而怒，命长史催促李广的属吏前往帐下听审。

骑将军长史并拜为中郎。汉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三四月间，武都地区（今甘南及陕西南）的氐人起兵反汉。57 岁的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之职随军出征，凯旋回朝后，被提升为中郎将。此后，赵充国被调往上谷郡边防领兵屯戍，不久奉调回到长安，出任负责管理皇家池苑、税收和铸钱事务的水衡都尉，成为皇帝的近臣。不久，他又领兵出征匈奴，擒获匈奴的西祁王，升任后将军，兼任水衡都尉。

后将军是西汉几大将军之一，负责西北边防，地位十分重要。赵充国担任此职后，不仅负责军事工作，而且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本始元年（前 73 年）正月，赵充国因拥立汉宣帝有功而被封为营平侯。

本始三年（前 71 年）春，汉宣帝发兵 15 万，五路出击匈奴。赵充国以蒲类将军率一路大军出征，回朝后仍为后将军并兼任少府。神爵元年（前 61 年），西羌叛汉。他年已 76 岁，却自告奋勇担任汉军统帅，领兵出征。他采取安抚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恩威并施，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羌乱。班师还朝后任后将军兼卫尉。神爵二年（前 60 年），匈奴单于率 10 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①，汉宣帝又派他率 4 万余骑兵屯戍沿边九郡以为防备。匈奴单于惧于赵充国的威名，加上病势渐重，不敢入边而撤。但就在这一年，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因罪自杀，这给赵充国以不小的打击，他遂即提出退休。汉宣帝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 60 斤，让他告老还家。此后，赵充国仍然关心国事，“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②。甘露二年（前 52 年），赵充国以 86 岁的高龄辞世，汉宣帝谥为“壮侯”，以表彰他的卓越功勋。

赵充国从一名普通的骑士开始，步步升迁，最后成为“掌兵及四夷”的将军，这同他的高尚品德和优异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赵充国具有勇敢无畏、不怕牺牲的品格。天汉二年（前 99

---

①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年），他随李广利的大军在天山东麓击败匈奴右贤王军，回师途中遭到敌军的包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①，处境万分危急。赵充国挺身而出，率领100多名壮士强行突围，他负伤20余处，仍拼杀不已。汉军将士深受鼓舞，最后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摆脱了险境。回朝后，汉武帝曾在行宫召见，亲自察看他的伤情，赞叹他是真正的英雄。

然而赵充国绝不仅仅是一员能够杀敌陷阵的猛将。他“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②，从戎之后更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终于使自己成为一名深谋远虑、智勇双全的大军事家。

汉武帝用兵四方，导致西汉王朝国力衰退，人民困苦，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因而在晚年不得不改弦更张。经过昭、宣两朝的不断努力，西汉王朝才又重新恢复了元气。赵充国亲自经历目睹了这一历史进程，比一般将领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兵之利害”即战争的两重性，主张领兵打仗应当上顾国体，下恤民命，尽可能少采取军事行动而运用其他手段；为将不能逞意气之勇，贪眼前之功，一味用兵攻杀。

赵充国“通知四夷事”③，熟悉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与现状，他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不仅仅从军事角度，而且能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而提出一些高于常人的应对之策。在平定羌乱之时，赵充国首先提出用兵首恶先零羌，招抚协从罕、开诸羌的方略，然后又献罢兵屯田之计，最大限度地减少汉军征战的人员损失及财力消耗，取得了“坐支解羌虏”的奇效。这表明赵充国不仅具有一个优秀军事将领的深谋细算，而且具有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赵充国谙熟兵法，深知“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的道理，坚信“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④。用兵打仗，“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

---

①②③④《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先计而后战"①。他的这种指挥风格，在平羌作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早在羌乱发生之前，赵充国就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断定羌人将在秋季马肥之时发动叛乱，建议朝廷"宜及未然为之备"②。但有关部门并未采取防备措施，羌人果然在秋季起兵反汉。赵充国又不顾老迈，主动请缨，出任平羌的主帅。抵达金城郡后，他没有立刻赶往前线，而是等待1万骑兵聚齐后方才行动。为防止敌人在汉军渡黄河之际截击，赵充国在一个夜晚首先派出三支前锋部队衔枚偷渡，在彼岸构筑工事，掩护大军渡河。汉军刚刚完成渡河的行动，发现有近百名羌骑在汉营附近游弋。赵充国怀疑这是敌人的诱兵，而自己的部队"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即严令大军勿动："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③。在向西部都尉府出发之前，他首先派出骑兵前往险关四望峡侦察，未见敌兵，立刻引军连夜通过，占领了军事要地落都山（今青海乐都南）。此后，任凭羌兵数次在营外挑战，赵充国只是不予理会，借以挫败羌兵的锐气，同时派人对羌人进行分化瓦解。待到羌兵已经疲惫，赵充国便引军进攻叛乱中坚先零羌。先零羌望风而逃，赵充国引军"徐行驱之"。羌兵拼命逃奔，在渡湟水之中淹死了数百人，又被汉军俘虏及斩杀500余人。汉军还缴获马牛羊10万余头，车4000余辆。赵充国这种临战不急不躁，用兵讲求实效的指挥风格，完全符合量敌用兵、力求爱惜国力的原则。

赵充国还具有刚直不阿的宝贵品德。他怀抱报国爱民之心，常常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勇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并敢于犯颜进谏。他的平羌方案，就是经过反复上书谏诤，最后才被采纳施行的。

赵充国去世之后，汉宣帝把他与霍光等名臣名将画像置于未央宫的麒麟阁内。至汉成帝时，西羌方面又传警报，汉成帝特地

---

①③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隃度"即遥测，汉时长安方言说"遥"为"隃"。

让黄门侍郎杨雄在赵充国的画像旁题词歌颂，说他“料敌制胜，威谋靡亢”①，再次肯定了赵充国的平羌方略及其功绩。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后　记

《西汉军事史》为《中国军事通史》之一，系应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之约，由我与李德龙、刘曙光同志合作撰写。其中，李德龙同志撰写第一、二、三、四、五章；刘曙光同志撰写第六、八、九、十章与第七章第一至第五节；李德龙与刘曙光同志合写第十一章第三节；我撰写绪论、第七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及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目、第二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目、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目、第二节第四目，并负责对全部书稿进行统纂改定。全书的图片则概由刘曙光同志负责选定。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中国古代战略研究室研究员霍印章先生的大力帮助，他提供了基础框架提纲，仔细审读初稿和修改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书稿修改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生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田人隆两位先生又悉心加以审读，作了斧正。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汉军事史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海内外学者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完整的专著问世。本书的写作，尽可能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力图勾画出西汉军事发展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规律。但由于我们的学识与功力有限，书中不免存在谬误或疏漏之处，有些论述也不尽完善，希望方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陈梧桐

1996年4月1日